

目 錄

第二卷說明 一

一九〇七年

考茨基『俄國革命的動力和前途』一書格魯吉亞文版序言	三—三
彼得堡的競選和孟什維克	一—一〇
立憲民主黨人專制還是人民專制？	二—三
無產階級在鬥爭，資產階級在和政府締結聯盟	三—七
悼念捷里亞同志	九—三
先進的無產階級和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	三—三
一場糊塗	三—七
我們高加索的小丑們	四—四
杜馬的解散和無產階級的任務	四—四

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代表大會（一個代表的札記）…………… 四一七

一 代表大會的成分…………… 四一七

二 議事日程。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杜馬黨團的工作報告…………… 四一七

三 關於非無產階級的政黨…………… 四一七

四 關於工人代表大會…………… 四一七

給第三屆國家杜馬社會民主黨代表的委託書（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巴庫市工人選民團初選人大會通過）…………… 四一七

應當抵制協商會議…………… 四一七

一九〇八年

選舉以前…………… 八五—八六

再論有保障的協商會議…………… 八五—八六

我們最近時期的罷工說明了什麼？…………… 八五—八六

石油業主在策略上的轉變…………… 九一—九三

必須作好準備！…………… 九三—九五

經濟恐怖和工人運動…………… 九三—九五

石油業主對經濟恐怖的看法…………… 九三—九五

報刊評論	一三五—一三九
奴顏婢膝的「社會主義者」	一三五
假仁假義的祖巴托夫分子	一三七
協商會議和工人	一三一—一四〇
一九〇九年		
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	一四一—一五〇
關於即將到來的總罷工	一五一—一五五
黨的生活	一五七—一六〇
巴庫委員會關於「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內意見分歧的決議	一六一
十二月罷工和十二月合同（爲紀念其五周年而作）	一六一—一六五
一九一〇年		
高加索來信	一六六—一六九
一 巴庫	一六六
石油工業的狀況	一六七
油礦區自治	一六九
組織狀況	一七三

目 錄

「合法機會」	一三三
二 梯弗里斯	一六六
綱領上的取消主義	一七九
策略上的取消主義	一八三
巴庫委員會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決議（爲即將召開的全黨代表會議而通過）	一八七—一九一
一 關於黨的政治鼓動和真正團結	一八七
二 關於即將召開的全黨代表會議的代表資格	一九一
德國工人領袖奧古斯特·倍倍爾	一九一—一九七
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	一九一—一九三
一九一二年	
擁護黨！	二〇三—二〇七
五一萬歲！	二〇九—二一四
新的時期	二一五—二二六
自由派的偽君子們	二二七—二三八
無黨無派的怪物們	二二九—二三二

實際生活在勝利着！	三三—三五
他們幹得好……	三十七—三九
奔流起來了！……	三十一—三三
他們怎樣準備迎接選舉	三五—三七
結論……	三九—四〇
我們的目的……	四一—四四
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	四一—四四
初選人的意志	四九—五一
關於彼得堡工人選民團的選舉結果	五三—五六
一 初選人的選舉	五三
二 覆選人的選舉	五四
三 兩種統一	五五
四 代表的選舉	五七
今天選舉	五九—六一
一九一三年	
告俄國全體男女工人書（一月九日）	六三—六六

彼得堡的選舉（聖彼得堡來信）

三六九—三七一

一 工人選民團

三七〇

一 爲選舉而鬥爭

三七〇

二 給代表的委託書

三七一

三 假統一和代表的選舉

三七四

二 城市選民團

三七七

三 結論

三八〇

在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上（高加索來信）

三八三—三八七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三八九—三九六

一 民族

三九一

二 民族運動

三九〇

三 問題的提法

三九八

四 民族文化自治

三九五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義，它的分離主義

三九六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會議

三九〇

七 俄國的民族問題

三九一

社會民主黨黨團狀況

三九一—三九三

連納慘案一周年	三五一—三六八
註釋	三六九—三六八
年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	三六九—四〇二

目
錄

第二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所包括的，大部分是斯大林同志一九〇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一三年被流放到土魯漢斯克邊區時（他在那裏一直住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著作，主要是斯大林同志革命活動中的兩個時期即巴庫時期和彼得堡時期的著作。

一九〇七年上半年的著作（『考茨基「俄國革命的動力和前途」一書格魯吉亞文版序言』、『彼得堡的競選和孟什維克』等等）論述了布爾什維克在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的策略。這個時期的文章刊載在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的報紙『我們的生活報』和『時報』上。這些著作第一次用俄文印行。

一九〇七年六月以後，斯大林同志主要在巴庫進行革命活動，這一時期的著作（『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巴庫委員會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決議』、『高加索來信』）論述了布爾什維克爲保全並鞏固秘密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和孟什維克取消派進行的鬥爭。論述領導革命工人運動和領導工會問題的文章有『我們最近時期的罷工說明了什麼？』、『石油業主對經濟恐怖的看法』、『協商會議和工人』等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一個代表的札記）』一文是爲總結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而寫的。編入第二卷的斯大林同志這一時期的文章曾刊載在『巴庫無產者

報』、『汽笛報』和『社會民主黨人報』上。

從一九一一年下半年起，開始了斯大林同志革命活動中的彼得堡時期（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斯大林同志主持中央委員會俄國局，領導黨在俄國實現布拉格代表會議的決議。這個時期的著作主要是論述工人運動中新的革命高潮和布爾什維克黨在選舉第四屆國家杜馬時的任務。這些著作是『擁護黨！』（傳單）、『新的時期』、『他們幹得好……』、『奔流起來了！……』、『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初選人的意志』、『彼得堡的選舉』和其他文章。這些文章曾刊載在彼得堡的『明星報』和『真理報』上。

編入第二卷的還有斯大林同志的名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九一三年）。這部著作發展了布爾什維克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理論和綱領。

斯大林同志在土魯漢斯克流放地寫的『論民族文化自治』一文和其他若干種著作，至今還沒有找到。

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

考茨基『俄國革命的動力和前途』一書

格魯吉亞文版序言

考茨基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大家早就知道他是社會民主黨的有資望的理論家。然而考茨基不僅在這方面著名，他還以切實認真、深思熟慮的策略問題研究家見稱。在這一點上，他不僅在歐洲同志中間，而且在我們這裏也有了很高的威望。這並不奇怪：今天，當策略上的意見分歧使俄國社會民主黨分成兩派的時候，當互相批評流為無謂爭吵而常常把事情弄僵、闡明真理又極其困難的時候，聽一聽考茨基這樣一位公正而有經驗的同志的意見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的同志如此熱心地着手研究考茨基的策略論文『國家杜馬』、『莫斯科起義』、『土地問題』、『俄國農民和革命』、『猶太人在俄國遭受的蹂躪』等等，就是這個緣故。可是同志們之特別重視這本書，是因為其中談到了使社會民主黨分成兩派的一切主要問題。事情是這樣的：不久以前，普列漢諾夫請求外國同志闡明我們的各種迫切問題時，也以同樣的問題請教過考茨基，請他予以相當的答覆。從考茨基的話裏可以看出這本書就是他的答覆。既然如此，同志們自然應當更加重視。很明顯，這本書對於我們尤其具有重大的意義。

因此，我們哪怕是大致回顧一下我們意見分歧的問題，並順便闡明考茨基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會是非常有益的。

考茨基站在哪一方面呢？他支持的是誰呢？是布爾什維克呢，還是孟什維克？

使俄國社會民主黨分成兩部分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國革命的一般性質問題。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結局應當是消滅封建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試問誰來領導這個革命，誰來把人民中的不滿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呢？是資產階級呢，還是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跟着資產階級走，像法國當時那樣呢，還是資產階級跟着無產階級走？問題就在這裏。

孟什維克通過馬爾丁諾夫說，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它是法國革命的重演，既然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那末我國革命也就應當由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領導權，——這是有害的空想……」『無產階級應當跟着資產階級極端反對派走。』（見馬爾丁諾夫『兩個專政』）

而布爾什維克說，固然，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但這決不是說，它是法國革命的重演，它應當像法國那樣一定要由資產階級領導。在當時的法國，無產階級是覺悟不高的沒有組織的力量，因此革命的領導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裏。而在我國，無產階級是覺悟較高的有組織的力量，因此它已經不滿足於充當資產階級附屬品的角色，而要作爲一個最革命的階級來領導當前的運動了。無產階級領導權不是空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實，無產階級實際上正在把不滿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誰勸它『跟

着資產階級反對派走』，誰就是剝奪無產階級的獨立性，誰就是把俄國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工具（見列寧『兩個策略』）。

考茨基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自由派常常引證法國大革命，却常常引證得毫無根據。現代俄國的條件在許多方面完全不同於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見本書第三章）……『俄國的自由主義完全不同於西歐的自由主義，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說明直接拿法國大革命作為現今俄國革命的範例是非常錯誤的。西歐革命運動中的領導階級會是小資產階級，特別是大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見第四章）……『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即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的革命時期已經過去了，就俄國說也已經過去了。在俄國，無產階級不再像以前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那樣是資產階級單純的附屬品和工具，而是具有獨立革命目標的獨立階級了。』（見第五章）

關於俄國革命的一般性質，考茨基就是這樣說的；對於無產階級在目前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考茨基就是這樣了解的。資產階級不能夠領導俄國革命，所以無產階級應當出來作革命的領袖。

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二個問題是：自由資產階級是不是至少可以作為無產階級在目前革命中的同盟者呢？

布爾什維克說，不可以。固然自由資產階級在法國革命中曾起過革命的作用，但這是因為那裏的階級鬥爭沒有這樣尖銳，無產階級的覺悟不高，它滿足於充當自由派附屬品的角色；而在我國，階級

鬥爭非常尖銳，無產階級的覺悟高得多，它不能滿足於充當自由派附屬品的角色。凡是無產階級自覺地進行鬥爭的地方，自由資產階級就不再是革命的了。因此，爲無產階級的鬥爭所嚇倒的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便想託庇在反動派的卵翼之下。因此，他們反對革命甚於反對反動派。因此，立憲民主黨寧願和反動派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却不願和革命結成聯盟。是的，我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及其辯護人立憲民主黨人是反動派的同盟者，是革命的「文明」敵人。貧農却完全不然。布爾什維克說，只有貧苦農民才會向革命的無產階級伸出手來，而且只有他們才能够在目前革命的整個時期和無產階級結成牢固的聯盟。無產階級也應當支持他們去反對反動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如果這兩支主力結成聯盟，如果工人和農民互相支持，革命的勝利就有了保證。否則，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布爾什維克無論在杜馬內或在杜馬外即在初選階段都不支持立憲民主黨人。因此，布爾什維克無論在選舉中或在杜馬內只支持革命的農民代表去反對反動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因此，布爾什維克只把廣大的人羣衆團結在杜馬中革命部分的周圍，而不把他們團結在整個杜馬的周圍。因此，布爾什維克不支持任命立憲民主黨人組閣的要求。（見列寧『兩個策略』和『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

孟什維克的議論却完全不同。他們說，自由資產階級固然搖擺於反動和革命之間，但歸根到底，它仍然會靠近革命，仍然會起革命的作用。爲什麼呢？因爲法國自由資產階級起過革命的作用，因爲它是站在反對舊制度的立場上的，所以不得不靠近革命。依照孟什維克的意見，不能把自由資產階級及其辯護人立憲民主黨人叫做目前革命的叛徒，他們是革命的同盟者。這就是孟什維克在選舉中和

在杜馬內都支持他們的緣故。孟什維克硬說階級鬥爭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應當凌駕於共同鬥爭之上。正因為如此，他們號召人民羣衆團結在整個杜馬的周圍，而不只團結在杜馬中革命部分的周圍。正因為如此，他們全力支持任命立憲民主黨人組閣的要求。正因為如此，孟什維克甘願把最高綱領置之腦後，削減最低綱領，並放棄民主共和制，只求不嚇跑立憲民主黨人。或許某些讀者認爲這一切都是對孟什維克的誹謗，因而要求列舉事實。那末下面就是事實。

請看有名的孟什維克著作家馬里舍夫斯基不久以前是怎樣寫的：

『我國的資產階級不要共和制，所以我國是不會有共和制的……』，因而『……我國革命的結局應該產生立憲制，決不應該產生民主共和制』。因此，馬里舍夫斯基勸告『同志們』拋棄『對共和制的幻想』。（見『文集第一輯』第二八八、二八九頁）

這是第一點。

在選舉前夕，孟什維克的領袖切列萬寧寫道：

『無產階級如果像某些人所建議的那樣，企圖同農民一起既反對政府又反對資產階級以爭取全權的和全民的立憲會議，那就是荒謬而愚蠢的了。』他說，我們現在正力求和立憲民主黨人達成協議並組織立憲民主黨內閣（見『我們的事業』雜誌（創刊號））。

這是第二點。

然而這一切不過是寫寫罷了。孟什維克的另一個領袖普列漢諾夫却覺得寫寫還不够，他希望把

所寫的東西付諸實施。當黨內對競選策略問題進行激烈爭辯的時候，當大家問到在初選階段可否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協議的時候，普列漢諾夫竟認為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協議還不夠，而開始鼓吹直接結成聯盟，鼓吹暫時和立憲民主黨人合併。請回憶一下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九〇六年）登載着普列漢諾夫一篇短文的『同志報』（5）吧。『同志報』的一位讀者向普列漢諾夫問道，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能不能有共同綱領，如果能有的話，那末『共同的競選綱領……會是怎樣的呢？』普列漢諾夫回答說，共同的綱領是必需的，而且這種綱領應當是『全權的杜馬』……『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另外的答覆』（見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同志報』）。普列漢諾夫的話是什麼意思呢？這些話的意思不過是：在選舉的時候，無產階級的政黨（即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應當附和企業主的政黨（即附和立憲民主黨），應當和它一起印刷傳單發給工人，實際上應當拋棄全民立憲會議的口號，拋棄社會民主黨的最低綱領，而提出立憲民主黨的全權杜馬這個口號來代替它。事實上這就是拋棄我們的最低綱領去討好立憲民主黨人，抬高自己在他們心目中的聲價。

這是第三點。

然而，普列漢諾夫說得不够大胆的地方，孟什維克的第三個領袖華西里也夫却特別大胆地說出來了。請聽吧：

『首先讓整個社會、全體公民……建立一個立憲政權。既然這個政權成了人民的，人民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因階級和利益而形成的集團……着手解決一切問題。那時階級鬥爭和集團鬥爭不僅是適宜

的，而且是必需的……在目前，這種鬥爭却是致命的和罪惡的……」因此，各個不同的階級和集團必須『暫時放棄一切「最好的綱領」而合併成一個立憲黨……』『我的建議總括起來就是要有一個共同的綱領，作為綱領基礎的是奠定一個全權的社團的始基，只有這個社團才能產生適當的杜馬……』『這個綱領的內容……就是對人民代表機關負責的內閣……言論和出版的自由……』等等（見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同志報』）。至於全民的立憲會議和我們的全部最低綱領，依照華西里也夫的意見，這一切都必須『放棄』……

這是第四點。

孟什維克的第四個領袖馬爾托夫固然不同意孟什維克華西里也夫的意見，並因上述論文而傲慢地責罵他（見『評論』〔第二集〕）。可是普列漢諾夫對華西里也夫大加讚揚，依照普列漢諾夫的意見，華西里也夫是『瑞士工人的一個不知疲倦的和受人愛戴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者』，他『對俄國工人的事業會有很大幫助』（見『世界』雜誌〔一九〇六年六月號〕）。究竟相信這兩個孟什維克中的哪一個呢？相信普列漢諾夫呢，還是相信馬爾托夫？此外，難道馬爾托夫本人不久以前不會寫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紛爭正在加強專制制度的障地，因而阻礙人民解放事業的成功』（見愛里馬爾『人民和國家杜馬』第二十頁）嗎？誰不知道，這個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就是華西里也夫所提的自由主義『建議』的真正基礎呢？

可見孟什維克對自由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迷戀到何種程度，他們對自由資產階級的『革命性』

抱着這麼大的希望，以致爲了討好自由資產階級而甘願把社會民主黨的綱領置之腦後。

考茨基怎樣看我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呢？他認爲誰是無產階級的真正同盟者呢？他對這個問題說些什麼呢？

『現在（即在目前的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不再像以前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那樣是資產階級單純的附屬品和工具，而是具有獨立革命目標的獨立階級了。但在無產階級以這種姿態出現的地方，資產階級就不再是革命的階級了。俄國資產階級既然一般地是自由主義的並且執行獨立的階級政策，毫無疑義，它也就仇恨專制制度，但是它更加仇恨革命……既然它要政治自由，那末它之要政治自由，主要因爲它認爲政治自由是結束革命的唯一手段。由此可見，資產階級不是俄國當前革命運動的動力……在革命鬥爭的整個時期內，只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才有利益上的牢固共同性。正是這種共同性應當成爲俄國社會民主黨全部革命策略的基礎……沒有農民，我們現在就不能在俄國取得勝利。』（見第五章）

考茨基是這樣說的。

我們認爲這是無須解釋的。

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三個問題是：我國革命勝利的階級實質是什麼？或者換句話說，哪些階級應當在我國革命中取得勝利？哪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

布爾什維克確認，既然目前革命的主力是無產階級和農民，既然他們不互相支持就不能勝利，那

末將來取得政權的就一定是他們，所以革命的勝利將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見列寧『兩個策略』和『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

相反地，孟什維克却拒絕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他們不相信無產階級和農民將取得政權。依照他們的意見，政權應當落到立憲民主黨的杜馬手裏，因此他們異常熱心地支持成立立憲民主黨的責任內閣這一口號。這樣，孟什維克向我們提議的就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是立憲民主黨人的專政了（見馬爾丁諾夫『兩個專政』和『勞動呼聲報』⁽¹⁾、『我們的事業』雜誌等）。

考茨基怎樣看這個問題呢？

對於這一點，考茨基直截了當地說：『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力量及其勝利的可能性，就在於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民利益的共同性。』（見第五章）就是說，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一起為共同的勝利而鬥爭，革命才會勝利，——立憲民主黨人的專政是反革命的。

我們意見分歧的第四個問題是：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當然，所謂臨時革命政府會自然而然產生出來，那末，社會民主黨是否可以參加革命政府呢？

布爾什維克說，參加這種臨時政府不僅從原則上看是容許的，而且實際上也是必要的，這是為了使社會民主黨能够在那裏，在臨時革命政府中，嚴正地保護無產階級和革命的利益。既然在街頭的鬥爭中無產階級要和農民共同摧毀舊制度，既然無產階級要和農民一起流血犧牲，自然，無產階級就應當和農民一起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把革命引導到預期的結局（見列寧『兩個策略』）。

孟什維克則拒絕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他們說，這是社會民主黨所不能容許的，這對社會民主黨人是不適合的，這似乎會葬送無產階級（見馬爾丁諾夫『兩個專政』）。

對於這一點，考茨基說些什麼呢？

「很可能，在今後的革命進程中社會民主黨會得到勝利……但這並不是說，『俄國所經歷的革命能立刻在俄國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即使革命把政權暫時交給了社會民主黨』。（見第五章）

由此可見，在考茨基看來，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不僅是可以容許的，甚至可能把『政權暫時』完全轉到社會民主黨一黨手裏。

這就是考茨基對於我們意見分歧的幾個主要問題的看法。

由此可見，社會民主黨最大的理論家考茨基和布爾什維克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這一點連孟什維克也不否認，不用說，某些『正統的』孟什維克是要除外的。這些人大概根本沒有看過考茨基的這本書。例如馬爾托夫就坦白地說：『考茨基在最後結論中是同意主張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列寧同志及共同道者的。』（見『評論』第二集第十九頁）

這就是說，孟什維克不同意考茨基，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考茨基不同意孟什維克。

那末，究竟誰同意孟什維克，而孟什維克到底又同意誰呢？

請看歷史是怎樣說明這一點的。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〇六年），在鹽區（彼得堡）舉行了一次辯論會。在辯論的時候，立憲民主黨的領袖司徒盧威宣稱：『你們大家都將成爲立憲民主黨人……孟

什維克已經被稱爲半立憲民主黨人了。許多人都認爲普列漢諾夫是立憲民主黨人，的確，普列漢諾夫現在所說的話，有許多是能夠爲立憲民主黨人所歡迎的，只可惜在立憲民主黨人陷於孤立的時候，他沒有說這些話。」（見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同志報』）

請看，到底是誰同意孟什維克。

如果孟什維克也會同意立憲民主黨人並走上自由主義的道路，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一九〇七年二月十日

按該書原文刊印

署名：柯巴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彼得堡的競選和孟什維克

競選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彼得堡這樣激烈。黨派間的衝突在任何地方也都不像在彼得堡這樣尖銳。社會民主黨人、民粹派、立憲民主黨人、黑幫分子，社會民主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民粹派中的勞動團分子⁽²⁾、社會革命黨人和人民社會主義者，立憲民主黨內的左派分子和右派分子——他們彼此之間都在進行激烈的鬥爭……

但同時，各黨派的面目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彼得堡暴露得這樣清楚。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競選是一件活生生的事情，而且各黨派的面目也只有實際中才可以認清。很明顯，鬥爭進行得愈激烈，鬥爭者的面目也一定暴露得愈清楚。

在這方面，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競選時的行爲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你們大概記得孟什維克的談話吧。還在選舉以前他們就宣稱，立憲會議和民主共和制是贅疣，首先需要的是杜馬和立憲民主黨內閣，因此必須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競選協議。他們說，不這樣的話，黑幫分子就會獲得勝利。下面就是孟什維克領袖列萬寧在選舉前夕所寫的：

「無產階級如果像某些人所建議的那樣，企圖同農民一起既反對政府又反對資產階級以爭取全

權的和全民的立憲會議，那就是荒謬而愚蠢的了。」（見『我們的事業』雜誌創刊號）

孟什維克的另一個領袖普列漢諾夫附和切列萬寧，他也反對成立全民的立憲會議而提出『全權的杜馬』來代替它，說爭取這個全權的杜馬應當成爲立憲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共同綱領』（見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同志報』）。

著名的孟什維克華西里也夫則更加露骨地說，階級鬥爭『在目前是致命的和罪惡的……』，各個不同的階級和集團必須『暫時放棄一切「最好的綱領」而合併成一個立憲黨……』（見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同志報』）

孟什維克就是這樣說的。

布爾什維克一開始就斥責了孟什維克的這種立場。他們說，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協議是不合乎社會主義者的身分的，社會主義者在競選中必須獨立活動。在初選階段容許成立協議只是一種例外，而且只容許和那些把全民的立憲會議、沒收一切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等等作爲當前的口號的政黨成立協議。立憲民主黨人却攬棄這一切。『黑幫的危險』——這是自由派捏造出來恐嚇某些天真幼稚的人的。黑幫分子是『駕駛』不了杜馬的。孟什維克談論『黑幫的危險』，不過是重彈自由派的老調。可是『立憲民主黨的危險』確實存在着，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我們的責任就是把一切革命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和那些跟反動派結成聯盟來反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人作鬥爭。我們必須同時進行兩種鬥爭：既要反對反動派，又要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及其辯護人。

布爾什維克就是這樣說的。

社會民主黨彼得堡代表會議(二)開幕的日期臨近了。在這裏，在這個代表會議上，必然會有兩種策略出現在無產階級面前：一種是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協議的策略，一種是同立憲民主黨人作鬥爭的策略……那時在這個會議上，無產階級必須把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這以前所說的一切作一番評價。但是孟什維克已經感到失敗在等待着他們，感到代表會議要斥責他們的策略，於是決定退出代表會議，和社會民主黨決裂。孟什維克爲了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協議而鬧起分裂來了。他們想用和立憲民主黨人作買賣的辦法把『自己人』安置到杜馬中去。

布爾什維克堅決斥責了這種沒有氣節的行爲。他們用手頭掌握的數字證明『黑幫的危險』並不存在。他們無情地批評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勞動團分子，公開號召他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去反對反革命和立憲民主黨人。

當布爾什維克把革命分子聯合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的時候，當他們不屈不撓地實行無產階級不調和的策略的時候，孟什維克却背着工人和立憲民主黨人進行談判。

立憲民主黨人逐漸右傾了。斯托雷平把立憲民主黨人的首領米留可夫請去『進行談判』。立憲民主黨人一致同意委託米留可夫以『黨的名義』去和反動派進行談判。很明顯，立憲民主黨人是願意和反動派成立協議來反對革命的。同時，立憲民主黨人的另一個首領司徒盧威公開宣稱『立憲民主黨人爲了獲得憲法，願與皇上成立協議』(見一九〇七年一月十八日『言論報』(二))。顯而易見，立憲民主

黨人就要和反動派結成聯盟了。

可是孟什維克仍然和立憲民主黨人進行談判，仍然力求和他們結成聯盟。可憐的人們！他們竟沒有想到，他們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協議就是和反動派成立協議呵！

這時，政府當局所許可的辯論會開始了。在這裏，在這些大會上直接弄清楚了所謂「黑幫的危險」不過是一種幻想，主要的鬥爭是在立憲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進行的；誰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協議，誰就是背叛社會民主黨。在這些大會上再也看不見孟什維克了。他們曾兩三次企圖袒護立憲民主黨人，但顯然是丟了臉，所以銷聲匿跡了。立憲民主黨的嘍囉孟什維克已經失去信用。辯論場中只剩下布爾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了。在大會上完全是他們在進行鬥爭。社會革命黨人和勞動團分子拒絕和立憲民主黨人談判。人民社會主義者搖擺不定。於是布爾什維克就成爲競選的領導者了。

孟什維克這時候在哪裏呢？

他們在和立憲民主黨人商談三個代表席位的問題。這真令人難以相信；但確是事實；我們有責任把真相公開說出來。

布爾什維克聲明說：打倒立憲民主黨人的領導權！

孟什維克却拒絕這個口號，因而也就服從立憲民主黨人的領導權，做他們的尾巴。

這時，工人選民團的選舉也在進行。事實表明，在孟什維克影響比較大的區裏，工人幾乎到處都選社會革命黨人爲初選人。我們不能投票擁護那些和立憲民主黨人妥協的人，社會革命黨人總比他們

好一些。」原來工人是這樣說的。工人把社會民主黨人叫做自由派，寧願和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和社會革命黨人一起走！這就是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造成的結果！

布爾什維克繼續實行自己的不調和的策略，並號召一切革命分子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社會革命黨人和勞動團分子公開贊同布爾什維克「打倒立憲民主黨人的領導權！」的口號。人民社會主義者和立憲民主黨人決裂了。大家漸漸明白，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勞動團分子之間的協議，無論如何也不會分散選票而使黑幫分子取得勝利。會取得勝利的不是立憲民主黨人就是極左派分子，至於「黑幫的危險」不過是一種幻想罷了。

這時，立憲民主黨人和孟什維克停止談判了。看來，事情沒有如願以償。布爾什維克却和社會革命黨人、勞動團分子及人民社會主義者成立了協議，孤立了立憲民主黨人，並對反動派和立憲民主黨人發動了總進攻。在彼得堡曾公佈三種競選名單：黑幫的、立憲民主黨人的和極左派的。和孟什維克的意願相反，布爾什維克關於三種名單所說的話就這樣應驗了。

孟什維克既被無產階級擯棄，對立憲民主黨人大失所望，又受社會革命黨人和勞動團分子恥笑，並為歷史唾罵，只好放下武器，投票贊成極左派的名單，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的維波爾格區選舉委員會公開宣稱，孟什維克將投票贊成極左派分子，反對立憲民主黨人。

這就是說，孟什維克否認有「黑幫的危險」，拒絕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協議而擁護布爾什維克「打倒立憲民主黨人的領導權！」的口號了。

其次，這就是說，孟什維克攬棄自己的策略，並公開承認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了。

最後，這就是說，孟什維克不再做立憲民主黨人的尾巴，而無精打彩地跟着布爾什維克走了。選舉終於舉行了，結果全彼得堡沒有一個黑幫分子當選！

這樣就證明了布爾什維克在彼得堡的策略是正確的。

孟什維克就這樣遭到了失敗。

載於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

《我們的生活報》(三)創刊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立憲民主黨人專制還是人民專制？

誰應當在革命時期掌握政權呢？哪些階級應當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掌舵呢？人民，無產階級和農民！——布爾什維克過去和現在都這樣回答。依照他們的意見，革命的勝利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專制），以實現八小時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土地並確立民主制度。孟什維克否定人民的專制，而對於誰應當掌握政權的問題，在這以前一直沒有直接回答過。現在，當孟什維克公然轉向立憲民主黨人的時候，他們才比較大胆地宣稱，掌握政權的應當是立憲民主黨人，而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請聽吧：

『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是……怪論』（無稽之談）……這是『社會革命黨觀點的傾向』

（見孟什維克的機關刊物『當代』二〇〇四期第四頁至第五頁坡特列索夫的文章）。

不錯，很出色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清楚地說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是必需的。可是考茨基怎麼能和坡特列索夫相比：誰都知道，坡特列索夫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考茨基倒不是！

另一個孟什維克補充道：

『責任內閣的口號會變成爭取政權、爭取把政權從官僚手中轉到人民手中的口號。』（同上，

立憲民主黨人專制還是人民專制？

第三頁柯里佐夫的文章）

由此可見，照柯里佐夫的看法，責任內閣的口號應當變成人民鬥爭的口號，就是說，無產階級和農民正應當在這個口號下進行鬥爭，他們不應當爲民主共和制而應當爲立憲民主黨內閣流血犧牲。

孟什維克所稱的人民奪取政權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想想看，原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是有害的，立憲民主黨人的專政倒是有益的！照他們的說法，我們要的不是人民專制，而是立憲民主黨人專制！

對了，對了！難怪人民的公敵立憲民主黨人讚揚孟什維克！……

載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三日

「時報」(二)第二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無產階級在鬥爭， 資產階級在和 政府締結聯盟

「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不同，普魯士資產階級……已經墮落到某個等級的水平……它一開始就有背叛人民而和舊社會戴皇冠的代表妥協的傾向。」

關於普魯士的自由派，馬克思就是這樣寫的。

的確，革命還沒有真正開展，德國自由派就和『最高當局』進行勾結。他們很快地勾結上了，後來就和政府一起反對工人和農民。大家知道，馬克思多麼尖銳而準確地揭露了自由派的這種兩面性：

『它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埋怨上層，害怕下層，對上層和下層都是利己主義的，而且也意識到自己的利己主義，對保守派是革命的，對革命派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口號，懼怕世界的風暴，但又爲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它，失去任何毅力，全盤抄襲別人，它庸俗，因爲它沒有任何獨特的東西，它的獨特的東西就是庸俗，它自己和自己討價還價，沒有首創精神，沒有肩負世界歷史使命——活像一個招人咒罵的老頭子……沒有眼睛，沒有耳朵，沒有鼻子——完全是一個廢物。三月革命後掌握

普魯士國家政權的普魯士資產階級就是這個樣子。」（見『新萊茵報』）（二五）

現時在俄國革命的進程中，我們這裏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

原來我國的資產階級也不同於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我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比德國資產階級更快更直截了當地宣稱，它「要和最高當局成立協議」來反對工人和農民。自由資產階級的政黨，即所謂立憲民主黨人，早就背着人民開始和斯托雷平秘密談判了。如果他們真的不背叛人民的利益，那末，這種談判所追求的目的是什麼呢？立憲民主黨人和「軍法」大臣有什麼可談的呢？關於這一點，不久以前法國和英國的報紙報道過，政府和立憲民主黨人之間正在締結聯盟以便鎮壓革命。這一秘密聯盟的條件是這樣的：立憲民主黨人應當放棄各項反政府的要求，爲此，政府將給幾個立憲民主黨人以大臣的席位。立憲民主黨人大大叫屈，說並沒有這回事。但事實表明的確有這回事。事實表明立憲民主黨人已經跟右派和政府結成聯盟了。

杜馬中最近的一次投票不是說明立憲民主黨人和政府的聯盟，又是說明什麼呢？請回顧一下事實吧。社會民主黨人提議成立飢餓農民救濟委員會。他們希望除了議員和官僚外，讓人民自己也來從事飢民救濟工作，自己來揭穿古爾柯和利德瓦里（²⁵）之流的「英雄行爲」。這是很好的，這是大家所希望的，因爲這一切都會加強議員和人民的聯系，這一切都會使人民低沉的怨言具有自覺的性質。顯然，誰真正爲人民謀福利，誰就一定支持社會民主黨人的提議，把它看做有益於人民的辦法。但是立憲民主黨人怎樣做呢？他們支持了社會民主黨人沒有呢？沒有！他們跟十月黨人（²⁶）和黑幫分子一

致否決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提議。立憲民主黨人的首領蓋森·回答社會民主黨人說：「實行你們的提議就會引起人民運動，因此你們的提議是有害的。」（見『帆報』〔二〕第二十四號）斯托雷平給立憲民主黨人以應得的報答說：「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我完全同意你們，你們是對的。」（同上）結果，支持社會民主黨人的只有社會革命黨人、人民社會主義者和大多數勞動團分子。

這樣，杜馬就分成了兩個陣營：反對人民運動的陣營和擁護人民運動的陣營。前者包括黑幫分子、十月黨人、斯托雷平、立憲民主黨人等等，後者包括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人民社會主義者、大多數勞動團分子等等。

這不是說明立憲民主黨人已經和政府締結了聯盟，又是說明什麼呢？

可見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即宣傳不要相信人民的叛徒立憲民主黨人並號召對他們作鬥爭的策略，已證明是正確的。

但是不僅如此。原來法國和英國的報紙所散佈的上述傳聞已完全證實。最近幾天首都各報根據『可靠消息』報道，立憲民主黨人已經和政府勾結好了。你們可知道，這種勾結的條件，原來連細節也被透露出來了。固然立憲民主黨人否認這一點，但這不過是粉飾一下罷了。請聽吧：

『今日報』〔二〕根據最可靠的消息報道，斯托雷平昨天在國家杜馬中的演講，對於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決不是意外的事。關於這件事，首相、庫特列爾……和代表右派中央的費多羅夫進行了一整天的預備談判。這些人之間的決定性的協議是在『言語報』〔三〕編輯部進行的，而維特

伯爵也曾打算前去…… 協議大致可歸結爲下列幾點：（一）立憲民主黨人公開和左派各黨斷絕一切關係，並在杜馬內嚴守中間立場；（二）立憲民主黨人放棄其土地綱領的一部分，使之接近於十月黨人的土地綱領；（三）立憲民主黨人暫時不堅持民族平等的主張；（四）立憲民主黨人擁護借外債。其交換條件是答應立憲民主黨人：（一）立憲民主黨立即合法化；（二）……給立憲民主黨人以下列各部大臣的席位：農業與土地調整部、國民教育部、工商部和司法部；（三）局部特赦；（四）支持立憲民主黨人廢除軍事法庭的法案。（見『帆報』第二十五號）

事情就是如此。

當人民進行鬥爭的時候，當工人和農民爲了打倒反動派而流血犧牲的時候，立憲民主黨人却和這個反動派締結聯盟來鎮壓人民革命！

立憲民主黨人原來是這樣的人！

他們要『保存』杜馬原來就是爲了這個！

這就是他們不支持社會民主黨人成立飢餓農民救濟委員會的緣故！

孟什維克對於立憲民主黨人的民主主義所持的論點就這樣破產了。

孟什維克所採取的支持立憲民主黨人的策略就這樣破產了，自此以後，支持立憲民主黨人就等於支持政府！

在緊要關頭，只有覺悟的農民代表如社會革命黨人等才會支持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這個觀

點已證明是正確的。

很明顯，我們也應當支持他們去反對立憲民主黨人。

孟什維克也許還想繼續支持立憲民主黨人吧？……

載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七日

「時報」第六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無產階級在鬥爭，資產階級在和政府締結聯盟

悼念捷里亞同志

過分讚揚死去的同志，在我們黨內已經成了一種風氣。隱瞞弱點，誇大優點，是現時悼念文字的特色。這當然是不好的風氣。我們不願意順從這種風氣。關於捷里亞同志，我們要講的只是真話，我們要向讀者介紹捷里亞實實在在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事實告訴我們，作為一個先進工人和黨的工作者，捷里亞同志是一個毫無瑕疵、黨所非常寶貴的人。一切最能表明社會民主黨特色的東西：渴求知識、獨立自主、勇往直前、堅忍不拔、愛好勞動、道德高尚，——這一切都集中表現在捷里亞同志的身上。捷里亞體現了無產者最優良的品質。這並非言過其實。他的簡歷立刻就會向我們說明這一點。

捷里亞同志並不是什麼「學者」。他靠自修獲得了知識，成了有覺悟的人。他從察崗村（捷里亞生於庫泰依斯縣察崗村）出來以後，在梯弗里斯一個私人家中當僕人。就在那裏他學會了俄語，並養成了好讀書的習慣。但他很快就討厭僕人的職業，不久以後他進了鐵路工廠的木工車間。這個工廠使捷里亞同志得益不淺。工廠是他的學校，在那裏他成了社會民主黨黨員，在那裏他受到鍛鍊而成爲堅定的戰士，也就在那裏他成了一個有才幹的覺悟的工人。

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捷里亞在先進工人中已成了有聲望的領導者之一。從一九〇一年梯

弗里斯遊行示威⁽²⁾時起，捷里亞同志就不知休息地工作着。熱烈地進行宣傳，建立組織，參加重要會議，爲獲得社會主義知識而刻苦自修，——他的全部工餘時間就是用在這些方面。警察追捕他，『打着燈』到處搜查他，但這一切只是更加增強他的毅力和鬥爭的渴望。捷里亞同志是一九〇三年遊行示威（在梯弗里斯⁽³⁾）的鼓舞者。雖然警察跟踪追捕他，他還是高舉旗幟，還是發表演說。在這次遊行示威以後，他便完全轉入秘密狀態。從這一年起，他受組織的委託開始到南高加索各城市去『旅行』。同年，他受組織的委託到巴士姆去建立秘密印刷所。但他帶着印刷器材到巴士姆車站時就被捕了，不久以後他被解到庫泰依斯監獄。從這時起，在他的『不安定的』生活中開始了新的時期。捷里亞這一年半在監獄裏並沒有虛度。監獄成了他的第二個學校。由於經常學習、閱讀社會主義書籍並參加討論，他的學識顯著地增進了。就在那裏，終於養成了他那種爲許多同志所羨慕的不屈不撓的革命性格。但也就是這個監獄給他打上了死亡的烙印，也就是這個監獄使他得了致命之症（肺癆），這種病終於把我們這位最優秀的同志的生命奪去了。

捷里亞雖然知道自己的健康已無可挽救，但並沒有感到不安。唯一使他不安的是『虛度光陰，無所作爲』。『什麼時候我才可以從心所欲地在廣闊的天地間展開活動，重新看到人民羣衆，投入他們的懷抱，並爲他們服務呵。』這就是這位被監禁的同志的理想。這個理想終於實現了。過了一年半，他被轉移到庫泰依斯『小』監獄，但他立刻就從那裏逃出而出現於梯弗里斯。這時黨內已發生分裂。捷里亞同志當時是靠近孟什維克的，但是他完全不像那些『正統的』孟什維克，把孟什維主義奉爲『可

蘭經』，把自己當做正教徒而把布爾什維克當做異教徒。捷里亞也不像那些把自己形容成『天生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所謂『先進』工人，這些人本是無知已極，却很可笑地叫嚷我們不需要知識，我們是工人。捷里亞的特性恰恰是：反對派別成見，痛恨盲目模仿，凡事都要尋根究底。正因為如此，他逃出監獄後就立刻鑽研『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馬爾托夫的『危急狀態』、列寧的『做什麼？』和『進一步，退兩步』等書。只要看見過捷里亞當時讀書的情形，就會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面黃肌瘦的捷里亞一邊發憤讀書一邊微笑地說：『我看，要決定作布爾什維克還是作孟什維克，並不那麼容易；在我沒有研究完這些書籍以前，我的孟什維主義是建築在沙灘上的。』於是，捷里亞同志研究了必要的女獻，深刻地考慮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爭論，衡量了這一切，以後他才說：『同志們，我是布爾什維克，照我看來，那些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人無疑地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

從此以後，他就成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的使徒。根據組織的決定，他在一九〇五年到巴庫去。建立印刷所，整頓各區組織的工作，參加領導機關，給『無產階級鬥爭報』寫稿，——這就是捷里亞同志在那裏做的工作。在那次衆所周知的組織遭受破壞的時候，他也被捕，但這一回他又『脫逃』，重新趕回梯弗里斯。在梯弗里斯的領導機關工作一個時期後，他參加了一九〇五年在塔墨爾福斯召開的布爾什維克全俄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留給他的印象是很有意思的。他抱着極大的希望注視着黨的未來，目光炯炯地說：爲了這個黨，我不吝惜最後的一分力量。但不幸的是，他剛從俄羅斯回來就臥病不起了。只是在這時他才開始真正寫作。在患病期間他寫了『我們需要什麼』（見『新

生活報』(三)、『陳屍和新屍』(答佐爾扎澤)、『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①、『爲什麼把我們稱爲布朗基主義者』等等。

他在臨終前幾天曾寫信給我們說，他正準備寫一本關於高加索社會民主黨歷史的小冊子，但是無情的死神從這個不知疲倦的同志手中過早地奪去了筆桿。

這就是捷里亞同志短短的然而充滿着風暴的一生的經歷。

驚人的才能、無窮的精力、獨立的精神、對事業的熱愛、英勇不屈的氣概、宣傳者的天賦，——這就是捷里亞同志的特點。

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隊伍裏才能遇到捷里亞這樣的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產生捷里亞這樣的英雄，也只有無產階級才會竭力向吞噬了我們的同志——工人捷里亞的可恨制度復仇。

載於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時報」第十號

署名：柯……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① 上面兩本小冊子未能出版，因爲在搜查時被警察搶去。

先進的無

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是擁護布爾什維克的。彼爾什維克的策略得到信任于城市、農民的組織「斯達維克得到信任的唯一工業增長都是蔑視的。

很清楚，布爾什維克和階級意識的發展都是重有一個時期，俄國社會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色……今天却完全兩樣

先進的無產階級和黨

員達二十萬之多，它使無產階級的鬥爭逐漸具有社會民主主義的色彩，把全俄國的革命民主派都集合在自己的周圍，並使「當代有權有勢的人」感到恐懼。而這個偉大的黨之所以特別偉大和卓越，在於它的舵柄掌握在黨員羣衆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個別的「有教養的人物」手中。這一點在選舉杜馬時表現得最爲清楚。當時黨員羣衆拋棄了「權威人士」普列漢諾夫的提議，不願和立憲民主黨人有一個「共同綱領」。固然，孟什維克同志們仍舊稱我們的黨是知識分子的黨，這大概是因爲這個黨就其大多數來說不是孟什維克的緣故吧。可是，既然在一千八百萬無產者中僅擁有四十萬黨員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有權叫做無產階級政黨，那末在俄國九百萬無產者中擁有二十萬黨員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也就有權稱爲無產階級政黨了……

可見俄國社會民主黨之所以偉大，還在於它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它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未來，批判地對待它的舊「領袖」的吩咐。

最近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代表會議便是這方面的一個範例。

在這兩個代表會議上，工人都起了決定作用，在這兩個代表會議上，工人都佔代表總數的十分之九。兩個代表會議都擯棄了普列漢諾夫之流的「舊領袖」的陳舊而不適宜的「指示」。兩個代表會議都公開承認布爾什維主義是必需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就這樣表示了對孟什維克策略的不信任，承認了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必要性。

彼得堡和莫斯科發出了整個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聲音。莫斯科和彼得堡領導着其餘的城市。在

一月和十月的發動時期，指示是從莫斯科和彼得堡發出的，在光榮的十二月的日子裏，運動是由莫斯科和彼得堡領導的。毫無疑問，即將到來的革命進攻的信號也一定會由這兩個城市發出。

而彼得堡和莫斯科是採取布爾什維主義的策略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策略是唯一的無產階級的策略，——這就是這兩個城市的工人對俄國無產階級所說的話……

載於一九〇七年四月八日

「時報」第二十五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一場糊塗……

『標槍報』⁽²⁵⁾的『政論家們』至今還不能決定自己的策略。他們在創刊號上曾寫過他們所支持的只是立憲民主黨人的『進步措施』，而不是立憲民主黨人本身。我們曾指出這是滑稽可笑的詭辯，因為孟什維克曾投票擁護被選入杜馬的立憲民主黨人，而不只是擁護他們的『措施』；他們把立憲民主黨人帶進杜馬，而不只是帶進他們的『措施』；他們推舉一個立憲民主黨人爲杜馬主席，而不只是執行他的『措施』，——這清楚地證明了孟什維克支持立憲民主黨人的事實。這是如此明顯，孟什維克關於支持立憲民主黨人的話是如此之多，再來否認這一事實就只有令人發笑了……

現在他們稍微『考慮了』一下，便又說出另一套來：不錯，『在選舉時我們支持了立憲民主黨人』（見『標槍報』第三號），可是這只是在選舉時，至於在杜馬內，我們支持的並不是立憲民主黨人，而只是立憲民主黨人的『措施』；你們却『不把杜馬內的策略和選舉時的策略區別開來看』。第一、只在杜馬內防止幹蠢事而在選舉時却慫恿幹蠢事的那種『策略』是非常可笑的。第二、孟什維克推舉立憲民主黨人爲杜馬主席，這難道不是真的嗎？推舉立憲民主黨人爲主席，這應當算哪一種策略呢？算『杜馬內的策略』呢，還是杜馬外的策略？我們認爲戈洛文是在杜馬內被推舉爲杜馬主席的，而不是在街

道上被推舉為街道主席的。

顯然，孟什維克在杜馬內也實行了他們在杜馬外所實行的那種策略。這種策略就是支持立憲民主黨人的策略。如果他們現在否認這一點，這是由於他們思想一塌糊塗所致。

「標槍報」宣稱：支持立憲民主黨人並不等於抬高他們的聲價，否則，你們支持社會革命黨人也就是抬高他們的聲價了。這些「標槍報分子」真是愛開玩笑的人！原來他們沒有料到來自社會民主黨方面的任何支持都會替它所支持的那個政黨抬高聲價！因此，他們也就這樣慷慨地說出各種「支持」的諾言……是的，可愛的同志們，社會民主黨支持社會革命黨人是會抬高社會革命黨人在人民心目中的聲價的，正因為如此，這樣的支持只是作為例外和作為使立憲民主黨人失敗的手段才是可以容許的。支持社會革命黨人決不是我們的理想，而是用來壓制立憲民主黨人的一種不得已的下策。而你們支持的恰恰是出賣工人和農民的立憲民主黨人，比起這些人來，社會革命黨人却有一個優點：他們靠近革命……

「比如說，立憲民主黨人要求普選制。這本來是一種下策，因為這是立憲民主黨人的要求。」
(同上)

真是愛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原來普選制是「立憲民主黨人的要求」呀！原來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竟不知道普選制並不是立憲民主黨人的要求，而是革命民主派的要求，社會民主黨堅持這個要求比誰都更徹底！不，同志們，如果你們竟不能了解立憲民主黨人不是革命民主派，如果你們竟不能

了解和他們作鬥爭以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是我們當前的問題，如果你們竟弄不清你們昨天說的是什麼，今天說的又是什麼，那末你們最好暫時把筆擱下，首先澄清一下自己一場糊塗的思想，然後再來『批評』吧……

這樣會更好些，我們拿杜馬來賭咒……

載於一九〇七年四月十日

「時報」第二十六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我們高加索的小丑們

我們的文章惹得孟什維克的『標槍報』大發雷霆，——看來，斥責是命中要害了。這當然是非常有趣的場面……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寫過，杜馬之向右轉並不使我們驚奇。為什麼呢？因為在杜馬內佔統治地位的是自由資產階級，這個資產階級已和政府結成聯盟而和工人農民決裂了。這就是杜馬軟弱的一個原因。既然工人和革命的農民不跟隨反革命的杜馬走，既然他們也和杜馬中的大多數決裂，這就是說，我國人民比十八世紀的法國人民更有覺悟。這是杜馬軟弱的又一個原因。我們對杜馬的軟弱和它的向右轉就是這樣解釋的。

聽了這番解釋以後，我們的孟什維克竟嚇得魂不附體了，於是他們驚惶地哀號：

『不對，假如布爾什維克的解釋是正確的，那末我們只好把手一攤說，俄國的革命完了。』
(見『標槍報』第六號)

可憐的人呵！他們相信自己的革命性竟不像相信立憲民主黨人的革命性那樣堅定！自由派叛變

了革命，因此革命就削弱了！原來工人和革命的農民只等於零。如果你們沒有遠大的眼光，那就活該你們倒霉！

他們甚至對自己也不忠實。例如一年半以前，這些孟什維克在『光綫報』(3)上寫的却是另外一套：『十二月罷工使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並使它變成了保守的。革命的進一步發展應當是反對自由派。革命有沒有力量做到這一點呢？這要看誰是革命的推動者。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領袖當然也是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如果沒有強大而忠實的同盟者，它是不能單獨把革命進行到底的，而惟有農民才是這樣的同盟者。』（見『光綫報』第十二號）

是的，孟什維克在抱着社會民主黨的觀點時就是這樣說的……

但是現在，當他們背向社會民主黨的時候，他們就唱起另一種調子，宣佈自由派是革命的中心，是革命的救星。

儘管事實如此，他們却有勇氣要我們相信：高加索的孟什維克不是小丑，他們並沒有披上社會民主黨的外衣來掩飾自己的立憲民主黨的本質！

孟什維克說：『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一屆杜馬中幹得比較勇敢，他們要求成立一個對杜馬負責的責任內閣等等，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立憲民主黨人在杜馬解散後的第二天就在維波爾格宣言①上簽了字，這應當怎樣解釋呢？』

爲什麼他們今天不這樣做呢？

對於這個問題，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哲學沒有給予而且不能給予答覆。」（同上）

失魂落魄的同志們，你們安慰自己也是枉然的。我們早已答覆了這個問題：本屆杜馬之所以更加慘淡，是因為無產階級現在比在第一屆杜馬時期更有覺悟，更加團結，這就把自由資產階級推到反動派方面去了。高談自由主義的同志們，你們永遠要牢牢記住，無產階級愈是自覺地進行鬥爭，資產階級就愈是反革命。這就是我們的解釋。

可愛的同志們，而你們究竟怎樣解釋第二屆杜馬的慘淡呢？

例如你們在『標槍報』第四號上寫道，杜馬的軟弱和慘淡應當歸咎於『人民的沒有覺悟和沒有組織』。如你們自己所說，第一屆杜馬比較『勇敢』，可見那時人民是『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第二屆杜馬比較慘淡，可見今年人民的『覺悟和組織』不如去年，可見，革命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事業是倒退了！同志們，你們要說的不就是這些嗎？可愛的人呵，你們不就是想藉此來辯護自己傾向於立憲民主黨人嗎？

如果你們今後還要當小丑，那就活該你們和你們混亂的『邏輯』倒霉……

載於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三日

『時報』第二十九號

本文沒有署名

從格魯吉亞文譯成俄文

① 第一屆國家杜馬被解散後，杜馬的一些代表（主要是立憲民主黨人）於一九〇六年七月在維波爾格舉行會議，通過一項宣言，號召人民在沙皇沒有定期重新選舉杜馬以前，對政府採取不納稅、不服兵役的「消極抵抗」。——譯者註。

杜馬的解散和無產階級的任務

第二屆杜馬被解散了(三)。解散它不是平平常常的，而是吵吵嚷嚷的，正和解散第一屆杜馬時一模一樣。偽善的沙皇這次解散杜馬也頒佈了『解散宣言』，『深表惋惜』。同時頒佈了『新選舉法』，把工人和農民的選舉權剝奪得一乾二淨，甚至還發出『革新』俄國的諾言，這種『革新』當然要靠槍殺和靠第三屆杜馬來實現。一句話，不久以前解散第一屆杜馬時所幹過的一切，這次又都搬出來了。沙皇簡略地重演了一遍第一屆杜馬的解散……

沙皇解散第二屆杜馬並不是沒有原因，也決不是沒有目的的。他本想通過杜馬來和農民建立聯系，想使農民由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變為政府的同盟者，這樣來隔離無產階級，孤立無產階級，以便破壞革命事業而使革命的勝利成爲不可能。爲了這個目的，政府曾求助於自由資產階級，因爲自由資產階級在那些無知的農民羣衆中暫時還有點影響。政府就是想通過自由資產階級來和千百萬農民建立聯系。它就是想這樣利用第二屆國家杜馬。

可是結果相反。第二屆杜馬的頭幾次會議就暴露出農民代表不僅不信任政府，而且不信任自由資產者的代表。在對一系列問題的表決中，這種不信任不斷增長起來，終於發展到了公開敵視自由資

產階級代表的地步。這樣，政府就沒有能够把農民代表團結在自由派的周圍，因而也就沒有能够通過自由派把他們團結在舊政權的周圍。政府想通過杜馬來聯系農民並孤立無產階級，這一願望並沒有實現。相反地，農民代表却愈來愈團結在無產階級代表的周圍，團結在社會民主黨人的周圍，並且他們愈是疏遠自由派和立憲民主黨人，就愈加堅決地接近社會民主黨的代表。這就大大便利了在杜馬外把農民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這一事業。所以結果不是無產階級陷於孤立，而是自由資產階級和政府脫離了農民而陷於孤立（無產階級團結了千百萬農民，使他們緊緊地跟着自己走）；可見政府並沒有如願以償，遭受破壞的不是革命事業，而是反革命事業。由於這種原因，第二屆杜馬的存在對政府就愈來愈危險了。於是政府『解散了』杜馬。

爲了更順利地破壞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接近，爲了在那些無知的農民羣衆中播下敵視社會民主黨人的種子而把他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政府採取了兩種辦法。

第一、政府攻擊社會民主黨的杜馬黨團，給它的成員捏造罪名，說他們號召立刻暴動，這樣把他們說成是解散杜馬的主要罪人。它說，親愛的農民們，我們本來不想解散你們『心愛的杜馬』，可是社會民主黨人用暴動威脅我們，所以我們不得不『解散』它。

第二、政府頒佈了『新選舉法』，根據它，農民覆選人名額縮減一半，縮減之數則加在地主覆選人名額上，讓後者在全體大會上選舉農民代表；工人覆選人的名額也幾乎縮減一半（由二百三十七個覆選人縮減至一百二十四個）；政府保留了『按地區、資格和民族』重新分配選民的權利，取消了任何競

選宣傳的自由，以及其他等等。這一切爲的是：不讓革命的工人代表和農民代表進入第三屆杜馬；使杜馬裏盡是些自由主義的、反動的地主和廠主的代表；損害農民的代表權，不顧農民本身的願望，使最保守的農民代表也能够當選，藉此使無產階級不能把廣大農民羣衆公開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因而政府自己就能公開接近農民。

這就是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的真正目的。

大概自由資產階級了解了這一切，所以它通過自己的立憲民主黨人去協助政府。還在第二屆杜馬中，它就和舊政權勾結上了，一面又向農民代表討好，力圖孤立無產階級。杜馬解散的前夕，立憲民主黨人的首領米留可夫曾號召他的黨把所有的人都團結在「斯托雷平政府」的周圍，和它成立協議，向革命（實際上就是向無產階級）宣戰。立憲民主黨人的第二個首領司徒盧威甚至在杜馬解散以後還替那種把社會民主黨代表『引渡』給政府處理的『主張』作辯護，號召立憲民主黨人公開走上和革命作鬥爭的道路，跟反革命的十月黨人合夥，孤立不安分的無產階級並和它作鬥爭。立憲民主黨默不作聲，可見它是同意自己的首領的。

顯然，自由資產階級是了解目前形勢的全部重要性的。

推翻沙皇政權的任務更加明確地擺在無產階級面前了。請想一想吧。有過第一屆杜馬，也有過第二屆杜馬。可是，無論第一屆或第二屆都沒有『解決』而且也不能『解決』任何一個革命問題。一切依然如故：農民沒有土地，工人沒有八小時工作制，全體公民沒有政治自由。爲什麼呢？就是因爲沙皇

政權還沒有死亡，它還繼續存在，它在解散了第一屆杜馬以後，接着又解散了第二屆杜馬，同時組織反革命，力圖破壞革命力量，使千百萬農民離開無產者。但是革命的潛在力——城市中的危機和農村中的飢荒——繼續在起作用，日益猛烈地激動廣大的工農羣衆，日益堅決地要求解決我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沙皇政權的掙扎只有使危機尖銳化。自由資產階級力圖使農民離開無產階級，這只能加強革命。很明顯，不推翻沙皇政權，不召開全民立憲會議，就不能滿足廣大工農羣衆的要求。同樣很明顯，只有同農民結成聯盟去反對沙皇政權和自由資產階級才能解決革命的根本問題。

推翻沙皇政權和召開全民立憲會議，——這就是第二屆杜馬的解散所指給我們的道路。和慣於叛變的自由資產階級作鬥爭，和農民緊密聯合起來，——這就是第二屆杜馬的解散所告訴我們的辦法。

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自覺地走上這條道路，並光榮地完成革命領袖的使命。

載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日

〔巴庫無產者報〕創刊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

(一個代表的札記) (三)

倫敦代表大會結束了。和那些自由派的無聊文人、形形色色的維爾格什斯基^(註)之流及庫斯柯娃^(註)之流的希望相反，代表大會所給予我們的不是黨的分裂，而是進一步的團結，是全俄國先進工人的進一步統一為一個不可分割的黨。這是真正的全俄國的統一代表大會，因為我們的波蘭同志、崩得同志和拉脫維亞同志第一次最廣泛最全面地派出代表參加了這次代表大會，他們第一次積極地參加了黨代表大會的工作，從而他們也就第一次把自己組織的命運和全黨的命運最直接地聯系起來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倫敦代表大會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團結和鞏固的事業。

這就是倫敦代表大會第一個重要的成果。

但是倫敦代表大會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同樣和那些自由派的無聊文人的願望相反，代表大會是以『布爾什維主義』對『孟什維主義』的勝利，以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派對我們黨內機會主義派的勝利而結束的。當然關於各階級和各政黨在我國革命中的作用和我們對它們的態度問題，在我們之間的意見分歧是人所共知的。黨的正式中央（按成分來說是孟什維克的中央）在一系列的行動中和整個

黨抵觸，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不妨回憶一下在第一屆杜馬時期中央委員會提出立憲民主黨責任內閣的口號被黨拒絕的事實，在第一屆杜馬解散後同一個中央提出的「恢復杜馬常會」的口號也被黨拒絕的事實，中央因第一屆杜馬被解散而發出的著名的總罷工的號召又被黨拒絕的事實……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是必須結束的。爲此必須總結黨對機會主義的中央所取得的實際勝利，即過去一年來我黨發展歷史中的種種勝利。於是倫敦代表大會把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派的所有這些勝利作了一番總結，鞏固了這些勝利，並採納了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派的策略。

因此，今後黨將奉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嚴格的階級政策。無產階級的紅旗再不會倒向自由主義的狡辯家了。那種爲無產階級所不容的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這就是我黨倫敦代表大會第二個同等重要的成果。

在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旗幟下把全俄國的先進工人事實上聯合成一個全俄國的統一的黨，——這就是倫敦代表大會的意義，這就是它的一般性質。

現在我們就來比較詳細地談談這次代表大會。

一 代表大會的成分

到會代表共約三百三十人，其中三百零二人有表決權，代表十五萬以上的黨員；其餘代表只有發

言權。按派別來分，情形大致如下：（只指有表決權的）布爾什維克九十二人，孟什維克八十五人，崩得代表五十四人，波蘭代表四十五人，拉脫維亞代表二十六人。

從代表大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工人和非工人）來看，代表大會的情形如下：體力勞動的工人共有一百一十六人，辦事員和店員二十四人；其餘代表都不是工人。而體力勞動的工人按派別來分，其情形如下：布爾什維克派三十八人（百分之三十六），孟什維克派三十人（百分之三十一），波蘭代表二十七人（百分之六十一），拉脫維亞代表十二人（百分之四十），崩得代表九人（百分之十五）。職業革命家按派別來分，其情形如下：布爾什維克派十八人（百分之十七），孟什維克派二十二（百分之二十二），波蘭代表五人（百分之十一），拉脫維亞代表二人（百分之六），崩得代表九人（百分之十五）。

我們大家對這個統計數字都感到『驚訝』。怎麼回事呢？孟什維克老是叫喊我們黨的成分是知識分子佔大多數，他們日夜謾罵布爾什維克是知識分子，他們以驅逐一切知識分子出黨相威脅，他們一貫蔑視職業革命家；可是他們這個派別的工人竟比『知識分子』布爾什維克少得多！他們的職業革命家竟比布爾什維克多得多！不過我們認為孟什維克的這種叫喊就是：『誰害什麼病，誰就老談什麼病。』……

從代表的『地區分佈』來看，代表大會成分的數字更加有趣。原來大批的孟什維克代表主要是農業區和手工業區派來的：古里亞（九個代表），梯弗里斯（十個代表），小俄羅斯農民組織『斯皮爾卡』（似乎是十二個代表），崩得（極大多數是孟什維克）；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頓巴斯（七個人）。但大批

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却完全是大工業區派來的；彼得堡（十二個代表），莫斯科（十三個或十四個代表），烏拉爾（二十一個代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十一個代表），波蘭（四十五個代表）。

很明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大工業無產者的策略，是階級矛盾特別明顯和階級鬥爭特別激烈的地區的策略。布爾什維主義是真正無產者的策略。

另一方面，同樣很明顯，孟什維克的策略主要是手工業工人和農村半無產者的策略，是階級矛盾不很明顯和階級鬥爭還隱蔽着的地區的策略。孟什維主義是無產階級中半資產階級分子的策略。

數字就是這樣說明的。

不難了解，在洛茲、莫斯科或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中是不能認真地談論和自由資產階級結成聯盟這一事情的，因為這些地方的自由資產階級分子正和工人進行殘酷的鬥爭，時常以部分解僱和紛紛歇業來「懲罰」工人，——在那裏，孟什維主義是不得人心的，那裏需要布爾什維主義，需要不調和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策略。反之，給古里亞的農民或什克洛夫的某些手工業者灌輸階級鬥爭的思想却是極困難的；他們沒有感覺到階級鬥爭的劇烈的、經常的打擊，所以他們樂意作任何妥協以反對「共同的敵人」，——在那裏，暫時還不需要布爾什維主義，那裏需要孟什維主義，因為那裏充滿着妥協和調和的氣氛。

從民族觀點來看，代表大會的成分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統計數字表明孟什維克派大多數是猶太人（當然不算崩得代表），其次是格魯吉亞人，再次是俄羅斯人。布爾什維克派絕大多數却是俄羅斯

人，其次是猶太人（當然不算波蘭代表和拉脫維亞代表），再次是格魯吉亞人等等。關於這一點，布爾什維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³⁵⁾）開玩笑說，孟什維克是猶太人的派別，布爾什維克是真正俄羅斯人的派別，所以我們布爾什維克不妨在黨內來一次蹂躪猶太人的暴行。

兩個派別的成分如此，是不難解釋的，因為布爾什維主義的策源地主要是大工業區，除波蘭外，都是純粹俄羅斯人的區域；孟什維克的區域却是小生產的區域，同時是猶太人、格魯吉亞人等等的區域。

至於說到出現在代表大會上的派別，那就應當指出代表大會之在形式上分爲五派（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波蘭代表等等），只在討論原則性的問題（關於非無產階級的政黨，關於工人代表大會等等問題）以前才保有一定的作用，固然，並不是很大的作用。從討論原則問題時起，實際就不分什麼形式上的派別了，而在表決時，代表大會通常分爲兩部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所謂中派或泥潭派在代表大會上是沒有的。托洛茨基成了『漂亮的廢物』。而且全體波蘭代表都明確地站到了布爾什維克方面。大多數拉脫維亞代表也明確地支持了布爾什維克。大多數的崩得代表事實上總是支持孟什維克，而形式上却十足地奉行了兩面政策，這種政策使一方面喜歡，另一方面惱怒。盧森堡同志非常藝術地描述了崩得的這種政策。她說崩得的政策不是能影響羣衆的成熟的政治組織的政策，而是小商人的政策；這種小商人永遠在觀望，永遠在等待明天糖也許會跌價。崩得代表中只有八個到十個支持布爾什維克，而且不是經常的。

一般說來，優勢，相當大的優勢，是在布爾什維克方面。

可見這次代表大會是布爾什維克的，雖然並不很突出地是布爾什維克的。孟什維克提出的決議，只通過了有關游擊活動的決議，並且是完全偶然通過的，因為布爾什維克這一次沒有應戰，確切些說，布爾什維克不想把戰鬥進行到底，純粹出於一種願望：「就讓孟什維克同志們高興一次吧」……

二 議事日程。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杜馬黨團的工作報告

從代表大會的政治派別來看，代表大會的工作可以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關於一些形式問題的討論，如代表大會議程、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和杜馬黨團的工作報告等。這些問題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但它們都和某些派別的「榮譽」、和「千萬別得罪」某些派別「千萬別引起分裂」的想法直接或間接聯系着，所以叫做形式問題。代表大會的這一部分工作進行得最熱烈，耗費的時間也最多。這種情形的發生是由於「道德」上的考慮（「千萬別得罪」）重於原則上的考慮，所以嚴格固定的政派並沒有形成，當時不能立即猜出「誰將佔上風」，各個派別都想拉攏「謹慎的中立分子」而醉心於瘋狂地爭奪優勢。

第二部分：關於原則問題的討論，如關於非無產階級的政黨、工人代表大會等等原則問題。在這裏已經沒有「道德」上的考慮，各派按照嚴格固定的原則主張而形成了固定的政派，各派之間的力量

對比立刻清楚地顯現出來；所以代表大會的這一部分工作進行得最心平氣和，最有成果，這鮮明地證實了，討論時的原則性是代表大會的工作獲得成果和得以心平氣和進行的最好保證。

現在我們簡略地談談代表大會的第一部分工作。

普列漢諾夫同志致開幕詞，指出『有時』必須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進步分子』成立協議；以後代表大會選出了由五個人（每派一人）組成的主席團，選出了資格審查委員會，進而擬定了議事日程。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維克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完全和在去年的統一代表大會上一樣，非常激烈地反對布爾什維克把對時局的估計問題和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階級任務問題列入議程的提議。革命在走向高潮呢還是在走向低潮，根據這種情況，應當把革命『取消』呢還是進行到底；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使自己和俄國社會其他階級劃清界限的階級任務是怎樣的，——這都是孟什維克同志們所害怕的問題。他們像陰影不敢和太陽見面一樣逃避這些問題，他們不願把我們意見分歧的根源公之於世。爲什麼呢？因爲孟什維克派內部在這些問題上存在着嚴重的意見分歧；因爲孟什維主義不是一個完整的派別，孟什維主義是許多派別的混合物，這些派別在和布爾什維主義進行派別鬥爭時不容易看出來，但當從原則上提出時局問題和我們的策略問題時就會立刻暴露出來。孟什維克不願暴露自己派別內部的這個弱點。布爾什維克知道這一點，爲了使討論具有更高的原則性而堅持把上述問題列入議程。孟什維克看出原則性可以制他們的死命，便開始頑強抵抗並向『謹慎的同志們』示意說他們會感到『委屈』，於是代表大會沒有把時局等問題列入議程。最後通過了下面的議事日程：中央委員

會的工作報告、杜馬黨團的工作報告、對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杜馬問題、工人代表大會問題、工會問題、游擊活動問題、危機、同盟歇業和失業現象、斯圖加特國際代表大會^(三〇)、組織問題。

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問題，主要報告人是馬爾托夫同志（代表孟什維克）和略多沃依同志^(三一)（代表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的報告本來就不是認真分析各種現象的報告，而是一場傾心的談話，說無過的中央會怎樣從事領導黨的工作，然後怎樣從事領導杜馬黨團的工作，而「可怕的」布爾什維克又怎樣用他們的原則性來麻煩中央，妨礙中央的活動。關於中央所提出而後來沒有被黨採納的成立立憲民主黨責任內閣、「恢復杜馬常會」等等口號，馬爾托夫會辯護說，當時的局勢不穩定，而且在沉寂時期不能提出其他口號。關於中央在第一屆杜馬解散後立即發出總罷工而後來又發出局部發動的不成功的號召，馬爾托夫還是用情況不穩定和不可能準確判定羣衆情緒這一理由來作辯護。關於中央在彼得堡組織的分裂^(三二)上所起的作用講得很少。可是關於根據一部分布爾什維克的倡議而召開的軍事和戰鬥組織的代表會議，却講得非常之多。照馬爾托夫的意見，這個代表會議在黨的組織中引起了混亂和無政府狀態。在報告結束時，馬爾托夫號召代表大會注意由於時局特別複雜和混亂而造成的黨的領導工作的困難條件，不要對中央要求過苛。顯然，馬爾托夫自己承認了中央有嚴重的罪過。

略多沃依同志的報告却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照他的意見，黨中央有責任：（一）維護和實行黨

綱；(二)實現黨代表大會給它的策略指示；(三)保持黨的完整；(四)把黨的有益的工作統一起來。可是中央對於這些責任一項也沒有執行。中央本應維護和實行黨綱，可是在第一屆杜馬的著名的土地宣言^(三)問題上却向社會民主黨的杜馬黨團提議，爲了統一反對派，爲了爭取立憲民主黨人，不要把我們土地綱領中關於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的著名條款列入杜馬的宣言，而只限於簡單地聲明主張讓出土地，不說明要不要贖金。

請想一想：黨中央竟提出去掉黨綱中沒收土地這一極重要的條款。中央破壞了黨綱！中央是黨綱的破壞者，這種聞所未聞的可恥的事情，你們想得到嗎？

其次，中央委員會不但不遵行統一代表大會的指示，不但不經常加強各黨派在杜馬內部的鬥爭使杜馬外的階級鬥爭更有自覺性，不但不實現無產階級的獨立的嚴格的階級政策，反而提出成立立憲民主黨責任內閣、『恢復杜馬常會』、『擁護杜馬，反對權奸』等等口號，藉以沖淡黨在杜馬中的鬥爭，模糊杜馬外的階級矛盾，抹去無產階級的戰鬥政策和自由資產階級的妥協政策之間的一切界限而使前者適應後者。並且當中央機關報編委之一因而也是中央委員會委員之一的普列漢諾夫同志更進一步和立憲民主黨人妥協，向黨提議跟自由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拋棄立憲會議的口號而提出自由資產階級所能採納的『全權的杜馬』的口號時，中央不僅沒有抗議普列漢諾夫同志這種侮辱黨的輕舉妄動，反而表示贊同，不過不敢正式表示自己的贊同罷了。

黨中央就這樣破壞了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政策和統一代表大會的決議這兩者的起碼要求！

中央在模糊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中央在使無產階級的政策服從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策，中央在使無產階級的旗幟倒向立憲民主黨自由主義騙子，——請看孟什維主義的機會主義者把我們弄到了何等地步！

至於中央委員會不僅沒有保持黨的統一和紀律，反而經常破壞黨的統一和紀律，自己帶頭分裂彼得堡的組織，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也不願多談中央沒有把黨的工作統一起來的問題，因為這是不言而喻的。

所有這一切，中央的這一切錯誤由於什麼呢？當然不是由於那些「可怕的」人物參加了中央的會議，而是由於當時充滿了中央的孟什維主義沒有能力領導黨，它作爲一個政治流派已經徹底破產了。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央的全部歷史就是孟什維主義破產的歷史。當孟什維克同志責備我們，說我們「妨礙了」中央，說我們「麻煩了」中央等等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回答這些愛講道德的同志們：是的，同志們，我們「妨礙了」中央來破壞我們的綱領，我們「妨礙了」中央來使無產階級的策略適應自由資產階級的口味，而且今後我們還要妨礙它，因為這是我們的神聖職責……

略多沃依同志所講的大體上就是如此。

在討論中已經弄清，大部分同志，甚至某些崩得代表，都贊同略多沃依同志的觀點。如果說布爾什維克的指出中央錯誤的決議終究沒有通過，這無非是因爲「千萬別引起分裂」這種顧慮大大影響了同志們。當然，孟什維克的信任中央的決議也沒有通過。於是大會對中央的工作沒有作出估計就直

接轉到下一個問題了……

對杜馬黨團的工作報告的討論，一般說來，就是對前一個問題的討論的重複。這也很明白，杜馬黨團是在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活動的，自然，批評或捍衛中央也就是批評或捍衛杜馬黨團。

第二報告人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第一個報告人是策烈鐵里同志）的意見是很值得注意的。照他的說法，杜馬黨團（孟什維克佔多數）的口號，即統一杜馬中的反對派、不要分裂反對派、必須同立憲民主黨人一道走的口號，——這一孟什維克的口號在杜馬中完全破產了，因為在最重要的問題如預算、軍隊等等問題上，立憲民主黨人都和斯托雷平一道走，於是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就不得不和農民的代表携起手來反對政府和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不得不在事實上承認自己立場的破產，並在杜馬中實行布爾什維克的口號：必須引導農民的代表去反對右派和立憲民主黨人。

波蘭同志的意見同樣是值得注意的。他們說，不能容許杜馬黨團同人民黨人（*РД*）一起開會，因為這些波蘭黑幫分子曾一再組織而且現在還在組織屠殺波蘭社會主義者的暴行。對於這一點，高加索孟什維克的兩個首領（*Б*）相繼回答說，對於杜馬黨團重要的不是各個政黨在自己家裏做些什麼，而是它們在杜馬中的表現怎樣，人民黨人在杜馬中却多少表現着自由主義的態度。原來要鑑別各個政黨，不應當根據它們在杜馬外做些什麼，而應當根據它們在杜馬內說些什麼。這種機會主義真是登峯造極了……

大多數發言人都同意阿列克辛斯基同志的觀點，但是關於這個問題仍然沒有通過任何決議，這又是考慮到『別得罪』的緣故。代表大會把決議問題擱下，直接轉到了下一個問題。

三 關於非無產階級的政黨

現在我們從形式問題轉到原則問題，轉到我們意見分歧的問題。

我們策略上的意見分歧的問題，就是我國革命可能遭到的命運以及俄國社會各階級和各政黨在這次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其結果應當是粉碎農奴制度，而不是粉碎資本主義制度，它只能以建立民主共和國來完成，這一點大概在我們黨內意見是一致的。其次，我國革命，整個說來是在走向高潮，而不是走向低潮；我們的任務不是『取消』革命，而是把革命進行到底，這一點至少在形式上大家的意見也是一致的，因為孟什維克作爲一個派別在任何地方都還沒有發表過相反的意見。但是，怎樣把我國的革命進行到底呢？無產階級、農民、自由資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作用怎樣呢？各種鬥爭的力量要怎樣配合才能把目前的革命進行到底呢？聯合誰？打擊誰？如此等等。我們的意見分歧就是從這裏開始的。

孟什維克的意見。既然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惟有資產階級才能是革命的領袖。資產階級會是法國大革命的領袖，會是歐洲其他國家革命的領袖，所以它也應當是我們俄國革命的領袖。無

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戰士，但是它應當跟着資產階級走，推動資產階級前進。農民也是革命的力量，但是農民的反動東西太多，所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共同行動就該大大少於和民主派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對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比農民更可靠的同盟者。一切鬥爭的力量都應當以民主派的自由資產階級為領袖而團結在它的周圍。因此，決定我們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的不應當是革命的原理；以無產階級為首、和農民一起反對政府和自由資產階級；而應當是機會主義的原理：以自由資產階級為首、和一切反對派一起反對政府。由此就產生了和自由派妥協的策略。

孟什維克的意見就是如此。

布爾什維克的意見。我國革命確實是資產階級革命，但這還不是說，革命的領袖將是我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在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是法國革命的領袖，為什麼呢？因為法國無產階級當時是軟弱的，它沒有進行獨立自主的行動，它沒有提出自己的階級要求，它既沒有階級覺悟又沒有組織，它當時是跟着資產階級走的，所以資產階級就利用它作為達到自己的資產階級目的的工具。由此可見，資產階級當時並不需要國王政府做同盟者來反對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同盟者和僕人，所以資產階級當時是能夠革命的，甚至能領導革命。我們俄國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俄國無產階級決不能說是軟弱的；它提出自己的階級要求，完全獨立自主地行動已經有好幾年了；它已經具有了解自己的利益的足夠的階級覺悟，它已經結成自己的政黨，它有一個在俄國最強大的具有自己的綱領和策略原則、組織原則的政黨；在這個政黨的領導下，它已經取得對資產階級的許多輝煌的勝

利…… 在這種條件下，我國無產階級能不能滿足於充當自由資產階級尾巴的角色，滿足於充當資產階級手中的可憐工具的角色呢？它能不能、應不應跟着資產階級走，奉它爲自己的領袖呢？它能不能不做革命的領袖呢？請看看我國自由資產階級陣營中的情形吧：被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所嚇倒的我國資產階級，不但不去領導革命，反而投入反革命的懷抱，和反革命結成聯盟來反對無產階級。我國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則在全世界面前公開和斯托雷平妥協，投票贊成有利於沙皇制度反對人民革命的預算和軍隊的提案。因此，俄國自由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力量，必須和這種力量進行最無情的鬥爭，這不是很明白的嗎？考茨基同志說，在無產階級獨立自主行動的地方，資產階級就不再是革命的了…… 他說得不對嗎？

總之，俄國自由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它不能是革命的推動者，更不能是革命的領袖；它是革命的死敵，必須和它進行頑強的鬥爭。

無產階級是我國革命的唯一領袖，它既關切俄國革命，又能引導俄國的革命力量去衝擊沙皇專制制度。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把全國的革命分子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只有它才能把我國的革命進行到底。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盡一切可能來培養無產階級去起革命領袖的作用。

這就是布爾什維克觀點的實質。

在把我國革命進行到底的事業中，究竟誰能够成爲無產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呢？對於這個問題，布爾什維克的回答是：無產階級唯一比較可靠的強有力的同盟者就是革命的農民。將要和無產階

級共同作戰以反對農奴制度的一切基礎的，不是慣於叛變的自由資產階級，而是革命的農民。

根據這一點，確定我們對資產階級各政黨的態度的應當是這樣的原理：以無產階級爲首、和革命的農民一起反對沙皇制度和自由資產階級。因此就有必要反對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從而也就不容許和立憲民主黨妥協。

布爾什維克的意見就是如此。

報告人列寧和馬爾丁諾夫以及其他一切發言人的講話都沒有超出這兩個立場的範圍。

馬爾丁諾夫同志既然絕對否認可以實行無產階級領導權，並絕對擁護和立憲民主黨人聯盟的主張，也就徹底「加深了」孟什維克的觀點。

其他極大多數發言人的講話都是符合布爾什維克立場的精神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盧森堡同志的演說。她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向代表大會致賀並說出我們的德國同志對我們的意見分歧的看法（這裏我們把盧森堡在不同時間發表的兩次演說合在一起來談）。關於無產階級起革命領袖的作用、關於自由資產階級起反革命力量的作用等問題，盧森堡完全同意布爾什維克的意見，她批評了孟什維主義的首領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得，稱他們爲機會主義者，把他們的立場比作法國饒勒斯派的立場。盧森堡說：我知道布爾什維克也有一些失策、怪脾氣、過分的強硬，但是我完全了解他們並爲他們辯護，因爲對孟什維克機會主義這種曖昧不明模稜兩可的東西是不能不強硬的。法國的蓋得派^(四)也表現過這種過分的強硬，他們的領袖蓋得同志在著名的競選

招貼中宣稱：『任何一個資產者也不許投票選我，因為我在議會中將只維護無產者的利益，反對一切資產者。』儘管如此，儘管這些話這樣激烈，在蓋得派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反對饒勒斯派的鬥爭中，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總是站在蓋得派方面。對於布爾什維克也必須這樣說，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將支持他們反對機會主義者孟什維克……

盧森堡同志所說的大致如此。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盧森堡同志宣讀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給代表大會的一封信。這封信之所以值得注意，在於它勸告黨去和自由主義進行鬥爭，承認俄國無產階級作為俄國革命領袖的特殊作用，因而也就承認布爾什維主義的一切基本原理。

因此顯而易見，歐洲最有經驗的和最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公開地明確地支持布爾什維克，認為他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支持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叛徒，反對孟什維克。

主席團中波蘭代表團的代表梯什科同志演說中的某些地方也是很有意思的。梯什科同志說，兩個派別都想使我們相信他們是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但並不是任何人都容易了解：究竟是誰站在這個立場上，是布爾什維克還是孟什維克……幾個孟什維克『從左面』插嘴說：『是我們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梯什科回答他們說：『不是的，同志們！你們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這個立場上，因為你們在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這個事業中完全無能，你們只會死記偉大的馬克思的偉大的詞句而不會運用這些詞句，這一切都說明你們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

這說得真够藝術。

的確如此，就拿下面的事實來說吧。孟什維克常常說，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無論何時何地都要把無產階級變爲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這對不對呢？無疑是對的！這是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時時刻刻都應當記住的馬克思一句偉大的話。但是，孟什維克同志怎樣應用這句話呢？他們是否在促使無產階級從它周圍的資產階級分子羣衆中實際分離出來而成爲獨立自主的階級呢？他們是否在把革命分子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是否在培養無產階級去起革命領袖的作用呢？事實表明孟什維克根本沒有這樣做。相反地，孟什維克勸告無產階級更經常地去和自由資產階級成立協議，因此他們就不是促使無產階級分離出來成爲獨立自主的階級，而是促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混合在一起；孟什維克勸告無產階級放棄革命領袖的作用，把這個作用讓給資產階級，跟着資產階級走，因此，他們就不是促使無產階級變爲獨立自主的政治力量，而是促使無產階級變爲資產階級的尾巴……這就是說，孟什維克所做的和他們根據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原理所應當做的恰恰相反。

是的，梯什科同志說得對：孟什維克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

討論結束後提出了兩個決議草案：一個是孟什維克的，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其中布爾什維克的草案被大會以極大多數票通過作爲決議的基礎。

接着，大會進行修正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約八十件，主要是針對草案中的兩項：一項是關於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袖，另一項是關於立憲民主黨人是反革命的力量。這是討論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因

爲這裏特別鮮明地暴露了各個派別的面目。第一個重要的修正案是馬爾托夫同志提出的。他要求以『無產階級是先鋒隊』的字句代替『無產階級是革命領袖』的字句。他的理由是『先鋒隊』一詞能更確切地表達意思。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反駁了他。他說，問題不在於確切與否，而在於這一項中表現了兩個對立的觀點，因爲『先鋒隊』和『領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作爲先鋒隊（先進部隊），這就是在前列作戰，站在受射擊最厲害的地方，流血犧牲，同時却受別人的領導，在這種情況下，就是受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因爲先鋒隊從來不領導總的鬥爭，而總是受別人的領導。相反地，作爲領袖，這是不僅在前列作戰，而且領導總的鬥爭，引導這個鬥爭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們布爾什維克不願讓資產階級民主派來領導無產階級，我們要使無產階級自己去領導人民的全部鬥爭，引導這個鬥爭達到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目的。

結果，馬爾托夫的修正案被否決了。

其他這類性質的修正案同樣被否決了。

另一部分修正案是針對關於立憲民主黨人這一項的。孟什維克提議承認立憲民主黨人還沒有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但是代表大會沒有通過這個提議，所有這類性質的修正案都被否決了。接着孟什維克提議容許在某種情況下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哪怕是技術性的協議。代表大會也沒有通過這個提議，否決了與此有關的修正案。

最後，整個決議提付表決，結果一百五十九票贊成布爾什維克的決議，一百零四票反對，其餘的

棄權。

代表大會以極大多數票通過了布爾什維克的決議。

從此，布爾什維克的觀點成了黨的觀點。

此外，這次表決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

第一、這次表決使代表大會不再形式地、人為地劃分為五個派別（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波蘭代表、拉脫維亞代表、崩得代表），而開始了新的、有原則的劃分：布爾什維克派（其中包括全體波蘭代表和大部分拉脫維亞代表）和孟什維克派（其中幾乎包括一切崩得代表）。

第二、這次表決得出了工人代表在兩派中分佈狀況的最精確的統計數字：已經弄清布爾什維克派中的工人代表不是三十八個，而是七十七個（三十八個加二十七個波蘭代表，再加十二個拉脫維亞代表）；孟什維克派中的工人代表不是三十個，而是三十九個（三十個加九個崩得代表）。原來，孟什維克派是知識分子的派別。

四 關於工人代表大會

在說明工人代表大會問題的討論情形以前，必須介紹一下這個問題的歷史^①，因為這個問題是極端錯綜複雜的，沒有弄清的。在我們意見分歧的其他問題上，黨內已有兩個極其明確的派別，即布爾

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而在關於工人代表大會的問題上，我們有着不是兩個，而是一大堆完全沒有弄清的和彼此對立的派別。的確，布爾什維克的行動是團結的，明確的；他們根本反對工人代表大會。然而孟什維克的行動是極端混亂的：他們分成了許多集團，各唱各的調子，誰也不理誰。以阿克雪里羅得為首的彼得堡的孟什維克提議召開工人代表大會來建立黨。以艾里為首的莫斯科的孟什維克提議召開工人代表大會却不是為了建立黨，而是為了建立非黨的『全俄工人聯合會』。以拉林〔圖〕為首的南方的孟什維克扯得更遠，他們號召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既不是為了建立黨，也不是為了建立『工人聯合會』，而是為了建立一個除一切無產階級分子外，還可包括社會革命黨分子、半資產階級分子和『勞動團』分子的更加廣泛的『勞動聯合會』。至於其他影響比較小的集團和個別人物，如敖德薩和裏海東岸地區的小集團，如一本可笑的小冊子的傻頭傻腦的『作者』即所謂『流浪漢』和『舒拉』〔圖〕，那就不用提了。

孟什維克隊伍中的混亂情形就是如此。

可是，工人代表大會怎樣召開，怎樣組織，選什麼日子召開，請誰參加，由誰發起召開呢？

在這些問題上，也和在大會的目的問題上一樣，在孟什維克中間顯得一團混亂。

○ 這樣做之所以尤其必要，在於轉到資產階級報紙編輯部裏去的孟什維克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過去和現在散播了許多謊言（見『同志報』關於『工人代表大會』的文章。這篇文章是一個著名的孟什維克寫的，並在『巴庫之日』報〔三〕上轉載過）。

他們中間一部分人提議把工人代表大會的選舉和杜馬的選舉聯系起來，從而用『強制手段』組織工人代表大會；另一部分人則主張指望政府的『放任』，不得已時就請求政府的『許可』；第三部分人却建議把代表送到國外去，哪怕是三、四千人也能，就在那裏秘密舉行工人代表大會。

一部分孟什維克提議只讓正式的工人組織選派代表參加代表大會，另一部分則主張人數不下一千萬的有組織的和無組織的無產階級一律派代表參加代表大會。

一部分孟什維克提議由社會民主黨發起召開有知識分子參加的工人代表大會，另一部分則主張把黨和知識分子撇開，而只由工人自己發起召開完全沒有知識分子參加的代表大會。

一部分孟什維克堅決主張立即召開工人代表大會，另一部分則提議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暫時只限於宣傳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

那末，對現存的社會民主黨怎麼辦呢？這個黨領導無產階級鬥爭已達數年之久，在自己隊伍中團結了十五萬黨員，已經開過五次代表大會，如此等等。『把它一筆勾銷』呢，還是另有什麼辦法？對於這個問題，所有的孟什維克從阿克雪里羅得到拉林，都異口同聲地回答說，我們沒有無產階級的黨。『問題正在於我們沒有黨』，孟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向我們說，『我們只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組織』，必須通過工人代表大會建立一個黨來代替這個組織。孟什維克的報告人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就是這樣說的。

可是對不起，怎麼會是這樣呢？我黨歷次的代表大會，從第一次（一八九八年）到最近一次（一

九〇七年）的代表大會，孟什維克同志一直極熱烈地參加組織的歷次的代表大會；無產階級的這一切財力和人力的巨大耗費，為組織代表大會所必需的這種耗費，孟什維克也和布爾什維克一樣要負責的這種耗費，——這一切，難道說都是騙局和作假嗎？！

黨對無產階級發出的所有這些戰鬥的號召，孟什維克也簽了字的號召；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在黨的領導下、時常由黨發起而爆發的所有這些罷工和起義；無產階級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獲得的所有這些勝利；在黨的旗幟下，為了黨而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街頭殉難的，在西伯利亞過着囚禁生活的，在獄中受着殘害的所有這些成千上萬的無產階級犧牲者，——所有這一切，難道說都只是喜劇和騙局嗎？

難道說我們沒有黨嗎？我們只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組織」嗎？

當然，這簡直是謊話，令人憤怒的無恥的謊話。

大概也就因為這一點，阿克雪里羅得的上述聲明引起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代表的無限憤怒。這些工人代表從自己的座位上跳起，堅決地回答報告人阿克雪里羅得說：「正是你這個老待在外國的人是資產者，我們却不是；我們是工人，我們有自己的社會民主黨，我們不允許你侮辱這個黨」……

可是，假定說工人代表大會能夠舉行，假定它已經舉行，因而現存的社會民主黨就被送到檔案庫裏去了，工人代表大會不管怎樣是召開了，在代表大會上就要組織一個什麼「工人」聯合會或者什麼「勞動」聯合會了。以後究竟怎樣呢？這個代表大會會通過什麼樣的綱領呢？工人代表大會的面目

將是怎樣的呢？

一部分孟什維克回答說，工人代表大會可能通過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是要刪削一些；可是他們立刻又補充說，工人代表大會也可能不通過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他們認為這對於無產階級並不是特別糟糕的事情。另一部分人則更堅決地回答說，因為我國無產階級帶有嚴重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工人代表大會就很可能不通過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而通過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綱領。在工人代表大會上無產階級將失去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可是它將因此而得到一個把所有工人結合在一個聯合會中的工人組織。例如莫斯科孟什維克的首領切列萬寧就是這樣說的（見『策略問題』）〔四〕。

總之，『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的工人聯合會』，——這就是工人代表大會的可能成果。至少孟什維克自己是這樣想的。

顯然，關於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目的和方法的某些問題，孟什維克的意見是互不一致的，他們一致的是：『我們沒有黨，而只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組織，必須把這個組織送進檔案庫去』……

阿克雪里羅得的報告也正是在這個範圍內兜圈子。

從阿克雪里羅得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宣傳，實際上必然要變成反黨的宣傳，變成對黨作戰。

而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實際工作，也必然要變成對我們現在的黨進行破壞和瓦解的實際工作。可是孟什維克通過他們的報告人和他們的決議草案，請求黨代表大會禁止那種反對組織工人代

表大會的宣傳，即禁止反對破壞黨的宣傳。

值得注意的是：孟什維克發言人（普列漢諾夫除外，因為他根本沒有談到工人代表大會的問題）的演說中所特別強調的是打倒黨、打倒社會民主黨、無黨無派萬歲、非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聯合會」萬歲一類的口號。雖然這些口號不是由發言人公開提出的，却從他們的演說中透露出來了。

無怪乎所有資產階級的文人，從工團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到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都這樣熱烈擁護召開工人代表大會。要知道他們都是我們黨的敵人，而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實際工作會大大削弱黨，破壞黨。他們怎麼會不歡迎「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呢？

布爾什維克的發言人所講的却完全不同。

布爾什維克的報告人林多夫同志^(註)簡略地指出了孟什維克中各個主要派別的特點以後，進而說明產生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的各種條件。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宣傳是在一九〇五年，即在十月事件前的反動高壓時期開始的。在十月、十一月間，這種宣傳停止了。在反動高壓重新開始後的幾個月中，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宣傳又活躍起來。在第一屆杜馬時期，在比較自由的日子裏，這種宣傳沉寂了。後來，在杜馬解散以後又加緊起來，如此等等。結論是明顯的：在比較自由的日子裏，在黨有可能自由擴大的時候，召開工人代表大會以建立「廣大的非黨的黨」的宣傳自然就失去了基礎；反之，在反動高壓、黨員紛紛退黨而不是新黨員大批入黨的時候，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宣傳，即採取人為的辦法來擴大狹隘的黨或代之以「廣大的非黨的黨」的宣傳，就獲得一定的基礎。可是不言而喻，

任何人爲的辦法都無濟於事，因為要真正擴大黨，需要的是政治自由，而不是工人代表大會，因為工人代表大會本身還需要這種自由呢。

其次，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具體說來，是根本荒謬的，因為這種主張所依據的不是事實，而是不正確的論點：『我們沒有黨』。問題在於我們有無產階級的黨，這個黨大聲疾呼，說明自己的存在，這個黨使無產階級的敵人感到非常頭痛，——這一點孟什維克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正因為我們已經有這樣的黨，正因為如此，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根本是荒謬的。當然，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擁有十五萬以上先進無產者並領導着幾十萬戰士的黨，如果我們只是影響很小的一小羣人，像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或七十年代的法國社會主義者那樣，那末我們自己就會竭力設法召開工人代表大會，以便從這個代表大會中擠出一個社會民主黨來。但是問題在於我們已經有了黨，有了在羣衆中有巨大影響的真正無產階級的黨，所以爲了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爲了建立幻想的『非黨的黨』，我們就不可避免地首先要『取消』現存的黨，首先要毀掉現存的黨。

正因為如此，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工作實際上就必然要變成破壞黨的工作。而能否在某個時候建立起『廣大的非黨的黨』來代替黨，是否需要建立這樣的黨，這還是個問題。

正因為如此，我們黨的敵人，形形色色的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才這樣熱心讚揚孟什維克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宣傳。

正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才認爲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工作是危險的，有害的，因爲這種工作會破

壞黨在羣衆中的威信，會使羣衆受到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

林多夫同志所說的大致如此。

擁護工人代表大會而反對社會民主黨呢，還是擁護黨而反對工人代表大會？

問題就這樣擺在黨代表大會的面前。

布爾什維克工人代表立即了解了這個問題，並堅決地起來『保護黨』。他們說：『我們是黨的愛護者，我們愛自己的黨，我們不允許萎靡不振的知識分子破壞黨的威信。』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盧森堡同志完全贊同布爾什維克。她說：『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不能了解孟什維克同志的可笑的張皇失措，他們在摸索着尋找羣衆，而羣衆自己却在尋找黨，緊緊地向黨靠攏。』……

從討論中可以看出極大多數的發言人是支持布爾什維克的。

在討論結束以後，大會把布爾什維克的決議草案和孟什維克的決議草案提付表決。其中布爾什維克的草案被通過作爲決議的基礎。帶原則性的修正案幾乎都被否決，通過的只有一個多少還算重要的修正案，即反對限制自由討論工人代表大會問題的修正案。全部決議說明了『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會使黨遭受破壞』，『會使廣大工人羣衆受到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說明了這個主張本身對無產階級是有害的。同時這個決議把工人代表大會跟工人代表蘇維埃及其代表大會嚴格地區別開來。工人代表蘇維埃及其代表大會不僅不破壞黨，不僅不和黨競爭，反而會鞏固黨，跟着黨走，幫助

黨解決革命高潮時期的各種實際問題。

最後，全部決議以一百六十五票對九十四票的多數被通過。其餘代表棄權。

這樣，代表大會就把召開工人代表大會這個有害的、反黨的主張拋棄了。

這個問題的表決給我們揭示了如下的重要現象：參加表決的一百一十四個工人代表中，贊成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原來只有二十五人，其餘都投反對票。按百分比計算，工人代表中百分之二十二贊成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百分之七十八反對。特別重要的是：在贊成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九十四個代表中，工人只佔百分之二十六，知識分子却佔百分之七十四。

要知道，孟什維克老是叫喊，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是工人的主張，只有「知識分子」布爾什維克才反對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等等。如果根據這次投票來判斷，那最好應當承認：相反地，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是知識分子幻想家的主張……

要知道，甚至工人中的孟什維克顯然也不是都贊成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在三十九個工人代表（三十個孟什維克加九個崩得代表）中，贊成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只有二十四人。

一九〇七年於巴庫

第一次載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日和七月十日

「巴庫無產者報」創刊號和第二期

署名：柯巴·伊萬諾維奇

給第三屆國家杜馬 社會民主黨代表的委託書

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巴庫市工人選民團初選人大會通過

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代表應當組成一個特別的黨團，這個黨團作為黨的組織之一，必須和黨保持最密切的聯繫，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和黨中央的指示。

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基本任務就是協助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教育和階級鬥爭，以便使勞動者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使無產階級完成它在俄國目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所應當擔負的政治領袖的使命。

爲了這個目的，黨團在一切場合下都應當提出無產階級自己的階級政策，使社會民主黨有別於其他一切組織和一切革命黨派（從立憲民主黨人起到社會革命黨人止）。它無論如何也不能爲了和杜馬中任何黨派在對付政府方面保持一致行動而拋棄這個任務。

我們的代表應當在杜馬中堅持不懈地揭露各種地主黑幫政黨和慣於叛變的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的全部反革命實質。另一方面，他們應當竭力使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黨派（社會革

命黨人、人民社會主義者和勞動團分子）擺脫自由派，推動它們走上徹底的民主革命政策的道路，領導它們進行反對黑幫和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鬥爭。同時，社會民主黨黨團應當和反動的假社會主義的空想作鬥爭，因為社會革命黨人、人民社會主義者及其他黨派利用這些空想來掩蓋他們那種實質上是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利用這些空想來模糊工人階級純潔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階級意識。我們的黨團應當藉杜馬講壇向全國人民闡明目前革命的全部真實情況，應當大聲疾呼地向人民說明，在俄國不可能用和平方法求得人民的解放，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全體人民起來反對沙皇政權。

社會民主黨的口號，就是召開由全體人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投票的選舉法自由選出的立憲會議，這個立憲會議在徹底推翻沙皇專制政體後，將在俄國建立民主共和國。爲了實現這個口號，社會民主黨必須號召羣衆進行新的公開鬥爭。自由資產階級爲對抗無產階級的口號而提出的其他任何口號，如責任內閣等等，都不是社會民主黨黨團所能接受和支持的。

社會民主黨黨團在參加國家杜馬的日常立法工作和其他活動時，應當追求的是完成自己的經常批評和經常鼓動的任務，而不是直接立法的目的，同時要向人民說明，當實權還全部操在專制政府手中時，立法是完全不可靠的和毫無效果的。

如果社會民主黨黨團在第三屆國家杜馬中能這樣工作，就會有助於無產階級和跟它一道的農民目前在杜馬外所進行的反對沙皇專制政體的革命鬥爭。

一九〇七年九月印成傳單

按傳單原文刊印

應當抵制協商會議！（四九）

關於參加或抵制同石油業主舉行的協商會議的問題在我們並不是一個原則問題，而是一個怎樣做才算合理的實踐問題。我們不能像某些被激怒的和不完全正常的「個人」所提議的那樣，對任何協商會議一概加以抵制；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能像我們那些立憲民主黨人型的同志們所想像的那樣，對協商會議一概決定參加。我們應當根據活的事實，而且只能根據事實來處理參加或抵制的問題。並且可能有這樣的情形：在某種實際情況下，在某種條件下，我們團結羣衆的任務使參加成爲必要，那時我們就一定參加協商會議；反之，在另一種條件下，同樣的任務却可能使抵制成爲必要，那時我們就一定抵制協商會議。

其次，爲了避免發生混亂，我們必須預先確定我們所運用的概念。「參加」協商會議是什麼意思呢？「抵制」協商會議又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我們在各種會議上說明共同的要求，選舉初選代表等等，目的不是爲了破壞協商會議，相反地，是爲了參加協商會議，以便遵照協商會議的規章，依據這種規章去和石油業主進行談判，並在最後訂立某種合同，那末我們應當把我們的這種行爲叫做參加協商會議。但是，如果我們擬定要求，選出初選代表來更好地說明這些要求，傳播並公佈已經擬定的

要求，目的不是爲了參加同石油業主舉行的協商會議，而是爲了破壞協商會議，破壞在鬥爭前和石油業主訂立任何合同（我們認爲在鬥爭後，特別是在勝利的鬥爭後，訂立合同是必要的），那末我們應當把我們的這種行爲叫做抵制協商會議。當然這是積極的抵制，因爲這種抵制最後會破壞協商會議。

同時，決不應當把對付杜馬的策略和對付協商會議的策略混爲一談。參加或抵制協商會議是爲了準備條件以改善石油業中現存的制度，而參加或抵制杜馬則是爲了改善國內一般的狀況。協商會議的命運完全是由當地的無產階級獨自決定的，因爲沒有無產階級參加，協商會議自然就開不起來，而參加或抵制杜馬的命運則不單由無產階級決定，還要用農民決定。最後，積極的抵制（破壞）協商會議即使沒有積極的發動也能順利實現，至於抵制杜馬，其結果就不是這樣了。

一般意見已經說明了。現在我們來談談抵制即將舉行的協商會議這個具體問題。

巴庫工人經濟鬥爭的歷史可以分爲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到最近爲止的鬥爭時期。這一時期主要的活動人物是機電工人，而油礦工人（巴）則幼稚地輕信地跟着機電工人走，就像跟自己的領袖走一樣，他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生產中的重大作用。石油業主在這個時期的策略可以說是向機電工人討好的策略，向機電工人一貫讓步而對油礦工人一貫不理的策略。

第二個時期是以油礦工人的覺醒、他們在舞台上的獨立活動，同時把機電工人排擠到次要地位而開始的。可是這種活動帶着滑稽可笑的性質，因爲：（一）它所要求的沒有超越可恥的獎金的範圍；

所以我們認爲，現時，在總鬥爭之前，當局部門爭還在進行的時候，當總鬥爭還在前面的時候，當石油業主還在濫發獎金、企圖使油礦工人離開機電工人並腐蝕他們幼弱的意識的時候，在這時候『參加協商會議』，參加即將舉行的協商會議，號召工人和石油業主一起訂立雙方必須遵守的合同，那就不是消除而是鞏固羣衆頭腦中『別什凱什』的成見。這就是說，灌輸到羣衆的意識中去的不是不信任石油業主的的思想，而是信任他們的思想。這也就是說，我們不是把油礦工人團結在機電工人的周圍，不是使他們靠攏機電工人，而是暫時把他們撇開，把他們拋到資本家的魔掌中去。

當然，『因禍得福』，協商會議目前就其組織鬥爭方面來說，就柯切加爾同志^三所說的『擴大鬥爭』方面來說，也能够帶來某些好處。但是，如果協商會議帶來的害處絕對超過上面所說的某些好處，那就一定要拋棄協商會議這個廢物。因爲，如果柯切加爾同志主張『參加協商會議』主要是由於協商會議能『組織』和『擴大鬥爭』，那就簡直令人不能理解，爲什麼在羣情憤激的時候，在總鬥爭的前夕，在組織中的總鬥爭的初期不去『參加協商會議』呢？怕什麼呢？那時不正是特別需要『普遍組織』和『擴大鬥爭』嗎？那時不正是羣衆最不應當接受上面的讓步嗎？但是問題也正在於選舉初選代表並不等於組織羣衆。問題也正在於所謂組織（當然是我們所了解的，而不是加邦所了解的）首先就是發展勞資間勢不兩立的意識。只要有了這種意識，其他一切自然就好辦了。

可是即將舉行的協商會議恰恰不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在目前的條件下，符合我們的任務的唯一策略只能是抵制協商會議的策略。

抵制的策略能最好地發展工人和石油業主之間勢不兩立的意識。

抵制的策略能動搖『別什凱什』的成見，使油礦工人拋開石油業主，從而把他們團結在機電工人
的周圍。

抵制的策略能灌輸不信任石油業主的思想，從而能在羣衆面前最好地強調指出鬥爭的必要性，
強調指出這是改善生活的唯一手段。

因此，我們應當展開抵制運動；舉行工廠大會，擬定要求，選出初選代表來更好地說明共同的要
求，印發這些要求，解釋這些要求，把這些要求再一次交給羣衆去最後批准，如此等等。而這一切都
要在抵制的口號下進行，以便使共同的要求成爲普遍歡迎的要求，充分利用各種『合法機會』去抵制
協商會議，使它成爲笑柄，從而強調指出，爲實現共同的要求，必須進行鬥爭。

總之，應當抵制協商會議！

載於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汽笛報』第四號

署名：柯……

按報上原文刊印

應當抵制協商會議！

八三

選舉以前

石油業主先生們退却了。不久以前他們還通過自己的『石油事業報』^[5]編輯說，巴庫的工會是『外來的非工人的東西』。政府當局遵照他們的意旨，到處張貼佈告，請工人推舉初選代表參加籌備委員會，想藉此排除工會對協商運動的領導。這是昨天的情形。而現在，一月七日，工廠視察員通知各工會的書記說，石油業主舉行了會議，決定建議市長先生發給各工會在油礦和工廠舉行會議的許可證。

資本家先生們懼怕工會的影響加強，他們希望工人處於散漫和解體狀態。爲了這個目的，他們甚至不肯承認油礦工人委員會和工廠工人委員會。但是我們現在已迫使他們承認：領導解決工人生活中最大問題之一即協商會議和集體合同問題的，將是而且必須是工會。

達什納克黨人^[6]和社會革命黨人先生們雖然幫助石油業主先生們和政府當局反對工人的組織，但我們已迫使他們承認工會的領導作用了。

達什納克黨人先生們急忙響應了市長先生的號召，立刻着手進行選舉。當然，他們有自己的目的；破壞工會所提出的進行協商運動的條件，其中主要的一條就是承認工人的組織。

但是石油業主先生們並不滿意達什納克黨人的匆忙活動。附和達什納克黨人的只有一些小公司，如阿比楊茨、「霓虹」、阿拉拉特、法羅斯等公司，而在大公司中，只有兩三個阿爾明尼亞公司進行了選舉。

「裏海—黑海」、諾貝爾、柯柯列夫、「波爾恩」、施巴也夫、阿薩杜拉也夫、「莫斯科—高加索」等公司的工人都通過了決議，抗議這種選舉，並拒絕在許可證發給工會之前參加選舉。

規模最大又最有勢力的各公司的工人都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意志。這樣，他們就不僅答覆了石油業主先生們，而且答覆了那些太愛講漂亮話的「朋友們」。

工人們的決議明確地證實：工會提出的條件並不是「領袖們」捏造的，像社會革命黨人在他們的小冊子「爲什麼我們不去參加協商會議」中所武斷的那樣。

政府當局、石油業主和達什納克黨人都竭力阻撓工會影響的擴大。工人却信任工會並表示贊同工會所提出的條件。

「協商」和「談判」這些字眼對於工人不是而且也不應當是可怕的東西，正如工人不怕在罷工前夕進行談判和提出要求一樣。提出要求有時可以使衝突不必用罷工方式來解決。不過往往有相反的情況。爲了使「談判」能向工人揭示事情的全部真相，爲了使協商運動能廣泛提出和公開討論工人生活中的一切問題，從而使工人獲得極寶貴的幫助，就必須實行工會所提出的、將列入給當選初選代表的委託書中的條件。

任何談判，只要在全體工人羣衆面前進行，就『沒有什麼可怕』。工會所提出的條件將保證全體工人能廣泛參加討論和協商會議有關的一切問題。

申德里柯夫式的協商會議的覆轍，永遠不會重蹈了。

我們已經做到使那些『靠攏』機械工會的弟兄們放棄『不論條件如何都要協商』的口號而跟着我們走了。他們並且決定抵制那種不接受基本條件，即不承認工會領導作用的選舉。我們還要做到再不會有人贊成『不論條件如何』都要抵制的主張。協商會議，主要是協商運動，只要提供這方面所必要的條件，工人是可以參加的。

工人們最近通過的幾項決議已證實我們的立場是正確的。

許可證已經發給我們了。這就是說，我們已經使政府當局和石油業主承認工會的領導作用了。

大公司的大多數工人都贊成在我們所指出的條件下參加選舉。

我們現在可以沉着而有信心地着手推舉初選代表，我們建議給他們提出如下的委託書：選出十六名協商代表，由他們要求首先承認下列各項作爲參加籌備委員會進行談判的必要條件：

(一) 舉行協商會議的時間，應由工人和業主的初選代表作爲平等的雙方（即根據雙方協議）確定。

(二) 根據每一百工人產生一個初選代表的原則而選出的全體初選代表的會議，必須存在到協商會議結束爲止。此項會議必須定期召開，必要時得隨時召開，以便討論工人、協商委員和協商代表

的報告，並給他們以指示。

(三) 初選代表有權在工廠、油礦和修理廠中舉行會議，以討論所要求的和所提出的合同條件。

(四) 石油工會和機械工會理事會都有權派沒有表決權的協商代表參加跟石油業主舉行的協商會議，並有權在協商會議的各個委員會中，在初選代表的會議上，在工廠、油礦等集會上作報告。

(五) 參加籌備委員會的協商代表由初選代表委員會作為統一的整體不分生產部門地選出，在籌備委員會中，同樣作為統一的整體進行談判（為全體工人商定統一的合同）。

載於一九〇八年一月十三日

「汽笛報」第十四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再論有保障的協商會議

協商運動正進行得熱火朝天。初選代表的選舉即將結束。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不久就要召開。要不要舉行協商會議，最好是在什麼保障（條件）下舉行協商會議，該怎樣了解這些保障，——這就是初選代表委員會首先要研究的問題。

我們在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上的行動路綫應當是怎樣的呢？再說一遍，和石油業主舉行協商會議，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一件新事情。我們在一九〇五年舉行過一次協商會議。一九〇六年又舉行過第二次協商會議。這兩次協商會議給了我們些什麼，教會了我們些什麼，是否對我們有用呢？

無論當時或是不久以前，都有人向我們說，沒有任何條件的協商會議本身就能把羣衆團結起來。然而事實表明，過去的兩次協商會議沒有一次把羣衆團結起來，而且也不能把羣衆團結起來，因為僅僅進行了選舉，全部「團結」就以此告終了。

爲什麼呢？

再論有保障的協商會議

因爲在籌備前兩次協商會議時，根本就沒有什麼言論和集會的自由，沒有可能在各工廠、油礦和工人宿舍召集羣衆，也沒有可能就每一個問題擬定委託書並一般地讓羣衆積極參與協商會議的全部工作。所以當時羣衆只好不進行活動，僅僅一些協商代表離開工人羣衆很遠地在進行活動。可是我們早已知道，羣衆只有在行動中才能組織起來……

其次，因爲當時沒有初選代表委員會，這樣一個工人的常設機關能够在協商會議整個開會期間自由活動，把各公司和各區的工人聯合在自己的周圍，擬定這些工人的要求，並根據這些要求來監督工人協商代表。但設立這種初選代表委員會，石油業主不肯同意，而協商會議的發起人對這一點也就順從地妥協了。

我們更不必說，當時還沒有工會，這種領導運動的中心能够把初選代表委員會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引導它沿着階級鬥爭的道路前進……

以前有人向我們說，甚至協商會議本身就能滿足工人的要求。但是前兩次協商會議的經驗把這種說法也駁倒了。因爲當我們的協商代表在第一次協商會議上一談到工人的要求時，石油業主們就打斷他們的話，說「這和協商會議的議程無關」，說協商會議的使命是談「以液體燃料供應工業的問題」，而不是談什麼要求。當我們的協商代表在第二次協商會議上要求讓失業工人的協商代表也參加會議時，這一次石油業主們又打斷他們的話，說他們沒有受權來考慮這類要求。這樣，他們就粗暴地把我們的協商代表推出來了。當某些同志提出要用共同鬥爭來支持我們的協商代表時，人們才明

白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因為兩次協商會議都是由資本家們挑選在對他們有利的淡季——冬季舉行的，那時伏爾加河封凍，石油產品價格下跌，因此，那時要想工人取得勝利，簡直是愚蠢的。

以前兩次協商會議就是這樣對我們『有用』的。

很明顯，為開會而開會的協商會議，沒有能自由活動的初選代表委員會的協商會議，沒有工會參加和領導而且是在冬季召開的協商會議，——總之，沒有保障的協商會議，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這樣的協商會議不僅不能團結工人，不僅不能促使我們的要求實現，反而會破壞團結並推遲滿足我們要求的時機，因為它只用空洞的諾言來搪塞工人而不給工人任何東西。

這就是前兩次協商會議給我們的教訓。

這就是覺悟的無產階級一九〇七年十一月抵制了第三次協商會議的緣故。

機械工會的個別同志不願前幾次協商會議的全部經驗，不願石油業無產階級大多數人的意志，更不願工會之間所訂立的公約，竟為沒有保障的協商會議大吹大擂，讓那些同志記住這一點吧！

讓他們記住這一點，並且不要破壞這個公約。

但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乾脆拒絕一切協商會議呢？

不，不是這個意思！

主張抵制的社會革命黨人說，我們不應當參加協商會議，因為請我們去的是我們的敵人，是資產者。對於這種意見，惟有一笑置之，因為請我們到工廠或油礦去做工的也是這些敵人，也是這些資產

者。是否僅僅由於請我們去的是敵人，是資產者，我們就應當抵制工廠或油礦呢？這樣做豈不是要餓死！既然工人接受了資產者的招請去做工，他們豈不是都發了瘋！

達什納克黨人說，我們不應當參加協商會議，因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機構。對於這種荒謬的說法也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因為目前的社會生活也是資產階級的『機構』，工廠、油礦這一切都是按照資產階級的『形像和樣式』，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的『機構』，是否僅僅因爲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的，我們便加以抵制呢？這樣一來，我們應當搬到哪裏去呢？到火星、木星上去呢，還是到達什納克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的空中樓閣裏去？……○

不，同志們！我們不應當背向資產階級的陣地，而應當衝擊這個陣地！我們不應當把陣地留給資產階級，而應當一步步地奪取陣地，把資產階級從那裏趕走！只有住在空中樓閣裏的人才不能了解這個簡單的真理！

如果我們沒有預先得到所要求的保障，我們就不去參加協商會議。反之，如果我們得到了所要求的保障，我們就去參加協商會議，以便憑藉這種保障，把協商會議由乞憐的工具變爲進一步鬥爭的工具，正如在滿足了某些必要的條件以後，我們就不拒絕上工，以便把工廠、油礦由進行壓迫的場所變爲爭取解放的場所一樣。

○ 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先生們對印刷工人及其老闊舉行的協商會議和他們雙方訂立的集體合同頗有好感。此外，他們並不攔阻他們的個別黨員參加這種工作。這些事實就足以證明他們的抵制主張是很不嚴肅很不切實的。

我們籌備有保障（工人爭得的保障）的協商會議，號召五萬工人羣衆來選舉初選代表委員會並擬定我們的要求，我們便會把巴庫的工人運動引上新的對它有利的鬥爭道路，即有組織的自覺的運動的道路，而不會引上自發的（分散的）別什凱什運動的道路。

這就是我們所期待於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或者是有保障的協商會議，或者是不要任何協商會議！（完）

讓那些老協商派先生們去鼓吹反對保障吧，讓他們去頌揚沒有保障的協商會議吧，讓他們在祖巴托夫的泥坑裏爬吧；可是無產階級要把他們從泥坑中拖出來，並要教會他們在階級鬥爭的廣場上行走！

讓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先生們「臨空翱翔」吧，讓他們從他們高高的天空來抵制工人的有組織的行動吧；可是覺悟的無產階級要把他們拉到我們罪惡的地上來，並迫使他們向有保障的協商會議低頭！

我們的目的是明確的：把無產階級聚集在初選代表委員會的周圍，把初選代表委員會團結在工會的周圍，以達到我們的共同要求，以改善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道路是明顯的：從有保障的協商會議走向滿足石油業無產階級的切身需要。

我們將及時號召初選代表委員會既和陷在泥坑中的協商派作鬥爭，也和主張抵制的社會革命黨人、達什納克黨人的稀奇古怪的幻想作鬥爭。

或·者·是·有·一·定·保·障·的·協·商·會·議·，
或·者·是·不·需·要·協·商·會·議·！

載於一九〇八年二月三日

「汽笛報」第十七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我們最近時期的罷工說明了什麼？

一二月間罷工的特徵就是出現了一些給我們的運動加進了新因素的新特點。這些特點之一，即罷工的防禦性，在『汽笛報』^{〔五〕}上已經談過了。然而這是外部的特點。更值得注意的是表明我們的運動向前發展的其他一些內部的特點。這裏我們說的是關於要求的性質、罷工的方式、新的鬥爭方法等等。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要求的内容。必須指出大部分的罷工都沒有提出獎金的要求（如諾貝爾、莫托維利哈、『鐵鎚』、米爾佐也夫、阿達莫夫等公司）。就是提出獎金要求的公司，工人也總是竭力把它列在自己要求的最後面，感到僅僅爲『別什凱什』而進行鬥爭是可恥的（如皮托也夫等公司）。顯然，別什凱什的舊習正被徹底打破。工人開始瞧不起『別什凱什』。工人正從小資產階級的要求（獎金）轉到無產階級的要求：開除最蠻橫的管理人員（如諾貝爾、『鐵鎚』、阿達莫夫等公司），重新收用被解僱的工人弟兄（如米爾佐也夫公司），擴大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的權利（如諾貝爾、米爾佐也夫兩公司）。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米爾佐也夫公司工人的罷工^{〔五〕}。他們要求承認工人委員會並使被解僱的工人弟兄復職，作爲公司今後不經工人委員會同意不得解僱任何一個工人的保證。罷工已經繼續

我們最近時期的罷工說明了什麼？

了兩個星期，並且是以罕有的團結一致的精神進行的。必須看一看這些工人，必須知道他們是多麼自豪地說：「我們進行鬥爭，並不是爲了獎金或毛巾、肥皂，而是爲了工人委員會的權利和榮譽。」所以我說，必須知道這一切，才能了解工人腦子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最近幾次罷工的第二個特點是油礦工人羣衆的覺醒和積極性。原來，在此以前，油礦工人只好跟着機電工人走，跟着他們走並不常常是樂意的，而獨立起來從事鬥爭也只是爲了獎金。以前他們對於機電工人有些仇視，這種仇視是由石油業主的挑撥離間的別什凱什政策煽起的（如去年在比比—愛巴特公司和不久以前在拉普申公司）。最近幾次罷工表明油礦工人的消極性正在逐漸消除。諾貝爾公司的罷工（一月間）是他們發動起來的，並且他們還領導了機電工人；米爾佐也夫公司的罷工（二月間）也是油礦工人鼓動起來的。不用說，隨着油礦工人積極性的提高，他們對於機電工人的仇視也在逐漸消除。油礦工人開始和機電工人攜手並進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個特點，就是罷工者對我們工會抱着友好的態度，而且一般說來，罷工也進行得較有組織。首先必須指出那些妨礙事情順利進行的過多的要求已經沒有了（請回憶一下去年的「裏海」公司吧），現在提出的僅僅是幾項能夠團結羣衆的重要要求（如諾貝爾、米爾佐也夫、莫托維利哈、「鐵鎚」、阿達莫夫等公司）。其次，這些罷工幾乎沒有一次不是在工會的積極參與下進行的；工人們認爲邀請工會代表來參與是必要的（如柯柯列夫、諾貝爾、「鐵鎚」、米爾佐也夫及其他公司）。油礦工人委員會和工廠工人委員會以前同工會對立的態度正在逐漸消除。工人開始把工會看做自己

的親生子。油礦工人委員會和工廠工人委員會開始由工會的競爭者變成工會的支柱。因而最近幾次罷工很有組織。

由此就產生了第四個特點，就是最近幾次罷工比較成功，或者確切些說，局部罷工並不是常常失敗，也不總是完全失敗。我們首先指的是柯柯列夫公司的罷工。我們認為柯柯列夫公司的罷工是我們鬥爭方法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這次罷工和其他幾次罷工（如皮托也夫、莫托維利哈兩公司）表明：如果（一）有組織地進行罷工，（二）有工會的積極參與，（三）有相當的堅持性，（四）選擇恰當的鬥爭時機，那末局部罷工決不會沒有結果。至少大家可以看出『反對局部罷工』這種『帶原則性的』呼聲是冒險的口號，最近運動中沒有一件事實足以證明這個口號是正確的。相反地，我們認為在有工會領導和時機選擇得當的條件下，局部罷工可以變成團結無產階級的很重要的因素。

在我們看來，最近時期幾次罷工的最重要的內部特點就是這樣。

載於一九〇八年三月二日

「汽笛報」第二十一號

署名：科·卡托

按報上原文刊印

石油業主在策略上的轉變

我們的石油業主「談論」「歐洲式的」勞資關係，這是不久（不過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情。

那時他們竭力採取調和態度。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深思熟慮的」李恩孜孜不倦地鼓吹集體合同的神聖來源，局部罷工的浪潮日益高漲，石油業主打算用「歐洲式的」協商方法「調整生產」，政府當局施以一定的壓力，——這一切使石油業主產生的正是調和的「歐洲式的」情緒。

李恩大聲叫喊：「打倒罷工的無政府狀態。」

石油業主附和他說：「秩序萬歲。」

於是「秩序」似乎建立起來了。資方迫害的次數似乎減少了。罷工的次數也減少了。石油業主「認為需要協商了」（見十二月份「石油事業報」）。

於是掀起了協商運動。工人堅決拒絕舊的幕後協商會議。他們絕大多數贊成有保障的協商會議。這樣，工人便表示了明確的願望：要充分利用協商會議，把它變成有組織的自覺的鬥爭工具。

現在的情形又是怎樣呢？

「歐洲式的」勞資關係的論調再也聽不到了。「調整生產」的「打算」隻字不提了。「罷工的無政府狀態」再也不使石油業主害怕了，相反地，他們自己却向工人進攻，奪去工人既得的果實，解僱先進

的工人弟兄，用這種種行動把工人推向『無政府狀態』。

顯然石油業主不再認為需要協商，他們寧願進攻了。

早在一月底的石油業主代表大會上，他們就開始向工人進攻。他們根本不讓工會代表發言。他們拒絕商談工人住宅區問題。他們決定把學校、醫療等等問題一筆勾銷。他們剝奪了工人參加管理民衆文娛館的權利。

石油業主的這一切行動使人感到他們正在走上『新的』『非歐洲式的』道路，走上公開進攻工人的道路。

石油業主代表大會的委員會繼續進行他們代表大會的『工作』。委員會向工人進攻——徵收『十戈比醫藥捐』。至於委員會所採取的同樣說明石油業主轉變策略的一些細小措施，就更不用提了。

迫害依然在變本加厲，其形式為剝奪油礦工人和工廠工人已經爭得的種種權利，裁減員工，解僱先進分子，關閉工廠等等。

他們把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的作用化為烏有。在路特希爾德（巴拉漢內）、『裏海』、施巴也夫（巴拉漢內）、『波爾恩』（巴拉漢內）、比也林格、米爾佐也夫、納甫塔蘭等公司，由於工人委員會而引起的衝突，都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他們藉口『裁員』而『趕走』最有威望的工人弟兄，特別是『趕走』協商會議的初選代表。『裏海』、『波爾恩』、穆赫塔羅夫（巴拉漢內）、施巴也夫（巴拉漢內）、拉普申（比比——愛巴特）、馬里尼柯夫等

公司所發生的事情，更使人對此不再有任何懷疑。

沃坦公司的歇業是石油業主「新」策略的傑作。

他們用這些辦法把工人推上無組織無政府的爆發的道路來消耗工人的力量。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對罷工工人的鎮壓方式。我們是指米爾佐也夫公司，實際上就是指這個公司的經理馬爾卡羅夫先生，他唆使攜帶單響槍的回民攻擊罷工的阿爾明尼亞人，因而造成阿爾明尼亞人和韃靼人互相衝突的條件。

這就是石油業主在策略上的轉變。

顯然，石油業主再也不要「歐洲式的條件」了。

石油業主對協商會議的「成功」大失所望，對單單依靠不能滿足工人基本要求的協商會議來「調整生產」的可能性已感到絕望，眼看協商會議正從瓦解工人的工具變成組織五萬羣衆的工具，於是想盡方法擺脫協商會議，無限期地延遲協商會議的召開，或者至少也要使它毫無作爲。

爲此，他們使用一套迫害手段，挑逗工人進行過早的發動，使正在形成的總的運動分散成個別的局部的運動，把工人從階級鬥爭的廣闊大道推上集團衝突的彎曲小路。

他們想用這些辦法來轉移工人對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的注意力，來使那能够團結工人的初選代表委員會在工人心目中失去意義，來阻止工人的聯合，從而不讓工人準備爲實現自己的要求而鬥爭。

他們這樣做，是要竭力挑逗暫時還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去進行過早的總發動，使自己得以「未

遠』征服工人，保證長期『不間斷地』開採石油。

石油業主轉變策略的用意就是這樣。

根據上述一切，我們的策略應當怎樣呢？

石油業主利用我們的無組織性向我們進攻，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我們工會的周圍團結起來，用我們現有的一切手段保衛自己不受打擊。

他們要挑逗我們進行自發的局部的爆發，想分裂我們的總的運動，因此，我們的責任就是不要上石油業主的圈套，盡可能不要舉行局部罷工，不要分散總的運動。

他們要奪去我們團結的武器，取消我們的初選代表委員會，無限期地延遲協商會議的召開，強使我們進行過早的總發動，因此，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求立刻召開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着手擬定工人的要求，並在這一工作的進程中把羣衆團結在初選代表委員會的周圍。

只要我們鞏固了初選代表委員會，把五萬羣衆集合在它的周圍，我們就不難適當地對付石油業主先生們的非歐洲式的陰謀詭計。

載於一九〇八年三月九日

『汽笛報』第二十二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必須作好準備！

石油工會理事會決定設法使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五〕儘速召開。

理事會之所以這樣做，是根據許多工人的聲明，工人不願再等待了，要求立即召開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

機械工會也決定這樣做。

前幾天，這兩個工會已將有關這一問題的聲明送交工廠視察長。

應該認為，問題很快就會得到一定的解決。

政府當局和資本家究竟對工會的聲明怎樣答覆，當然，我們還不知道。

也許他們會接受工人的要求，立即召開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這樣，協商會議的工作大概就能『正常地』進行。

也許他們會拖延下去，暫時不作正面答覆。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當準備應付一切，不讓石油業主欺騙工人。

我們應當時時刻刻都有充分準備地去和石油業主見面。

必須作好準備！

爲此，必須立刻着手擬定要求。

我們同意參加有保障的協商會議。但是，我們去和石油業主見面，如果不帶全體石油業無產階級羣衆所贊同的要求去，又帶什麼去呢？既然如此，我們就來擬定工人對工資、工作時間、工人住宅區、民衆文娛館、醫療等要求吧。

我們的工會已經開始工作了。它在『汽笛報』上發表了對工人住宅區、醫療、民衆文娛館、學校等問題的意見。這些要求已由工會編成題名『協商會議參考資料』的小冊子印發出去。

但是這還不够。

必須把所有這些要求告訴羣衆，讓他們討論，讓他們發表非發表不可的意見。

此外，關於工資和工作時間的問題，工會還沒有研究，所以對於這兩個問題也必須立即着手擬定要求。

爲了這些目的，我們工會先要選出一個擬定要求的專門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要和協商會議的初選代表及四個區的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保持聯繫，以便和他們共同研究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迫切問題。

然後召開各工廠、油礦、工人宿舍的全體大會，最後批准這些要求。

我們籌備參加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的工作計劃就應當是這樣。

只有在擬定了要求並使這些要求成爲羣衆自己的要求之後，我們才能把這些羣衆團結在初選代

表委員會的周圍。

我們使羣衆聚集在他們的初選代表委員會的周圍，便能保證他們不受石油業主的意外侵害。

不要怯懦地空談各項保障的『具體化』（見『油礦公報』^(五)），也不要輕率地叫喊『春天來到了』（回想一下社會革命黨人吧），而要堅持不懈地擬定工人的要求，這才是我們在事變迫近的情況下首先應當做的事情。

總之，我們要更加同心協力地作好準備，去參加有保障的協商會議！

載於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六日

『汽笛報』第二十三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必須作好準備！

一〇五

經濟恐怖和工人運動

工人的鬥爭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採取同樣形式的。

有過一個時期，工人和廠主作鬥爭就搗毀機器，燒掉工廠。那時工人說：機器，這是貧困的根源！工廠，這是壓迫人的地方！既然如此，就搗毀它，燒掉它！

這是一個沒有成形的、無政府主義騷動式的衝突時期。我們還知道另外一些情況：當工人對縱火和破壞的效力感到失望時，就改用『更激烈的形式』，如殺死廠長、經理、主任等等。那時工人說：機器和工廠是毀壞不完的，而且這種毀壞對工人也沒有好處，但是用恐怖手段嚇唬嚇唬經理，使他們馴服總是可能的，既然如此，就得揍他們，使他們心驚胆顫！

這是一個在經濟鬥爭的基礎上實行個人恐怖的衝突時期。工人運動斷然否定了這兩種鬥爭形式，把它們拋棄了。

這是可以理解的。無疑地，工廠確實是剝削工人的地方，機器至今也還在幫助資產階級擴大這種剝削，但這並不是說，機器和工廠本身就是貧困的根源。相反地，正是工廠，正是機器使無產階級能

粉碎奴隸的鎖鍊，消滅貧困，推翻一切壓迫，只是必須把它們從各個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變成人民的公共財產。

從另一方面來說，假若我們當真搗毀並燒掉機器、工廠、鐵路，那末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呢？要知道，那時生活就會變成一片荒漠，而工人首先就會沒有飯吃！……

顯然我們不應當搗毀機器和工廠，如果我們真正渴望消滅貧困，那末一有可能，我們就應當佔有機器和工廠。

這就是工人運動擯棄無政府主義騷動式衝突的緣故。

無疑，經濟恐怖能使資產階級懼怕，所以它也有某種表面的「效果」。但是，如果這種懼怕是一時的，瞬息即逝的，那又有什麼意思呢？經濟恐怖並非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即使只從這一點來看，也可以明白這種懼怕只能是一時的。這是第一。第二，如果我們背後沒有工人的強有力的羣衆組織隨時準備爲工人的要求進行鬥爭並能保持住已爭得的讓步，那末資產階級一時的懼怕以及因此而作的讓步又能給我們什麼呢？而且事實很清楚地證明，經濟恐怖會取消工人對這種組織的需要，會消除工人對團結一致和獨立行動的熱望，因爲他們有實行恐怖的英雄可以替他們行動。我們是否應當發揚工人的獨立自主精神呢？我們是否應當增進工人要求團結的願望呢？自然是應當的！但是，既然經濟恐怖會扼殺工人的獨立自主精神和團結願望，那末，我們能不能使用經濟恐怖呢？

同志們，不能！我們不應當暗中用個別的襲擊去嚇唬資產階級，這種「事情」讓那些有名的打手

去幹吧。我們應當公開反對資產階級，我們應當時時刻刻使資產階級感到懼怕，直到最後勝利爲止！要做到這一點，所需要的不是經濟恐怖，而是能引導工人去鬥爭的堅強的羣衆組織。

這就是工人運動撲滅經濟恐怖的緣故。

鑒於上述種種，米爾佐也夫公司罷工工人最近通過的反對放火和『經濟』殺人的決議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在這個決議中，代表米爾佐也夫公司一千五百名工人的聯合委員會指出焚燒鍋爐房（在巴拉漢內）和由於經濟關係殺死主任（在蘇拉漢內）的事實，同時聲明『反對這種殺人放火的鬥爭方法』（見『汽笛報』第二十四號）。

米爾佐也夫公司的工人就這樣完全擺脫了舊日恐怖主義騷動的傾向。他們就這樣堅決地走上了真正的工人運動的道路。

我們向米爾佐也夫公司的同志們致敬，並號召全體工人同樣堅決地走上無產階級羣衆運動的道路。

載於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汽笛報』第二十五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石油業主對經濟恐怖的看法

經濟恐怖問題還在吸引着「公衆」的注意。

對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發表了意見，指責經濟恐怖，因為它對工人階級是有害的因此也就是不適當的鬥爭方法。

油礦和工廠的工人也發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見。

當然，石油業主也在發表意見。而且可以看出他們的「觀點」和工人的觀點根本不同，因為他們在咒罵「來自工人方面的」經濟恐怖時，絲毫不提要反對來自石油業主方面的同樣的恐怖。這裏我們指的是著名的石油業主機關報上一篇論經濟恐怖的著名社論（見「石油事業報」第六號卡——查先生（譯）的文章）。

我們就談談這篇社論吧。這篇社論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僅因為它論證了石油業主的「觀點」，而且因為它反映了石油業主對現階段工人鬥爭的情緒。爲了方便起見，必須把這篇社論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卡——查先生談到攻擊工人及其組織的若干枝節問題；第二部分談到經濟恐怖的原因；第三部分談到對付經濟恐怖的辦法。

我們先從枝節問題談起。首先是關於米爾佐也夫公司的工人。大家知道，在蘇拉漢內油礦的一個主任被殺和鍋爐房失火以後，米爾佐也夫公司工人的聯合委員會立即代表一千五百名工人一致抗議這種鬥爭方法，否定了殺人放火和罷工的聯系。這個抗議的誠意看來是沒有理由懷疑的。但是卡——查的想法不同。他這位吹毛求疵的『批評家』仍認為必須懷疑工人的誠意，說『委員會錯了』，說殺人放火和罷工有直接聯系。而且這是在一千五百名工人的代表一致抗議以後說的話！這不是居心歪曲事實、侮辱工人、甚至用造謠的手段誣蔑工人，又是什麼呢？既然如此，怎能相信這位在自己的文章中談其『使人們的犯罪意志高尚化』的卡——查先生的誠意呢。

卡——查先生從米爾佐也夫公司工人又轉而談到我們的工會。誰都知道我們的工會發展得很快。只要看看整個協商運動都是在它的直接領導之下進行的這一事實，就可以斷定它在工人中間的影響之大了。『汽笛報』說，『工會的影響和作用正與日俱增，它甚至在工人羣衆最落後最沒有文化的階層的心目中，也逐漸成爲他們經濟鬥爭的天然領導者了』，這不過是指出盡人皆知的事實罷了。是的，這一切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是我們這位執拗的『批評家』却不肯承認事實，他『懷疑』一切的一切，他甚至不惜否認事實，只要能破壞工會在讀者心目中的威信和聲望就行！儘管這樣，卡——查先生居然還有勇氣說他是我們工會的贊助者，是『使經濟鬥爭高尚化』的辯護人！

誰說了第一，誰就一定會說第二；誰罵了我們的工會，誰就一定要罵我們的報紙，果然卡——查先生大罵『汽笛報』了。而且據說是因爲『汽笛報』『沒有竭盡全力把不必要的怨恨、危險的刺激、過分

的神經質和不文明的險惡行爲從經濟鬥爭的氣氛中清除出去」，『汽笛報』專事『攻擊其他組織、黨派、階級、報紙和個別人物，甚至還攻擊自己的兄弟報紙「油礦公報」』。

卡—查先生唱的調子就是這樣。我們本來可以把這位大名鼎鼎的『批評家』的一套胡說當做耳邊風，因爲資本家的奴才爲了討好自己的主子是一定會胡說的！儘管這樣，我們這次對這位巴庫的大批評家還是要講幾句話。據他說，『汽笛報』『沒有把不必要的怨恨、危險的刺激從鬥爭的氣氛中清除出去』……就假定這一切都說得對。但是看在神聖的資本的面上，請你說一說：什麼東西能造成更大的怨恨和刺激呢？是『汽笛報』上印出來的字呢，還是石油業主不斷解僱工人、徵收十戈比醫藥捐、奪去工人的民衆文娛館、求助於柯企(二)和暴力鎮壓等實際行動？爲什麼卡—查先生，這位『使經濟鬥爭高尚化』的『忠心耿耿的』辯護人，對石油業主那種刺激人和激怒人的行動認爲一句話也用不着說呢？須知那些會採用經濟恐怖手段的『愚昧無知的』分子是不讀我們的報紙的，須知最能刺激和激怒他們的是石油業主的迫害和壓榨，那末，爲什麼這位大肆攻擊『汽笛報』的卡—查先生絕口不談石油業主先生們的『卑鄙勾當』呢？既然如此，卡—查先生的恬不知恥難道還不明顯嗎？

第二、卡—查先生從哪裏看出『汽笛報』沒有努力『把不必要的怨恨和危險的刺激從經濟鬥爭的氣氛中清除出去』呢？『汽笛報』鼓吹反對經濟恐怖和意大利式罷工^①，反對無政府主義騷動式罷工而主張有組織的罷工，反對局部的發動而主張維護整個階級的利益，這不是『把不必要的怨恨和危險的刺激從鬥爭的氣氛中清除出去』又是什麼呢？難道這一切，卡—查先生都不知道嗎？或許他認爲

需要假裝不知道，以便扮演一個替資本家進行狡辯的角色吧？不然，又何必來這套『道德』和『人類良心』的花言巧語呢？

卡——查先生接着責備『汽笛報』『攻擊其他組織、黨派、階級、報紙、個別人物，甚至還攻擊『油礦公報』』。完全正確，卡——查先生，你無意中說了真話，『汽笛報』的確是對其他階級及其機關報進行鬥爭的！但是，難道還能要求受其他一切階級和集團剝削的工人的報紙不這樣做嗎？够了，不要再裝『聖潔的天使』了，不要扭扭捏捏，就直截了當地說吧。難道你不知道石油業主的機關報『石油事業報』的創辦及其老闆——石油業主代表大會委員會的成立，正是爲了『攻擊』工人階級、『攻擊』工人政黨、『攻擊』工人報紙的嗎？難道你不記得代表大會委員會最近實行的徵收十戈比醫藥捐、提高份飯價格、減少學校和病房、奪去工人的民衆文娛館等等措施嗎？石油業主的機關報『石油事業報』不是在竭力替這些亞洲式的措施辯護嗎？或許這不是在『攻擊』工人，而是在『使犯罪的意志高尚化』、在整頓經濟鬥爭等等吧？但是，你要工人報紙怎樣對待剝削工人的石油業主，怎樣對待他們那些欺騙工人的組織，怎樣對待他們那個腐蝕工人的機關報，又怎樣對待那個爲石油業主的亞洲式野蠻措施尋找『哲學』根據而可笑地賣勁的卡——查呢？難道卡——查先生真不了解工人和老闆之間必然有階級鬥爭嗎？呵，當然！卡——查先生是十分了解這一切的，他自己正在對無產階級及其組織進行鬥爭！不過，第一、他反對來自工人方面的鬥爭，而不反對一般的鬥爭；第二、石油業主不是在鬥爭，而只是在『使鬥爭高尚化』；第三、要知道卡——查並不是反對工人，他完全擁護工人爲……石油業主謀利益；

第四、要知道卡—查有『收入』，這一點也應該估計到……

看來，卡—查先生的勇氣和他的『良心』都能隨需要而增長，二者大可媲美。

在卡—查先生的社論中用以反對無產階級及其組織的若干枝節問題就是如此。

* * *

現在我們來談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

作者在他的文章的這一部分裏談到經濟恐怖的原因。從這裏『可以看出』，原因是工人階級中落後階層的『愚昧的頭腦』和『犯罪的意志』。而『愚昧』和『犯罪』是因為工會和工人報紙沒有竭盡全力教育工人和使他們高尚化。卡—查先生補充說，當然，『各項綱領（工會的？）是不贊成經濟恐怖的』，但是，『既然我們看到實際生活已誤入歧途，那末僅僅在綱領上不贊成是不够的。這裏需要一切黨派和工會』，『對已經產生的禍害進行積極的鬥爭……』。卡—查先生解釋自己的意思說，『只有當……工人的一切朋友不分黨派地努力反對……經濟恐怖的時候，只有到那個時候，殺人事件才會絕跡』等等。總之，工人是愚昧的，所以他們往往敢於殺人，但他們之所以愚昧，是在於他們的工會和報紙沒有努力『教育』他們，使他們『高尚化』，所以一切都是工會和工人報紙的過錯。

卡—查先生唱的調子就是這樣。

我們不想多談卡—查先生滿腦子對經濟恐怖的糊塗觀念，——我們所指的是他無知地把經濟恐怖說成綱領問題。我們只想指出一點：（一）當卡—查先生講『綱領性的恐怖』時，如果指的是工會，

那末，難道他不知道俄國的工會根本沒有綱領嗎，——每個工人都知道這一點！（二）如果他指的是黨，那末，難道他不知道經濟恐怖是策略問題而不是綱領問題嗎，——每個小學生都知道這一點！這一切關於綱領的宏論究竟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感到奇怪的是石油業主先生們竟僱不到一個高明一點的、至少也不是這麼無知的『思想家』。

我們也不想多談卡——查先生另一個非常蠢笨（不僅是無知！）的聲明，他說由於經濟恐怖，『實際生活已誤入歧途』，因此『我們』應當和實際生活作鬥爭。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假若誤入歧途的正是實際生活，而不是個別的落後於實際生活的人，那末我們的事業就糟糕了。我們的鼓動宣傳之所以有力，正是在於實際生活這個全能的、不斷發展的生活本身要求和經濟恐怖作鬥爭。如果卡——查先生不懂得這一點，那末我們奉勸他搬到另外一個什麼星球上去，或許在那裏會用得上他那套和不斷發展的實際生活作鬥爭的蠢笨理論……

我們最好來談談卡——查先生的『分析』吧。

首先我們要問，難道卡——查先生真認為經濟恐怖的原因正是在於工會和工人報紙嗎？

『教育』工人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教工人去進行自覺的、有計劃的鬥爭！（這是卡——查先生同意的！）但是除了工會和工人報紙在口頭上和報刊上宣傳有組織的鬥爭以外，還有誰能做這種工作呢？

使經濟鬥爭『高尚化』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使經濟鬥爭去反對制度，無論如何不是反對個人！

（這也是卡——查同意的！）但是除了工會和工人報紙以外，又有誰能做這種工作呢？

難道不就是石油業主剷除和解僱最覺悟的工人，把對工人階級的鬥爭化為對個別工人的鬥爭嗎？

如果卡——查先生確實相信他對工會和工人報紙的責備是正確的，那末他爲什麼又偏偏勸告這些工會和報紙呢？難道他不知道『攻擊其他階級、報紙、人物』等等的組織是不會照卡——查先生的勸告行事的嗎？他究竟爲什麼要幹這種白中搗水的勾當呢？

顯然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責備。

如果卡——查先生不管這些，還是發表言論來反對工會，那末這就是爲了要轉移讀者對真正原因的注意力，使讀者認不清真正的『罪犯』。

可是不行，卡——查先生！你想把經濟恐怖的真正原因瞞過讀者，那是辦不到的！

『經濟殺人』的真正原因不在於工人，也不在於他們的組織，而在於石油業主先生們刺激人和激怒人的行動。

你指出無產階級某些階層的『愚昧』和『無知』。但是不靠學校和講演會來掃除『愚昧』和『無知』，又靠什麼呢？石油業主先生們爲什麼要減少學校和講演會呢？而你這位『誠心』主張掃除『愚昧』的先生爲什麼不大聲疾呼地反對石油業主剷奪工人的學校和講演會呢？

你說要使風氣『高尚化』，但是在石油業主先生們奪去工人的民衆文娛館這種民衆娛樂中心的時

候，悲天憫人的閣下，你爲什麼一聲不響呢？

你高唱『使經濟鬥爭高尚化』，但是當資本家的僱傭走狗殺死工人漢拉爾（納甫塔蘭公司）的時候，當『波爾恩』、『裏海』、施巴也夫、米爾佐也夫、『鐵鎚』、莫托維利哈、比也林格、穆赫塔羅夫、馬里尼柯夫等公司解僱最先進的工人的時候，當施巴也夫、穆赫塔羅夫、『鐵鎚』、『盧諾』、比比—愛巴特區的柯柯列夫等公司毒打工人的時候，你爲什麼一聲不響呢？

你談論工人『犯罪的意志』和『不必要的怨恨』等等，但是當石油業主刺激工人，激怒工人中最敏感最容易發火的臨時工人和失業工人的時候，你躲到哪裏去了？正是這一部分工人被有名的十戈比醫藥捐和代表大會委員會所辦的食堂份飯的漲價弄得忍飢挨餓，悲天憫人的閣下，你知道不知道？

你談論經濟恐怖所引起的『血和淚』的慘狀，但是大批殘廢工人在代表大會委員會所辦的醫院裏無法得到一個牀位，這使人流了多少血和淚，你知道不知道？爲什麼石油業主先生們減少病房？爲什麼你對於這件事情不像反對工會和工人報紙一樣地大聲叫喊？

你高唱『良心』等等，可是，你的『無瑕的』良心爲什麼對石油業主先生們的這一切迫害行爲無動於中呢？

你談論……好，够了！看來已很明顯：『經濟殺人』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工人，也不在於他們的組織，而在於石油業主先生們刺激人和激怒人的行動。

同樣很明顯，卡—查先生是石油業主先生們的可憐的僱傭走狗，他把一切都歸罪於工人組織，力

圖藉此在「公衆」面前替自己主子的行動辯護。

*

*

*

現在我們來談談卡——查先生的文章的第三部分。

卡——查先生在自己文章的第三部分談到對付經濟恐怖的辦法，而且他的「辦法」和他說明經濟恐怖「原因」的那套「哲學」是完全符合的。

大家來聽聽這位巴庫大哲學家的論調吧：

「必須對已經產生的禍害進行積極的鬥爭，並且應當提出這個鬥爭的口號。現在對於一切政黨、團體、工會和小組都應當提這樣的口號：『打倒經濟恐怖！』只有在勇敢地舉起寫着這一口號的潔白旗幟的時候，只有那時……殺人才會絕跡。」

卡——查先生就是這樣大發其哲學議論的。

由此可見，卡——查先生是徹頭徹尾地忠於他的上帝——資本家的。

第一、他把「經濟殺人」的全部「罪過」，從石油業主身上卸下來（哲學地卸下來！）轉嫁到工人、工會和工人報紙身上去。這樣，他就能在所謂「世人」面前「證明」石油業主先生們的亞洲式的進攻策略是完全「無罪」的了。

第二、這在石油業主是最主要的一點，他「想出了」不要石油業主花費一文錢就可以祛除「殺人」的最便宜的方法——讓工會和報紙加緊宣傳鼓動反對經濟恐怖，於是他就再次強調石油業主不應當

對工人讓步，不應當『有所花費』。

既便宜，又漂亮！石油業主先生們聽了卡—查先生的話，可以贊歎不已了。

當然，石油業主先生們可以『隨便唾棄』所謂『世人』的意見。但是，既然有一個什麼卡—查爲了『全人類的良心』肯在『世人』面前爲他們辯護，那他們怎麼會反對呢？

相反地，同一個卡—查在作了這樣的辯護之後，又提出祛除經濟恐怖的最『可靠』而又最便宜的方法，他們怎麼會不高興呢？讓工會和報紙完全自由而毫無阻礙地去宣傳鼓動吧，只要石油業主的錢袋萬歲就行。看，難道這不是很開明嗎！…… 既然如此，他們怎麼會不讓自己的『夜鶯大盜』^②卡—查先生登上文壇呢。

可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只要以覺悟工人的觀點來看問題，就可以立刻明白卡—查先生所提出的辦法多麼可笑。

這裏的問題完全不在於工會和報紙，工會和報紙早就進行宣傳鼓動，反對經濟恐怖，可是，雖然如此，『殺人』仍沒有絕跡。問題主要地在於石油業主先生們採取刺激人的和激怒人的行動，在於石油業主先生們實行經濟迫害、壓榨和亞洲式的進攻策略，這一切正在造成並且將來還會造成引起我們注意的『經濟殺人』。

請你講一講：石油業主先生們接二連三地奪去工人已經爭得的果實，這種激怒人的行動已逼得最沒有覺悟的工人都去進行『經濟殺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工會和報紙的宣傳鼓動，哪怕就是

影響很大的工會和報紙的宣傳鼓動，又能有什麼作爲呢！很明顯，僅僅是反恐怖的宣傳鼓動，即使打着『潔白的旗幟』，也是無力祛除『經濟殺人』的。

顯然，爲『祛除』『經濟殺人』，必須採用比單純的宣傳鼓動更切實一些的辦法，這首先要石油業主放棄壓榨和迫害的行爲，滿足工人的合理要求……只有在石油業主把他們亞洲式的進攻策略放棄，即把減低工資，剝奪民衆文娛館，減少學校和病房，實行十戈比醫藥捐，提高份飯價格，不斷解僱先進工人，以暴力對付工人等等手段放棄之後，只有在石油業主確實以文明的歐洲式的態度對待工人羣衆及其工會，承認他們的『平等』權利之後，只有在那時才會奠定『祛除』『殺人』的基礎。

所有這一切都明顯得無須再加證明了。

但是，卡—查先生不懂得這一點，而且也不能懂得這一點，實在說，是不願懂得這一點，因爲這對於石油業主先生們不『利』，因爲這需要他們一定的破費，因爲這會把經濟『殺人』的『罪犯』的全部真相揭露出來……

結論只有一個：卡—查是資本家的奴才。

但是從這一點，從卡—查這個奴才角色的身上，究竟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

從這一點應當得出的結論是：卡—查先生所說的話並不是他自己的話，而是『鼓舞着』他的石油業主的話。所以卡—查的文章並不是他自己的哲學，而是石油業主先生們的哲學。顯然，石油業主通過卡—查的嘴說話，卡—查只不過傳達他們的『心思、願望和情緒』罷了。

在這一點上，而且只有在這一點上，應當看出我們所分析的卡——查這篇文章的主旨。

卡——查作爲卡查^③或作爲「個人」，在我們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是無足輕重的毫無價值的東西。卡——查先生倒無須抱怨「汽笛報」似乎在「攻擊」他「個人」，我們敢向卡——查先生保證，「汽笛報」對他這個所謂「個人」從來也沒有感到過興趣。

但是，卡——查作爲沒有人格的東西、卡——查作爲並非「個人」的東西、卡——查作爲單純表達石油業主先生們的意見和情緒的東西，在我們看來倒無疑地是有一定價值的。我們就是從這一觀點來看卡——查本人和他的文章的。

顯然，卡——查先生沒有白唱。既然他在他的文章的第一部分猛烈攻擊工會，竭力破壞工會的威信，既然他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控訴工會有助長經濟恐怖之罪，而對石油業主的亞洲式的措施却隻字不提，既然他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指出反恐怖的宣傳是祛除「殺人」的唯一辦法，而對他的主子們的進攻策略則避而不談，那末這就是說，石油業主是不打算向工人羣衆讓步的。

石油業主是要進攻的，石油業主是應該進攻的，而你們工人和工會，請退却吧，——這就是卡——查先生的文章對我們說的話，這就是石油業主通過自己的「夜鶯大盜」的嘴對我們說的話。

這就是卡——查先生這篇文章的主旨。

我們工人、我們的組織和報紙應該對石油業主先生們警惕，不要上他們挑逗行爲的當，要像從前一樣堅定而沉着地沿着把我們的自發鬥爭變成有計劃的、有明確目標的、嚴正的階級鬥爭的道路

前進。

至於資本家的形形色色的僱傭走狗的假仁假義的哀號，那我們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載於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四日、十八日

『汽笛報』第二十八、第三十、第三十二各號

署名：科·卡托

按報上原文刊印

① 即罷工者不離開生產地點，以消極怠工去反對廠主的壓迫和剝削的一種罷工形式。——譯者註。

② 夜鶯大盜是俄羅斯民間故事中的人物，善學夜鶯鳴聲和互蛇猛獸叫聲，藉此攔劫路人，後爲勇士伊里亞·姆羅梅茨所殺。——譯者註。

③ 俄文「卡查」的意思就是山羊。——譯者註。

報刊評論 (六三)

奴顏婢膝的『社會主義者』

在梯弗里斯出版的報紙有好幾種，其中有一種格魯吉亞文報紙叫做『火花報』(六三)。它是一種新的但同時又是最老的報紙，因為它是梯弗里斯過去所有的孟什維克報紙（從一九〇五年的『光綫報』起）的續刊。『火花報』是由一個老牌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者集團編輯的。但問題當然不止於此。問題主要在於這個集團的機會主義是特別稀奇古怪的。機會主義本來就是個沒有原則沒有政治氣節的東西；但是我們可以說，任何一個孟什維克集團的沒有氣節，從來沒有達到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集團這樣無恥的地步。一九〇五年，這個集團曾經承認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袖（見『光綫報』）。一九〇六年，它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揚言『靠工人是沒有希望的……只有農民才能表現主動性』（見『光綫報』）。一九〇七年，它又改變了自己的『立場』，說『革命中的主導地位應當屬於自由資產階級』（見『思想報』(六三)），如此等等。

但是，這個集團的沒有原則從來還沒有達到現在（一九〇八年夏天）這樣無恥的地步。我們指的是『火花報』對在思想上奴役被壓迫者的所謂教區長的被殺所作的評論。這次暗殺的經過是盡人皆知

的。有某個集團殺死了教區長，又殺死了從「肇事地點」帶着案情調查記錄回去的憲兵上尉，後來還襲擊了護送教區長屍體的一羣流氓。這個集團顯然不是流氓集團，但也不是革命團體，因為目前正值聚集力量的時候，任何革命團體都不敢冒險破壞無產階級的團結事業而去幹這種勾當。社會民主黨對這個集團的態度是盡人皆知的：查明產生這個集團的條件，努力消除這種條件，同時又在思想上、組織上和這個集團本身作鬥爭，使它們在無產階級的心目中威信掃地，使無產階級和它們劃清界限。「火花報」却不這樣做。它既不調查什麼，也不提出什麼，只是亂講幾句一般反對恐怖手段的鄙俗的自由主義的話，接着就勸告讀者，豈止是勸告，而且責成讀者向警察告發（不多不少，正是告發！）這些集團，把它們交給警察！這是可恥的，然而遺憾得很，這却是事實。請聽聽「火花報」上的這段話吧：

「把殺死教區長的兇手交給法庭審判，這就是永遠洗清自己身上的污點的唯一辦法……這就是先進分子的責任。」（見「火花報」第五號）

要社會民主黨人充當自願的告密者，——你看，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者把我們糟蹋成什麼樣子！

機會主義者沒有政治氣節，並不是沒有來由的。他們沒有政治氣節是由於他們拚命想投合資產階級的口味，討好「老爺們」，博得他們的誇獎。這就是機會主義的遷就策略的心理基礎。爲了在「老爺們」面前炫耀一番，爲了討好他們，爲了至少不使他們因教區長的被殺而發怒，我們的孟什維克機

會主義者便充當了警犬的角色，在他們面前搖尾乞憐！

遷就策略真無過於此了！

假仁假義的祖巴托夫分子

高加索的一些城市裏出現了機會主義的特種典型，巴庫也是這樣。巴庫也有一個比梯弗里斯的機會主義集團更右因而也更無原則的集團。我們指的不是和資產階級的『今日報』併居的『油礦公報』；關於這個報紙，我們的報刊已經說得够多了。我們現在說的是巴庫孟什維克的老祖宗申德里柯夫的『正義事業』集團。誠然，這個集團早就不在巴庫了，它受到巴庫工人及其組織的攻擊，不得已搬到彼得堡去了。可是它還不斷把自己寫的東西寄到巴庫來，它只寫巴庫的事情，它正是要在巴庫尋找同道，它在竭力『爭取』巴庫的無產階級。因此，我們不妨談談這個集團。正好我們面前放着『正義事業』雜誌第二、三兩期的合刊。翻開一看，我們眼前就呈現出一幅老圖畫，畫着申德里柯夫先生們（公）一幫打得火熱的老夥伴。這個是依里亞·申德里柯夫，鍾柯夫斯基先生面前有名的『拍馬專家』，幹幕後勾當的老手。這個是格列勃·申德里柯夫，從前當過社會革命黨黨員，也當過孟什維克，又當過『祖巴托夫分子』，現在是個退休者。這個是出名的長舌婦，『冰清玉潔』的克拉芙吉婭·申德里柯娃，一位各方面都令人愜意的女士。形形色色的『門徒』也不少，如格羅舍夫之流和卡利寧之流，這些

從前在運動中起過作用、現在却落在實際生活後面、專靠回憶來過日子的人物，甚至已故的列甫的影子也浮現在我們面前……一句話，這幅圖畫裏真是應有盡有！

然而，誰需要這一切呢？爲什麼要讓過去黑暗時期的可恥的陰影來糾纏工人呢？他們是不是要邀請工人去焚燬井架呢？或者是要工人去辱罵黨，糟蹋黨？去開沒有工人參加的協商會議，然後去和鍾柯夫斯基先生幹些什麼勾當呢？

不是！申德里柯夫們是想要「拯救」巴庫工人！他們「看到」在一九〇五年以後，即申德里柯夫們被工人趕走以後，「工人已經瀕於滅亡」（見「正義事業」雜誌第八十頁）。所以申德里柯夫們便出版了「正義事業」雜誌，爲的是「拯救」工人，把工人從「絕路」中引導出來。爲此，他們提議恢復老樣子，拋掉最近三年的成就，背棄「汽笛報」和「油礦公報」，不理睬現存的工會，擯棄社會民主黨，並且把一切非申德里柯夫分子趕出工人委員會，然後團結在調解室的周圍。工人不再需要罷工，也不再需要秘密組織，只需要調解室；申德里柯夫們和古卡索夫們^(註)將在鍾柯夫斯基先生的許可下在調解室裏「解決問題」……

他們想這樣把巴庫工人運動從「絕路」中引導出來！

完全和「石油事業報」的變色蜥蜴卡—查先生一模一樣（見「石油事業報」第十一號）。

但是，莫斯科的祖巴托夫、彼得堡的加邦、敖德薩的沙也維奇難道不也是這樣「拯救過」工人嗎？難道他們不都是工人的死敵嗎？

那末，這些假仁假義的『救世主』究竟想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騙誰呢？

不行，申德里柯夫先生們，儘管你們和卡——查都硬說巴庫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還『應當受一次考試（受誰的考試？）』，看看是否成熟』（見『正義事業』雜誌第二頁），然而你們畢竟是欺騙不了巴庫的無產階級的！

巴庫的無產階級已經相當覺悟，能够摘下你們的假面具，給你們指出應得的下場！你們是些什麼人，你們是從哪裏來的？

你們不是社會民主黨人，因為你們是靠反對社會民主黨、反對黨性起家的！

你們也不是工會活動家，因為你們在踐踏那自然而然浸透了社會民主主義精神的工會！你們就是假仁假義的、戴着『人民之友』的假面具的加邦分子和祖巴托夫分子！

你們是無產階級內部的因而也是最危險的敵人！

打倒申德里柯夫們！唾棄申德里柯夫們！

我們就是這樣回答你們的『正義事業』雜誌，申德里柯夫先生們！

巴庫的無產階級就是這樣回答你們假仁假義的討好！……

載於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五號

署名：柯……

按報上原文刊印

協商會議和工人

協商運動停頓了。雙方談判中斷了。舊的但也永久是新的協商會議又一次被破壞了。成立初選代表委員會，成立籌備委員會，擬定要求，向羣衆做報告，廣泛地把工人團結在自己委員會的周圍，把工人委員會團結在工會的周圍，把工會團結在社會民主黨的周圍，——所有這一切都中斷了，都成爲過去了。通過協商會議來「調整生產」，使勞資「關係高尚化」，——這些陳詞濫調也都被遺忘了。梯弗里斯的老牌小丑鍾柯夫斯基宣佈這齣「戲」閉幕了。資本家使喚慣了的走狗卡拉——穆爾查先生給他鼓掌。幕落了，於是在我們面前出現一個早已熟悉的場面：石油業主和工人仍舊各守原來的陣地，等待着新的風暴，新的衝突。

只是有點「不明白」：石油業主明明昨天還懇求工人去開協商會議，懇求結束「歷次局部罷工的無政府狀態」並要和他們「取得協議」，而政府當局則以臭名遠揚的鍾柯夫斯基爲代表，邀請有威望的工人去和他們舉行正式談判，要他們相信集體合同的好處；但突然又發生了這樣劇烈的變化：他們宣佈協商會議是多餘的，集體合同是有害的，「歷次局部罷工的無政府狀態」是他們所希望的！

這是怎麼回事？這種「怪事」的原因在哪裏？破壞協商會議的「罪魁」究竟是誰？

鍾柯夫斯基先生回答說：當然是工人的過錯，我們還沒有開始談判，他們就提出准許工會參與談判這一最後通牒式的要求來搗亂，讓工人先放棄工會，我們就開協商會議，否則我們不要協商會議！石油業主們異口同聲地附和說：我們同意，正是工人的過錯，讓他們放棄工會，我們不要工會！沒有工人的工會『機械工會』跟在工人的敵人後面附和說：他們本來是對的，這實在是工人的過錯。的確，工人爲什麼不放棄工會呢？先放棄自己的要求來講價錢，然後再談要求，豈不更好嗎？沒有讀者的報紙『油礦公報』隨聲附和沒有工人的工會說：對，對，循規蹈矩的工人先講價錢，然後再談最後通牒，先讓出陣地，然後再把它奪回；巴庫的工人却缺乏這種循規蹈矩的精神，他們太不循規蹈矩，差不多成爲抵制主義者了。

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一本正經地指出：我們本來就知道會這樣，我們早就料到這一切了，如果工人和工會完全決裂而高喊抵制，並且不作任何準備，也不團結什麼廣大羣衆就直接舉行罷工，那末他們就會懂得沒有『土地和自由』就沒有協商會議，就會懂得『在鬥爭中才能取得自己的權利』……

巴庫無產階級的『朋友』和敵人就是這樣說的。

這些對巴庫無產階級的責備的毫無根據是否需要證明呢？只要把責備工人熱愛協商會議的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跟責備這些工人抵制協商會議的機械工會和石油業主對照一下（我是說，只要把這兩種相互排斥的觀點對照一下），就會立刻明白上述責備完全是荒誕無稽的……

假使是這樣，那末究竟誰是破壞協商會議的真正『罪魁』呢？

我們先大略地看看協商會議的歷史。石油業主並不是第一次邀請工人去開協商會議，我們現在經歷的已是第四次協商會議了（一九〇五年、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向來是石油業主首先提議召開協商會議，也向來是政府當局幫助他們和工人『取得協議』，訂立集體合同。石油業主有自己的目的：他們想用極小的讓步來保障自己的公司不發生罷工，保證自己的公司能不斷吊油。對於石油王國的『平靜無事』政府當局是更爲關心的，不用說，很多政府官員都是幾家最大石油公司的股東，石油工業方面的捐稅是國家預算中最重要的收入之一，『祖國工業』是靠巴庫重油來滋養的。因此，石油工業稍一停頓就必然影響俄國的工業。

但還不僅如此。對上述各點姑且不談，政府所以重視巴庫的安寧，還在於巴庫無產階級的羣衆性的發動，無論是石油工人的發動，或是和他們有聯系的海員工人的發動，都能感染其他城市的無產階級。請回憶一下事實吧。一九〇三年春天，巴庫的第一次總罷工掀起了南俄各城市著名的七月罷工和遊行示威⁽¹⁾。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二月間的第二次總罷工⁽²⁾成了全俄一二兩月間光榮發動的信號。一九〇五年，巴庫無產階級迅速治癒了阿爾明尼亞人和韃靼人互相殘殺的創傷，又重新投入戰鬥，以自己的熱忱感染了『全高加索』。最後，從一九〇六年起，即在俄國革命已經退却之後，巴庫仍然沒有『平靜下來』，直到目前實際上還享有某些自由，並且每年都能比俄國任何地方較好地慶祝無產階級的五一節，引起其他城市工人的羨慕…… 既然如此，就不難了解爲什麼政府當局竭力不去激

怒巴庫工人，而每當石油業主想和工人協商，想和他們『取得協議』並訂立集體合同時都予以支持。

但是，我們布爾什維克每次都加以抵制。

爲什麼呢？

因爲石油業主所要的不是當着羣衆的面和羣衆進行協商，訂立合同，而是背着羣衆和一小撮人進行協商，訂立合同。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欺騙成千上萬的石油工人羣衆。

我們的協商會議的實質何在呢？我們的協商會議，這就是石油業無產階級和石油業資產階級就彼此的要求所進行的談判。如果談判達成協議，那末協商會議就以訂立雙方在一定期間必須遵守的集體合同而結束。一般說來，我們毫不反對協商會議，因爲在一定的條件下，在共同要求的基礎上，協商會議能够把工人團結成統一的整體。但是協商會議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能團結工人：（一）羣衆能最積極地參加協商會議，自由地討論自己的要求，監督自己的協商代表等等；（二）必要時羣衆能以總罷工來支持自己的要求。如果在油礦和工廠中沒有一定的集會自由，沒有可以自由開會的初選代表委員會，沒有工會的領導，工人能够積極協商、討論要求等等嗎？當然不能！在冬天，當航運停止、石油無法外運的時候，當老闆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能曠日持久地對抗總罷工的時候，工人能堅持自己的要求嗎？當然也不能！可是以前各次協商會議都正好選定在冬天舉行，都正好在沒有討論要求的自由、沒有自由活動的初選代表委員會、沒有工會的參與等情況下建議召開的，工人羣衆及其組織被處心積慮地排擠出活動場所，一切事情都由一小撮親申德里柯夫派的『個人』包辦。他們說，工人

先生們，你們去選舉協商代表吧，選完以後就可以各自回家了！沒有工人參加的協商會議，欺騙工人的協商會議，——這就是他們三年來向我們建議的東西。對這樣的協商會議只應當抵制，所以我們布爾什維克就向它宣佈抵制……

工人不能一下子就弄明白這一切，因此，他們在一九〇五年參加了第一次協商會議。但是後來他們不得不退出協商會議而使它破裂。

工人在一九〇六年又犯錯誤而參加了第二次協商會議。但是他們又不得不拋棄協商會議而使它再一次破裂。

這一切都說明實際生活本身指摘並糾正了工人的錯誤，把他們推上了抵制申德里柯夫式幕後的、騙人的協商會議的道路。

邀請工人參加這種協商會議的孟什維克不自覺地幫助了石油業主欺騙工人……

但是在一九〇七年，事情起了變化。一方面是兩次協商會議的經驗，另一方面是布爾什維克的大力宣傳，——兩方面都起了作用：工人堅決地拒絕了政府當局和石油業主召開協商會議（已經是第三次協商會議了！）的建議。

從此，巴庫的工人運動進入了新階段……

然而，這是不是說工人怕開協商會議呢？當然不是！像他們這樣經歷過轟轟烈烈的大罷工的人，還會怕和石油業主談判嗎？

這是不是說工人逃避訂立集體合同呢？當然不是！像他們這樣訂立過「十二月合同」的人，還會怕訂立集體合同嗎？

工人抵制了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的協商會議，這也就說明工人已經相當成熟，不致再容許他們的敵人用申德里柯夫式的幕後協商會議來愚弄他們了。

政府當局和石油業主一看到抵制的陰影，就問我們到底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能參加協商會議，我們回答說：在協商會議的整個進程中必須有工人羣衆及其工會的廣泛參加。只有讓工人能夠（一）自由討論自己的要求，（二）自由召集未來的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三）自由利用自己工會的幫助，（四）自由選擇召開協商會議的時間，工人才能參加協商會議。而且要把承認工會這一項放在第一位。這幾項條件就叫做保障。於是一個著名的公式便開始流行了：或者是有保障的協商會議，或者是不·要·任·何·協·商·會·議！

我們這樣做是否就背棄了抵制沒有工人參加的申德里柯夫式的舊協商會議的策略呢？絲毫也沒有！抵制舊協商會議的策略完全沒有改變，我們宣佈要參加的只是新的協商會議，有保障的協商會議，只參加這樣的協商會議！

是否需要證明這種策略的正確性呢？是否需要證明只有採取這種策略，我們才能將協商會議由欺騙工人的工具變成團結工人的工具而把工人團結在工會的周圍，並組成一支能够堅持自己要求的數萬人的大軍呢？

甚至孟什維克、機械工會、「油礦公報」也不能反對這種主張，他們也跟着我們宣佈准許工會參與談判這項最後通牒式的要求。我們手頭有文件證明，如果這一項要求不先得到滿足，許可證不發給工會，孟什維克就不僅不同意參加協商會議，而且不同意推舉初選代表。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籌備委員會進行談判之前，在初選代表委員會召開會議之前，在推舉初選代表之前。當然現在他們可以說「只有在談判結束的時候才應當提出最後通牒式的要求」，說他們「一開始就反對最後通牒式的要求」（見「油礦公報」第二十一號），但這本來就是孟什維克陣營中那些毫無氣節的機會主義者做慣的，早爲人所共知的「反覆無常的行爲」。這又一次證明了我們的策略是堅定不移的！

甚至曾經咒罵過「和協商會議有關的一切的一切」的社會革命黨人和達什納克黨人也在我們的策略面前「低了頭」，決定參加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了！

工人明白了我們主張的正確性，所以絕大多數都擁護我們的主張。在被徵詢過意見的三萬五千工人中，擁護社會革命黨人和達什納克黨人（主張無條件抵制）的只有八千人，擁護孟什維克（主張無條件協商）的有八千人，擁護我們的策略即擁護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的策略的却有一萬九千人。

這樣，工人沒有採納孟什維克的策略，即主張參加沒有工人、沒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的策略。工人也沒有採納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策略，即脫離實際地抵制協商會議並舉行無組織的總罷工的策略。工人贊成有保障的協商會議，贊成有計劃地利用協商會議的全部進程來組織總罷工。

協商會議所以被破壞的秘密就在這裏！

石油業主異口同聲地贊成沒有保障的協商會議。這樣，他們也就是贊同孟什維克的策略。我們說，這就是孟什維克主張錯誤的最好的證明。

但是，因為工人拒絕參加沒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石油業主就改變了自己的策略，而……破壞協商會議，抵制協商會議。這樣，他們也就是贊同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策略。我們說，這就是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主張不對的最好的證明。

巴庫無產階級的策略原來是唯一正確的策略。

因此，石油業資產階級就以全力攻擊這個策略。石油業資產階級完全贊同孟什維克的沒有保障的協商會議，迫不得已時則抓住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抵制策略，可是它無論如何也不肯遷就要求召開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的巴庫無產階級！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請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景：滿足了盡人皆知的各項條件（即保障），掀起了對工人各種要求的極其廣泛的討論；初選代表委員會在羣衆中日益鞏固起來；在擬定要求的進程中，羣衆團結在自己初選代表委員會的周圍，又通過初選代表委員會團結在工會的周圍；結成一支統一大軍的五萬羣衆向石油業主提出要求；石油業主只得不戰而降，或者不得不重視這個在對他們最不利的時候發動起來的組織得很好的總罷工；——難道這對石油業資產階級有利嗎？既然如此，資產階級所豢養的『石油事業報』和『巴庫報』的阿貓阿狗怎能不咪咪汪汪地亂叫起來呢？石油業主一面在破壞協商會議，一面却說：既然這個協商會議沒有可詛咒的保障就開不成，那就打倒它。

政府當局和石油業主破壞協商會議的原因就在這裏。

協商會議的歷史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而『油礦公報』忘記了這一切，繼續高唱着『領導者冒失』，愚蠢地嘵叨着、重複着『巴庫報』和『石油專業報』社論上的話！甚至梯弗里斯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文報紙也認為需要『放開自己的嗓門』來給巴庫的立憲民主黨人幫腔^{〔三〕}！可憐的應聲蟲！

然而，根據新的情況，我們的策略應當怎樣呢？

石油業主破壞了協商會議。他們在挑逗總罷工。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立刻用總罷工來回答他們呢？當然不是！石油業主已經儲藏了大量石油，他們老早就在準備反擊總罷工，這且不談；我們不應當忘記，我們自己還沒有準備好進行這樣嚴重的鬥爭。我們暫時決不應當舉行經濟總罷工。

應當承認，只有各公司分別舉行罷工才是合乎時宜的適當的退却形式。孟什維克看來是從『原則』出發來否認這種罷工的適當性（見李恩的小冊子^{〔四〕}）。他們是大錯特錯了。春天幾次罷工的經驗證明，在工會和我們組織的積極參與下，各公司分別舉行的罷工可以成爲團結無產階級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因此，我們應當緊緊掌握這一手段；我們不應當忘記，只有愈積極地參與無產階級的一切鬥爭，我們的組織才愈會成長壯大。

我們最近的策略任務就是如此。

政府當局破壞協商會議之後就想完全取消所謂『巴庫的自由』。這是不是說我們應當完全轉入地

下，把活動地盤讓給黑暗勢力呢？當然不是！不管反動派多麼猖狂，不管他們怎樣破壞我們的工會和組織，他們總不能消滅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因為這樣做會在工廠和油礦中引起『無政府狀態和衝突』。我們的責任是鞏固這些工人委員會，以社會主義精神感染它們，並且以公司為單位把它們聯合起來。為此，我們工廠和油礦的支部必須經常出來領導這些工人委員會，而各個支部又必須通過自己的代表以公司和區為單位聯合起來。

我們最近的組織任務就是如此。

只要完成這些最近的任務，從而鞏固工會和我們的組織，我們就能把成千上萬的石油工人羣衆團結在一起，以便將來和石油資本家進行戰鬥。

載於一九〇八年七月二十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五號附刊

署名：柯巴

按【巴庫無產者報】附刊原文刊印

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

誰都知道我們黨正遭遇着深重的危機。黨員退黨，組織縮小和削弱，各個組織彼此隔離，沒有統一的黨的工作，——這一切都說明黨病了，黨正遭遇着嚴重的危機。

特別使黨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黨組織和廣大羣衆脫節的狀態。有一個時期，我們各地的組織都有幾千黨員，領導幾十萬羣衆。那時黨在羣衆中有牢固的根基。現在却不同了。各地組織已沒有幾千人，只剩下幾十人，至多也不過幾百人。至於領導幾十萬羣衆，那就更談不上了。固然我們黨在思想上對羣衆有廣泛的影響，羣衆是認識黨的，羣衆是尊重黨的。「革命後」的黨和「革命前」的黨的區別首先就在這裏。但是黨的全部影響實在也僅限於此。單有思想上的影響，那還是非常不夠的。問題在於廣泛的思想影響限於狹隘的組織而不能鞏固起來，——我們的組織和廣大羣衆脫節狀態的根源就在這裏。只要指出彼得堡的情況，就立刻可以了解危機的全部嚴重性：彼得堡在一九〇七年約有八千黨員，而現在連三四百人都難湊足了。至於處在同樣狀態中的莫斯科、烏拉爾、波蘭、頓巴斯以及其他地方，那就更不用說了。

但是還不止此。黨不僅苦於和羣衆脫節，而且苦於黨的各個組織彼此毫無聯系，不是過着統一

的黨的生活，而是彼此隔離。彼得堡不知道高加索在做什麼，高加索不知道烏拉爾在做什麼，如此等等，每個地方都過着自己獨特的生活。嚴格地說，過着共同生活的統一的黨，也就是我們大家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引以自豪的那個黨，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正處在最嚴重的手工業方式的狀態中。現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一方面是『無產者報』^[55]和『呼聲報』^[56]，另一方面是『社會民主黨人報』^[57]，都沒有並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國各地的組織聯系起來，不能使它們過着統一的黨的生活。如果以為遠離俄國現實的國外機關報能把早已經過小組活動階段的黨的工作連成一氣，那就太奇怪了。誠然，在各個彼此隔離的組織之間有許多共同的、從思想上把它們聯系起來的東西，——它們有一個經過革命考驗的共同綱領，有經過革命肯定下來的共同的實際工作原則，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這正是『革命後』的黨和『革命前』的黨的第二個重要區別。但這還不够。因為黨組織在思想上的統一還遠不能把黨從組織渙散和彼此隔離的狀態中拯救出來。只要指出一點就够了：連黨內普通的書信往來也沒有達到比較令人滿意的程度。至於把黨真正聯系成一個統一的機體，那就更不用說了。

總之，(一)黨和廣大羣衆脫節，(二)黨組織彼此隔離，——這就是黨目前所遭遇着的危機的實質。不難了解，革命本身的危機，反革命的暫時勝利，發動失敗後的沉寂和黨在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兩年所享有的些微自由的完全喪失，都是造成這一切現象的原因。在革命向前推進的時候，在有自由的時候，黨發展了，擴大了，鞏固了。在革命退却的時候，在沒有自由的時候，黨就開始衰弱了。起初

是知識分子脫黨，隨後一些最動搖的工人也脫黨了。黨的成長，實際上就是先進工人的成長，這局部地加速了知識分子的脫黨，因為「一九〇五年知識分子」貧乏的知識已趕不上先進工人的複雜要求。

當然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將來的自由來到以前，黨應當在危機中苟延殘喘，像某些人錯誤設想的那樣。要知道，第一、自由本身的到來多半取決於黨是否能擺脫危機而以健壯的、新生的姿態出現，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取得自由的條件之一是依靠組織得很好的工人政黨。第二、盡人皆知的階級鬥爭的法則告訴我們，資產階級的組織性日益加強，必然會使無產階級的組織性相應地加強起來。而誰都知道，先行革新我們的黨——唯一的工人政黨，是增強我們無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組織性的必要條件。

因此，在自由來到以前，使黨健全，使黨擺脫危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全部問題在於要找出使黨健全的办法，要開闢這樣的途徑，使黨藉以（一）聯系羣衆，（二）把彼此隔離的各個組織結成統一的機體。

*

*

*

那末我們黨怎樣才能擺脫危機，爲此需要採取什麼辦法呢？

有些人對我們說，盡量使黨成爲公開的黨，並把它團結在公開的杜馬黨團的周圍。但是，當最無關緊要的文化團體之類的公開機關都受到殘酷壓制的時候，怎能盡量使黨成爲公開的黨呢？難道能採取放棄黨的革命要求的辦法嗎？要知道，這是葬送黨而不是革新黨了！此外，既然杜馬黨團本身

不僅脫離羣衆，而且脫離黨組織，它又怎能將黨和羣衆聯繫起來呢？

很明顯，這樣解決問題，反而把問題弄得更混亂，使黨更難擺脫危機。

另外一些人對我們說，盡量把黨的職責交給工人，以便使黨擺脫不堅定的知識分子。無疑地，使黨擺脫不需要的客人，而把職責集中在工人自己手中，這對於黨的革新工作一定會大有幫助。但是同樣很明顯，僅僅『轉交職責』，同時却保存舊的組織系統，使用老一套的黨的工作方法，從國外進行『領導』，那是不能把黨和羣衆聯繫起來，不能把黨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的。

顯然用治標的辦法是完成不了什麼大事的，必須找到根本辦法來根治黨的疾病。

黨首先苦於和羣衆脫節，所以無論如何要使黨聯繫羣衆。但是在我們目前的條件下，只有首先並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別爲廣大羣衆所關心的問題，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就拿羣衆日益貧困的事實和資本家的進攻來說吧。大規模的歇業已像暴風似地從工人頭上掠過，而縮減生產，任意解僱工人，減少工資，延長工作日，——總之，資本家的進攻，至今還在繼續着。很難想像，這一切使工人多麼痛苦，多麼焦急，使工人和廠主間發生了多少『誤會』和衝突，使工人頭腦中因此出現了多少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們的組織在進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時，必須不倦地參與這一切小衝突，把這些小衝突同偉大的階級鬥爭聯繫起來，支持羣衆日常的抗議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實來表明我們黨的偉大原則。誰都應當明白，只有這樣才能使『逼得走投無路』的羣衆動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擺脫』可詛咒的停滯狀態。而使他們『擺脫』這種狀態也正是把他們團結在我們組織的周圍。

工廠黨委會就是能在羣衆中最有成效地開展這一工作的黨的機關。參加工廠黨委會的先進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圍的羣衆團結在黨的周圍的活躍分子。不過工廠黨委會必須不倦地參與工人的一切鬥爭，保衛他們的日常利益，並且把這些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聯繫起來。使工廠黨委會成爲黨的主要堡壘，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其次，爲了接近羣衆，還必須把黨的其他更高級的組織建立得不僅適於保衛羣衆的政治利益，而且適於保衛羣衆的經濟利益。黨組織必須不忽略任何一個多少帶有重要性的生產部門。爲此就必須在建立組織時，除按照地區的原則外，還要採用按照生產部門的原則，例如把各種不同生產部門的工廠黨委會按照生產部門分別組成各個不同的分區，再按照地區把這些分區聯合爲區等等。如果分區的數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沒有什麼不好，相反地，黨組織却能獲得堅固的基礎並和羣衆更密切地聯繫起來。

黨組織的成分在解決危機方面具有更大的意義。必須讓最有經驗最有威望的先進工人到各個地方組織中去工作，使地方組織的工作集中在他們堅強的手中，使他們（正是他們）在組織中擔任最重要的職務（從實際工作和組織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職務的工人經驗不足，修養不夠，即使最初常常跌交，那也不要緊，實際工作和較有經驗的同志們的指點會擴大他們的眼界，終於會把他們培養成真正的著作家和運動的領袖。不要忘記，倍倍爾這樣的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只是在工作過程中、在實踐中鍛鍊出來的，而目前我們的運動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俄國的倍倍爾，需要工人

出身的有經驗的堅定的領袖。

正因為如此，我們在組織工作方面的口號應當是：『給先進分子開闢更廣闊的道路以參加黨的各部門工作』，『給他們更廣大的活動範圍』！

不言而喻，先進分子除了要有做領導工作的願望和主動性以外，還要有豐富的學識，而我國有學識的工人是很少的。這裏就正用得着有經驗而又積極的知識分子的幫助。必須建立一些高級的小組，即先進分子的『學習討論會』，即使每區建立一個也好，必須有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這一切大可彌補先進分子的缺陷，而把他們培養成未來的演說家和思想領導者。同時先進分子必須在他們的工廠裏經常做報告，『盡量實習』，不要因為怕在聽衆面前『丟臉』而裹足不前。要永遠拋棄過分的謙虛和在聽衆面前的惶恐，要大胆勇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即使在開始時失敗了也不要緊，跌一兩次交，你就會像『基督履海』似地行走自如了。

總之，（一）根據那些和無產階級總的階級需要有關的日常需要，努力進行宣傳；（二）組織並鞏固工廠黨委會，作為黨在各區中的最重要的據點；（三）把黨的最重要的職責『交給』先進分子；（四）組織先進分子的『學習討論會』，——這就是使我們的組織能够把廣大羣衆團結在自己周圍的辦法。

不能不指出，解決黨內危機的上述辦法是實際生活本身提供的。中央區和烏拉爾早已不依靠知識分子，那裏是由工人自己處理黨組織的工作的。在索爾莫沃、魯干斯克（頓巴斯）、尼古拉也夫，工人在一九〇八年印發了傳單；在尼古拉也夫，除傳單外，還出版了秘密的機關報。而巴庫的組織，過

去和現在都不斷地參與工人的一切鬥爭，過去和現在幾乎沒有放過工人和石油業主的任何一次衝突，當然，同時還進行一般的政治鼓動工作。這也就是巴庫的組織直到現在還和羣衆保持着聯系的原因之一。

黨聯系廣大工人羣衆的方法就是這樣。

但是黨不僅苦於和羣衆脫節，而且苦於黨組織彼此隔離。

現在我們就來談談後一個問題。

*

*

*

那末，怎樣把彼此隔離的各個地方組織聯系起來，怎樣把它們集成一個有聯系的過着統一生活的黨呢？

也許可以認爲時而舉行的全黨代表會議就能解決這一任務，就能把各地組織聯合起來。或者在國外出版的『無產者報』、『呼聲報』和『社會民主黨人報』終於會把黨的組織集合起來，團結起來。無疑地，不論前者或後者對於聯系各地組織都有不小的作用。至少到目前爲止，代表會議和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是聯合彼此隔離的組織的唯一手段。但是，第一、代表會議，而且是不常舉行的代表會議，只能暫時把各地組織連成一氣，因而這樣的聯系並不像所需要的那樣牢固。一般說來，在代表會議閉會期間，這種聯系便斷了，實際上仍舊用手工業方式進行工作。第二、至於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姑且不論它們運到國內的數量是極其有限的），那它們當然落後於俄國的黨的生活，不能及時覺察和觸

及工人所關切的問題，因而不能把我們的地方組織牢固地連在一起。事實證明：自倫敦代表大會以來，黨雖能召開兩次代表會議（*見*），在國外出版了幾十期機關報，但是我們的組織之聯結成一個真正的黨這一事業，危機之解決這一事業，還只是勉勉強強地進展了一點。

因此，代表會議和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對於黨內的聯系雖然是極其重要的，但是對於克服危機，對於牢固地把地方組織聯合起來還是不夠的。

顯然，需要治本的辦法。

只有辦一個全國性的報紙，使這個報紙成爲聯系黨的各種工作的中心並在俄國國內出版才是治本的辦法。

只有在共同的黨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國各地的組織聯合起來。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來綜合地方組織的經驗，然後把已經概括起來的黨的經驗推廣到各個地方組織中去，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而全國性的報紙正可能成爲這樣的中心，即領導黨的工作、統一和指導黨的工作的中心。但是這個報紙爲了能真正領導工作，必須使各地把各種詢問、聲明、信件、通訊、控訴、抗議、工作計劃、羣衆所關切的問題等等源源不斷地寄給它，使這個報紙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聯系，從而使這個報紙掌握足夠的材料，能及時覺察、觸及並闡明必要的問題，根據這些材料作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號，並使這些指示和口號成爲全黨和一切組織的武器……

沒有這些條件，黨的工作就失去了領導；黨的工作沒有領導，就不能把各個組織牢固地團結成一

個整體！

正因為如

領導作用的（

不用說，

來就是中央委

得很好的全國

言，只有用這

一氣並真正在

任務。

總之，創

就是我們的任

現在把上

牢固聯系，黨

必須使我

必須使上

黨內

爲了解決地方的任務，在進行一般政治鼓動的同時，必須根據迫切的日常需要來進行經濟鼓動，經常參與工人的鬥爭，建立並鞏固工廠黨委會，把黨的職責盡可能集中在先進工人的手中，組織先進分子的『學習討論會』來培養堅定而有學識的工人領袖。

爲了解決中央的任務，必須創辦一個能把地方組織和黨中央委員會聯繫起來並且把它們團結成一個整體的全國性的報紙。

只有解決了這兩個任務，黨才能擺脫危機而以健壯的新生的姿態出現；只有具備了這些條件，黨才能擔負起英勇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名副其實的先鋒隊這一重大使命。

克服黨內危機的辦法就是這樣。

不用說，黨愈能充分利用它周圍的各種合法機會——從杜馬講壇和工會直到合作社和喪葬基金會，就愈能迅速地完成克服危機的任務，完成革新和健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任務。

載於一九〇九年八月一日和二十七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六號和第七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關於即將到來的總罷工

巴庫工人正處在艱苦的時期。石油業主去年春天開始的進攻仍在繼續。工人以前爭得的成果被徹底地剝奪着。而工人「只好」默不作聲，「無盡期地」忍受下去。

工資因直接減少或因取消房租津貼、獎金等等而日益降低。三班制既改成兩班制，而加班和包工事實上又成爲強制性的，所以工作日就延長了。所謂「裁減員工」還在進行。石油業主常因一點小事，有時竟平白無故地解僱工人，特別是覺悟的工人。他們並且肆無忌憚地亂開「黑名單」。『固定』工人制度改成了以票計工的『臨時』工人制度，這種工人隨時都可能爲一點小事而失去工作。罰款和打罵『制度』到處盛行。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不再被承認。殘廢法被蠻橫地扔在一邊。醫藥治療被減少到最低限度。十戈比醫藥捐的『苦役法』仍在實行。清潔衛生工作被置諸腦後。學校辦得很壞。民衆文娛館沒有了。夜校沒有了。講演會沒有了。有的只是解僱，再解僱！石油業主蠻橫到什麼程度，從下列事實就可以看出：許多大公司，例如「裏海」公司爲了避免支付房租津貼，竟公然宣佈『自己的』工人未經公司行政當局許可不得結婚。儘管如此，石油大王們還是逍遙法外。他們感到自己有勢力，看到他們狡詐的進攻策略已經得逞，所以繼續侮辱工人。

石油業主進攻得逞決不是偶然的。這完全是由許多有利於這次進攻的外部情況促成的。這首先是俄國普遍的沉寂狀態，是既成的有利於資本進攻的反革命局面。不用說，沒有這種情況，石油業主就不得不節制自己的貪慾。其次是以蹂躪少數民族的暴徒馬爾丁諾夫為首的地方當局完全像奴才一樣地為石油業主効勞，爲了討好他們，什麼都肯幹（我們只要回憶一下『米爾佐也夫公司事件』就行了）。再次是工人的組織不堅強，這多半是由油礦工人的成分不固定而造成的。誰都明白在和石油業主作鬥爭時，油礦工人是很重要的，然而正因爲他們和農村聯系得最密切，他們就最不『善於』進行有組織的鬥爭。最後是工資項目的繁多（其中包括獎金、房租津貼、車費、洗澡費等等）使資本家易於減少工資。無須證明，直接減少工資並不像暗中減少工資那麼容易，所謂暗中減少工資就是利用保持工資『本身』原額的錯覺來零敲碎打地逐漸取消獎金、房租津貼、車費等等。

這一切再加上石油業主經驗的增多和組織性的加強，自然就大大便利了資本在石油王國的進攻。

石油大王們這種瘋狂進攻什麼時候才會停止，他們的蠻橫無理有沒有止境，這就要看他們會不會遇到工人方面的強有力的、有組織的抵抗而定。

目前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就是石油業主打算『完全』征服工人，『一勞永逸地』摧毀他們的鬥志，『無論如何』要把『自己的』工人變成唯命是聽的奴隸。早在去年春天，他們就想達到這個目的，當時他們破壞了協商會議，企圖挑逗工人去進行無組織的總罷工，以便一下子打垮工人。他們現在還是想

達到這個目的，心懷惡意地有步驟地進攻工人，經常挑逗工人去進行自發的發動。

工人暫時什麼話也不說，默默地懷恨在心，地忍受着石油業主的打擊。可是，我們眼看一方面石油業主一天比一天蠻橫，無止境地奪取工人最後的一塊麪包，把工人弄到赤貧的地步，愚弄工人並挑逗他們去進行自發的爆發；另一方面工人一天比一天忍耐不住，對石油業主的怨言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我們眼看到這一切，可以確信地說，石油工人的憤怒的爆發，在最近的將來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工人真能『無盡期地』忍受下去，淪於奴隸般順從的中國苦力的地位，或者是他們奮起反抗石油業主，掃清走向較好生活的道路。羣衆的憤怒日益不可遏止，證明工人必然要走第二條道路，即和石油業主鬥爭的道路。

而石油工業的現狀是這樣的：它不僅完全容許工人進行防禦性的鬥爭，保持舊有的陣地，而且完全容許工人轉入進攻，奪取新的陣地，進一步增加工資，進一步縮短工作日等等。

實際上，既然目前石油業主的利潤比俄國和歐洲其他企業主的利潤大得多，既然石油市場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起來，擴張到新的地區（如保加利亞），既然噴油井的數目日益增加，既然石油價格非但沒有下跌，反而有上漲之勢，那末工人完全有可能掙斷奴隸般忍受的鎖鍊，擺脫可恥的沉默的桎梏，舉起向石油業主反攻的旗幟，從他們那裏爭得新的較好的勞動條件，這豈不是很明顯的嗎？……

但是，記住了這一切，還不應當忘記：即將到來的總罷工將是巴庫歷來罷工中最嚴重、最持久、

最頑強的一次。應當注意到我們以前的罷工具備下列有利的條件：（一）俄國革命的普遍高漲；（二）由此造成的地方當局的相對『中立』；（三）石油業主由於經驗不夠和組織性不強，一遇到罷工就張皇失措。現在我們既沒有第一個條件，又沒有第二個條件，更沒有第三個條件。普遍的高漲沒有了，隨之而來的却是使石油業主稱心如意的普遍的沉寂；地方當局的相對『中立』沒有了，隨之而來的却是他們使用一切『鎮壓』手段的充分決心。石油業主不再是經驗不夠和組織性不強，而是組織性加強了。並且石油業主在鬥爭中已經老練得自己會挑逗工人罷工了。他們甚至不怕挑逗工人舉行總罷工，只要這種罷工是無組織的，是使他們有可能『一下子制服』工人的。

這一切都說明工人就要和有組織的敵人進行嚴重而困難的鬥爭。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儘管有許多不利的條件，勝利還是可能的。只是必須使工人的鬥爭不是自發的和分散的，而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和自覺的。

只有在這個條件下才能指望獲得勝利。

我們不知道總罷工究竟在什麼時候開始，但無論如何不會在對石油業主有利的時候。現在我們只知道一點，就是必須立即開始堅持不懈的準備工作來迎接總罷工，並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精力和勇氣貫注到這一工作上去。

加強我們的團結性，加強我們的組織性，——這就是我們準備工作的旗幟。

因此，應當立刻着手把工人廣泛地團結在社會民主黨的周圍，團結在工會的周圍。這首先應當結

束組織中的分裂狀態，把兩派聯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同時也應當結束各工會的分裂狀態，把它們聯合成一個強有力的工會。必須使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活躍起來，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感染它們，使它們和羣衆聯系起來，並通過它們把我們和整個石油工人大軍聯系起來。必須着手擬定能把工人團結成一支有力大軍的共同要求。必須經常參與工人和石油業主的一切衝突，從而實際上把工人團結在社會民主黨的周圍。總之，應當堅持不懈地竭盡全力地進行準備，以便應付自如地迎接即將到來的困難而光榮的總罷工。

我們號召同心協力地準備經濟總罷工。

載於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七號

署名：科·柯……

按報上原文刊印

黨的生活

(一九)

下面我們刊登了巴庫委員會關於「無產者報」編輯部內意見分歧的決議。這種意見分歧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在我們國外出版的報刊上早就對這種意見分歧進行過爭論。有人甚至說布爾什維克派內部在鬧分裂。可是巴庫工人很少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這種意見分歧的內容。因此，我們認為必須在這個決議的前面加上一些說明。

首先談談布爾什維克派內部鬧分裂的問題。我們聲明：布爾什維克派內部現在和過去都沒有鬧過任何分裂，只是對利用合法機會的問題有意見分歧。在布爾什維克派這樣一個精神飽滿、生氣勃勃的政派中，無論過去或將來，這種意見分歧總是會有的。誰都知道，有一個時期，布爾什維克派內部對於土地綱領、游擊活動、工會和黨等問題都有過相當嚴重的意見分歧，儘管這樣，布爾什維克派却沒有分裂，因為它的內部對於其他重大的策略問題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關於這一次的問題也應該這樣說。因此，關於布爾什維克派內部鬧分裂的說法純粹是捏造。

這裏所說的意見分歧是指十二人組成的「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註)分成了兩派：編輯部內的多數(十人對二人)認為爲了鞏固黨，應當利用工會、俱樂部，特別是杜馬講壇等合法機會，黨不應當從

杜馬中召回杜馬黨團，相反地，應當幫助杜馬黨團改正錯誤，利用杜馬講壇進行社會民主黨的正確而公開的鼓動工作；周圍聚集着所謂召回派和最後通牒派的編輯部內的少數（二人）却認為合法機會沒有什麼特殊價值，以不信任的眼光看杜馬黨團，認為不需要支持它，甚至不反對在一定條件下把它從杜馬中召回。

巴庫委員會認為編輯部內少數人的觀點不符合黨和無產階級的利益，因此，堅決擁護以列寧同志為代表的編輯部內多數人的立場。

巴庫委員會關於「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內意見分歧的決議

巴庫委員會根據「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兩派送來的印就的文件，討論了編輯部的情況，並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一）從問題的本質看來，編輯部內多數人對於在杜馬內外進行工作的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是唯一正確的。巴庫委員會認為，只有這樣的立場才能稱為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立場——精神上的而不僅是字面上的布爾什維克的立場。

（二）『召回派』，作為布爾什維克派中的一個派別，它的產生，是對合法機會，特別是對杜馬講壇作了有害於黨的過低估計的結果。巴庫委員會確認，在目前沉寂的環境中，在沒有其他更重要的手段

來公開進行社會民主黨的鼓動工作的情況下，利用杜馬講壇進行工作可以是而且應當是黨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

(三) 經常提醒杜馬黨團注意黨紀的「最後通牒派」並不是布爾什維克派內的什麼派別。既然它竭力站在一個僅限於對杜馬黨團顯示中央權力的特殊派別的立場，所以「最後通牒派」是最壞的一種「召回派」。巴庫委員會確認，只有中央在杜馬黨團內部和對整個杜馬黨團進行不倦的工作，才能使杜馬黨團成爲真正有黨性的守紀律的黨團。巴庫委員會認爲杜馬黨團最近幾個月來活動的事實顯然證明了這一切。

(四) 作爲一個文學流派的所謂「造神派」，以及一般地把宗教成分注入社會主義的東西，它的產生，是對馬克思主義基礎作了非科學的因而是有害於無產階級的解釋的結果。巴庫委員會着重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及其形成爲確定的世界觀，並不是和宗教成分結合的結果，而是和宗教成分進行無情鬥爭的結果。

(五) 根據這一切，巴庫委員會認爲，對聚集在編輯部內少數人周圍的上述派別進行無情的思想鬥爭是黨當前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

(六) 另一方面，編輯部的兩部分人雖有上述意見分歧，但對於布爾什維克派極爲重要的問題（如對時局的估計，無產階級及其他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彼此的意見是一致的，根據這一點，巴庫委員會認爲，布爾什維克派的統一，即編輯部兩部分人的共同工作，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七) 因此，巴庫委員會不同意編輯部內多數人的組織政策，並反對把站在編輯部內少數方面的人『從我們中間清除出去』的任何措施。巴庫委員會同樣反對馬克西莫夫同志的行爲，因爲他聲明不服從編輯部的決定，而這會引起新的更激烈的摩擦。

(八) 巴庫委員會建議舉行一個和全黨代表會議平行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作爲消除現存不正常狀態的實際措施(八)。

關於『某地學校』和對『左派孟什維克』的態度問題，巴庫委員會因尙未掌握充分材料，暫不作出確定的決議。

一九〇九年八月二日

載於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七號

按報上原文刊印

十二月罷工和十二月合同

(爲紀念其五周年而作)

同志們！

從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巴庫各區宣佈經濟總罷工那天起，到今天整整五年了。

從工人和石油業主訂立著名的十二月合同即我們的『重油憲法』那時起，到最近幾天也快滿五年了。

我們以自豪的心情回憶這些日子，因爲這是我們勝利的日子，是石油業主失敗的日子！

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個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壯麗場面：成千上萬的罷工工人包圍了『電力』公司，責成自己的協商代表提出十二月要求，而躲在『電力』公司裏面被工人包圍的石油業主代表則『表示贊同』，簽訂了合同，『同意了一切』……

這是貧民無產者對富翁資本家的真正勝利，是給石油工業中的『新制度』奠定基礎的勝利。

訂立十二月合同以前，我們平均每天工作十一小時；訂立合同以後，規定工作九小時，對採油工人逐漸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

十二月罷工和十二月合同

一六一

訂立十二月合同以前，我們平均每天收入約八十戈比；訂立合同以後，工資提高到每天一個盧布零幾個戈比。

十二月罷工以前，既不發給我們房租津貼，也不供給我們宿舍；由於舉行了罷工，我們為機電工人爭得了前者，又爭得了後者，只是還必須把這一切推廣到其他工人身上。

十二月罷工以前，資本家的走狗在油礦和工廠裏無法無天，對我們橫加毆打，肆意罰款；由於舉行了罷工，一定的制度、一定的『憲法』建立起來了，我們根據這個『憲法』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協商代表來表達我們自己的意志，和石油業主一起談判，和他們一起確定相互間的關係。

我們一下子就從『阿姆沙拉』⁽²⁾和『負重的牲口』變成了為較好的生活而鬥爭的人！這就是十二月罷工和十二月合同給予我們的東西！

但還不止這些。十二月鬥爭給予我們的基本東西是：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必定獲得勝利，有決心迎接新的戰鬥，認識到『單靠自己的手』就可以砸碎資本主義奴隸制的鎖鍊……

從那時起，我們總是向前進展；增加了工資，使油礦工人也爭得了房租津貼，鞏固了『重油憲法』，使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得到了部分的承認，組織了工會，團結在社會民主黨的周圍……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繼續多久。革命退却和反革命加緊以後，特別是從一九〇八年年初起，石油業主竟假借石油產量減少和市場縮小的理由，開始剝奪我們原已爭得的果實。他們取消獎金和房租津貼。他們實行十二小時的兩班制來代替八小時的三班制。他們減少了醫藥治療。他們已經奪去民衆

文娛館，現在又要把學校奪去；他們用在學校方面的只有少得可憐的幾文錢，而每年花在警察身上的竟達六十多萬盧布。至於打罵和罰款的恢復，工人委員會的取消，沙皇政府的奴才——大資本家的走狗對工會的迫害……那就更不用說了。

這樣，最近兩年來，他們不但使我們不能繼續改善生活，而且使原來的情况更加惡化，把我們原已爭得的果實奪去，將我們拋到十二月以前的舊時代。

現在，十二月十三日，在這個勝利的十二月罷工五周年紀念的日子，在這個石油業主曾在我們面前發抖而我們舉行進攻並爭得新權利的日子，——正是在今天，我們面前擺着石油工人羣衆所關切的重大問題：我們還要沉默多久？我們的忍耐有沒有盡頭？我們應當不應當掙斷沉默的鎖鍊，爲我們的切身要求舉起經濟總罷工的旗幟？

你們自己判斷吧。今年的產量達到了五億普特，這是最近四年來任何一年的產量都沒有達到過的數字。石油的價格絕沒有下跌，因爲今年的平均價格和去年一樣是二十一戈比。無須任何花費的自噴石油一天比一天增多。因爲各地不用石炭而改用石油，石油市場一天天擴大，石油的輸出量也不斷增加。可是石油業主的生意愈好，從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愈多，他們就愈加惡毒地對待工人，愈加厲害地壓迫工人，愈加猖狂地解僱覺悟的工人弟兄，愈加狠心地奪去工人的最後一塊麪包！

同志們，石油工業的狀況愈來愈有利於石油工人的共同鬥爭，而石油業主的挑釁行爲必然推動工人去進行這樣的鬥爭，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同志們，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們無盡期地忍受下去，落到一聲不響的奴隸地位，或者是起來為我們的共同要求進行共同的鬥爭。

我們過去和現在的一切，我們的鬥爭和我們的勝利都證明我們要選擇第二條道路，即舉行總罷工的道路，以爭取提高工資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取工人住宅區和房租津貼，爭取民衆文娛館和學校，爭取醫療和殘廢工人撫卹金，爭取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和工會的權利。

同志們，我們一定會達到自己的目的，儘管有聞所未聞的迫害手段，儘管石油業主的組織性正在加強，只要我們加緊總罷工的準備工作，只要鞏固我們的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只要擴大我們的工會，只要團結在社會民主黨的周圍，我們就會像五年前那樣使我們的老闆們就範。

社會民主黨既引導我們獲得了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的勝利，也就會引導我們通過有組織的總罷工獲得未來的勝利。

這就是光榮的十二月鬥爭的經驗。

那末就讓今天，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勝利罷工開始的日子，鼓舞我們去同心協力，堅持不懈地準備總罷工吧！

讓我們大家對這一天的共同懷念成爲石油業主預感到社會民主黨領導的總罷工即將到來的不祥之兆吧！

即將到來的總罷工萬歲！

社·會·民·主·黨·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文曾印成傳單

按傳單原文刊印

十二月罷工和十二月合同

一六五

高加索來信

(八三)

一 巴 庫

石油工業的狀況

在國內比較「平靜」之後，在俄國豐收和中部工業區工作活躍之後，石油工業已進入比較高漲的階段。由於局部罷工次數減少（因為政治上的殘酷迫害和石油業主組織性的不斷加強），罷工所造成的石油減產量已降低到五十萬普特左右（一九〇八年為一千一百萬普特，一九〇七年為二千六百萬普特）。沒有罷工而吊油又能順利進行，這成為自噴石油量增加的有利條件之一。石油業中已經形成的（相對的）穩定狀態，又使它恢復了近幾年來所失去的市場。今年石油產量已提高到五億普特，這是最近四年中任何一年都沒有達到的數字（去年是四億六千七百萬普特）。由於中部工業區對液體燃料的需要增加，又由於東南鐵路、梁贊—烏拉爾鐵路和莫斯科—喀山鐵路不用頓巴斯的煤而改用石油，今年石油的輸出量就大大超過了去年。雖然石油業主叫苦連天，相反地，石油價格却沒有下跌，依然照舊，因為今年的平均價格和去年一樣（二十一戈比）。而得天獨厚的油井往往噴泉似地噴出石

油來，下雨似地賜給石油業主。

一句話，石油業主的「生意」正在好轉。

可是經濟上的迫害不僅沒有減輕，反而變本加厲。取消了「獎金」和房租津貼。兩班制（每班十二小時）代替了三班制（每班八小時），加班包工逐漸成爲制度。醫療和學校經費減到最低限度（而石油業主用在警察方面的經費每年竟達六十多萬盧布！）。食堂和民衆文娛館已被奪去。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和工會極被輕視，覺悟的工人弟兄照舊被解僱。罰款和打罵制度也在恢復。

沙皇政權的奴僕，警察和憲兵，完全爲石油大王們効勞。暗探和奸細密佈巴庫石油區，工人每因與石油業主發生極小的糾紛而被大批驅逐，實際「自由」（巴庫特權）被剝奪淨盡，逮捕事件不斷發生，——地方當局「立憲」工作的情形就是這樣。這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地方當局「按其本性」來說不能不窒息任何「自由」，即使是最起碼的「自由」；第二、地方當局之所以必須這樣做，還在於石油業以普特稅、官地抽成、消費稅和運輸稅等形式每年使國庫得到不下四千萬盧布的「收入」，它「需要」平靜，「需要」不間斷的吊油。至於石油業中任何些微的停滯都會嚴重地影響中部工業區，而這又會攪亂政府的「事業」，那就更不用說了。固然，不久以前政府會認爲在石油區必須容許某些「自由」，並佈置了工人和石油業主的「協商會議」，但這是過去的事情，那時反革命得勢的可能性還不明顯，那時討好工人的政策還是最有利的政策。現在情勢已經明顯了，反革命「完全」站穩了，於是野蠻的迫害政策代替了討好政策，蹂躪少數民族的暴徒馬爾丁諾夫代替了甜言蜜語的鍾柯夫斯基。

這時，工人完全懂得局部罷工是不適當的了，他們日益堅決地談到經濟總罷工。石油業主的『生意』日見好轉，而壓榨却不斷加重，這一事實使工人恨入骨髓，使他們有了戰鬥情緒。工人以往已爭得的果實被剝奪得愈厲害，總罷工的思想在工人頭腦中就成熟得愈充分，工人『期待』『宣佈』罷工也就愈焦急。

組織考慮到石油業狀況有利於罷工，也考慮到工人有罷工情緒，於是決定展開總罷工的準備工作。目前巴庫委員會正在徵求羣衆意見，擬定能團結全體石油業無產階級的共同要求。要求大概將包括八小時工作制、工人住宅區、房租津貼、民衆文娛館和學校，提高工資，廢除加班和包工，增加醫療，承認工人委員會和工會。組織及其執行機關巴庫委員會認爲儘管反革命日益猖獗，儘管石油業主的組織性日益加強，只要工人以自己階級的組織性，即聯合各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擴大和鞏固工會並團結在社會民主黨的周圍來對抗敵人的力量，他們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時機的選擇取決於種種條件，事先很難估計。現在有一點是明顯的：罷工不可避免，必須抓緊『每一分鐘』準備罷工……

油礦區自治

石油業的好轉並不是巴庫無產階級生活中唯一重要的現象。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事件是我們這裏不久以前展開的『地方自治運動』。我們指的是巴庫各石油區的油礦區自治。在內政部提出邊區地方自治的著名『奏摺』和高加索總督遵此發佈高加索地方自治實施辦法的『通令』以後，石油業主已着

手草擬油礦區自治方案。此項方案的原則無疑將由石油業主這次（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批准，這些原則大致如此：油礦區（巴拉漢內、羅曼內、薩崩奇、蘇拉漢內、比比—愛巴特）單獨成立一個不屬於市、縣的特別地方自治單位，稱為油礦區自治局。油礦區自治局的職務是管理給水、供電、修路、電車、醫療、民衆文娛館、學校，建設屠宰場、澡堂、工人住宅區等等。地方自治局本身大體上按照一八九〇年六月十二日的「條例」^(八)組織，所不同的是按照「條例」必須保證貴族佔地方自治局委員的半數，因為這裏沒有貴族（石油業主既把油礦區從縣治裏劃分出來，也就使自己不受佔優勢的地主的威脅，並造成本身的優勢），就保證石油業主佔半數，並且所保證的還不是全體石油業主而只是二十三個大石油業主。地方自治局的四十六個席位中，官廳和公共機關的代表佔六席；十萬工人居民佔四席；繳納全部捐稅（全部預算約六十萬盧布）三分之二的納稅人，即二十三個大石油業主佔十八席；繳納六分之一捐稅的納稅人，即從屬於大石油業主的一百四五十個中等石油業主佔九席；工商業小資產階級（約一千四百人）佔其餘的九席。

你們可以看出站在我們面前的，一方面是特權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必然成爲勞資雙方尖銳的衝突場所的純粹工業界的地方自治局。

石油業主組織這樣一個地方自治局，第一、是想把文化和經濟方面的大部分職務從他們的「代表大會」推給油礦區自治局，使「代表大會」變成純粹的辛迪加；第二、是想把其餘的資產階級即輔助企業、鑽井包工等業主拉來共同負擔花在油礦工人居民身上的經費。至於「按照第三屆國家杜馬的條

例』所選出的工人的四個席位（從工人選民團選出初選人，然後選出四個覆選人），這在石油業主來說，不但不是損失，而且很有利，因為這四個工人席位是爲了給地方自治局裝門面而給的，——多麼『開明』而又……便宜合算，石油大王何樂而不爲。

另一方面，無疑地，既然油礦區自治局能把石油業資產階級和所謂『輔助企業』資產階級聯合成一個整體，那末它也一定能把至今還是分開的石油工人和輔助企業的工人聯合起來，使他們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四個代表表明他們的共同要求。

巴庫委員會有鑒於此，便在它的關於油礦區自治的決議中決定利用籌劃中的自治局，即參加自治局，以便宣傳工人的一般經濟需要，並加緊組織工人。

其次，爲了擴大選舉制度的範圍，並鑒於油礦區自治局所要處理的問題大體上也就是過去召開的協商會議所要處理的那些工人關切的問題，而工人在協商會議上一直和石油業主佔相等的席位，所以組織在自己的決議中要求工人在自治局中也要佔相等的席位，並在決議中着重指出，自治局內的鬥爭只有在得到自治局外的鬥爭的支持並爲後者的利益服務時才会有力量。

此外，鑒於省府會議決定把巴拉漢內、薩崩奇、羅曼內三個區（實際上都是工人住宅區）劃出油礦自治區是對工人不利的，組織要求把這三個區劃入油礦自治區。

最後，巴庫委員會在決議的總論中指出，普遍、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是地方自治自由發展和現存階級矛盾自由表現的必要條件。同時着重指出，必須推翻沙皇政權，必須召開全民立憲會議，以

此作為建立徹底民主的地方自治局的先決條件……

油礦區自治局目前還在籌備階段。石油業主委員會的草案須經石油業主代表大會批准，再經總督辦公室送交內政部，然後送交國家杜馬等等。雖然如此，組織仍決定立即展開運動，在油礦和工廠中召開大會，以揭穿石油業主，使廣大羣衆普遍知道我們的綱領，並鼓吹召開全民立憲會議。爲了這些目的，組織既不拒絕「參加」石油業主的代表大會，也不放棄利用杜馬講壇，並預先供給我們的黨團以必要的材料。

組織狀況

由於巴庫油礦區的某些特殊條件（集會的某種可能性還沒有被政府當局完全取消，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還存在），巴庫的組織狀況優於俄國其他地區。此外，所謂合法機會的存在也使工作便於進行。因此，我們組織的聯系是相當多的。但是由於人力和經費的不足，這些聯系還沒有充分利用。本來需用韃靼文、阿爾明尼亞文及俄文進行口頭的和主要是文字的宣傳，但因為經費（和人力）不足，只得限於俄文，然而，例如回民工人在生產（吊油）中就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並且他們的人數也比俄羅斯人或阿爾明尼亞人多。用俄文出版的「巴庫無產者報」（巴庫委員會的機關報）已經三個月沒有出版了，主要是因為沒有經費。巴庫委員會在最近一次會議上接受梯弗里斯委員會的提議，盡可能用四種或三種文字（俄文、韃靼文、格魯吉亞文、阿爾明尼亞文）出版一種總的機關報。我們組織內的

黨員（嚴格地說）不過三百人。和孟什維克同志（約一百人）的聯合還沒有進入實現階段，——暫時僅僅有聯合的意願，但是僅僅有聯合的意願還不能消除分裂狀態。……宣傳工作只在我們稱爲「學習討論會」的高級組內進行，其方式是講演。重要的宣傳書籍深感缺乏……和黨脫離的狀態、對俄國各地黨組織情況的完全隔膜，這對於黨員羣衆有很壞的影響。創辦全國性的機關報，經常舉行的全黨代表會議和中央委員有計劃的巡視，是會有助於工作的。在巴庫委員會通過的具有全組織性的決定中，最重要的是關於召開全黨代表會議和創辦全國性機關報的兩個決定^①。關於第一個問題，巴庫委員會認爲必須儘速召開代表會議以解決已經成熟的、主要是組織上的各項問題。巴庫委員會認爲與召開代表會議的同時召開布爾什維克的代表會議以消除布爾什維克派內部最近數月來所形成的不正常狀態也是必要的。關於第二個問題，巴庫委員會鑒於組織彼此隔離分散，認爲只有在俄國出版一種全國性的機關報才能把黨的組織連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因此建議黨着手創辦這樣的報紙。

「合法機會」

我們的組織比較容易地應付了危機，我們的組織從來沒有中斷過自己的活動，並且對一切日常問題不管怎樣總有反應，這一切，在許多方面都應當歸功於至今還在我們組織周圍繼續存在的「合法

^① 見本卷第一八七頁至第一八九頁。——編者註。

機會」。當然，「合法機會」的存在又應歸功於石油業的特殊條件及其在全國經濟中的特殊作用，但是現在且不談這些……在巴庫的「合法機會」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的存在。這些委員會是由各該公司的全體工人不分民族不分政治信仰而選出的。它們的職能是代表工人去和公司行政當局談判屬於油礦——工廠性質的問題。在直接意義上說，它們還不是合法的組織，但在間接關係上和實際上却是完全合法的，因為它們的存在是根據「十二月合同」，而十二月合同全文都載在工人「工資計算簿」上，工人「工資計算簿」則是經政府當局許可而印製的。油礦——工廠工人委員會對於我們的組織顯然是有意義的；我們的組織通過它們可以有組織地去影響全體石油工人羣衆，但必須使這些委員會在羣衆面前堅持我們組織的決定。固然，因為現在石油業主不再重視這些委員會，它們的作用已經不那麼大，但工人「重視」這些委員會，這一點在我們比什麼都重要……

除了工人委員會，存在的還有工會，實際上是兩個工會，即「石油工人」的工會（約九百會員）和「機械工人」的工會（約三百會員）。「採油工人」的工會可以不算，因為它的作用太小了。至於和石油業沒有直接關係的其他行業的工會，以及受社會革命黨影響的秘密的海員工會（約二百會員），我們就不談了，雖然海員工會對石油業也有意義。在上述兩個工會中，前者（受布爾什維克影響的）在工人中特別有威信，它是按生產部門的原則建立的，它並且把石油業中各勞動部門的工人（採油、鑽井、機械、煉油、雜工）都聯合起來了。這種組織形式是由鬥爭條件來決定的，例如，鬥爭條件使機械工人脫離採油工人而舉行的罷工成爲不適當的行動。工人們懂得了這一點，就開始大批退出「機械工

人」的工會。因為按行業原則建立起來的「機械工人」的工會（受孟什維克影響的）反對按生產部門的原則建立工會，而主張成立三個獨立的工會（機械、採油、石油加工）來代替一個總的工會。但是按行業建立組織的原則早就被巴庫的實際經驗否定了。這就是「機械工人」的工會日趨衰落的一個原因。「機械工人」的工會的領導者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也容許非機械工人加入他們的工會，因而破壞了自己的原則。假若這些領導者沒有虛偽的自尊心，「機械工人」的工會早就會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石油工人」的工會合併了。

順便談談合併問題。工會合併的「談判」已經進行了兩年，但至今沒有談出什麼結果來，因為（一）孟什維克的領導者們怕自己被淹沒在布爾什維克的大多數中，因而有意阻撓合併；（二）影響這兩個工會活動的那兩個政派，目前還沒有聯合起來。究竟和誰聯合呢？可以算在孟什維克名下的也許有八十到一百個「黨員」，但他們自己現在還沒有聯合起來。至少最近八個月來我們沒有看見孟什維克「領導集團」發過一張傳單，沒有聽見他們做過一次演講，雖然在這期間石油區經歷了總罷工、地方自治、戒酒等重要運動。孟什維克的組織事實上已取消而不存在了。簡單地說，沒有誰可以聯合。而這種情況自然就阻礙了工會的合併……

○ 德米特里也夫還不懂得這一點，他在「職工運動實際經驗點滴」一書中「證明」必需有三個工會，他的根據不是對石油工人的鬥爭條件的「分析」，而是對……勞動技術的「分析」。他說，行業是各種各樣的，因此工會也應當是各種各樣的……

兩個工會都是非黨的。但這並不妨礙和黨組織保持最密切的聯系。

工會，特別是「石油工人」的工會對羣衆的影響是不小的。這就自然而然易於把最活躍的分子團結在我們組織的周圍。

在其餘的「合法機會」中，值得注意的是幾個俱樂部（受社會民主黨影響的）和「勞動」消費合作社（受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影響的）。這都是巴庫無產階級中最活躍的分子聚集的中心。在對我們組織的關係上，它們，特別是在整個石油區內活動的「知識就是力量」俱樂部（「科學」俱樂部只在城裏活動），可以說是和工會一樣的……

最近兩星期來忙於戒酒運動，這個運動幾乎需要所有合法機構都參加工作。巴庫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已在自己的決議中表明了。決議把酗酒看做資本主義制度下必不可免的惡習，只有隨着資本主義的垮台，隨着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把它根除。同時現存的專制農奴制度使工人和農民淪於毫無權利的奴隸地位，並剝奪他們滿足文化要求的可能性，因而使酗酒在勞動階層中劇烈地流行起來。至於「政府」代表公然鼓勵酗酒，作為充實國庫的來源，那就不用說了。根據這一切，巴庫委員會斷言：無論是正在組織的戒酒代表大會和「戒酒協會」的「自由派」的說教，或者是神甫的勸導，都不能減輕，更不能根除這種由於生活不平等所造成而為專制制度所加甚的酗酒惡習。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範圍內，只有不以根除酗酒為目的而把它減到最低限度為目的的鬥爭，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為使這種鬥爭得到勝利，首先必須推翻沙皇政權，爭取成立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樣才能自由發

展階級鬥爭，並組織城市和農村的無產階級，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廣泛地培養他們的力量，以便爲社會主義進行偉大的鬥爭。巴庫委員會把即將召開的戒酒代表大會⁽²⁾看做宣傳俄國無產階級的民主要求和社會主義要求的手段，並建議我們的代表跟參加代表大會的那些模糊無產階級階級任務的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

十二月二十日

第一次載於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三日（二十六日）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十一號

署名：科·斯·

「合法機會」一節寫於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署名：科·斯傑芬

按報上原文刊印

「合法機會」一節按手稿刊印

二 梯弗里斯

就工業發展來說，梯弗里斯和巴庫截然不同。巴庫之受人注意，因為它是石油工業的中心，梯弗里斯之受人注意則僅僅因為它是高加索的行政、商業和「文化」的中心。梯弗里斯全部產業工人約有兩萬，就是說，比士兵和警察還少。唯一的大企業是鐵路工廠（約有三千五百工人）。其餘各企業多的有一二百人，大部分只有二十到四十人。然而梯弗里斯簡直盡是商店以及與之有關的「商業無產者」。由於和經常活躍而又很多波動的俄國大市場的联系不够密切，梯弗里斯呈現停滯狀態。它沒有那種僅為大工業中心所特有的尖銳的階級衝突，這又使它變成一種有待外力來攪動的泥潭之類的東西。正是這個緣故，孟什維克派，真正「右的」孟什維克派，才能在梯弗里斯盤踞了這麼久。巴庫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在那裏，布爾什維克明顯的階級立場得到工人的熱烈擁護！

在巴庫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梯弗里斯則要經過長時間的爭論才能弄明白，——布爾什維克堅定不移的言論要費很大的氣力才能使人理解。這正好說明為什麼梯弗里斯的布爾什維克「酷嗜」辯論，而孟什維克却相反地希望盡可能「逃避」辯論。但是，從上面所說的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即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梯弗里斯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工作，經常會而且必然會採取對孟什維主義進行思想鬥爭的形式。因此，對於目前還在梯弗里斯佔優勢的孟什維克所造成的，我們首先必須與

之鬥爭的那種思想氣氛，即使簡略地加以分析也是特別有意義的。這種氣氛可以說是取消主義的，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策略上，綱領上都是取消主義的。我們就從分析這種氣氛着手，簡略地談談梯弗里斯黨的工作情況。

綱領上的取消主義

格魯吉亞文的孟什維克報刊是反映孟什維克「輿論」的機關報。梯弗里斯孟什維克的信條表現，在「幾個迫切問題」的幾篇文章中（見「思想報」和「開端報」各號）。這幾篇文章的作者是梯弗里斯孟什維克中影響最大的安恩同志（*Э.Э.*）。

我們現在就來談談這幾篇在思想上培植了梯弗里斯取消主義的文章。

作者在這幾篇文章裏「重新評定一切價值」並得出結論說，黨（特別是布爾什維克）在某些綱領原則上，尤其是在策略原則上迷失了方向。按作者的意見，必須「根本改變黨的全部策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力量的聯合」才有可能，這是革命勝利的唯一保證。不過還是讓作者自己來說吧。

作者說：「布爾什維克曾經證明它（無產階級）應當（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實現自己的全部最低綱領。但是要知道，如果實現了這個最低綱領的社會部分，就會束縛資產階級的生產，引起整個資產階級的抗議，成爲大規模反革命的開端……誰敢斷言，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符合目前不發達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呢？」很明顯，「要實現布爾什維克的最低綱領，簡直是唱高調」（見一九

○八年二月『思想報』第十七號)。

當然，不單是布爾什維克說過要實現全部最低綱領，因為除了全黨的最低綱領以外，根本就沒有什麼布爾什維克的最低綱領，但是，在這裏，值得注意的並不是這一點。重要的是我們的作者鑒於『資產階級的不發達』和由此產生的反革命的危險，於是起而反對綱領中的『社會部分』，認為這是『唱高調』，顯然應予取消。

在安恩同志的文章裏找不到他對工業實際狀況的任何分析(顯然，安恩同志措詞不當，他把工業的落後稱爲『資產階級的不發達』。——科·斯大·註)，找不到任何數字，任何稍微重要一些的材料，他隨便從虛無縹緲的論點出發，說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資產階級受不了，而且沒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力量的聯合』，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所以要打倒綱領中的『社會部分』……

作者的論斷其實也就是現代自由派時常提出來反對社會民主黨人的論斷，其荒誕無稽是無須我們證明的。我們以爲只要從這些論斷中摘引幾句就可以立刻看清梯弗里斯孟什維克的面目了……

但是我們的作者不僅起而反對綱領中的『社會部分』，並且他也不饒恕(雖然並不那麼明目張胆)綱領中的政治部分。我們且聽他說吧：

『單是一個無產階級或單是一個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無論如何也不能戰勝反動勢力……』

○所謂『資產階級』，作者處處都是指的『中等』自由資產階級，『其思想代表者就是立憲民主黨人』。——科·斯大·註。

很明顯，把它們的力量聯合起來，把它們用某種方式配合起來並且使它們走向一個共同目標，才是戰勝反動勢力的唯一道路。（着重號是我們加的）……『反動勢力的失敗，憲法的爭得和實施都取決於怎樣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自覺地聯合起來和怎樣使它們走向一個共同目標』……在這方面『無產階級前進時應當不讓自己的不調和的態度削弱了共同運動』。但是，因為『資產階級的目前要求只能是溫和憲法』，如果無產階級不願『讓自己的不調和的態度削弱了共同運動』，不願破壞『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自覺地走向一個共同目標』，總之，如果無產階級不願為反革命準備勝利的條件，那末顯而易見，無產階級的責任就是拋棄自己的『激進憲法』（見一九〇八年『開端報』第四號）。

結論很明顯：打倒民主共和國，『共同運動』和……『溫和憲法』萬歲，當然這是『爲了』革命的『勝利』……

可見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些文章不過是笨拙地轉述前社會民主黨黨員華西里也夫的一篇大家知道的文章罷了，這篇文章於一九〇六年發表在『同志報』上，談的是『各階級聯合起來』，暫時忘却無產階級的階級任務，取消民主共和國的口號等等。不同的地方只是華西里也夫說得直截了當，清清楚楚，而安恩同志却不好意思說得十分露骨罷了。

我們現在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致來分析自由派的這一套胡言亂語，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報刊對此早已從根本上作過分析和評價了。我們只想如實地說：我們的作者拾人牙慧地大談綱領問題，梯弗

里斯的孟什維克曾以爲他是發表『新的』派別宣言，其實他是要取消黨的最低綱領，是要拿我們的綱領去適應立憲民主黨的綱領。

現在我們就從梯弗里斯孟什維克的『新』綱領談到他們的『新策略』吧。

策略上的取消主義

安恩同志特別不滿意黨的策略，照他的意見，這個策略必須『根本改變』（見『開端報』第四號）。因此，他的文章大部分是對於這個策略的批評。他特別攻擊著名的『普列漢諾夫公式』（『俄國革命如是工人運動就能勝利，否則決不能勝利』（九二）），把它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論點混爲一談，並斷定它是經不起批評的。他提議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聯合起來』以進行『共同運動』……『走向一個共同目標』的『新的』（其實是舊的！）論點來代替這個『公式』。請聽吧：

『無論是馬克思的理論或是歷史事實，都不能證實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論點是正確的。』

引證的理論：

『無產階級不能用自己的手建立自己的敵人的制度。因此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

引證的歷史事實：

『我們的革命曾經同時是我們的工人運動，儘管如此，革命並沒有勝利。很明顯，普列漢諾夫的公式沒有得到證實。』（見『思想報』第十七號）

真是簡單明瞭。只是不得不替德國社會民主黨惋惜，它居然還在致倫敦代表大會的賀信中承認（大概是由於輕率吧！）：無論是『馬克思的理論』或是『歷史事實』都完全證實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有領導作用是正確的。更不用說我們的（不幸的！）黨了……

我們的作者究竟用什麼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他提議用什麼來代替呢？

安·恩·同志說：『單是一個無產階級或單是一個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無論如何也不能戰勝反動勢力……很明顯，把它們的力量聯合起來，把它們用某種方式配合起來並且使它們走向一個共同目標，才是戰勝反動勢力的唯一道路』。在這方面，『無產階級前進時應當不讓自己的不調和的態度削弱了共同運動』……（見『開端報』第四號）作者保證說，因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愈微弱，資產階級革命就愈能勝利（着重號都是我們加的。——科·斯大·），當然要在其他同等的條件下』（見『思想報』第十五號）

作者說的是什麼『其他同等的條件』，只有天曉得。明顯的只有一點：他爲了……革命的利益而宣揚削弱階級鬥爭。爲我們全部革命的經驗所證實的一個論點，即革命愈是依靠領導貧農反對地主和自由資產者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階級鬥爭，這個革命的勝利就愈是徹底，——這一論點對於我們的作者仍然是無法理解的神秘莫測的東西。『無產階級的力量和資產階級的力量聯合起來』，——這

就是安·恩·同志所認定的革命勝利的唯一保障。

但是我們的作者寄予這樣大的希望的資產階級究竟是什麼資產階級呢？請聽吧：

我們的作者說：『反動派反對立憲民主黨特別猛烈……因為……俄國未來的統治者是要從這個以立憲民主黨人代表其思想體系的中等階級產生出來的。只有統治能力已經成熟的中等資產階級才能奪取反動派的國家政權，這個階級是反動派的直接競爭者，因此反動派最怕這個階級。』一般說來，『在一切革命中，與其說反動階層怕革命者，還不如說怕溫和的資產階級。為什麼呢？因為正如我們上面所說，只有這個階級才是從舊制度手中接受政權的人。因此正是這一階級負有使命，以自己的溫和的憲法使新制度能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並這樣來消滅反動勢力的基礎』（見『思想報』第二十四號）。但是，『資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就不能建立新制度』，所以『無產階級不得不支持資產階級反對派』（見『開端報』第四號）。

總之，手捧『溫和的』君主憲法的『溫和的』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才是拯救我國革命的人。而農民呢，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們的作者說，『當然，農民會參加運動並使運動帶有自發的性質，但是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兩個現代的階級』，即溫和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見『開端報』第四號）。

總之對農民是不能有什麼特別指望的。

現在一切都清楚了。為了革命的勝利，就需要手捧溫和憲法的溫和的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但

單是它一個階級還不能勝利，它需要無產階級的幫助。無產階級應當幫助溫和的資產階級，因為除了它，無產階級是沒有誰（連農民也在內）可以指望的。但是爲此，無產階級就必須拋棄自己的不調和的態度，並伸手給溫和的資產階級，爲爭取立憲民主黨的溫和憲法而進行共同鬥爭。其餘的一切就自然好辦了。把工人和農民反對溫和資產階級和農奴主的鬥爭當做革命勝利的保證的政黨，是誤入歧途了。

一句話，起領導作用的不是引導着農民前進的無產階級，而是牽着無產階級鼻子走的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

梯弗里斯孟什維克的「新」策略就是如此。

據我們看來，分析這些庸俗自由主義的陳詞濫調是沒有必要的。不過有必要指出：梯弗里斯孟什維克的「新」策略就是要取消已由革命證明爲正確的黨的策略，使無產階級變成溫和的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小尾巴。

第一次載於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七日）

「辯論專頁」（『社會民主黨人報』附刊）第二號

署名：科·斯大·

巴庫委員會一九一〇年一月 二十二日的決議

(爲即將召開的全黨代表會議而通過)

一 關於黨的政治鼓動和真正團結

俄國革命動力一個時候有過的沮喪和麻痺狀態開始消失了。

沙皇政權的政策在巴爾幹、波斯和遠東的破產，政府想藉十一月九日頒佈的使貧者失地富者更富的法令〔五〕來安定農民的可笑掙扎，政府剝奪工人起碼的自由並使工人受資本家任意宰割的『勞動政策』的大失人心，國債的日益增加和把俄國零碎拍賣給外國資本家的事實，在軍需官和鐵路頭子們的貪污盜竊、偵緝隊的敲詐勒索、暗探局的營私舞弊等等行爲上表現出來的行政機關的極端腐敗，——這一切都使羣衆看清反革命並不能戰勝暫時打瞌睡的革命力量，使最近數月來工人所表現的活躍更爲加強，使他們對國內政治生活發生興趣，同時提出究竟做什麼、往哪裏去等等問題。

黨的面前發生了一個火急的問題，即必須廣泛地展開黨的政治鼓動。那些享有出版自由的自由

派反革命分子想用合法的『代表大會』和『社會團體』等手段來使羣衆馴服並破壞社會民主黨在羣衆中的影響，這樣也就使我黨必須展開政治鼓動的問題變成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

可是我們的組織互相隔離，又沒有一個經常在我國活動並在實際上把各個地方組織聯合成一個統一政黨的（領導的）實踐中心，因而無法實現真正的黨的（而不是手工業小組方式的）政治鼓動，使黨不可能採用某種嚴正辦法對付『自由派』方面的有系統的陷害，以致降低了黨在工人中的威信。

這種情況會使我們分散的因而軟弱的不合法組織不能利用『合法機會』，反而真正被『合法機會』所利用，當然是有損於社會民主黨的，——這一點就更不用說了。

有鑒於此，巴庫委員會認為，擬定一個真正團結黨以及實現黨的政治鼓動的辦法是當前刻不容緩的問題。

巴庫委員會認為，在一系列必要的措施中佔主要地位的應當是：

- （一）把（領導的）實踐中心移到俄國來；
 - （二）創辦在俄國國內出版的、由上述實踐中心編輯的並和各地有聯系的全國指導性的報紙；
 - （三）在最重要的工人運動中心（烏拉爾、頓巴斯、彼得堡、莫斯科、巴庫等地）創辦地方機關刊物。
- 巴庫委員會堅信實現上述措施就可以把一切真正有黨性的分子不分派別地團結到社會民主黨裏來，就可以造成廣泛展開政治鼓動的可能性，並使廣泛地利用『合法機會』這一工作易於進行，以擴大並鞏固我們的黨。

因此，巴庫委員會建議黨中央委員會立即召開全黨代表會議，把上述問題提交會議討論。

二 關於即將召開的全黨代表會議的代表資格

巴庫委員會研究了召開全黨代表會議的組織計劃（見『無產者報』第五十號『當前任務』一文），認為在規定的代表以外應當吸收確實存在的並正在活動的黨的秘密組織的代表參加會議，而且主要應當注意無產階級廣大羣衆所集中的大的中心城市。

這種代表之所以必要是無須論證的（見關於代表會議議程問題的特別決議）。

巴庫委員會承認增加代表會議的代表名額是必要的，但同時仍堅決反對那些在合法『組織』內工作的小組特派代表。

巴庫委員會認為一個小組，無論它是參加黨的地方組織並服從其領導的，或僅僅自以爲是社會民主黨組織而不承認地方組織的領導的，其特派代表對代表會議的工作都不會有什麼重大意義。在前一種情形下，黨組織既有代表就不必再有任何特派代表。在後一種情形下，那種特派代表是和代表會議本身的性質相抵觸的，因爲這個代表會議必須絕對是黨的代表會議。

本文曾印成傳單

按傳單原文刊印

德國工人領袖奧古斯特·倍倍爾

誰不知道年高望重的德國工人領袖倍倍爾呢？他過去是一個「普通的」鑛工，而現在是一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在他的批評之下，就像在鐵錘的打擊之下一樣，「戴皇冠的人物」、第一流的學者都不止一次地退却了，德國千百萬無產者聽他的話就像聽先知的話一樣。

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是他的七十壽辰。

在這一天，全德國的戰鬥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國際局和世界各國有組織的工人都隆重地慶祝了這位高齡的倍倍爾的七十壽辰。

倍倍爾怎麼會受到這樣的尊敬？他為無產階級做了些什麼？

倍倍爾是怎樣從工人下層中奮鬥出來的？他是怎樣從一個「普通的」鑛工變成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戰士的？

他一生的歷史是怎樣的？

倍倍爾的童年是在貧困中度過的。才三歲他就失去了撫育他的父親——一個貧窮而有肺癆的士官。為了給孩子們另找一個撫育者，倍倍爾的母親改嫁給一個獄吏。母親帶着孩子們從一向居住的兵

營中搬進監獄的房子。

但是過了三年，第二個丈夫又死了。再度陷於無人撫養的一家大小就遷回故鄉——內地的一個偏僻的地方，在那裏全家過着半飢餓的生活。倍倍爾這個窮孩子被收入「貧民學校」，十四歲即以優良成績畢業。但在畢業前一年，他又遭到新的不幸，他失去了母親——他的最後的依靠。倍倍爾成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孤兒，一切都要依靠自己。他不能升學，於是到一個熟識的鑛工那裏去當學徒。

單調的、苦役般的生活開始了。倍倍爾在作坊裏從早上五點一直做到晚上七點。只有書本才給他的生活帶來一些變化，他把全部空閒時間都用在讀書上。每天早晨上工前，他給女主人打水，每星期賺得五六文錢；爲了讀書，他把這些錢都用作圖書館的借書費了。

顯然，貧困不僅沒有使年輕的倍倍爾沮喪，不僅沒有打消他對光明的憧憬，相反地，却更加鍛鍊了他的意志，加強了他的求知慾，使他心裏產生了許多問題，使他貪婪地從書本裏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

一個爲無產階級解放而鬥爭的毫不倦怠的未來戰士就是這樣在跟貧困作鬥爭中培養出來的。

十八歲，倍倍爾學徒期滿，從此開始了獨立的鑛工生活。二十歲，他已經出席萊比錫的工人集會，聽工人社會主義者的演說。這是倍倍爾和工人演說家會面的第一次集會。倍倍爾那時還不是社會主義者，他是同情自由派的，但是他看見工人能够獨立演說而衷心高興，他羨慕他們，他心中燃起了做一個像他們那樣的工人演說家的願望。

從這時起，倍倍爾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已經有了確定的道路。倍倍爾加入了工人組織，並在組織中努力工作。他很快就成爲一個有威望的人物，他被選入工會委員會。在工會工作時，他反對社會主義者而和自由派一致行動，但是在對社會主義者的鬥爭中，他逐漸相信他們是正確的。

二十六歲，他已經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倍倍爾的聲望增長得如此迅速，過了一年（一八六七年）他就被選爲工會委員會的主席和國會中的第一個工人代表了。

倍倍爾這樣鬥爭着，勝利着，一步步地克服周圍的障礙，終於從工人下層中奮鬥出來，變成德國戰鬥工人的領袖。

從這時起，倍倍爾已經公開地擁護社會民主主義了。他當時的最近目標是對自由派作戰，把工人從他們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把工人結成一個工人自己的社會民主黨。

次年，一八六八年，倍倍爾在紐倫堡代表大會上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倍倍爾的巧妙而無情的攻擊使自由派完全失敗，德國社會民主黨就在自由主義的廢墟上誕生了。

倍倍爾在代表大會上說，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所以工人應當和資產階級自由派決裂，結成一個工人自己的政黨。不管一小撮自由派怎樣反對，代表大會的絕大多數都跟着他擁護了馬克思的這句至理名言。

倍倍爾說，爲了工人的完全解放，全世界的工人必須團結起來，因此應該參加國際工人協會。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又跟着他一致擁護了偉大導師的這句至理名言。

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政黨就這樣誕生了。接生的就是倍倍爾。

從那時起，倍倍爾的生活就和黨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了，他的憂樂就和黨的憂樂融合在一起了。倍爾自己則成了德國工人所愛戴的人和鼓舞者，同志們，因為這樣一個人不能不叫人敬愛；他爲了使工人能够自己站立起來，爲了把他們從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監護下解放出來，並爲他們建立自己的政黨而做了這樣多的工作。

一八七〇年，年輕的黨受到了第一次考驗。對法戰爭爆發了，德國政府向國會要求戰費，倍倍爾是國會議員，對戰爭不能不明確地表示贊成或反對。倍倍爾當然知道戰爭僅僅對於無產階級的敵人有利，可是德國社會的各階層，從資產者到工人，都充滿了錯誤的愛國熱情，把拒絕給政府撥款叫做背叛祖國。但是倍倍爾不顧這種「愛國」偏見，不怕逆流而進，他在國會講壇上大聲地宣稱：我是社會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我不贊成戰爭而贊成各民族友愛；我不贊成與法國工人爲敵而贊成我們德國工人和他們團結起來。甚至工人方面對倍倍爾的大胆發言也報之以責罵、嘲笑和蔑視。但是忠於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倍倍爾一分鐘也不垂下旗幟去遷就自己的弟兄們的偏見，相反地，他用各種辦法努力提高他們，使他們能够清楚地認識戰爭的危害性。後來，工人們明白了自己的錯誤，於是更加愛戴他們自己的剛毅堅強的倍倍爾。政府却因此賞了他兩年徒刑，然而他在監獄裏也沒有虛度光陰，寫成了『婦女和社會主義』這一名著。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黨又受到新的考驗。被社會民主黨的發展所震驚的德國政府頒佈了『反

社會主義者特別法』，破壞黨和工會的組織，毫無例外地封閉所有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取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昨天還是合法的社會民主黨今天就被打入地下了。政府想用這一切手段來挑逗社會民主黨進行不會成功的徒然有害的發動，使它喪失鬥志，然後一舉而殲滅之。當時要有非凡的堅定和卓越的遠見，才不致張皇失措，才能及時改變策略，才能理智地適應新的條件。許多社會民主黨人上了挑撥的當而熱中於無政府主義。另一些人則完全庸俗化，墮落成自由派。可是倍倍爾始終如一地站在崗位上，鼓舞了一些人，節制了另一些人的不理智的熱情，揭穿了又一些人的空論，靈活地引導黨沿着真理的道路一直前進，再前進。過了十年，政府只得對工人運動日益增長的力量讓步，廢除了『特別法』。倍倍爾的路綫已被證明是唯一正確的路綫。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黨又受到一次考驗。社會民主黨中的溫和分子迷惑於工業的高漲和比較容易取得的經濟勝利，開始否認不調和的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他們說，不需要不調和性，不需要革命，需要的是各階級的合作，我們需要和資產階級及政府妥協，和它們一同修補現存的制度，因此讓我們投票擁護資產階級政府的預算吧，讓我們參加現存的資產階級政府吧。溫和分子就這樣破壞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和社會民主黨的革命策略。倍倍爾知道這種情勢的全部危險性，便和黨的其他領袖一同向溫和分子宣戰，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在德勒斯頓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上，他宣佈了革命的鬥爭方法的必要性，徹底擊敗了德國溫和派領袖伯恩施坦和福爾馬爾。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在各國社會主義者的面前，他再度宣佈了不調和的鬥爭的必要性，擊

敗了國際溫和派的領袖饒勒斯。從那時起，他就沒有讓『黨的溫和敵人』安寧過，而是使他們在耶拿（一九〇五年）和紐倫堡（一九〇八年）接二連三地失敗。結果，黨經過內部鬥爭以後更加統一而強有力了，異常地鞏固了，大規模地發展了，所有這些主要應歸功於這位奧古斯特·倍倍爾……

但是倍倍爾並不滿足於僅在黨的範圍內進行活動。他在德國國會中發表霹靂般的演說，斥責腐敗的貴族，摘下自由派的假面具，暴露『帝國政府』的罪惡，他在工會中的多年活動，——這些都說明倍倍爾是無產階級的忠實的捍衛者，只要哪裏鬥爭在沸騰着，只要哪裏需要他蓬勃的無產階級的精神，他就出現在哪裏。

這就是德國和國際社會主義者這樣尊敬倍倍爾的緣故。

當然，倍倍爾也有過錯誤，——誰沒有錯誤呢（只有死人才不犯錯誤），——可是這些小錯誤和他對黨的大功勞比起來就微不足道了。現在，黨經過倍倍爾四十二年的領導，共計有六十多萬黨員，兩百萬左右有組織的工會工人，博得三四百萬選民的信任，只要振臂一呼就能在普魯士舉行幾十萬人的遊行示威。

最有意義的是慶祝倍倍爾壽辰的日子適逢德國社會民主黨最鮮明地表現自己威力的日子，適逢普魯士的廣大羣衆為爭取普選而舉行組織得嚴密無比的遊行示威的日子。

倍倍爾有充分的權利說，他的工作並不是徒勞無益的。

這就是高齡的倍倍爾的生平事業。是的，他很老了，可是他的精神還非常年輕，他依舊站在崗位

上，等待着新的戰鬥，新的勝利。

只有戰鬥的無產階級才能產生像它自己那樣生氣勃勃、永遠年輕、永遠向前看的倍倍爾。

只有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才能給倍倍爾的奔放的性格以發展的廣闊天地，使他毫不倦怠地致力於破壞舊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

倍倍爾以他的生平事業證明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及其不可戰勝性，證明了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

同志們，讓我們向親愛的導師——鑛工奧古斯特·倍倍爾致敬！

他的確值得做我們俄國工人的榜樣，俄國工人特別需要許多像倍倍爾這樣從事工人運動的人。

倍·倍·爾·萬·歲！

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

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印成傳單

按傳單原文刊印

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

謝明同志！昨天我從同志們那裏收到你的信。我首先向列寧及其他同志致熱烈的敬禮。然後再談你的來信和一般的『棘手問題』。

照我的意見，聯盟（列寧——普列漢諾夫）這條路綫是唯一正確的：（一）這條路綫，也只有這條路綫，才真正符合俄國內工作的利益，即把一切真正有黨性的分子團結起來的利益；（二）這條路綫，也只有這條路綫，才能在孟什維克工人和取消派之間挖掘一道鴻溝，驅散並殲滅取消派，使合法組織趕快從取消派的挾持之下解放出來。爭取在合法組織中的影響是很迫切的問題，是使黨走向復興道路的必要階段。而結成聯盟則是從這種組織中清除取消主義垃圾的唯一方法。

聯盟的計劃顯然是列寧的主意，——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明察秋毫。但這並不是說任何聯盟都是好的。托洛茨基聯盟（他會說，這是『綜合』）就是腐朽的沒有原則性的東西，是各種不同原則的馬尼洛夫式的混合，是無原則的人想念『好』原則的無可奈何的表現。事物的邏輯本來就有嚴格的原則性，它是不容混淆的。列寧——普列漢諾夫聯盟之所以有生氣，就在於它有深刻的原則性，並在於它的

基礎是對復興黨的方法問題有一致的看法。可是，正因為這是聯盟而不是合併，所以布爾什維克必須有自己的派別組織。很可能在工作進程中布爾什維克會使普列漢諾夫分子終於馴服，但這僅僅是可能而已。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躺在牀上期待這樣的結果，即使這樣的結果是十分可能的。布爾什維克在行動上愈團結，在發動上愈有組織，那末使他們馴服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因此，我們應當毫不倦怠地多方努力。關於前進報派我就不談什麼了，因為現在他們沒有取消派和普列漢諾夫分子那樣值得注意。如果他們有一天醒悟過來，那當然很好，否則由他們去吧，讓他們自行其是吧。

關於國外的的工作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但這並不就是一切，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組織俄國國內的工作。我黨歷史證明，意見分歧的問題不是在辯論中，而主要是在工作的過程中，在運用原則的過程中解決的。因此當前的任務就是以嚴格確定的原則為中心來組織俄國的工作。取消派立刻了解到這種情形（他們的嗅覺很發達），開始向公開的工人組織裏鑽（已經鑽進去了），而且他們還有自己的秘密的俄國中央來指導工作等等。可是我們還在『準備着』，還停留在排演階段。據我看，我們目前刻不容緩的任務是組織中心小組（俄國國內的），這個小組應該先把各主要中心（彼得堡、莫斯科、烏拉爾、南方）的秘密的、半公開的和公開的工作統一起來。這個小組可以隨便叫什麼名字，叫『中央委員會俄國分部』或中央委員會直屬輔助小組都沒有關係。但是這樣的小組却像空氣和麪包一樣地需要。目前各地的工作者都是茫無所知，孤孤單單，互相隔離，灰心喪氣。這個小組却能使工作活躍起來，使思想明確起來。這樣就會掃清

障礙並開闢一條真正利用合法機會的道路。據我看，從此就可以開始復興黨的事業。不妨預先組織一個承認全會〔三〕決議的工作者的會議，當然這要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這一切都要在各中央機關『改革』〔四〕之後和在普列漢諾夫分子同意的條件下進行。這個會議很可能給上述的中心小組提供適當的人選。據我看，就是在其他許多方面，這個會議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行動必須堅決而無情，不要怕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前進報派方面的責難。只要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列寧的擁護者在俄國國內工作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他們對任何責難都可以置之不理。

關於俄國國內的工作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現在來談我自己。我還有六個月期滿〔五〕。期滿之後，我就可以完全聽候使喚。如果實在迫切需要工作者，我立刻可以溜之大吉。『思想』雜誌〔六〕創刊號我已經讀過。我可以想像得出：昨天的敵人今天已共同行動起來，單憑這一事實，就會使工人多麼清醒多麼奮發，就會在取消派的隊伍中造成多大騷動多大混亂。任何正派的人都會說，這真不壞。

流放地有不少正派的人，如能供給他們秘密的定期刊物，那就很好了。請把『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十七號和以後各號寄來，『社會民主黨人報』的『附刊』也請寄來。『工人報』〔七〕創刊號和第二號我們這裏沒有，『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也沒有。『明星報』〔八〕大概就會收到。寄郵包的地址是：（一）沃洛果達省索里維切果茨克鎮伊萬·伊薩柯維奇·波哥莫洛夫；（二）沃洛果達省索里維切果茨克鎮彼得·米海洛維奇·謝拉費莫夫。我的通信地址是：沃洛果達省索里維切果茨克鎮格里果羅夫住宅，尼

古拉·阿歷山大羅維奇·沃茲涅先斯基。 致

同志的敬禮

科·斯·

不要寄掛號信。懇切地請你多寫一些你們那裏的情況。

寫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信件抄本刊印

擁護黨！

(五七)

現在全國對政治生活的興趣又高起來了，與此同時，我們黨的危機也就要結束了。死氣沉沉的麻痺狀態開始過去了。不久以前召開的全黨代表會議^(二〇)是黨的新生的鮮明標誌。我們的黨既然隨着俄國革命的發展而鞏固，隨着俄國革命的低落而被破壞，也就必然隨着全國的政治覺醒而恢復過來。各主要工業部門日益活躍，資本家的利潤不斷增長，工人的實際工資却在下降；資產階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組織自由發展着，無產階級的公開的和秘密的組織却橫遭破壞；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日益上漲，地主的利潤不斷增長，農民經濟却陷於破產；二千五百多萬人口的遭受飢荒正表明反革命的『革新的』制度一籌莫展，——這一切都不能不影響到勞動階層，首先影響到無產階級，使他們對政治生活發生興趣。今年一月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會議就是這種覺醒的鮮明表現之一。

然而內心的激動不能不形之於外，——在目前政治條件下，它必然轉為公開的羣衆發動。必須改善工人的生活，必須提高工資，縮短工作日，必須根本改變廠礦工人的現狀。但是不通過現在還被禁止的局部的和總的經濟發動，怎麼能做到這一切呢？

必須爭取和老闆自由鬥爭的權利，爭取罷工、結社、集會、言論、出版等等的權利，因為沒有這些權利，工人爭取改善自己生活的鬥爭就會極端困難。但是不通過公開的政治發動，不採取遊行示威、政治罷工等等，怎麼能做到這一切呢？

必須使連年飢荒的國家恢復元氣，必須結束目前的狀況，因為在這種狀況下，千千萬萬土地勞動者不得不遭受周期性的飢荒和飢荒所引起的一切災禍，因為對那些飢餓不堪的父母含淚「賤賣」親生兒女這一情景是不能袖手旁觀的！必須根本消滅目前掠奪性的財政政策，因為這種政策使困窮的農民經濟陷於破產，而每當歉收時必然把千百萬農民推上毀滅性的飢餓的道路！必須把國家從貧困和腐敗中拯救出來！但是不自下而上地推翻沙皇制度的全部建築，能不能做到這一切呢？不通過負有歷史使命的領袖——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廣大人民革命運動，又怎能推翻沙皇政府並掃除一切農奴制的殘餘呢？……

然而爲了使必將到來的發動不分散不混亂，爲了使無產階級能够光榮地完成將來發動的統一者和領導者的崇高使命，——爲了這一切，除了廣大人民階層的革命覺悟和無產階級的階級自覺以外，還必須有一個強大而靈活的無產階級的政黨，一個能把各個地方組織單獨的努力聯合成一個總的努力，從而把羣衆的革命運動指向敵人的主要堡壘的政黨。整頓無產階級的政黨——俄國社會民主黨，這是使無產階級能勝任地迎接必將到來的革命發動所特別需要的。

由於第四屆國家杜馬選期的迫近，黨的團結一致更顯得迫切需要了。

但是怎樣整頓黨呢？

首先必須鞏固黨的地方組織。這些分得小而又小的組織，四周是一片悲觀失望的海洋，缺乏知識分子的力量，而且往往被奸細所破壞，——誰不知道地方組織生活中這種糟糕的情形呢？必須結束而且可以結束這種力量渙散的狀態！一方面工人羣衆的開始覺醒，另一方面表現這種覺醒的不久以前召開的代表會議，都大大有助於這種渙散狀態的消滅。我們必須竭力消滅組織上的渙散狀態！讓每個城市和每個工業據點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凡是相信必須有秘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都不分派別地集合起來吧，——讓他們都集合到黨的地方組織裏來吧！讓那些把工人聯合成一支被剝削者大軍的車牀再把他們結成一個反對剝削和暴力的戰士的統一政黨吧！……同時不必追求黨員的數字龐大；在目前的工作條件下，這甚至會是危險的。關鍵在於同志的質量，關鍵在於使集合在地方組織內的有威信的同志能覺悟到他們所擔當的事業的重要性，並遵循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路綫堅強地進行自己的工作。讓這樣形成起來的地方組織不要閉關自守，讓它們不斷地參與無產階級鬥爭的一切事情，從最『小的』尋常事情直到最大的『不尋常的』事情；讓任何一次勞資間的衝突或任何一次工人羣衆對沙皇政府暴行的抗議都逃不出它們的影響；應當永遠記住，只有這樣才能鞏固並健全地方組織。正因為如此，它們必須跟公開的工人羣衆組織，跟工會和俱樂部保持最密切的聯繫，並用一切辦法幫助這些組織發展。

工人同志們不要因缺乏知識分子的力量而須單獨担负困難和複雜的任務就感到惶惑不安，應當

永遠拋棄那種誰都不需要的謙遜和懼怕『不習慣的』工作的心理，應當有勇氣把黨的複雜的工作擔當起來！如果因此發生某些錯誤，那也不要緊；跌一兩次交，以後就會行走自如的。像倍倍爾那樣的人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只是在黨的一切部門的工作過程中從下面成長起來的……

但是地方組織，即使是鞏固而有影響的地方組織，單獨來看，還不算是黨。因此還需要把它們集合在一起，結成一個過着共同生活的整體。分散的地方組織不僅彼此沒有聯系，而且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完全各行其是的組織各自担驚冒險地行動，往往在工作中走着彼此相反的路綫，——這一切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黨內手工業方式的情況。把各個地方組織彼此聯系起來，把它們集合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周圍，這正是拋棄手工業方式而為整頓無產階級黨的事業開闢道路。必須有一個和地方組織千絲萬縷聯系着的、經常把消息供給地方組織並把它們彼此聯系起來的有威信的中央委員會，一個不斷地參與全體無產階級發動的一切事情的中央委員會，一個為了進行廣泛的政治鼓動工作而在俄國國內出版秘密報紙的中央委員會，——這就是革新和團結黨所應走的方向。

不用說，僅僅一個中央委員會是担負不了這個困難任務的。各個地方組織的同志必須記住，沒有地方上同志們的經常支持，中央委員會必然會變成一個徒有其名的東西，而黨就會變成空架子。因此，中央和地方組織同心協力地工作，——這就是革新黨的必要條件，這就是我們向同志們發出的號召。

總之，同志們，擁護黨，擁護正在新生的、秘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

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二年三月印成傳單

按手稿刊印

擁護黨！

二〇七

五一萬歲！

(1911)

同志們！

早在十九世紀，全世界的工人就決定每年紀念今天這個日子——五月一日。這是一八八九年的事情。那時在世界社會主義者巴黎代表大會上，工人決定在今天，在五月一日這一天，當大自然從冬眠中甦醒過來，森林和羣山披上翠綠，田野和草地開遍鮮花，太陽開始更溫暖地照耀，空氣中感覺到新生的喜悅，大自然陶醉於舞蹈和狂歡中的時候，——他們決定在今天大聲地公開地向全世界宣佈，工人給人類帶來的是春天，是掙脫資本主義枷鎖的解放，工人負有在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革新世界的使命。

每一個階級都有自己所喜愛的節日。貴族們有自己的節日，在那些日子裏，他們宣佈『有權』掠奪農民。資產者有自己的節日，在那些日子裏，他們『證明』『有權』剝削工人。神甫們也有自己的節日，在那些日子裏，他們讚美現存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勞動者死於窮困，寄生蟲却沉溺於豪華奢侈的生活。

工人們也應當有自己的節日，在這一天，他們應當宣佈：人人勞動，人人自由，人人平等。這個

節日就是五一節。

工人們早在一八八九年就這樣決定了。

從那時起，在五一節這一天的羣衆集會和遊行示威中愈來愈有力地響起了工人的社會主義的戰鬥呼聲。工人運動的海洋日益波瀾壯闊地氾濫起來，把歐洲和美洲到亞洲、非洲和澳洲的許多新的地域和國家捲進去了。從前工人的薄弱的國際間的聯系，不過幾十年就成長爲一個定期舉行代表大會並團結着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千百萬工人的宏偉的國際間的親密聯盟了。無產階級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日益猛烈地沖擊動搖着的資本主義堡壘。不久以前在英國、德國、比利時、美國等地爆發的引起全世界剝削者和帝王們恐懼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日益迫近的鮮明標誌……

『我們不崇拜金偶像！』我們不需要資產者和壓迫者的王國！讓資本主義及其所引起的窮困和流血的慘象受人詛咒吧，讓這些東西死亡吧！勞動王國萬歲，社會主義萬歲！

這就是全世界覺悟了的工人在今天所宣佈的。

他們確信自己的勝利，他們鎮定而堅強，他們驕傲地沿着通向樂土的道路，沿着通向光明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邁進，逐步地實現馬克思的偉大號召：『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

自由國家的工人就是這樣慶祝五一節的。

俄國工人自從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地位以來，就不願落後於自己的同志們，總是不顧一切，不顧沙皇政府的殘酷迫害而和自己的國外同志們一起行動，和他們共同慶祝五一節。誠然，最近兩三年來，

在反革命猖獗和黨內紊亂、工業蕭條和廣大羣衆死氣沉沉而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時期，俄國工人被剝奪了照舊慶祝自己光輝的工人節日的可能。但是國內最近開始的活躍狀態，經濟罷工和因重審第二屆杜馬社會民主黨代表案件而在工人中引起的政治抗議，因遍及二十多省的飢荒而在廣大農民階層中產生的不滿情緒，幾十萬店員對俄國死硬派的『革新的』制度的抗議，——這一切都說明死氣沉沉的冬眠即將過去，繼之而起的是國內的政治活躍，首先是無產階級中的政治活躍。正因為如此，今年俄國工人能夠而且應當在今天向自己的國外同志們伸出手去。正因為如此，他們應當以種種方式和國外同志們一起慶祝五一節。

他們今天應當告訴大家，他們和自由國家的同志們是一致行動的，——他們現在不崇拜、將來也不崇拜金偶像了。

除了全世界工人的共同要求以外，他們還應當加上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等俄國本身的要求。

『我們仇恨戴皇冠的暴君！』『我們尊敬帶着枷鎖的受苦難的人民！』『消滅血淋淋的沙皇制度！消滅貴族的土地私有制！消滅廠礦老闆的橫行霸道！給農民土地！給工人八小時工作制！給全體俄國公民民主共和國！』

這就是俄國工人今天還應當宣佈的。

俄國的自由派硬要自己和別人相信：沙皇制度在俄國已經很鞏固，而且它能夠滿足人民的基本

需要；這是撒謊，這是向尼古拉末世獻殷勤。

俄國的自由派用各種調子高唱革命已經死亡，我們生活在『革新的』制度中，這是欺騙，這是捏造。

請環顧一下：難道災難深重的俄國像一個『革新的』、『安排得很好的』國家嗎？

不是民主憲法，而是絞架和野蠻專橫的統治！

不是全民議會，而是黑幫地主們的黑幫杜馬！

不是『確定不移的公民自由的原則』，不是早已在十月十七日宣言中所許諾的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和罷工的自由，而是『酌情處理』和『根本杜絕』的魔手、被查封的報館、被流放的編輯、被破壞的團體、被驅散的集會！

不是人身不可侵犯，而是監獄中的毒打、對公民的侮辱、對連納金礦罷工工人的血腥鎮壓！

不是農民需要的滿足，而是進一步使農民羣衆失去土地的政策！

不是整頓好了的國家經濟，而是軍需機關中的盜竊行爲、鐵路管理機關中的盜竊行爲、林業中的盜竊行爲、海軍系統中的盜竊行爲！

不是政府機關中的秩序和紀律，而是法庭的偽造證據、偵緝隊的敲詐和勒索、暗探局的暗殺和挑釁！

不是俄羅斯國家的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是俄國的『政策』在近東和遠東問題上可恥的破產，在波

斯流血事件^①中扮演劊子手和破壞者的角色！

不是居民的安寧和幸福，而是城市中的自殺現象和農村中駭人聽聞的三千萬農民的飢餓！

不是淳正的風尚，而是寺院中即官方道德的堡壘中聞所未聞的荒淫無恥！

而作為這一幅圖畫的最後一筆的是對連納金礦幾百個勞動者的殘酷槍殺！……

已爭得的自由的破壞者、絞架和槍殺的崇拜者、『酌情處理』和『根本杜絕』的擬訂者、貪污的軍需官、盜竊的工程師、行劫的警察、殺人的暗探、荒淫無恥的拉斯普庭^②之徒，——他們就是所謂俄國的『革新者』！

而世界上還有一些人竟敢斷言：俄國萬事大吉，革命已經死亡！

不，同志們！在那千百萬農民挨餓、工人因罷工而被槍殺的地方，革命會活下去，一直活到人類的恥辱——俄國沙皇制度——被徹底掃除的時候。

在今天，在五一這一天，我們應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在大小羣衆集會上或秘密會議上告訴人們：我們誓為徹底推翻沙皇君主制而鬥爭，我們歡迎必將到來的俄國革命，俄國的解放者！

現在我們就向我們的國外同志們伸出手去，並和他們一同宣佈：

打·倒·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萬·歲！

我們舉起俄國革命的旗幟，並寫上：

五 一 萬 歲！

二二三

打·倒·沙·皇·君·主·制！
民·主·共·和·國·萬·歲！

同·志·們！我·們·今·天·慶·祝·五·一·節！五·一·節·萬·歲！

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二年四月印成傳單

按手稿刊印

① 在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波斯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一年間發生革命。一九〇八年，沙皇政府和英國一同派兵赴波斯干涉和鎮壓，造成流血事件。——譯者註。

② 拉斯普庭是沙皇尼古拉第二宮廷中勢力極大的一個惡棍，當時貴族迷信愚妄，拉斯普庭利用巫術，得以進入宮廷，先取得皇后的寵信，進而挾制沙皇，獨攬大權，左右國政，恣意橫行。——譯者註。

新的時期

隨着工人的經濟發動而來的是他們的政治發動。

隨着爭取提高工資的罷工而來的是因連納慘案而引起的抗議、羣衆集會和政治罷工。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里加和基輔、在薩拉托夫和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在放德薩和哈爾科夫、在巴庫和尼古拉也夫、——在各處，在俄國的各個角落，工人們都奮起聲援他們在連納被殘害的同志們。

『我們活着！未用盡的力量的火燄使我們的鮮血沸騰！』……

日益活躍的工人運動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這是在反革命猖獗之後發生的。大約兩年以前，工人們就試圖反抗那些貪得無饜的老闆們日益猛烈的進攻。防禦的罷工，個別地

方則有進攻的罷工，——這就是運動日益活躍的表現。這是第一個階段。莫斯科區是先鋒。大約一年半以前，工人們轉入了進攻的罷工，提出了新的經濟要求，爭取實現他們在反革命猖獗

時期被剝奪的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條件。這是第二個階段。西部邊區是先鋒。

現在已經進入第三個階段，進入政治運動的時期了。
從一個階段發展到另一個階段！

這應當是意料中的事。各主要工業部門日益發展，資本家的利潤不斷增長，工人的實際工資却在下降；資產階級各種行業的和政治的組織日益增多，工人的組織却橫遭破壞；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日益上漲，地主的收入不斷增加，三千萬農民却忍飢挨餓，被窮困所迫的父母却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兒女，——這一切不能不使工人階級隊伍中的政治生活活躍起來。

連納的槍聲不過是一個信號。

看來，『在施普卡並非完全平靜無事』^①。這種情形連那些急急忙忙準備『綏靖』國內的政府代表人物也感覺到了。看來這甚至反映到我國對外政策的各種問題上去了……

關於政治的抗議罷工的消息仍然不斷地傳來。

無疑地，解放運動的潛在力量已經動起來了……

向你們致敬，第一羣燕子！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彼得堡「明星報」第三十號

署名：科·斯·

按報上原文刊印

① 俄土戰爭（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時，曾在巴爾幹的施普卡山隘進行激戰，當時俄軍司令部却發出戰報說：『在施普卡平靜無事。』——譯者註。

自由派的偽君子們

『言論報』又一次『錯了』！原來它『沒有料到』『政府』對連納暴行會作『不機智的』解釋。你瞧，它曾『希望』馬卡羅夫大臣要特列申柯先生們『負法律責任』。可是馬卡羅夫突然聲稱：特列申柯是對的，今後還要槍殺工人！

對於這一點，自由派的『言論報』假裝痛心地说：『我們錯了。』（見四月十二日『言論報』）可憐的立憲民主黨人，他們不知多少次對政府指望『錯了』！

不久以前，他們還『以爲』俄國是有憲法的；他們會用各種語言對歐洲發誓說，『我們的聯合政府』『完全是立憲的』。這是他們在遠離俄國的倫敦時的事情。但是他們一回到俄國，回到『酌情處理』和『根本杜絕』的國家，就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失望』起來了。

不久以前，他們還『相信』斯托雷平已經使國家走上議會『革新』的道路。可是斯托雷平一實施衆所周知的第八十七條（*87*），立憲民主黨人就重彈起『錯誤』和『誤解』的老調來了。

立憲民主黨人拿俄國政府對罷工的態度（請回憶一下碼頭工人的罷工）和英國政府對罷工的態度相比擬，這難道是很久以前的事嗎？可是連納慘案一爆發，立憲民主黨人就又一次彈起他們偽善

的老調：「我們錯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錯誤」和「失望」日益增長，立憲民主黨討好政府的策略却原封未動！

可憐的，可憐的立憲民主黨人呵！看來他們在「指望」天真的讀者相信他們的真誠。

他們「以爲」民衆看不出他們在俄國解放事業的敵人面前表現的那副奴才相。

他們還不知道，如果他們直到現在對政府還是時常指望「錯了」，那末他們現在就會對民衆感到「失望」，因爲民衆最後是會了解他們的反革命性質而唾棄他們的。

那時，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將去欺騙誰呢？

在政府面前奴顏婢膝，在全國人民面前假仁假義，——究竟有什麼理由稱他們爲「人民自由黨」呢？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彼得堡「明星報」第三十號

署名：斯。

按報上原文刊印

無黨無派的怪物們

無黨無派的進步主義時髦起來了。俄國知識分子的天性就是如此，他們的天性就是需要時髦。他們過去熱中於沙寧精神^①，醉心於頹廢主義，現在又主張無黨無派了。

什麼是無黨無派呢？

俄國存在着地主和農民，他們的利益是對立的，他們之間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可是無黨無派不顧這一事實，有意掩飾利益的矛盾。

俄國存在着資產者和無產者，其中一個階級的勝利就等於另一個階級的失敗。可是無黨無派抹殺利益的對立性，閉眼不看它們之間鬥爭的事實。

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具有特別綱領和特殊面貌的黨。黨領導着階級鬥爭；沒有黨就不是鬥爭，而是一團混亂，缺乏明確性，混淆利益。可是無黨無派不喜歡明確性和肯定性，寧願模糊不清，寧願沒有綱領。

掩飾階級矛盾，抹殺階級鬥爭，沒有固定面貌，反對綱領，力求混亂和混淆利益，——無黨無派就是這樣的。

無黨無派力求什麼呢？

——聯合不能聯合的東西，實現不能實現的事情。

把資產者和無產者聯合成一個聯盟，在地主和農民之間架設一座橋梁，利用天鵝、龍蝦、梭魚來拉車，——這就是無黨無派所力求的。

無黨無派感到自己在聯合不能聯合的東西這件事情上無能為力，因而歎息道：

『美哉！妙哉！』

要是嘴裏長出蘑菇來！』

可是嘴裏是不會長出蘑菇的，所以無黨無派每次的希望都落了空，仍然是怪物。

沒有腦袋的人，或者更確切些說，兩個肩膀當中長的不是腦袋而是蘿蔔，——這就是無黨無派。

『進步的』雜誌『生活需要』(1933)所採取的正是這樣的立場。

『生活需要』雜誌說：『右派的政黨已經作出自己的決定，它們將聯合成一個反動集團來和整個進步的反對派作鬥爭……因此，包羅社會上一切進步分子的左派聯盟應該和右派聯盟對立起來。』

(見『生活需要』雜誌第六期)

可是這些『進步分子』是些什麼人呢？

這就是和平革新黨人(1934)、立憲民主黨人、勞動團分子、社會民主黨人。也就是『進步的』資產者、侈談自由主義的地主、渴望地主土地的農民以及和資產者進行鬥爭的無產者。

『生活需要』雜誌竟力圖把這些『分子』聯合起來！

說這是很獨特而又……不聰明的，難道不對嗎？

這個無原則的人們的機關刊物還打算向社會民主黨人作關於第四屆杜馬競選策略的演講嗎？
怪物們呵！……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彼得堡『明星報』第三十號

署名：科·斯—林

按報上原文刊印

① 沙寧是俄國無政府主義作家阿志巴綏夫所著長篇小說『沙寧』中的主人公，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謂人生目的只在於執行自己的意志，打破一切限制以獲得個人的幸福而滿足肉慾。——譯者註。

實際生活在勝利着！

「工人發出要求……結社自由的請願書一點也沒有使他們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恰恰相反，對這種要求的答覆是工人的橫遭槍殺……」

——摘自庫茲涅佐夫代表的演說

不怎麼久，不過是一年以前，「合法的黨」的熱心家們，取消派先生們大吹大擂地展開了所謂請願運動。

大家都知道的取消派的「政論性」機關刊物「生活事業」雜誌(25)寫道：工人運動的當前任務就是以請願的方法爭取結社的權利。

取消派的「科學性」機關刊物「我們的曙光」雜誌(26)在「論證」這一任務時，硬要工人相信請願會把「廣大羣衆」組織在自己的周圍。

可是連納金礦的流血慘劇發生了，活生生的實際生活及其毫不留情的矛盾出現了，於是取消派的請願策略也就化爲烏有了。合法的罷工、請願、懇求一概落空了。「革新的」制度現出原形了。似乎爲了更明確起見，這個制度的代表人物馬卡羅夫大臣聲明說，槍殺了五百個工人還沒有完，僅僅是開

始，靠上帝的幫助，今後還會發生同樣的事件……

真是命中要害！大吹大擂地搬出來的請願策略在實際生活上碰得粉碎了！原來請願政策是毫無力量的！

可見，請願是決不能解決新舊俄國之間歷來的爭端的……

俄國每個角落都因連納慘案而舉行了許多次的工人羣衆大會和罷工，——這種情形難道不是又一次說明工人不會走請願的道路嗎？

請聽聽工人代表庫茲涅佐夫的話：

「實質上，工人發出要求結社自由的請願書一點也沒有使他們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恰恰相反，對這種要求的答覆是工人的橫遭槍殺……」

這就是庫茲涅佐夫代表所說的。

凡是傾聽自己最親近的工人的意見的工人代表都不能有另外的說法。

不，取消派不走運！……

那末請願策略呢？把它放到哪裏去呢？

——當然是放到離開工人遠遠的某個地方去……

是的，是的，看來實際生活的教訓甚至對取消派也並非無用。請願的迷夢似乎開始消逝了。好吧，我們慶賀他們的清醒，由衷地慶賀！

要知道，我們早就一再地說：實際生活是萬能的，它總是在勝利着……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彼得堡「明星報」第三十號

署名：科·薩林

按報上原文刊印

實際生活在勝利着！

二二五

他們幹得好……

連納慘案以後，俄國各地紛紛罷工，紛紛抗議。

馬卡羅夫大臣在杜馬中作了『解釋』以後，俄國首都舉行了遊行示威。

政府想把俄國置於血腥『指令』的箝制之下。

俄國却顯得比政府更強，它決定走自己的道路……

我們再來看連納事件的經過吧。

連納金礦六千工人舉行了罷工。罷工是和平的，有組織的。當然，撒謊的『言論報』可以說在連納發生了『自發的騷動』（見第一〇三號）。可是我們並不是根據撒謊的『言論報』，而是根據目擊者屠里慶斯基的『報告』來判明真相的。屠里慶斯基先生肯定地說，那一天工人表現得非常好，他們『並沒有帶一塊石頭和一根棍子』。此外，礦上工作條件極其惡劣，工人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並自願放棄八小時工作制的要求，情願繼續讓步，——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和平的連納罷工的情況。

雖然如此，政府却認爲需要槍殺工人，槍殺手裏拿着旱煙包、口袋裏裝着要求釋放被捕同志的申請書的、和平的、赤手空拳的工人……

他們幹得好……

特列申柯沒有受到懲辦，——他是奉命行事的，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決定懲辦工人，而不懲辦特列申柯，——有人需要無產階級流血，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他們在槍殺工人那天想一舉兩得：第一、滿足連納吃人者的貪婪胃口；第二、恐嚇其他城市和地方的工人，——他們說你們乖乖地套上資本的羈絆吧，否則我們就要像對付連納工人一樣地對付你們了。

結果哪一個目的也沒有達到。

連納吃人者沒有得到滿足，因為金礦的罷工繼續着。

其他城市的工人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接連地掀起罷工，抗議槍殺工人。

不僅如此，俄國首都彼得堡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工人也舉行了遊行示威來回答馬卡羅夫的「解釋」。

俄國社會中最敏感的部分——青年學生已經向俄國人民中最革命的部分——無產階級伸出手來，並高舉紅旗宣佈：是的，「從前如此」，可是今後就不許如此了！

從連納的和平的經濟罷工發展到俄國各地的政治罷工，從俄國各地的政治罷工發展到俄國心臟的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工人的遊行示威，——這就是政府代表人物在和工人作鬥爭中所得到的。

是的，有遠見的俄國政府，解放運動的「田鼠挖得好呀」！

再有兩三次這樣的「功績」就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馬卡羅夫大臣的大話只能留下可憐的回憶

罷了。

幹吧，先生們，幹吧！

他們幹得好……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七日
彼得堡「明星報」第三十一號
署名：科·索林
按報上原文刊印

奔流起來了！……

被鐐銬鎖住的國家躺在它的奴役者的腳下。

它需要的是人民的憲法，然而得到的是專橫暴虐、『根本杜絕』和『酌情處理』的措施。

它需要的是人民的國會，然而奉獻給它的是士紳的杜馬，普利什凱維奇和古契柯夫的杜馬。

它需要的是言論、出版、集會、罷工、結社的自由，然而它在自己周圍所看到的只是被破壞的工

人組織、被查封的報館、被逮捕的編輯、被驅散的集會、被流放的罷工者。

它要求給農民土地，然而奉獻給它的是有利於一小撮農村富有者而使農民羣衆愈加缺乏土地的土地法。

答應它的是保護『人權』和『財產』，然而監獄和流放地充滿了『不穩分子』，偵緝隊的頭目們（請回憶一下基輔和梯弗里斯吧！）竟和強盜小偷串通一氣來侵犯人權，搶劫財產。

答應它的是『幸福』和『繁榮』，然而農民的經濟每況愈下，千千萬萬的農民忍飢挨餓，壞血病和傷寒症奪去成千上萬的生命……

奔流起來了！……

可是全國忍耐又忍耐……

忍耐不下去的人自殺了。

然而一切總有個盡頭，全國的忍耐到了盡頭了。

連納的槍聲擊破了沉默的冰層，人民運動的江河奔流起來了。

奔流起來了！……

現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禍害，多災多難的俄國所受的一切苦痛都集中在一件事實上，集中在連納事件上。

這就是連納的槍聲正好成爲罷工和遊行示威的信號的原因。

從這裏而且只有從這裏，才能給最近的事件找到解釋。

可是杜馬中發號施令的人——十月黨人、立憲民主黨人、進步派(С.С.)——却等待來自上面的、出自政府代表人物口中的「解釋」！

十月黨人在「質問」，進步派只是在「詢問」，立憲民主黨人却「合乎時宜地」談論特列申柯這類事變中的可憐傀儡！

而這些都是發生在馬卡羅夫已經向他們大發狂言「從前如此，將來還會如此」的時候！

俄國的首都幾萬工人舉行罷工，軍隊進入備戰狀態，「我們」在達達尼爾海峽問題上的外交工作因內部「糾紛」而遭受破壞，——他們却等待來自「上流社會」的答覆！

瞎子們！他們看不見，在這些日子裏，發言權屬於無產階級而不屬於政府代表人物……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彼得堡「明星報」第三十二號

署名：科·斯·

按報上原文刊印

奔流起來了！……

二三三

他們怎樣準備迎接選舉

第四屆杜馬的選期(20)迫近了，解放運動的敵人正在動員力量。

在我們面前的首先是反革命的政黨：極右派、民族主義者和十月黨人。他們反正都是支持政府的。他們在這次競選中所能指望的是什麼呢？當然不是廣大居民階層的同情，因為把自己的命運和在連納槍殺工人的政府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政黨是不能指望羣衆的同情的！它們唯一的希望就是政府的「指令」。而「指令」照例是不會少的。內政部早已通令各省長「採取保證各鄉選出完全可靠而不屬於左派的人爲初選人的辦法」。這些「辦法」歸結起來實際上是什麼呢？我們從實踐中知道，就是從名單上刪去左派候選人，誣告他們，然後加以逮捕、流放，就是這些「辦法」！另一方面，正教行政總署勸告各教區的主教們要熱烈參加這次選舉，把堅決維護教會利益的人選入杜馬，勸告他們爲了這個目的要召開準備選舉的教區神甫代表大會，出版專門的競選報紙等等。

各政府黨的事情真是糟糕透了，甚至連教會的神甫都不得不因此拋開「教會的事情」而爲「世俗的事情」奔走！

使選舉處在教會和世俗省長們的壓力之下，這就是他們所能指望的手段了。

固然，還有一種手段，那就是貼上無黨無派的商標，蒙蔽選民，設法鑽進杜馬，然後摘下假面具。

近來戴着無黨無派假面具登場的科甫諾的民族主義者就是想這樣辦『事情』的。可是這種手段太巧妙了，大概不適合於我們笨拙的死硬派……

俄國的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人、和平革新黨人和進步派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羣油滑的人，他們大概可以把這個無黨無派的商標使用到底……而這種無黨無派正是褪色的立憲民主黨人所需要的，而且是極其需要的。

問題在於：第三屆杜馬時期，一般人都學會了批判地看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另一方面，『第一選民團』的人即城市的大資產者對那些有負厚望的十月黨人『大失所望了』，所以就有可能把這些和立憲民主黨人爭往大臣客廳的十月黨人『打下馬去』。但是不通過進步的和平革新黨人，怎樣架設通向『第一選民團』的橋梁呢？因此——與和平革新黨人的聯盟萬歲！固然，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稍稍』右傾一點，可是，這有什麼要緊呢？既然如此有利，難道不能右傾一點嗎？

於是，向右看齊！

另一方面，『第二選民團』的『中小市民』即知識分子、店員以及其他等人，特別是由於日益擴大的連納事件，都已大爲左傾了。立憲民主黨人感到自己有重大的政治罪過，因爲他們以前老是企圖背叛『人民自由』的事業；要是他們現在相信會允許他們進大臣的客廳，那末他們是會高興跑去的，——天曉得！但是，正因爲如此，城市的民主階層就開始懷疑立憲民主黨人了。在這樣的選民面前，不戴假面具而以自由派叛徒的本來面目登場是有些危險的，這還用說嗎？但是在這種情形下，究竟捏造

些什麼去欺騙已在離開立憲民主黨人但還沒有走到社會民主黨人方面的左傾了的市民呢？當然是進步的煙霧……對不起，是進步的無黨無派。噢，不要以為進步派就是立憲民主黨人！不，他們決不是立憲民主黨人，他們只是會投票擁護立憲民主黨的候選人罷了，他們只是立憲民主黨人的『無黨無派的』夥計罷了……立憲民主黨人却替『無黨無派的』進步派大吹大擂；至少必須在口頭上左傾到……無黨無派方面去，否則是不行的！

於是，向左看齊！

一方面這樣……另一方面那樣……一會右些……一會左些……這就是自由欺騙人民的黨——立憲民主黨的政策。

蒙蔽選民，——這就是俄國自由派所指望的手段。

無黨無派的騙術在選舉中可以發生巨大的作用，這一點必須着重指出。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不揭露戴假面具的自由派先生們，如果他們不為這一次選舉積極活動，如果他們不竭力使城市的民主階層團結在解放運動領袖的周圍，團結在俄國無產階級的周圍，那末這種無黨無派的騙術是可以發生巨大的作用的。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彼得堡《明星報》第三十二號

署名：科·索林

按報上原文刊印

結 論

第一次政治高潮開始退落了。現在進行的是『最後的』罷工。各地罷工者還在發出抗議的呼聲，然而這將是『最後的』呼聲。國家暫時開始恢復『常』態了……

無產階級從最近的事件中可以吸取什麼教訓呢？

讓我們回顧一下『運動的日子』的情景吧。

四月四日。在連納槍殺了工人。死傷五百人左右。看來全國是平靜的。政府的態度很強硬。南方開始抗議罷工。

四月十日。在杜馬中提出質問。罷工的次數增加。人心惶惶。

四月十一日。馬卡羅夫大臣答覆：『從前如此，將來還會如此。』齊馬曉夫『不完全』同意馬卡羅夫。政府代表人物的隊伍中第一次發生慌亂。彼得堡舉行羣衆集會和罷工。各地的運動加強起來。

四月十五日。彼得堡的學生和工人舉行遊行示威。

四月十八日。彼得堡有十萬以上的工人罷工。工人舉行遊行示威。政府當局張皇失措。馬卡羅夫不敢在杜馬中露面。齊馬曉夫表示歉意。政府當局退却。向『社會輿論』讓步。

結論很明顯：緘默、忍耐是不可能獲得解放的。工人的呼聲愈響亮，反動的勢力就愈張皇失措，他們的退却也就愈快……

『運動的日子』是考驗各政黨的最好場所。評價政黨不應根據它們說的話，而應根據它們『在鬥爭的日子裏』的表現。在這些日子裏，那些自稱爲『人民的』政黨究竟表現得怎樣呢？

可是以查梅斯洛夫斯基之流和馬爾柯夫之流爲首的極端的黑幫地主集團却很難掩飾自己對於連納槍殺事件的高興：這有什麼了不起，政府當局不過顯示了力量和厲害，——讓那些『游手好閒』的工人知道自己在跟誰打交道吧！他們給馬卡羅夫鼓掌。他們投票反對社會民主黨黨團在杜馬中提出的質問。他們的『庶民報』(20)千方百計地慫恿政府當局去懲辦連納的『鼓動者』，懲辦全俄各地罷工的工人，懲辦工人的報紙『明星報』。

以巴拉朔夫之流和克魯平斯基之流爲首的溫和的黑幫地主集團實質上不反對殺人，——他們所惋惜的只是政府當局的行動太明顯太露骨。因此，他們一面貓哭老鼠似地爲『被害者』流淚，一面又希望政府在殺人方面做得『機智』一點。他們投票反對社會民主黨黨團的質問，他們的機關報『新時報』(21)則向政府當局建議，對那些『死心塌地的罷工者』『不要客氣』，對遊行示威者要『嚴辦』，而不是輕微的罰款或逮捕，不要再把逮捕起來的『鼓動者』從監獄裏釋放出去。

以古契柯夫之流和郭洛洛波夫之流爲首的保守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寄生階層的政黨——十月黨所哀痛的不是被槍殺的死者，而是它所支持的那個部由於在連納『不得當地使用武器』而遇到了『麻煩』

(罷工)。它稱馬卡羅夫的演說是「不够機智的」演說，它在自己的機關報『莫斯科呼聲報』(三)上表示深信政府『在流血事件上是無過的』。它否決了社會民主黨人的質問。它唆使政府當局向『煽動者』進攻。而當齊馬曉夫着手恢復馬卡羅夫的名譽時，它就給他鼓掌，認為『事件』已經解決了。

以米留可夫之流和馬克拉柯夫之流爲首的自由派地主和中等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對連納槍殺工人的事件大肆攻擊，可是它認爲問題並不在於制度的基礎，而在於特列申柯和別洛佐羅夫這一類人物。因此，它針對馬卡羅夫的演說彈了『我們錯了』的虛偽調子以後，就完全滿意齊馬曉夫那篇『懺悔的』演說，並且緘默起來了。它一方面支持那個要求全國裁判政府代表人物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另一方面又歡迎那些請求政府代表人物以『文明的辦法』制服罷工工人的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即和平革新黨人先生們。爲了使人對它，對立憲民主黨的好意絲毫不加懷疑，它居然在自己的『言論報』上宣佈連納的罷工是『自發的騷動』。

這就是所有這些『人民的』政黨在『運動的日子』裏的表現。

讓工人們記住這些，並在第四屆杜馬『選舉的日子』裏給他們以應得的報答吧。

只有社會民主黨在『鬥爭的日子』裏捍衛了工人的利益，只有它說出了全部真相。

結論很明顯：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唯一的捍衛者。上述其他一切政黨都是工人階級的敵人，不過它們和工人作鬥爭的方式各有不同罷了；有的用『文明的辦法』，有的用『不完全文明的辦法』，有的則用『完全不文明的辦法』。

現在，當第一次高潮正在退落的時候，曾經躲在貓哭老鼠這一煙幕後面的黑暗勢力又開始出現了。「庶民報」號召採取「辦法」來懲辦工人報刊。「新時報」請求不要饒恕「死心場地的」工人。政府當局則動手「幹」起來，一再逮捕「不穩分子」。他們在自己的「新進軍」中究竟能指望些什麼呢，曾經張皇失措的政府當局從哪兒來的這種勇氣呢？

他們能指望的只有一點：指望不可能每一次都掀起羣衆性的抗議，指望工人沒有組織，指望工人沒有足夠的覺悟。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彼得堡「明星報」第三十三號

署名：科·索林

按報上原文刊印

我們的目的

誰經常閱讀『明星報』並且知道它的撰稿人（也是『真理報』的撰稿人），誰就不難了解『真理報』的工作方針。以國際社會民主主義的光芒照耀俄國工人運動的道路，在工人中間傳播關於工人階級的朋友和敵人的真情，捍衛工人事業的利益，——這就是『真理報』所要追求的目的。

我們提出這樣的目的，決不是有意掩飾社會民主黨工人中間的意見分歧。不僅如此，我們以為強大而充滿生命力的運動，沒有意見分歧是不可想像的，——『觀點的完全相同』只有在墓地裏才能實現！但這並不是說，分歧之點多於一致之點。遠非如此！無論先進工人的意見如何分歧，他們總不會忘記他們不分派別地一樣遭受剝削，他們不分派別地一樣毫無權利。因此，『真理報』首先而且主要地將號召把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統一起來，無論如何要統一起來。既然我們對敵人應該勢不兩立，我們之間就得互相忍讓。對工人運動的敵人要鬥爭，在運動內部却要和平，要同心協力地工作，——這就是『真理報』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所將遵循的方針。

現時，在連納事件和即將到來的第四屆杜馬的選舉都非常堅決地向工人提出必須團結成一個統一的階級組織這個問題的時候，這一點是必須特別着重指出的……

我們着手進行工作的時候，就知道我們的道路上佈滿荆棘。只要回憶一下『明星報』遭到很多次沒收和『懲辦』就可以明白。但是，如果工人們今後還繼續保持現時對『真理報』的同情，那末荆棘是不可怕的。『真理報』將從這種同情中吸取鬥爭的力量！我們希望這種同情增長起來。此外，我們還希望工人不要僅限於同情，而要積極地參加我們的辦報工作。工人們不要說寫作是他們所『不習慣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現成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只是在寫作的過程中慢慢鍛鍊出來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動手去幹；跌一兩次交，以後就學會寫作了……

總之，更加同心協力地工作吧！

載於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真理報』創刊號

本文沒有署名

按報上原文刊印

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

（一三）

一九〇五年的運動所提出的俄國人民的要求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反動勢力和『革新的制度』的發展不僅沒有滿足這些要求，反而使得這些要求更加迫切了。

工人往往不僅沒有舉行罷工的可能，因為沒有什麼可以保證他們不因此而被槍殺；不僅沒有組織工會和舉行集會的可能，因為沒有什麼可以保證他們不因此而被逮捕；而且沒有選入杜馬的可能，因為他們總是要被『解釋』（二）掉或被驅逐掉的；前幾天普梯洛夫工廠和涅瓦造船廠的工人不就是被『解釋』掉了！

至於遭受地主和地政官任意欺壓的千千萬萬飢餓的農民，那就更不用說了……
這一切都說明必須滿足一九〇五年的要求。

俄國的經濟生活狀況和已經出現的未來工業危機的徵兆，以及廣大農民階層日益加劇的貧困化，使解決一九〇五年的任務成爲迫不及待了。

因此，我們認爲俄國正處在必將到來的羣衆運動的前夜，這一運動也許比一九〇五年更加深入。連納的發動和反對『解釋』的抗議罷工等等都證明了這一點。

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

這一運動的先鋒，也像一九〇五年一樣，將是俄國社會中最先進的階級即俄國無產階級。它的同盟者只能是和俄國解放事業休戚相關的多災多難的農民。

兩條戰綫的鬥爭，——既反對封建官僚制度，又反對力求和舊政權結成聯盟的自由資產階級，——這就是未來的人民發動應當採取的形式。

只有由工人階級來領導人民運動，這一鬥爭才能獲得勝利。

但是工人階級爲了能光榮地完成人民運動領袖的使命，就必須意識到自己的利益並具有高度的組織性。

杜馬講壇在目前條件下也是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廣大羣衆的最好工具之一。

正是爲了這個目的，我們才派我們的代表到杜馬中去，委託他和第四屆杜馬的整個社會民主黨黨團利用杜馬的講壇廣泛地傳播我們的要求，而不是在士紳的杜馬中無謂地玩弄立法的把戲。

我們希望第四屆杜馬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和我們的代表在敵視他們的、反動的杜馬陣營中高舉起工人階級的旗幟。

我們希望從杜馬講壇的高處響亮地發出社會民主黨黨團成員的呼聲，說明無產階級的最終目的，提出一九〇五年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說明俄國工人階級是人民運動的領袖，農民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說明自由資產階級是「人民自由」的叛徒。

我們希望第四屆杜馬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在根據上述口號進行工作的時候是團結一致的。

希望它在和廣大羣衆經常的接觸中吸取力量。
希望它和俄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步調一致。

一九一二年十月上半月印成傳單
按傳單原文刊印

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

二四七

初選人的意志

工人選民團的選舉結果終於揭曉了^(二五)。六個覆選人中，三個是取消派，三個是『真理報』的擁護者。從他們中間提誰來當代表呢？究竟應當提誰呢？關於這一點，初選人大會是不是給了某種指示呢？

取消派之所以能使他們的擁護者當選，在於他們玩弄『統一』的把戲，對初選人隱瞞了自己的觀點，掩飾了意見分歧。那些不喜歡意見分歧而相信他們口頭上那一套的無黨無派的初選人支持了他們。可是，不管取消派怎樣努力淆亂視聽，初選人的意志畢竟在一個問題上，而且在最主要的問題上表現出來了。這就是關於委託書的問題。初選人大會以壓倒的多數通過了一份給代表的明確的委託書，即『真理報』擁護者的委託書。

『光綫報』^(二六)在它的選舉報道中對這一點默不作聲，但是它對讀者隱瞞不住全體初選人都知道的真相。我們不讓它歪曲初選人的意志。

委託書就是給代表的指令。委託書左右着代表。委託書怎樣，代表也就怎樣。彼得堡各大工廠所提出的並為初選人大會所通過的委託書究竟說些什麼呢？

委託書首先說明一九〇五年的任務，說明這些任務還沒有得到解決，說明國內經濟政治狀況必能使這些任務得到解決。根據委託書，要使國家得到解放只能靠鬥爭，即兩條戰綫的鬥爭：一方面反對封建官僚的殘餘，另一方面反對背叛人民的自由資產階級，而且只有農民才能是工人的可靠的同盟者。但是只有在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起領導作用）的條件下鬥爭才能獲得勝利。工人愈有覺悟，愈有組織性，他們就能愈好地完成人民領袖的使命。既然杜馬講壇在目前條件下是組織和教育羣衆的最好工具之一，工人也就要派遣一個代表到杜馬中去，讓他和第四屆杜馬的整個社會民主黨黨團去堅持無產階級的根本任務，堅持全國人民的全部的不折不扣的要求……

這就是委託書的內容。

不難了解，這個委託書和取消派的『綱領』是根本不同的，它完全是反取消派的。

於是問題就來了：既然初選人代表大會已經明確決定代表必須執行委託書，如果取消派竟敢提出自己的代表候選人，那末對委託書該怎麼辦呢？

由取消派分子執行反取消派的委託書，——我們的取消派是否會無恥到這種地步呢？

他們是不是感覺到『統一』的把戲已使他們走投無路了呢？

也許他們打算違背委託書，打算把它置之腦後吧？

但是，那時對於初選人的意志又怎麼辦呢？彼得堡的工人無疑是會出來維護它的。取消派敢不敢踐踏初選人的意志呢？

現在他們還談論着勝利，可是他們是不是感覺到委託書已使他們遭到致命的失敗呢？因為委託書着重指出只有反取消派的人才能充當代表。

載於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真理報」第一四七號

署名：科·斯大·

按報上原文刊印

關於彼得堡工人選民團的選舉結果

一 初選人的選舉

和一九〇七年相比，工人情緒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對選舉的興趣大大提高了。如果不算分散在各企業中的小撮抵制分子，那就可以大胆地說，抵制的情緒完全不存在了。奧布霍夫⁽²⁾並沒有抵制，而是工廠行政當局的意志使它不能進行選舉。涅瓦造船廠是抵制分子有組織地進行活動的唯一工廠，然而那裏的工人絕大多數也贊成參加選舉。廣大的工人羣衆擁護選舉。不僅如此，只要他們面前沒有掃除不了的障礙，他們就爭得了選舉，並且以極大的興趣進行了選舉。不久以前反對「解釋」的羣衆性抗議也證明了這一點……

當選的幾乎都是社會民主黨人或靠近社會民主黨的人。由於某些客觀情況，尤其是由於取消派處心積慮地向工人隱藏自己的綱領，徹底的工人民主派的綱領只在某些企業中得到了傳播。然而，凡是這一綱領得到傳播的地方，工人都以「委託書」的形式通過了反取消派的綱領。在這種情況下，取消派看來既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自己的觀點，竟宣稱「他們實際上也擁護這樣的委託書」（涅瓦造

船廠)，同時他們還提出關於締結聯盟的自由的『修正案』，這種『修正案』被當做多餘的東西否決了。因此，主要是『看人』選舉的。結果絕大多數的初選人是社會民主黨人或靠近社會民主黨的人。

初選人的選舉說明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階級利益的唯一代表者。

二 覆選人的選舉

在出席大會的八十二個初選人中，確定的反取消派有二十六人，確定的取消派有十五人，其餘的四十一人是『一般社會民主主義者』，靠近社會民主黨的人和非黨的左派分子。

這四十一人將擁護誰，他們將贊成什麼樣的政治路線，這是『派別分子』最關心的問題。

初選人大會絕大多數贊成『真理報』擁護者提出的委託書。大會就這樣確定了自己的面貌。反取消派的政治路線勝利了。取消派阻礙這件事的企圖失敗了。

假若取消派在政治上是誠實的，假若他們尊重自己的觀點，他們就應當撤銷自己的候選人，把全部席位讓給『真理報』的擁護者。因為很明顯，只有委託書的擁護者才能當候選人。委託書的反對者充當委託書的辯護人，——只有政治上的破產者才能走這一步。取消派却走了這一步！他們對初選人隱瞞了自己的觀點，暫時裝作『自己人』，似乎『一點也不反對』所通過的委託書，玩弄統一的把戲，埋怨反取消派是分裂派。總之，他們力求博得無派別的初選人的同情，千方百計地把自己人『拉

進去」。果然他們欺騙了初選人，把自己人拉進去了。

很明顯，取消派的冒險主義是不會有止境的。

同樣很明顯，『真理報』的政治路線，而且只是這條路線，才得到彼得堡無產階級的同情，按照初選人的意志，只有『真理報』的擁護者才能當工人的代表。

我們並沒有希望更大的勝利……

三 兩種統一

在談到代表的選舉之前，對於所謂『統一』必須說幾句話，這種『統一』在選舉覆選人時起了決定的作用，所以取消派抓住它就像快淹死的人抓住一根草一樣。

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在『光綫報』上寫過，『真理報』從前擁護統一，可是現在它似乎反對統一了。這對不對呢？也對也不對。說『真理報』過去擁護統一，這是對的；說它現在反對統一，這是不對的，因為『真理報』一向號召徹底的工人民主派統一起來。

那末，關鍵究竟在哪裏呢？關鍵在於『真理報』對統一的看法同『光綫報』和托洛茨基完全不同。顯然有各種不同的統一。

『真理報』以為只有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護黨分子才能聯合成統一的整體。統一是以和反黨

分子，和取消派劃清界限為基礎的！這樣的統一，『真理報』過去一向擁護，將來還要擁護。

托洛茨基的看法却不是這樣，他把所有的人，無論是反對黨性的或擁護黨性的人都攪在一起。這樣，他自然得不到任何的統一，他這樣幼稚地鼓吹聯合那些不能聯合的東西已經五年了，其結果是：兩種報紙、兩套綱領、兩個代表會議，而工人民主派和取消派之間的統一一點也沒有！

當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護黨分子日益團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時，取消派却在自己和這個整體之間挖了一道鴻溝。

運動的實踐證明『真理報』的統一計劃是正確的。

運動的實踐粉碎了托洛茨基的聯合不能聯合的東西的幼稚計劃。

不僅如此，托洛茨基正在從空想的統一的說教者變成取消派的夥計，專幹有利於取消派的勾當。

托洛茨基曾用一切辦法使我們有兩種互相競爭的報紙，兩套互相競爭的綱領，兩個互相否定的代表會議，——現在這個假裝的大力士自己却向我們唱起統一的高調來了！

這不是統一，這是小丑才玩得出的把戲。

如果說這個把戲使取消派有可能弄到三個覆選人，那末這是因為在短時間內沒有可能揭穿那些向工人隱藏自己的旗幟而玩弄統一的把戲的小丑們……

四 代表的選舉

當取消派向『真理報』擁護者建議只提出一個杜馬候選人的時候，就不難了解他們所能談的是什麼樣的『統一』。他們不願初選人的意志，違反彼得堡無產階級的委託書，乾脆提議投票選舉取消派的候選人。『真理報』的擁護者除了說初選人的委託書是神聖的、當代表的只能是委託書的擁護者以外，對這樣的提議能回答什麼呢？是違反初選人的意志去迎合取消派的沒有氣節呢，還是不願取消派的刁難來服從彼得堡無產階級的委託書？『光綫報』叫囂『真理報』鬧分裂，並造謠誣譏覆選人，但是，爲什麼取消派不同意『真理報』向他們提議的在六個工人覆選人中進行抽籤呢？爲了工人有一個共同的候選人，我們甚至作了這樣的讓步，然而，我們要問爲什麼取消派拒絕抽籤呢？爲什麼『光綫報』的擁護者寧願有六個杜馬候選人而不願只有一個杜馬候選人呢？也許這是爲了『統一』吧？

『光綫報』說，古德柯夫提出『真理報』的擁護者巴達也夫作候選人，但是這個取消派報紙輕輕描淡寫地補充說，這個提議沒有通過。難道『光綫報』的取消派忘記了：拒絕撤銷自己的候選人資格的不只是『真理報分子』，而是他們的擁護者彼得羅夫。彼得羅夫這樣做實際上也就表明了取消派如何熱心於『統一』。然而他們還是把這種做法叫做統一！『光綫報』的另一個擁護者古德柯夫在『真理報』的擁護者巴達也夫當選以後，又提出自己作候選人，這也算統一嗎？誰會相信這一點呢？

『光綫報』假仁假義地替沒有一定政治面目的蘇達柯夫吹了一通，說他爲了統一才撤銷自己的候選人資格。但是蘇達柯夫根本不能競選，因爲他只得到兩票，難道『光綫報』不知道嗎？應該怎樣稱呼這種竟敢在萬目睽睽之下撒謊的報紙呢？

政治上沒有氣節，難道這就是取消派唯一的『美德』嗎？

取消派不顧彼得堡工人的意志，竭力照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的意志把自己人拉進杜馬去。但是，難道脫離了工人羣衆的『光綫報』還不了解彼得堡工人會宣佈不信任這樣的代表嗎？

載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真理報』第一五一號

署名：科·斯大·

按報上原文刊印

今天選舉

今天在彼得堡進行選舉。是第二選民團的選舉。兩個陣營即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在進行鬥爭。選民必須決定，他們把國家的命運託付給誰。

社會民主黨人所想的是什麼呢？

立憲民主黨人所想的是什麼呢？

工人階級的代表社會民主黨人力求把人類從一切剝削中解放出來。

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立憲民主黨人却把自己的未來建築在剝削人的基礎上，固然這是粉飾過的剝削，然而畢竟是剝削。

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國家革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但必須解決，必須依靠全國的努力來解決。

立憲民主黨人却以為談論革新是多餘的，因為「謝天謝地，我們已經有憲法了」……

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在走向國家革新的道路上，俄國已經分成了兩個：舊的、官方的俄國和新的、未來的俄國。

立憲民主黨人却以為在「恩賜憲法」以後，兩個俄國的「這種對立」再不可能了，因為「俄國只

有一個』。

結論只有一個：立憲民主黨人的立憲理想已經實現了。他們對於六三政制的範圍並不感到什麼拘束。

例如一九〇九年米留可夫曾和十月黨人古契柯夫及『溫和的』黑幫分子鮑勃凌斯基一起『代表』俄國在倫敦參加一次宴會，在宴會上他說過這樣的話：

『你們可以看出面前的人們在政治信仰上有各種各樣的色彩，但是這些色彩互相補充，代表着我們立憲俄國的偉大理想。』（見葉弗列莫夫『俄國的人民代表和……』第八十一頁）

由此可見，黑幫分子鮑勃凌斯基是爲了……『人民的自由』而『補充』立憲民主黨人米留可夫的，——立憲民主黨人的『偉大理想』原來如此。

當時在倫敦的宴會上既沒有一個工人代表，也沒有一個農民代表；立憲民主黨人的『偉大理想』原來是用不着工人和農民的……

不要工人代表、不要農民代表參加而制定鮑勃凌斯基之流、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的憲法，——這就是立憲民主黨人的『理想』！

既然如此，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三屆杜馬中投票贊成（一）反人民的預算，（二）間接稅，（三）監獄撥款等等，又有什麼奇怪呢？

既然如此，立憲民主黨人反對工人、農民和整個民主派提出的要求，又有什麼奇怪呢？

既然如此，立憲民主黨人通過馬克拉柯夫來要求「更猛烈、更嚴厲和更殘酷地」對付學生運動，在『言論報』上輕蔑地說連納工人的和平罷工是『自發的騷動』，又有什麼奇怪呢？

不，這不是『人民自由』的黨，而是出賣『人民自由』的黨。

這樣的人只會背着人民同官僚做買賣。他們過去和維特、斯托雷平、特列坡夫而現在又和薩宗諾夫『談判』，決不是偶然的。

這樣的人只會在哈爾科夫、科斯特羅馬、葉加特林諾達爾、里加等地的選舉中勾結黑暗勢力以擊敗社會民主黨人。

把國家的命運託付給這樣的人，無異於把國家交給敵人去作踐。

我們相信自重的選民不會把自己的榮譽和立憲民主黨人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讓立憲民主黨人今天因反俄國人民的嚴重罪行而受到應得的懲罰吧！

工人選民們！投票選舉你們的利益的代表者，選舉社會民主黨人吧！

店員選民們！不要選舉漠視你們的休息利益的立憲民主黨人，投票選舉唯一徹底維護你們的利益
的社會民主黨人吧！

波蘭選民們！你們正在爭取民族自由發展的權利，——要記住，沒有一般的自由，民族的自由是
不可想像的，立憲民主黨人却出賣自由！

猶太選民們！你們正在爭取猶太人的平等權利，但是要記住，和鮑勃凌斯基之流依依不捨的米

留可夫之流以及右派結成聯盟的立憲民主黨人是不會爭取平等權利的！

擁護人民自由的出賣者還是擁護人民自由的保衛者，擁護立憲民主黨人還是擁護社會民主黨人，——請選擇吧，公民們！

載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真理報」第一五二號

署名：科·斯大·

按報上原文刊印

告俄國全體男女工人書

(二八)

一月九日

同志們！

一月九日這個浸透了我們數百工人弟兄鮮血的日子又來了。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沙皇尼古拉·羅曼諾夫槍殺了我們的和平的、手無寸鐵的工人弟兄，因為他們到他那裏去請求改善生活。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八年了。在這漫長的八年中，除了有過曇花一現的自由以外，我們的國家一直受着沙皇和地主的蹂躪和折磨！

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在俄國，工人常因和平罷工而遭到槍殺，連納發生的事件就是例子。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千千萬萬的農民被弄得飢餓不堪，一九一一年情形就是例子。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在沙皇的監獄裏，人民的優秀兒女受着拷打和侮辱，被弄得大批自殺，不久以前在庫托馬爾、阿爾加契等地發生的事情(二九)就是例子。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陸海軍士兵為農民要求土地、為全體人民要求自由，常被沙皇的法庭判處槍斃，不久以前槍斃十七名黑海水兵的事情(三〇)就是例子。這是地主擁戴的全俄專制皇帝尼古拉·羅曼諾夫在行使他的「天賜」皇權——正教行政總署裏披着法衣的惡

棍們以及黑幫分子普利什凱維奇和赫沃斯托夫之流所祝福的皇權。

羅曼諾夫君主制依舊緊緊扼住俄國的脖子，今年它還打算慶祝血腥統治我國的三百周年。

但是，俄國已經不是那個在羅曼諾夫皇朝壓迫下長年忍氣吞聲、任人宰割的馴服的俄國了。首先是領導着一切爭取自由的戰士——我們俄國工人階級已經和從前不同了。我們現在不是以彎腰曲背、受盡屈辱的奴隸的樣子，而是以昂首闊步、結成大軍的戰士的姿態來迎接一九一三年的一月九日了。我們的戰士感覺到並了解到人民的俄國又覺醒了，反革命的冰層被打碎了，人民運動的江河重新奔流起來了，『新戰士的隊伍在跟着我們前進了』……

八年！經過的時間雖不長，經歷的苦難却不少……在這期間，我們看到了三屆國家杜馬。頭兩屆杜馬中自由派雖佔多數，但從那裏却響亮地發出了工人和農民的呼聲，因此沙皇遵照黑幫地主們的意志把這兩屆杜馬解散了。第三屆杜馬本身就是黑幫杜馬，五年來它和沙皇的狐羣狗黨串通一氣，力圖更殘酷地奴役並壓迫農民、工人，奴役並壓迫整個人民俄國。

在反革命猖獗的歲月中，工人階級忍受了最深重的苦難。一九〇七年，舊制度的勢力暫時壓下了羣衆的革命運動，從那時起，工人一直呻吟在雙重的壓迫下。沙皇匪幫比誰都更殘酷地向工人進行報復。資本家也向他們大舉進攻。廠主們利用政治的反動，得寸進尺地把工人費了這麼多的氣力，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才爭得的一切都奪去了。老闆們用同盟歇業的手段，在憲兵和警察的保護下延長工作日，減低工資，恢復工廠的各種舊制度。

工人咬緊牙關默不作聲。一九〇八年和一九〇九年是黑幫分子對自己的勝利最得意和工人運動最消沉的年頭。但到一九一〇年的夏天，工人的罷工就開始復活了。一九一一年底，有幾萬工人提出積極抗議，反對被陷害而判刑的第二屆杜馬社會民主黨代表繼續服苦役（三）。

羣衆性的工人運動是以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因第二屆杜馬社會民主黨代表被判處苦役而舉行的罷工來結束的。一九一一年底，羣衆性的工人運動又爲第二屆杜馬社會民主黨代表——這些先進的戰士們、這些工人階級的英雄們（現在他們的事業正由第四屆杜馬的工人代表們繼承着）的命運而重新活躍起來了。

隨着政治鬥爭的活躍而來的是工人經濟鬥爭的活躍。政治罷工造成經濟罷工，反過來，經濟罷工也造成政治罷工。工人運動像洶湧的洪流，後浪逐前浪地沖向沙皇君主制和資本獨裁的堡壘。覺醒起來追求新生活的工人階層日益擴大。投身於新鬥爭的羣衆日益增多。連納慘案所引起的罷工、五一節的罷工、抗議剝奪工人選舉權的罷工和抗議處死黑海水兵的罷工吸引了大約一百萬人來參加。這是革命的罷工，罷工的旗幟上寫着：「打倒羅曼諾夫君主制，打倒整個陳舊的、腐朽的、扼殺俄國的地主制度！」

工人的革命運動在擴大着，發展着。工人階級開始喚醒其他人民階層去作新的鬥爭。一切正直的人、一切渴望較好生活的人都開始抗議沙皇的狐羣狗黨的暴行了。甚至資產階級也在抱怨，甚至它也不滿意普利什凱維奇之流專橫獨霸的統治了。

六三改制並沒有使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安定下來。反革命年代表明，只要羅曼諾夫君主制還完整，只要地主統治還保全，俄國就沒有自由生活。

新的革命在高漲，在這個革命中，工人階級又將負起整個解放大軍的領袖的光榮使命。

在工人階級的旗幟上，仍舊寫着三個原來的要求，爲了這些要求，工人們曾有過那麼大的犧牲，流過那麼多的鮮血。

爲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爲農民無償地沒收地主、沙皇和教堂的全部土地！

爲全體人民建立民主共和國！

在現代的俄國，圍繞着這些要求曾經進行過並且進行着鬥爭。在不久以前連納罷工的日子裏，工人提出過這些要求。一月九日，工人階級又要提出這些要求。

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彼得堡、里加、尼古拉也夫的工人會試圖用罷工和遊行示威來表示紀念。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我們要在全俄國各地都這樣做。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在工人的血泊中誕生了俄國第一次革命。讓一九一三年的開始成爲俄國第二次革命的開端吧。羅曼諾夫皇朝準備在一九一三年慶祝自己的三百周年，他們還打算長久地騎在俄國的背上。讓我們在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對這幫強盜說：

够了！打倒羅曼諾夫君主制！民主共和國萬歲！

同志們！凡是有俄國工人生活和鬥爭的地方，都不要讓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毫無表示地過去。

我們要以到處集會，以決議，以羣衆大會，如果那裏有可能，就以

一·天·的·罷·工·和·
遊·行·示·威·

來紀念這個日子。

這一天我們要追念在鬥爭中犧牲的英雄們！我們追悼他們的最好辦法，就是在這一天使全俄國到處都響徹着我們原來的要求：

建·立·民·主·共·和·國·！
沒·收·地·主·土·地·！
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同志們！

準備一月九日的抗議吧！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底一九一三年

一月初印成傳單

按傳單原文刊印

彼得堡的選舉

(聖彼得堡來信)

和一九〇七年的選舉不同，一九一二年的選舉恰巧是在工人革命浪潮興起的時候舉行的。在一九〇七年，革命的浪潮低落了，反革命勝利了；在一九一二年却掀起了第一個新的革命浪潮。正因為如此，那時工人是無精打彩地進行選舉，有些地方甚至抵制選舉，當然是消極抵制。這也就表明消極抵制就是無精打彩和力量衰落的無可懷疑的徵象。正因為如此，現在在革命高漲的氣氛中，工人就拋棄了鬆懈的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態度，而以極大的興趣去參加選舉。不僅如此，工人還為選舉進行了鬥爭，雖然警察施盡詭計，橫加阻撓，他們還是用反對『解釋』的大規模罷工來爭取選舉權，並且爭得了選舉權。這是政治上的麻木狀態已成過去，革命已由停滯狀態向前推進的無可懷疑的徵象。固然，新的革命浪潮還沒有強大到可以提出像政治總罷工那樣的問題。然而它的力量已經強大到可以在一些地方衝破『解釋』的羅網，使選舉工作趨於活躍，組織無產階級的力量，並對羣衆進行政治教育了。

一 工人選民團

一 爲選舉而鬥爭

應當指出，罷工運動是我黨中央委員會代表和彼得堡委員會發起的。十月四日夜晚，即選舉覆選人的前夜，我們聽說最大工廠（普梯洛夫等工廠）的初選人受到縣選舉委員會的『解釋』。一小時後，彼得堡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的代表（三三）一起舉行會議，會上擬定了覆選人的新名單，通過了罷工一天以示抗議的決議。當夜，普梯洛夫工廠的社會民主黨工廠小組開會，接受彼得堡委員會的決議。五日，普梯洛夫工廠開始罷工。是全廠罷工。七日（星期日），涅瓦造船廠的社會民主黨工廠小組開會，贊同彼得堡委員會的決議。八日全廠罷工。其他工廠也相繼罷工。罷工的不僅有受到『解釋』的企業，而且有沒有受到『解釋』（帕里工廠）以及根據『選舉條例』沒有權利參加工人選民團選舉的一些企業。這是同情的罷工。到處都是革命的歌聲和遊行示威……十月八日深夜聽說省選舉委員會宣佈覆選人的選舉無效，撤銷縣選舉委員會的『解釋』，『恢復』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的『權利』，並吸收更多的企業參加選舉。工人歡慶勝利。工人勝利了。

涅瓦造船廠和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宣佈罷工時所通過的決議是值得注意的：

『我們抗議破壞我們的選舉權利，我們聲明：只有推翻沙皇制度，爭得民主共和國，才能保障工

人的選舉權和真正的選舉自由。」

取消派的「……只有實行國家杜馬普選制才能保障選舉權」的決議被否決了。這兩項決議事先都在社會民主黨各工廠小組中討論過，當看出（例如在涅瓦造船廠的小組中）取消派的決議得不到同情時，擁護這個決議的人就答應在羣衆大會上不把它向非黨羣衆提出，而支持黨小組所通過的決議。應該指出，他們是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的，這是他們的光榮。但是反取消派也報之以同樣的忠誠，使古德柯夫當選爲初選人，因爲反取消派在工廠中佔多數，本來是可以「搞垮」他的。假若「光綫報」稍有一點這樣的責任感，那就好了。「光綫報」對於工廠裏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會描寫得那麼好，可是對涅瓦造船廠的上述決議却默不作聲，而且還歪曲了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的決議。

這樣，工人爲選舉進行了鬥爭，並且爭得了選舉。讓那些在涅瓦造船廠中反對選舉而一無所成的彼得堡社會革命黨人從這裏取得教訓吧。

工人是在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下爲選舉而鬥爭的。讓那些「局部改良」的信徒、「光綫報」的取消派從這裏取得教訓吧。

二 給代表的委託書

反對「解釋」的罷工還沒有停止，初選人代表大會就召開了。本來就料到彼得堡委員會所擬訂的而爲彼得堡各大工廠（普梯洛夫工廠、涅瓦造船廠、帕里工廠）所贊同的委託書會被初選人通過。果

然，委託書以壓倒的多數被通過了，只有極少數的取消派棄權。這些取消派阻礙投票的企圖受到了『不要搗亂！』的呵斥。

初選人給代表的委託書中談到『一九〇五年的任務』，說這些任務『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說俄國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使這些任務必然會得到解決』。工人和革命農民不願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的妥協政策，要為推翻沙皇制度而進行鬥爭（這一鬥爭的領袖只能是無產階級），——照委託書所說的，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一九〇五年的任務（見刊載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十八、二十九兩號合刊上的『委託書』）。

可見這絕不是自由主義取消派的『重新審查第三屆杜馬的土地決議』或『普選國家杜馬』（見取消派的綱領）（二三頁）。

彼得堡的工人仍然忠於我黨的革命傳統。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口號，也只有這些口號，才得到了初選人代表大會的承認。在大會上左右全局的是非黨分子（八十二個初選人中有四十一個是『一般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非黨分子），既然彼得堡委員會的委託書在這樣的大會上也通過，那末這就是說，彼得堡委員會的口號在工人階級的情感和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

取消派怎樣對待這一切呢？如果他們相信自己的觀點而且政治道德也不太壞的話，他們就會提出自己的委託書，進行反對我們的委託書的公開鬥爭，或者在遭受失敗以後從名單上刪去自己的候選人。他們既然提出了自己的覆選人的候選人名單來和反取消派的名單相對抗，為什麼不也公開地

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委託書呢？在反取消派的委託書通過以後，他們爲什麼不開誠佈公地聲明，他們是反對委託書的，決不能作爲委託書未來的維護者而當選；並且他們爲什麼不聲明，他們將撤銷自己的候選人，以便騰出位置讓給贊成委託書的人呢？要知道這是起碼的政治道德。取消派所以不談委託書，也許是因爲問題沒有充分展開辯論，而在代表大會上問題是由非黨分子投票決定的緣故吧？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爲什麼他們不服從二十六個社會民主黨初選人的決議呢？這些人會在初選人代表大會開幕前幾天秘密集會，經過討論以後通過反取消派的綱領（以十六票對九票的多數通過，一票棄權），並且取消派的首領和他們的初選人也參加了這個大會。取消派既把整個初選人代表大會的委託書踐踏了，又把二十六個社會民主黨初選人的意志踐踏了，他們究竟有什麼高尚想法呢？顯然這裏只能有一個想法：跟反取消派搗亂，『無論如何』要把自己人弄進去。但是問題的奧妙就在這裏：如果取消派還進行公開鬥爭，他們的同黨就連一個也選不上，因爲大家都明白取消派的『重新審查第三屆杜馬的土地決議』在初選人中是得不到同情的。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自己的旗幟捲起來，假裝贊成委託書，聲明『實際上我們所贊成的也差不多是這樣的委託書』，其實却是『無論如何』要把自己人弄進去。他們就是這樣做的。取消派這樣一做，也就是把自己歸入政治破產者之列而自認失敗了。

但是，迫使敵人捲起他的旗幟就是迫使他承認自己的旗幟不中用，也就是迫使他承認他的對方在思想上是優越的，——這就等於取得了道義上的勝利。

真是『怪事』；取消派有『廣大的工人政黨』，反取消派只有『乾癆的小組』，而『狹隘的小組』居然戰勝了『廣大的政黨』！

世界上真是無奇不有！……

三 假統一和代表的選舉

資產階級外交家在準備戰爭的時候，他們就開始高喊『和平』和『友好關係』。如果有哪一個外交部大臣開始爲『和平會議』奔走呼號，那末你就應當知道『他的政府』已經定購了新的無畏艦和單翼飛機。外交家的言行應當不一致，否則他還算什麼外交家呢？說話是一回事，行動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好話是掩盖壞事的假面具。真誠的外交家就是乾燥的水，木質的鐵。

對取消派及其關於統一的假叫喊也應當這樣說。不久以前，贊成黨內統一的普列漢諾夫同志關於取消派代表會議⁽²⁾的決議會寫道：『十里以外就聞到他們的外交氣味。』後來同一位普列漢諾夫同志又把他們的代表會議稱爲『分裂的』會議。更直截了當地說，取消派是用外交式的叫喊統一來欺騙工人的，因爲他們一面在談論統一，一面却在製造分裂。並且取消派確實是社會民主黨裏的外交家，他們用統一的好話來掩盖他們製造分裂的壞事。取消派爲統一而奔走呼號的時候，你就應當知道他們已經爲分裂而把統一踐踏了。

彼得堡的選舉就直接證明了這一點。

和布爾什維克X討論這個提議的取消派Y（必要時，在保守必要秘密的條件下，我們可以說出雙方談判人的名字）^{二五}在徵求了自己一夥人的意見以後回答說：「抽籤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們的覆選人要受我們領導集團的決定的約束。」

取消派先生們，試反駁反駁我們的這段話看！

違背大多數社會民主黨初選人的意志，違背初選人代表大會大多數人的意志，拒絕抽籤，拒絕提出共同的杜馬候選人，這一切都是爲了統一，取消派先生們，你們的「統一」也太稀奇古怪了！

然而取消派的分裂政策並不是什麼新花樣。早從一九〇八年起他們就鼓吹取消秘密的黨了。取消派在彼得堡選舉中的胡作非爲就是他們的舊分裂政策的繼續。

有人說，托洛茨基以其「統一」運動給取消派的舊「事業」注入了「新血液」。這是不對的。雖然托洛茨基作了「英勇的」努力和「來勢洶洶的威脅」，但他到底不過是一個愛吵愛嚷的假裝的大力士罷了，因爲他五年來的「工作」，除了取消派，就沒有能夠團結任何一個人。新的吵嚷——舊的勾當！

我們回過來再談談選舉。取消派拒絕抽籤後，他們所能指望的只有一點，就是指望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偏愛取消派！爲了打破這個如意算盤，彼得堡委員會只好發出指示，讓全體覆選人參加競選，因爲取消派方面還有「動搖分子」（蘇達柯夫），而且他們根本沒有好好團結的組織。反取消派的全體覆選人執行了彼得堡委員會的指示，參加了競選。於是取消派的如意算盤落了空！並不是反取消派方面，而是取消派的覆選人中間發生了渙散現象，他們違反自己「集團」的決議，爭

先恐後地參加競選。值得奇怪的倒不是古德柯夫同意巴達也夫作候選人（古德柯夫所在的那個工廠通過的反取消派的委託書給古德柯夫以很大的壓力！），而是取消派彼得羅夫以及跟在他後面的古德柯夫本人在巴達也夫當選之後，仍舊參加了競選。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取消派來說，統一就是掩蓋他們分裂政策的假面具，就是他們想不顧彼得堡社會民主黨和無產階級的意志而騎着走進杜馬的寶駒。

二 城市選民團

連納慘案和工人中間的一般活躍氣象對於第二選民團的選民並不是沒有影響的。城市居民的民主階層大大地左傾了。如果說五年以前，在革命失敗之後，他們「埋葬了」一九〇五年的理想，那末現在，在羣衆性的罷工以後，舊的理想又開始復活了。立憲民主黨人的兩面政策已造成了一定的不滿情緒，這是立憲民主黨人自己不能不覺察到的。

另一方面，十月黨人「有負」大商人和大廠主的厚望。杜馬中出現了缺額，這也是立憲民主黨人不能不覺察到的。

於是立憲民主黨人在今年五月間便決定玩兩條戰綫的把戲。不是作鬥爭，而是玩把戲。

立憲民主黨人在兩個不同的選民團中所進行的競選運動之所以有不能不使選民驚奇的兩面性，

原因就在這裏。

和立憲民主黨人爭取對民主階層的影響的鬥爭成爲社會民主黨競選運動的中心了。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還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這是布爾什維克的『公式』，取消派多年來一直絕望地反對這個『公式』，現在他們却不得不把它當做顯而易見的和必不可免的切身需要來服從了。

在第二選民團中的勝利取決於民主階層的行動，這些階層按地位來說是民主的，但它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利益。這些階層將跟着誰走，跟着社會民主黨走呢，還是跟着立憲民主黨走？當時也有過第三個陣營，就是右派和十月黨人，但是關於『黑幫的危險』是沒有必要認真來談的，因爲很明顯，右派能够搜羅到的選票爲數很少。『不要嚇唬資產階級』的論調雖然有過（見『涅瓦呼聲報』二三〇所載弗·德·的文章），但是這只會引人發笑，因爲很明顯，社會民主黨不僅要『嚇唬』，而且要從陣地上打倒這個由其辯護士——立憲民主黨人爲代表的資產階級。

是社會民主黨掌握領導權還是立憲民主黨掌握領導權，——實際生活本身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由此可見，社會民主黨在整個運動進程中必須特別團結。

正因爲如此，彼得堡委員會的選舉委員會和另一個由孟什維克與個別取消派分子組成的委員會取得協議。關於人選的協議，有一個必需的條件，就是在進行競選宣傳的充分自由下，『凡其名字或活動和反黨鬥爭有關的人不得列入』（摘自談判『記錄』）杜馬候選人的名單。反取消派方面要求把

「其名字或活動和反黨鬥爭有關」的兩位彼得堡著名的取消派阿布×××和列×××除名之後，才得以開出第二選民團社會民主黨候選人的著名名單。爲了說明「統一的贊成者」的特點，這裏不妨指出他們在梯弗里斯選出齊赫澤以後，堅決拒絕前三屆杜馬社會民主黨代表坡克羅夫斯基代替他作候選人，並且以另提平行的候選人名單和破壞運動相威脅。

但是，「有進行競選宣傳的自由」這個保留條件，大概是多餘的，因爲運動的進程昭然若揭地表明，在對立憲民主黨的鬥爭中，除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即布爾什維克的競選宣傳運動以外，任何其他競選宣傳運動都不能有什麼結果。社會民主黨的彼得堡發言人和候選人所作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對抗「新的議會鬥爭方法」的「舊的鬥爭方法」、「第二次運動」以及「立憲民主黨責任內閣的口號不適用」等演說，誰不記得呢？而取消派所作的「不要分裂反對派」、「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左傾了」、「對這一資產階級『施以壓力』等等哀號又到哪裏去了呢？而『光綫報』中的取消派分子在進行反立憲民主黨的鼓動時有時甚至過分地『責罵』並『恐嚇』立憲民主黨人，——難道這一切不是證明實際生活本身甚至也通過『小兒的嘴』說出真理嗎？

而唐恩、馬爾托夫和其他反對「責罵立憲民主黨人」的分子的有原則的良心又到哪裏去了呢？

取消派的「廣大的工人政黨」在和「地下小組」的鬥爭中又一次遭到了失敗。請想一想：「廣大的工人（？）政黨」却做了小而又小的「小組」的俘虜！怪事……

三 結 論

從上面所說的首先可以明白，說選舉中只有兩個陣營即贊成六三政制的陣營和反對六三政制的陣營，這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在選舉中進行活動的不是兩個陣營，而是三個陣營，即革命的陣營（社會民主黨人）、反革命的陣營（右派）和給革命助威的妥協者的陣營（立憲民主黨人）。至於什麼反對反動勢力的『統一反對派』，那是根本沒有的。

其次，選舉說明，兩個極端陣營之間的界限將更加分明，中間陣營將因此分化，使那些抱有民主思想的人解放出來跑到社會民主黨方面去，而中間陣營本身則漸漸地轉到反革命方面去。

因此，說什麼來自上面的『改革』，說什麼『爆發』的不可能以及說什麼俄國在『憲法』保護下的『有機發展』就都失去了任何基礎。事件的進程必然會引向新的革命，不管拉林之流及其他取消派怎麼說，我們定會經歷『新的一九〇五年』。

最後，選舉說明，無產階級，也只有無產階級才負有使命去領導即將到來的革命，逐步把俄國一切渴望祖國從奴役下解放出來的誠實的、民主的人們集合在自己的周圍。只要看一下工人選民團的選舉進程，只要看一下彼得堡工人在初選人的委託書中所明白表示的同情，只要看一下他們為爭取選舉而進行的革命鬥爭就能相信這一點了。

根據這一切可以斷言，彼得堡的選舉完全證實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口號是正確的。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生氣勃勃而強大有力，這是第一個結論。
取消派在政治上破產，這是第二個結論。

載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十號

署名：科·斯大林

按報上原文刊印

在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上

(高加索來信)

在使取消派代表會議流芳百世的一系列決議中，關於「民族文化自治」的決議也佔着相當重要的位置。

請看這項決議：

「據高加索代表團報告，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各地組織的最近一次代表會議和這些組織的機關刊物都表達了高加索同志們的一個意見，即必須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代表會議在聽取了這個報告以後，對這一要求的實質不表示意見，認定對黨綱中承認每一民族均有自決權的條文這樣解釋和黨綱原意並不抵觸，並希望把民族問題列入即將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的議程。」

這個決議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表現了取消派對已經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顯出機會主義的模稜態度，它之所以重要，還在於這個決議簡直是字字珠玉。

例如，決議中聲明說，代表會議「對這一要求的實質不表示意見」，但加以「認定」並作出決定，這是多麼珍貴？要知道只有在輕歌劇裏才能這樣作出「決定」！

在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上

又如這樣的話，『對黨綱中承認每一民族均有自決權的條文這樣解釋和黨綱原意並不抵觸』。真是耐人尋味！黨綱的這一條（第九條）說到各民族的自由、各民族自由發展的權利和黨反對任何民族壓迫的責任。一般說來，按照這一條的原意，民族權利是不應當受到限制的，是可以一直擴大到實行自治制和聯邦制，甚至實行分離制的。這是不是說，某一民族，不管它怎樣決定自己的命運，決定擁護中央集權制或決定實行分離制，對黨來說都是無所謂的，都是同樣好的呢？這是不是說，僅僅根據一項抽象的民族權利，『對這一要求的實質不表示意見』，就可以建議（哪怕是間接地）一些民族實行自治制，另一些民族實行聯邦制，再一些民族實行分離制呢？各民族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但這不是說，黨就不應當影響民族的意志去作最符合於無產階級利益的決定呢？黨贊成宗教信仰自由，贊成人們有信奉任何宗教的權利。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黨將擁護波蘭的天主教、格魯吉亞的正教、阿爾明尼亞的格列高里教^①而不和這一類的世界觀作鬥爭呢？……而且黨綱第九條和民族文化自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它們可能互相『抵觸』，就像海奧勃斯的金字塔^②和臭名遠揚的取消派代表會議可能互相『抵觸』一樣，這難道不是不言而喻的嗎？

可是要知道代表會議正是用這種圓滑的手腕去『解決』問題的。

在取消派上述決議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高加索取消派在思想上的混亂，他們背棄了高加索舊日的國際主義旗幟而使代表會議通過了這項決議。

高加索取消派轉到民族主義方面去並不是偶然的。取消黨的傳統，這是他們早已開始了的。廢

除最低綱領的『社會部分』，取消『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見『辯論專頁』第二號（二七）），宣佈秘密的黨是附屬合法組織的輔助組織（見『日誌』第九期（二六）），這一切都是盡人皆知的事情。現在又輪到民族問題上來了。

高加索組織從剛產生時（九十年代初）起就具有嚴格的國際主義性質。格魯吉亞的、俄羅斯的、阿爾明尼亞的和回民的工人結成統一的組織，同心協力對敵鬥爭，——這就是當時黨的生活情形……

一九〇三年，給高加索聯盟奠定了基礎的高加索（實際上是南高加索）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大會），再次宣佈按國際主義精神建立組織的原則是唯一正確的原則。從那時起，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就在反對民族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了。格魯吉亞的社會民主黨人同『本族的』民族主義者，同民族民主主義者和聯邦主義者進行了鬥爭；阿爾明尼亞的社會民主黨人同『本族的』達什納克黨人進行了鬥爭；回民社會民主黨人同大伊斯蘭主義者（二五）進行了鬥爭。而且高加索社會民主黨在反對這些分子的鬥爭中不分黨內派別，擴大並鞏固了自己的組織……一九〇六年，在高加索區域代表會議上第一次冒出個民族文化自治的問題來。一小撮庫泰依斯人把它提出來並要求作正面的決定。照常時的說法，問題『被斷然否決了』，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就是以柯斯特羅夫和本文作者為代表的兩派都同樣激烈地反對它。當時作了決定：所謂『高加索區域自治』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最好辦法，是最符合在鬥爭中聯合起來的高加索無產階級的利益的。是的，一九〇六年的情況就是這樣。在以後的幾次代表會議上都曾一再申述此項決議，無論是孟什維克的或布爾什維克的、公開的或秘密的高

加索報刊都維護它並廣泛地傳播它……

可是，到了一九一二年，『原來』『我們』也需要民族文化自治了，當然（當然！）是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發生什麼變化了嗎？也許是高加索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覺悟降低了吧？如果是那樣的話，那末在工人之間樹立民族組織的和『文化的』壁壘是最不明智的了！也許是高加索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吧？如果是那樣的話，那末又該怎樣稱呼那些人爲地豎起並鞏固正在瓦解着的誰也不需要的壁壘的所謂『社會主義者』呢？……那末，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是農民的庫泰依斯拖走了梯弗里斯的『社會民主黨的十月黨人』。高加索取消派的活動今後將由被黷武的民族主義所嚇倒的庫泰依斯農民來支配。高加索的取消派擋不住民族主義的浪潮，他們已經失掉久經考驗的國際主義的旗幟，而且……去『隨着』民族主義的『浪潮』起伏，並把最後的財富扔到海裏；『去它的吧，多麼無用的東西。』……

但是，說了第一的人，必然要說第二，因爲一切東西都有自己的邏輯！格魯吉亞、阿爾明尼亞、回民和其他取消派的政黨都將附和高加索取消派所提出的格魯吉亞的、阿爾明尼亞的、回民的（和俄羅斯的？）民族文化自治了。結果就不是共同的組織，而是按民族劃分的單獨組織，可以說就是格魯吉亞的、阿爾明尼亞的和其他的『崩得』。

高加索取消派先生們不正是把民族問題的『解決』引到這個方向去嗎？

好，我們但願他們拿出勇氣，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吧！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使他們相信，高加索組織中的另一部分人，即格魯吉亞、俄羅斯、阿爾明尼亞和回民組織中有黨性的社會民主黨人，將堅決地和民族主義取消派的先生們，和這些背叛了光榮的國際主義旗幟的高加索叛徒們一刀兩斷。

載於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二日（二十五日）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十號

署名：科·斯大·

按報上原文刊印

① 格列高里教會是阿爾明尼亞基督教最早的組織之一，因該教會的創始人和第一個大主教是格列高里，故名格列高里教會。——譯者註。

② 該金字塔是埃及國王海奧勃斯時建築的，故稱海奧勃斯金字塔。——譯者註。

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

(二四〇)

俄國的反革命時期不僅帶來了『雷鳴電閃』，而且帶來了對運動的悲觀失望、對共同力量的懷疑顧慮。從前人們相信『光明的未來』，所以大家不分民族地共同進行鬥爭；共同的問題高於一切！後來人們心中發生了疑問，於是大家開始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裏去；讓各人只靠自己吧！『民族問題』高於一切！

同時國內經濟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九〇五年不是白白過去的：農村中的農奴制殘餘又受到了一次打擊。連年飢荒之後的幾次豐收和接着到來的工業高漲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村中的分化和城市的增長，商業和交通的發展，都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這種情形在邊疆地區尤其顯著。可是這種情形不能不加速俄國各民族內部經濟團結的過程。於是這些民族必然要行動起來……

這一時期所確立的『憲制』也起了喚醒各民族的作用。報紙和一般書刊的增多，出版事業和文化機關的某些自由，人民劇院的發展等等，無疑地都加強了『民族意識』。杜馬及其選舉運動和政治集團給各個民族的活躍造成了新的機會，給各個民族的動員造成了新的廣闊場所。

可是從上層掀起的驕武的民族主義浪潮，『當權人物』用來報復『愛好自由』的邊疆地區的種種

高壓手段，在下層激起了民族主義的逆流，這種民族主義有時變成粗暴的沙文主義。猶太人中錫安主義^(三)的加強，波蘭的沙文主義的增長，韃靼人中大伊斯蘭主義的盛行，阿爾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烏克蘭人中民族主義的加強，一般庸人的反猶太主義的共同傾向，——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民族主義的浪潮日益洶湧地逼來，大有席捲工人羣衆之勢。解放運動愈趨低落，民族主義的花朵就愈加怒放。

在這困難的關頭，社會民主黨負有崇高的使命：給民族主義一個反擊，使羣衆不受一般「時疫」的傳染。因為社會民主黨，而且只有社會民主黨，才能負起這個使命，用久經考驗的國際主義武器，用統一而不可分的階級鬥爭去對抗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浪潮來勢愈洶湧，社會民主黨爭取俄國各民族無產者友愛團結的呼聲就應當愈響亮。各邊疆地區直接接觸到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在這一點上需要特別的堅定性。

然而並非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首先是各邊疆地區的社會民主黨人，都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務。崩得從前強調共同的任務，現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純粹民族主義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過安息日」和「承認行話」當做自己競選綱領中的戰鬥性條文^①。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後塵：一部分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從前會和其餘的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一起否定過「民族文化自治」，現在他們却把它當做

① 見「崩得第九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

迫切的要求提了出來[⊖]。至於取消派代表會議用外交手腕批准民族主義的動搖思想[⊙]就更不用說了。由此可見，俄國社會民主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觀點並不是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都已經明白的。顯然，對於民族問題還必須進行一番認真的和全面的討論。徹底的社會民主黨人應當一致努力消除民族主義的迷霧，不管這種迷霧來自何方。

一 民 族

民族是什麼呢？

民族首先是一個共同體，是由人們組成的確定的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不是種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現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羅馬人、日耳曼人、伊特刺斯坎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等等組成的。法蘭西民族是由高盧人、羅馬人、不列顛人、日耳曼人等等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種族和部落的人們組成的。

總之，民族不是種族的共同體，也不是部落的共同體，而是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

另一方面，居魯士帝國或亞歷山大帝國雖然是歷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種族組成的，但

⊖ 見「八月代表會議的通報」。

⊙ 同上。

無疑地不能稱爲民族。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湊合起來的、內部缺少聯系的集團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勝敗爲轉移的。

總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曇花一現的混合物，而是由人們組成的穩定的共同體。

然而並非任何一個穩定的共同體都是民族。奧國和俄國也是穩定的共同體，但是誰也不稱它們爲民族。民族的共同體和國家的共同體有什麼區別呢？其中一個區別是民族的共同體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國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奧國境內的捷克民族和俄國境內的波蘭民族不能沒有各該民族的共同的語言，而奧國和俄國內部有許多種語言的事實並不妨礙這兩個國家的完整。當然，這裏所指的是民衆的口頭語言，而不是官場的文牘語言。

總之，共同的語言是民族的特徵之一。

當然不是說不同的民族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語言，也不是說凡操着同一語言的人們一定是一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共同的語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語言！沒有一個民族會同時操着幾種不同的語言，但並不是說不能有兩個民族操着同一語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堅人操着同一語言，但他們畢竟不是一個民族。挪威人和丹麥人，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也是如此。

但是，像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堅人雖然有共同的語言，却不是一個民族，這是什麼道理呢？

首先因爲他們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上。只有經過長期不斷的交往，經過人們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來。而長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從前英吉利

人和美利堅人居住在一個地域上，即居住在英國，所以當時是一個民族。後來一部分英吉利人從英國遷移到新的地域，遷移到美洲，於是在這個新的地域上逐漸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堅民族。由於有不同的地域，結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總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徵之一。

但這還不够。單有共同的地域還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還需要有內部的經濟聯系來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結合為一個整體。英國和北美之間沒有這種聯系，所以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發達等等而聯成一個經濟上的整體，那末北美利堅人本身也就不配叫做民族。

就拿格魯吉亞人來說吧。改革時期以前的格魯吉亞人雖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操着同一語言，可是嚴格說來，他們當時還不是一個民族，因為他們被分割成許多彼此隔離的公國，未能過共同的經濟生活，長期互相混戰，彼此破壞，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來自相殘殺。雖然有時某個僥倖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強把各個公國統一起來，然而這種曇花一現的偶然的統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統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農民漠視而分崩離析了。而且在格魯吉亞經濟分散的情況下，也不能不這樣……直到十九世紀後半期格魯吉亞才成為民族，因為當時農奴制度的崩潰和國內經濟生活的發展，交通的發達和資本主義的產生，使格魯吉亞各個區域之間實行了分工，徹底打破了各個公國在經濟上的閉關自守狀態，而把這些公國聯成一個整體。

其他一切度過了封建制度階段並發展了資本主義的民族也是如此。

總之，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聯系是民族的特徵之一。

但這還不够。除了上面所說的一切，還必須注意到結合成一個民族的人們在精神形態上的特點。各個民族之所以不同，不僅在於它們的生活條件不同，而且在於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精神形態不同。英吉利人、北美利堅人和愛爾蘭人雖然操着同一語言，但終究是三個不同的民族，他們歷代因生存條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質，在這一點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當然，心理素質本身，或者像人們所說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觀者看來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但它既然表現在一個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點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應忽視的東西了。

不用說，『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生活條件變化的，但它既然存在於每個一定的時期內，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總之，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的特徵之一。

這樣，我們就說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徵。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同時，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法則支配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須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個特徵單獨拿來作為民族的定義都是不夠的。不僅如此，這些特徵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彼此隔離，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語言等等，那末還是不能說他們是一個民族。例如俄國的、加里西亞的、美國的、格魯吉亞的和高加索山區的猶太人就是如此，在我們看來，他們並不是統一的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經濟生活，但是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末他們仍然不是一個民族。例如波羅的海沿岸邊區的日耳曼人和拉脫維亞人就是如此。

最後，挪威人和丹麥人雖然操着同一語言，可是由於缺少其他特徵，他們也就不是一個民族。只有一切特徵都具備時才算是一個民族。

也許有人會覺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徵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質的特徵，其他一切特徵其實都是民族發展的條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徵。例如有名的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民族問題理論家石普林格爾，特別是鮑威爾，就持有這樣的觀點。

現在我們就來考察一下他們的民族理論吧。

在石普林格爾看來，『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語言相同的人們的聯盟』。民族是『由一羣現代人組成的、和「地域」無關的文化共同體』。(着重號是我們加的)。

總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語言相同的人們的『聯盟』，不管他們彼此怎樣隔離，不管他們住在什麼

地方。

鮑威爾却扯得更遠了。

他問道：「什麼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種把人們聯合為民族的語言共同體呢？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操着同一語言，却不是統一的民族；猶太人並沒有共同的語言，却是一個民族。」^①那末，民族究竟是什麼呢？

「民族就是相對的性格共同體。」^②然而性格（這裏講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麼呢？

民族性格是「一族人區別於另一族人的種種特徵的總和，是一個民族區別於另一個民族的生理特質和精神特質的總和」^③。

鮑威爾當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此他補充說：

「人們的性格無非是由他們的命運決定的」……「民族無非是命運的共同體」，而共同的命運又是「由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或分配自己的勞動產品時所處的情況決定的」^④。

①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一九〇九年「公益」出版社版第四十三頁。

②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九年「鐮刀」出版社版第一頁至第二頁。

③ 同上，第六頁。

④ 同上，第二頁。

於是，我們就得出如鮑威爾所說的最「完備的」民族的定義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運的基礎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們的全部總和。』^⑤

總之，就是在共同命運的基礎上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却並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語言以及經濟生活相聯系。

這樣一來，試問民族還剩下什麼東西呢？經濟上彼此隔離、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語言的人們，還談得上什麼民族共同體呢？

鮑威爾說猶太人是個民族，雖然「他們並沒有共同的語言」^⑥，可是，例如格魯吉亞的、達格斯坦的、俄國的和美國的猶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絕，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並且操着不同的語言，他們還談得上什麼「共同命運」和民族聯系呢？

這些猶太人無疑地和格魯吉亞人、達格斯坦人、俄羅斯人以及美利堅人過着共同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薰陶，這就不能不給他們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們中間還有什麼相同之處，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殘餘。這一切是用不着懷疑的。可是，怎能認真地說，僵化的宗教儀式和日漸磨滅的心理殘餘會比這些猶太人所處的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環境更

⑤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九年「鐮刀」出版社版第二十四頁至第二十五頁。

⑥ 同上，第一三九頁。

⑦ 同上，第二頁。

強烈地影響到他們的『命運』呢？要知道，只有在這樣的假定下，才可以說猶太人一般地是個統一的民族。

那末，鮑威爾的所謂民族和唯靈論者的所謂神秘的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麼區別呢？

鮑威爾在民族『特點』（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條件』之間劃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們彼此隔離開來。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條件的反映，不是從周圍環境得來的印象的結晶，那又是什麼呢？怎能僅限於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產生的根源割斷分開呢？

其次，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當北美還叫做『新英吉利』的時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堅民族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當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區別，因為北美利堅人是從英國遷移過去的，他們帶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語言以外，還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雖然他們在新環境的影響下大概已開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們當然不會很快就喪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當時他們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雖然還有或多或少的共同點，但他們究竟已經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個民族了！顯然，當時『新英吉利』民族不同於英吉利民族的地方並不是特別的民族性格，或者與其說是特別的民族性格，倒不如說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特別環境和生活條件。

由此可見，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唯一的民族特徵，而只有各種特徵的總和。在把各個民族拿來作比較的時候，顯得比較突出的有時是這個特徵（民族性格），有時是那個特徵（語言），有時又是另一個特徵（地域、經濟條件）。民族是由所有這些特徵結合而成的。

鮑威爾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個東西，這樣就使民族脫離了它的根基，把它變成了不見形跡的獨立自在的力量。結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動着的民族，而是一種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的東西。試問，——我重說一遍，——像格魯吉亞的、達格斯坦的、俄國的、美國的和其他地方的猶太人，彼此語言不通（他們操着不同的語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從來不能見面，無論和平時期或戰爭時期都不會共同行動，這算什麼猶太民族呢？！

不，社會民主黨不是爲這種紙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綱領的。它只能承認那些活動着的、運動着的、因而使人們不能不承認的真正的民族。

鮑威爾顯然把民族這一歷史範疇和部落這一種誌範疇混淆起來了。

不過，鮑威爾本人大概也覺得自己的立論是有弱點的。他在自己那本書的開頭雖然堅決地說猶太人是一個民族^①，但他在該書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說「資本主義社會根本就不讓他們（猶太人）保全爲一個民族」^②而使他們受其他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來是「猶太人沒有單獨的居住地區」^③，例如捷克人却有這樣的地區，因此，鮑威爾認爲捷克人一定能保全爲一個民族。簡言之，原因就在於沒有地域。

①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九年「鐮刀」出版社版第二頁。

② 同上，第三八九頁。

③ 同上，第三八八頁。

鮑威爾如此推論，原想證明民族自治不能成爲猶太工人的要求^①，他這樣一來却無意中駁倒了他自己那種否認共同地域是民族特徵之一的理論。

可是鮑威爾扯得很遠。他在自己那本書的開頭堅決地說：『猶太人並沒有共同的語言，却是一個民族。』^②可是他剛剛寫到第一百三十頁就改變了陣綫而同樣堅決地說：『無疑地，沒有共同的語言，就不可能有什麼民族。』^③（着重號是我們加的）

鮑威爾在這裏原想證明『語言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工具』^④，但他同時無意中證明了他不想證明的東西，證明了自己那種否認共同語言的意義的民族理論是站不住腳的。

用唯心論的針線縫成的理論就這樣不攻自破了。

二 民族運動

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封建制度消滅和資

①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九年『鐮刀』出版社版第三九六頁。

② 同上，第二頁。

③ 同上，第三〇頁。

④ 同上，第一三〇頁。

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同時就是人們形成爲民族的過程。例如西歐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資本主義打破封建割據局面而勝利前進時形成爲民族的。

但是，西歐各民族形成的過程同時就是它們變爲獨立的民族國家的過程。英吉利、法蘭西等民族同時就是英吉利等國家。處於這一過程以外的愛爾蘭並不能改變一般的情況。

東歐的情形却有些不同。當西歐各民族發展成國家的時候，東歐却形成了多民族的國家，即由幾個民族組成的國家。奧匈帝國和俄國就是這樣的國家。在奧國，當時政治上最爲發展的是日耳曼人，於是他們就負起了把奧國各民族統一成一個國家的任務。在匈牙利，最能適應國家組織性的是匈牙利各民族的中堅——馬札爾人，於是他們成了匈牙利的統一者。在俄國，是以歷史上形成的強大而有組織的貴族軍事官僚爲首的大俄羅斯人擔負了統一民族的使命。

東歐的情形就是如此。

只有在封建制度還沒有消滅、資本主義還不大發展、被排擠到次要地位的民族在經濟上還沒有結合爲一個整體的條件下，才能有這種特殊的國家形成方式。

可是資本主義在東歐各國也開始發展起來了。商業和交通日益發達，大城市相繼出現，各民族在經濟上逐漸團結起來。資本主義闖進了被排擠的民族的不靜生活中，驚醒了它們，使它們動作起來。報刊和劇院的發展，萊哈斯拉特（奧國國會）和杜馬（俄國國會）的活動，都加強了『民族意識』。新興的知識分子充滿了『民族思想』，並在這方面進行活動……

但是那些覺醒起來要求獨立生活的被排擠的民族已不能形成獨立的民族國家了，因為它們在自己的道路上碰到了早已居於國家領導地位的統治民族中的領導階層極其強烈的反對。它們來遲了！……

奧國的捷克人和波蘭人等等，匈牙利的克羅地亞人等等，俄國的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和阿爾明尼亞人等等就是這樣形成民族的。在西歐（愛爾蘭）是例外的，在東歐却成了通例。

西歐的愛爾蘭用民族運動回答了這種例外的情形，東歐已覺醒的各民族也不免要這樣回答。推動東歐各個年輕民族去進行鬥爭的情況就是這樣形成的。

其實，鬥爭並不是在整個民族和整個民族之間，而是在統治民族的和被排擠民族的統治階級之間開始並激烈起來的。通常是被壓迫民族中的城市小資產階級起來反對統治民族中的大資產階級（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或是被壓迫民族中的農村資產階級起來反對統治民族中的地主（波蘭的烏克蘭人），或是被壓迫民族中的整個「民族」資產階級起來反對統治民族中的執政貴族（俄國的波蘭、立陶宛、烏克蘭）。

資產階級是主角。

在年輕的資產階級看來，市場是基本問題。它的目的是銷售自己的商品，戰勝和自己競爭的異族資產階級。因此，它力求保證自己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場。市場是資產階級學習民族主義的第一

個學校。

但問題通常不僅限於市場。統治民族中的半封建半資產階級的官僚常用他們「只捉不放」^①的方
法干預鬥爭。於是統治民族中的資產階級，不論小資產階級或大資產階級，就有可能「更迅速地」「更
堅決地」制服自己的競爭者。「力量」既日趨統一，限制「異族」資產階級的一連串辦法以至高壓手段
也就開始實行起來了。鬥爭由經濟範圍轉入政治範圍。限制遷徙自由，限制語言使用，限制選舉權，
減少學校，限制宗教活動等等辦法紛紛加到「競爭者」的頭上。當然，採取這種辦法不僅爲了追求統
治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可以說是爲了追求執政官僚們特殊集團的目的。但結果都是一樣：
資產階級和官僚在這種場合總是聯合一致的，不論奧匈帝國或俄國，情形都是如此。

被壓迫民族中受各方面排擠的資產階級自然要行動起來。它向「下層同胞」呼籲，開始高呼「祖
國」，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爲着……「祖國」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間給自己招募軍隊。
「下層」對這種號召並非始終不理，有時也在資產階級旗幟的周圍集合起來，因爲上層的高壓手段也
觸犯了他們，引起他們的不滿。

民族運動就是這樣開始的。

民族運動的力量決定於該民族廣大階層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參加運動的程度。

無產階級是否站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旗幟下面，這要看階級矛盾的發展程度，要看無產階級
的覺悟性和組織性。覺悟的無產階級有自己的久經考驗的旗幟，他們用不着站到資產階級的旗幟下

面去。

至於農民是否參加民族運動，這首先要看高壓手段的性質。如果高壓手段觸犯到『土地』利益，像在愛爾蘭發生過的情形那樣，那末廣大農民羣衆就會立刻站到民族運動的旗幟下面去。

另一方面，在格魯吉亞沒有較爲嚴重的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這首先是因為那裏沒有使羣衆產生這種民族主義的俄羅斯地主或俄羅斯大資產階級。在格魯吉亞有反阿爾明尼亞的民族主義，但這是因爲那裏還有阿爾明尼亞的大資產階級在打擊着尚未鞏固的格魯吉亞小資產階級，推動它走向反阿爾明尼亞的民族主義。

以這些因素爲轉移，民族運動可能具有羣衆性而愈益擴展起來（愛爾蘭、加里西亞），也可能變成一連串的小衝突，流爲無謂的爭吵和爭取用本族文字寫招牌的『鬥爭』（波希米亞的某些小城市）。

當然，民族運動的內容決不會到處一樣，它完全決定於運動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要求。愛爾蘭的運動具有土地問題的性質，波希米亞的運動帶着『語言問題的』性質，這裏要求公民權利平等和信教自由，那裏要求任用『自己的』官吏或組織自己的議會。在各種不同的要求中往往透露出民族所具有的各種不同的特徵（語言、地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鮑威爾所說的包羅萬象的『民族性格』這一要求。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爲『民族性格』就其本身來說是不可捉摸的，石特拉塞爾說得對，『政治家對它是奈何不得的』^①。

民族運動的形式和性質大致如此。

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民族鬥爭是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有時資產階級也能把無產階級吸引到民族運動中去，那時民族鬥爭表面上就會帶着「全民的」性質，然而這只是表面上如此。實質上，這個鬥爭始終是資產階級的，主要是有利和適合於資產階級的。

但決不能因此說無產階級不應當反對民族壓迫政策。

限制遷徙自由，剝奪選舉權，限制語言使用，減少學校以及其他種種高壓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損害並不比資產階級所受到的少，甚至還要多。這種情形只能阻礙被壓迫民族內無產階級精神力量的自由發展。當韃靼工人或猶太工人還被禁止用本族語言開會和演講，還被禁止入學讀書的時候，自然根本談不到他們的精神才智的充分發展。

然而民族主義的高壓政策對於無產階級的事業還有另一方面的危險。它能轉移廣大階層的視線，使之漠視社會問題，漠視階級鬥爭問題而只注意民族問題，注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共同」問題。這就會為進行所謂「利益協調」的欺騙宣傳、抹殺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在精神上束縛工人打下有利的基礎，因而嚴重地阻礙各族工人的團結事業。如果說很大一部分波蘭工人至今還受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精神束縛，如果說他們至今還站在國際工人運動之外，那末這主要是因為「當權人物」歷來的反波蘭政策為這種束縛打下了基礎，加重了工人們掙脫這種束縛的困難。

① 昆石特拉泰爾《Der Arbeiter und die Nation》（「工人和民族」）一九二二年版第三十三頁。

但是高壓政策並不以此爲限。它往往由壓迫的『制度』轉到挑撥各民族互相殘殺的『制度』，轉到屠殺和蹂躪的『制度』。當然，後者並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實現的，但是在可能實現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碼自由的條件下，它往往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使工人的團結事業有淹沒在血淚中的危險。高加索和南俄有過不少例子。『分而治之』，——這就是挑撥政策的目的。這樣的政策如果得逞，就會給無產階級帶來莫大的災害，使國內各族工人的團結事業受到最大的阻礙。

但工人所關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匯成一支統一的國際主義大軍，使他們迅速地徹底擺脫資產階級的精神束縛，使任何一個民族的兄弟們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發展。

因此，工人現在反對，將來還要反對從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政策，同樣要反對各種各樣的挑撥政策。

因此，各國社會民主黨主張民族自決權。

自決權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干涉這個民族的生活，毀壞它的學校和其他機關，破壞它的風俗和習慣，限制它的語言，削減它的權利。

這當然不是說社會民主黨要支持一個民族的一切風俗和機關。它反對用暴力壓迫民族，僅僅維護由民族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同時要進行鼓動，反對該民族的一切有害的風俗和機關，使該民族的勞動階層能夠擺脫這些有害的東西。

自決權就是民族能按照自己的願望去處理自己的事情。它有權按自治原則安排自己的生活。它

有權和其他民族建立聯邦關係。它有權完全分離出去。每個民族都是自主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這當然不是說社會民主黨將維護民族的任何要求。一個民族甚至有恢復舊制度的權利，但這還不是說社會民主黨將贊同該民族某個機關的這種決定。社會民主黨是保護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民族則是由不同的階級組成的，因此，社會民主黨的義務和民族的權利是兩種不同的東西。

社會民主黨為民族自決權而鬥爭，目的在消滅民族壓迫政策，使這種政策沒有立足的餘地，以便消除民族間的鬥爭，使它緩和下去，使它減到最小限度。

這就是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策和資產階級力求加劇並擴大民族鬥爭、繼續並加緊民族運動的政策在本質上的區別。

正因為如此，覺悟的無產階級就不能站到資產階級的「民族」旗幟下面去。

正因為如此，鮑威爾提出的所謂「進化的民族的」政策就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政策。鮑威爾企圖把自己的「進化的民族的」政策和「現代工人階級的」政策等量齊觀[⊖]，就是企圖使工人的階級鬥爭適應民族鬥爭。

民族運動實質上既是資產階級的運動，它的命運自然就和資產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只有資產階級滅亡，民族運動才會徹底滅亡。只有在社會主義世界裏，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來。可是把民

⊖ 見鮑威爾那本書第一六六頁。

族鬥爭減到最小限度，從根本上消除它，盡量使它無害於無產階級，這在資本主義範圍內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國的例子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爲此就必須使國家民主化，使各個民族有自由發展的可能。

三 問題的提法

民族有權自由決定自己的命運。它有權隨意處理自己的事情，當然，也不能侵犯其他民族的權利。這是無可爭辯的。

但是，如果注意到民族中多數人的利益，首先是無產階級的利益，那末民族究竟應當怎樣處理自己的事情，民族未來的憲法究竟應當採取怎樣的^{形式}呢？

民族有權按自治原則處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權分離。但這並不是說它在任何條件下都應當這樣做，也不是說自治制或分離制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利於該民族，即有利於該民族中的多數，有利於勞動階層。例如，南高加索的韃靼民族儘可召開本族的議會，並在本族地主和毛拉^①的擺佈之下恢復他們的舊制度，儘可決定從俄國分離出去。根據民族自決的條文，他們是完全有權這樣做的。但這對韃靼民族的勞動階層是否有利呢？社會民主黨能否漠不關心，聽任地主和毛拉領着羣衆去解決民族問題呢？難道社會民主黨不應當干預這種事情，不應當給民族意志以一定的影響嗎？難道它不應當

提出最有利於韃靼羣衆的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嗎？

但是如何解決才最符合於勞動羣衆的利益呢？自治制，聯邦制，還是分離制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要根據該民族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解決的。

不僅如此，條件也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樣是變化着的，因而在某個時期是正確的解決方法，在另一個時期也許是完全不可以採納的。

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曾主張俄屬波蘭分離，他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問題是要把較高的文化從破壞它的那種較低的文化中解放出來。當時這個問題不是單純理論上的問題，不是學院式的問題，而是實踐中、實際生活中的問題……

十九世紀末葉，波蘭馬克思主義者却反對波蘭分離，他們也是正確的，因為近五十年來俄國和波蘭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它們在經濟和文化方面接近起來了。此外，在這個時期，分離問題已由實踐的問題變成至多只能引起國外知識分子注意的學院式的爭論問題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從此就不會出現某種內部和外部的情況，使波蘭分離問題又成爲迫切的問題。由此可見，民族問題只有和發展着的歷史條件聯繫起來看才能得到解決。

某個民族所處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條件便是解決該民族究竟應當怎樣處理自己的事情和它的未來憲法究竟應當採取什麼形式這一問題的唯一關鍵。同時，很可能每個民族解決問題都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如果在什麼地方必須辯證地提出問題，那正是在這個地方，正是在民族問題上。

因此，我們應當堅決反對崩得所創始的那種很流行而又很籠統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我們所指的是有人輕率地拿奧國社會民主黨和南方斯拉夫社會民主黨^①做榜樣，說它們已經解決了民族問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只要抄襲它們的解決方法就行了。同時，他們竟以為凡在奧國是正確的東西，在俄國也是正確的。他們忽略了這方面最重要和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整個俄國的和俄國境內每個民族生活中的具體歷史條件。

例如，請聽聽有名的崩得分子柯索夫斯基的話吧：

『當崩得第四次代表大會討論到這一問題（指民族問題而言。——斯大林註）的原則方面時，代表大會中的一位代表根據南方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決議的精神所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博得了全體的贊同。』^②

結果，『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民族自治。

如此而已！既沒有分析俄國的實際情況，也沒有弄清俄國境內猶太人的生活條件，首先抄襲了南方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解決方法，接着『贊同了』，然後『一致通過了』！崩得分子就是這樣提出並『解決』俄國的民族問題的……

然而奧國和俄國的條件完全不同。因此，奧國社會民主黨一八九九年在布隆代表大會^③上根

① 南方斯拉夫社會民主黨是在奧國南部進行工作的。

② 見柯索夫斯基『民族問題』一九〇七年版第十六頁至第十七頁。

據南方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決議的精神通過民族綱領（固然有一些小小的修正）時，根本就不是俄國式地考慮問題，當然也就不會俄國式地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是問題的提法。主張民族文化自治的奧國理論家、布隆民族綱領和南方斯拉夫社會民主黨的決議的解釋者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是怎樣提出問題的呢？

石普林格爾說：『對於多民族的國家一般能否組成，或具體地說，奧國各民族是否不得不組成一個政治整體這一問題，我們現在不來回答；我們應認為這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在不同意上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人們看來，我們的研究當然是沒有根據的。我們的主题是：這些民族不得不共同生活；什麼樣的法權形式才能使他們生活得最好呢？』（着重號是石普林格爾加的）^①

總之，出發點就是奧地利國家的完整。

鮑威爾所說的也是如此：

『我們的出發點是假定奧國各民族將仍然留在他們現時居住的國家聯盟以內，於是我們就要問，在這個聯盟範圍內，各民族相互間的關係和他們全體對於國家的關係將是怎樣的呢？』^②

又是把奧國的完整列在第一位。

俄國社會民主黨能不能這樣提出問題呢？不，不能。其所以不能，在於它一開始就主張民族自

①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第十四頁。

②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三九九頁。

決，根據這種主張，民族有分離權。

甚至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也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承認俄國社會民主黨不能放棄民族自決的主張。當時哥里德勃拉特說：

『自決權是絲毫不容反對的。如果某一民族爲獨立而鬥爭，那就不要阻攔它；如果波蘭不願和俄國結成「正式婚姻」，那我們就不應該去妨礙它。』

這都是事實。可是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和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出發點不僅不同，而且根本相反。既然如此，還說得上抄襲奧國人的民族綱領嗎？

其次，奧國人是想用微小的改良、緩慢的步驟來實現『民族自由』的。他們提出民族文化自治作爲實際辦法時，完全沒有指望根本的改變，沒有指望他們遠景中所沒有的民主解放運動。然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民族自由』的問題和可能的根本改變聯系在一起，和民主解放運動聯系在一起，他們沒有理由指望改良。這就使俄國各民族可能的命運問題發生根本的變化。

鮑威爾說：『當然很難設想民族自治是靠一個重大的決定，靠大胆的堅決行動就可以實現的。奧地利將逐步走向民族自治，這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過程，是艱苦的鬥爭，由於這種鬥爭，立法和行政事宜將陷於慢性的麻木狀態。不，新的國家法權制度決不是通過一次偉大的立法行動就建立起來的，而是要通過爲各別區域、各別村社而頒佈的許多各別的法律才能實現的。』^①

石普林格爾所說的也是如此。

他寫道：『我清楚地知道這種機關（民族自治機關。——斯大林註）不是一年也不是十年可以建立起來的，單是爲了改組普魯士的行政管理機構就用了很長的時間……普魯士用二十年才完全建立了自己的主要行政機關。因此，請不要以爲我不知道奧地利要用多少時間，要克服多少困難吧。』^①

這一切都是很明確的。但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否不把民族問題和『大胆的堅決行動』聯繫起來呢？他們能否指望局部的改良，指望『許多各別的法律』作爲爭取『民族自由』的手段呢？既然他們不能而且不應這樣做，那末從這裏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奧國人的鬥爭方法和前途與俄國人完全不同嗎？在這種情況下，怎能局限於奧國人那種片面的不徹底的民族文化自治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主張抄襲的人不指望俄國有『大胆的堅決行動』，或者是他們雖指望有這種行動，但『他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最後，俄國和奧國當前的任務完全不同，因此解決民族問題的方法也應當不同。奧國生存在國會制度的條件下，目前那裏沒有國會就不能有什麼發展。可是奧國的國會生活和立法工作往往因各民族政黨間的劇烈衝突而完全陷於停頓。這就是奧國早已患慢性政治危機病的原因。因此，民族問題在那裏是政治生活的軸心，是生死存亡的問題。無怪乎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首先竭力設法解決

①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四二二頁。

②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第一八一頁至第二八二頁。

民族衝突問題，當然是以現存的國會制度為基礎用國會方法去解決的……

俄國的情形却不是這樣。第一、在俄國，『謝天謝地，沒有國會』^①。第二、這是主要的，俄國政治生活的軸心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土地問題。因此，俄國問題的命運即各民族『解放』的命運在俄國是和解決土地問題，即和消滅農奴制殘餘亦即和國家民主化聯系在一起的。這就說明為什麼俄國的民族問題並不是獨立的和有決定意義的問題，而是總的和更加重要的全國解放問題中的一部分。

石普林格爾說：『奧國國會之所以沒有成果，只在於每一種改良都在各個民族政黨內部引起矛盾而使這些政黨的團結受到破壞，於是各政黨的領袖對於一切帶有改良氣味的東西都竭力迴避。奧國的進步只有在各民族都獲得不可剝奪的法權地位時才談得上；這樣就使各民族不必在國會裏保持常備的戰鬥隊伍，使各民族有可能去解決各種經濟的和社會的任務。』^②

鮑威爾所說的也是如此：

『民族和平首先是國家所需要的。一個國家決不能容忍立法工作因極無聊的語言問題，因民族境界上某個地方某些氣憤的人彼此發生一些極小的爭執，因每設立一所新的學校而陷於停頓。』^③

這都是很明白的。但是民族問題在俄國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這也是很明白的。決定俄國進步

①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第三十六頁。

②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四〇一頁。

的命運的不是民族問題，而是土地問題。民族問題是從屬的問題。

總之，有不同的問題提法，有不同的前途和鬥爭方法，有不同的當前任務。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不顧空間時間而「解決」民族問題的書蟲才會拿奧國做榜樣，才會抄襲他們的綱領，這難道不明顯嗎？

再說一遍：以具體歷史條件為出發點，把辯證地提問題當做唯一正確的提問題的方法，——這就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

四 民族文化自治

上面我們已經談過奧國民族綱領的形式方面，談過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簡單地模仿奧國社會民主黨和簡單地採用它的綱領的那種方法論上的根據。

現在我們談談這個綱領的實質。

那末，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民族綱領是怎樣的呢？

一句話，這個綱領就是民族文化自治。

第一、這就是說，自治權不是給予主要是住着捷克人或波蘭人的捷克或波蘭，而是給予一般的捷克人和波蘭人，不分地域，不管他們居住在奧國什麼地方，都一律給予。

因此，這種自治就叫做民族自治，而不叫做地域自治。

第二、這就是說，分散在奧國各地的捷克人、波蘭人、日耳曼人等等都以個人資格分別組成完整的民族，並以這樣的民族的資格加入奧地利國家。這樣，奧地利將不是由各自治區域組成的聯盟，而是由不分地域建立起來的各自治民族組成的聯盟。

第三、這就是說，爲着這種目的而應當替波蘭人、捷克人等等建立起來的全民族機關將只管『文化』問題，不管『政治』問題。專門政治性的問題都集中在全奧國會（萊哈斯拉特）手中。

因此，這種自治還叫做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

下面就是一八九九年奧國社會民主黨在布隆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綱領原文^①。

綱領上先提到『奧國民族糾紛阻礙着政治進步』，『徹底解決民族問題……首先是文化上所必需的』，『這個問題只有在根據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選舉制建立起來的真正民主的社會裏才能得到解決』。然後說：

『只有在完全平等和沒有任何壓迫的條件下，奧國各民族的民族特點^②的保存和發展才有可

① 南方斯拉夫社會民主黨代表也曾投票擁護這個綱領。見『黨的布隆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一九〇六年版第七十二頁。

② 在帕寧的俄譯本中，『民族特點』譯成了『民族個性』（見鮑威爾此書帕寧譯本）。帕寧把這個地方譯錯了，因爲在德文原本上並無『個性』一詞，那裏所說的是 *nationalen Eigenart*，即民族特點，而這和『民族個性』是完全不同的。

能。因此，首先必須擯棄官僚政治的國家集權制和各個領地上的封建特權。

在這種條件下，而且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消除奧國的民族糾紛而建立民族秩序，其原則如下：

一、奧國應改組為各民族民主聯盟的國家。

二、應組成以民族為界限的自治團體來代替歷代的皇朝封地，每個團體的立法權和行政權均由根據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選舉手續選舉出來的民族議院掌管。

三、屬於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區域共同組成單一的民族聯盟，該聯盟完全按自治原則來處理本民族的事務。

四、少數民族的權利由帝國國會頒佈特別法律加以保障。」

綱領的結語號召奧國各民族團結起來。

不難看出這個綱領中還留下一些『地域主義』的痕跡，但它大體上是民族自治的綱領。無怪乎第一個鼓吹民族文化自治的石普林格爾熱烈地歡迎這個綱領。鮑威爾也贊同這個綱領，稱它為民族自治的『理論上的勝利』；不過爲了更明確起見，他才提議用更確定的條文代替第四條，其內容是說必

○ 見布隆一八九九年《Verhandlungen des Gesamtparteitagess》（「黨代表大會的討論」）。

○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第二八六頁。

○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五四九頁。

須『把每個自治區域內的少數民族組成公法團體』來掌管學校及其他文化事宜。

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民族綱領就是如此。

我們來考察一下它的科學根據。

我們來看看奧國社會民主黨是怎樣論證它所鼓吹的民族文化自治的。

我們來看看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論家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的意見吧。

民族自治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民族是和固定的地域無關的人們的聯盟。

石普林格爾說：『民族和地域沒有任何本質上的聯系，民族是自治的個人聯盟。』

鮑威爾也說民族是『不在某個固定區域內獨佔統治的』『個人的共同體』。

但組成一個民族的那些人並不總是密集在一個區域裏的，他們往往分成許多集團而攙雜在別的民族機體中。這是資本主義驅使他們到各個區域和城市去謀生的緣故。可是這些集團既然攙雜在別的民族區域，並在那裏佔少數，於是在語言、學校等方面就會受到人數眾多的當地民族的限制。由此就產生了民族衝突。由此就證明地域自治是『毫無用處的』。照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的意見，擺脫這種狀況的唯一出路是把這個散處全國各地的少數民族組成一個共同的包括各階級的民族聯盟。他們

①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五五頁。

②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第十九頁。

③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二八六頁。

認為只有這樣的聯盟才能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化利益，才能消除民族糾紛。

石普林格爾說：「必須使各民族有正確的組織，必須給它們以權利和義務」……當然，「法律是容易制定的，但它是否能發生人們所預期的作用呢？」……「要想給民族制定法律，首先就要把這些民族建立起來」……「不組成民族便不能建立民族法制和消除民族糾紛」……鮑威爾也是這樣說的，他藉口「工人階級的要求」，提議「根據個人原則把各個少數民族組成一些公法團體」^⑤。

但是，怎樣組織民族呢？怎樣確定某人屬於某個民族呢？

石普林格爾說：「用民族名冊來確定某人屬於某個民族，居住在一個區域的每個人都應當聲明自己屬於某一民族。」^⑥

鮑威爾說：「個人原則的前提是根據成年公民的自由聲明按民族劃分居民……」為此就「應當編製民族名冊」^⑦。

①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第七十四頁。

② 同上，第八十八頁至第八十九頁。

③ 同上，第八十九頁。

④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五五二頁。

⑤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第二二六頁。

⑥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三六八頁。

其次。

鮑威爾說：「居住在單一民族區內的一切日耳曼人以及登記在雜居區的民族名冊上的日耳曼人共同組成一個日耳曼民族，並選出民族委員會。」^①

應該說，捷克人、波蘭人等也是如此。

石普林格爾說：「民族委員會就是民族文化議會，它有權規定原則並批准經費，藉以照管民族學校事宜，照管民族文學、藝術和科學，藉以建立學院、博物館、美術陳列館、劇院」等等^②。民族組織及其中央機關就是如此。

照鮑威爾的意見，奧國社會民主黨主張建立這種包括各階級的機關是想「使民族文化……成爲全體人民的財富，並且用這種唯一可能的辦法把民族的全體成員團結成一個民族文化共同體」^③（着重號是我們加的）。

也許有人認爲這一切只和奧國有關。但是鮑威爾不以爲然。他堅決認定在其他和奧國一樣是由幾個民族組成的國家裏，也必須實行民族自治。

鮑威爾認爲「在多民族的國家裏，各民族中的無產階級都應當提出自己的民族自治的要求

①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三七五頁。

② 見石普林格爾「民族問題」第二三四頁。

③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五五三頁。

去對抗有產階級的民族政策，即奪取政權的政策」^㉑。

然後，鮑威爾悄悄地用民族自治替換了民族自決而繼續說：

「這樣，民族自治，民族自決，就必然成爲多民族國家中各族無產階級的立憲綱領。」^㉒

但他還不以此爲限。他深信他和石普林格爾所「成立」的包括各個階級的「民族聯盟」會成爲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雛形。因爲他知道「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將把人類分成一些以民族爲界限的團體」^㉓；在社會主義時代，「人類將分成一些民族自治團體」^㉔；「這樣一來，社會主義社會無疑地是一幅由許多個人的民族聯盟和地域團體構成的五光十色的圖畫」^㉕；因此「社會主義的民族原則是民族原則和民族自治的最高綜合」^㉖。

大概够了……

在鮑威爾和石普林格爾的著作中就是這樣論證民族文化自治的。

最惹人注意的首先是他們用民族自治來替換民族自決的那種莫名其妙的毫無理由的做法。二者

㉑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三三七頁。

㉒ 同上，第三三三頁。

㉓ 同上，第五五五頁。

㉔ 同上，第五五六頁。

㉕ 同上，第五四三頁。

㉖ 同上，第五四二頁。

必居其一：或者是鮑威爾不懂得自決是什麼，或者是他懂得，但不知他為什麼竟故意把它縮小了。因為毫無疑義：(甲) 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多民族國家的完整為前提的，自決却超出了這種完整的範圍；

(乙) 自決是賦予民族以全部權利的，民族自治却只限於「文化」權利。這是第一。

第二、將來內外情況完全可能配合成這樣，那時某一民族會決定退出多民族的國家，例如退出奧國，——小俄羅斯社會民主黨人在黨的布隆代表大會上就曾這樣聲明他們要把本族人民的「兩部分」合併成一個整體^①。那時，對「各·族·無·產·階·級·必·然·要·採·取·的」民族自治怎麼辦呢？用削足適履的辦法把各民族機械地塞進國家完整性的框子裏去，這算是什麼「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其次，民族自治是和民族的整個發展進程抵觸的。民族自治提出組織民族的口號，可是，既然實際生活，既然經濟發展使得整批的人脫離本民族，並使他們散居各地，試問，怎能人為地把這種民族結合起來呢？無疑地，在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民族逐漸團結起來。可是同樣無疑地，在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開始了民族分散的過程，成批的人開始離開本民族出外謀生，以至於完全遷移到國內其他區域去；同時，這些移民就漸漸失去舊有的聯系，而在新的地方取得新的聯系，一代一代地養成新的風俗習慣，也許還會通曉新的語言。試問，能否把這些彼此隔離的集團合併成統一的民族聯盟呢？什麼地方竟有這樣一種魔術能把無法統一的東西統一起來呢？例如，難道可以把波羅的海沿岸和南高加

① 見「黨的布隆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第四十八頁。

索一帶的日耳曼人『團結成一個民族』嗎？既然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不可能做到的，那末民族自治和那些力圖使歷史開倒車的老民族主義者的空想又有什麼區別呢？

但民族的統一不僅因人口分散而逐漸消失，並且由於內部原因，即由於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而消失下去。在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還可以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隨着大工業的發展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這種『共同性』開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僱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諒解的時候，根本就談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在資產階級渴望戰爭，無產階級却宣佈『以戰爭對付戰爭』的時候，還談得上什麼『共同命運』呢？能不能把這些彼此對立的分子組成一個統一的包括各階級的民族聯盟呢？既然如此，還談得上『民族的全體成員團結成一個民族文化共同體』嗎？因此，民族自治是和階級鬥爭的整個進程抵觸的，這不是很明顯嗎？

我們暫且假定『組織民族』這個口號是可能實現的口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國會議員爲了取得更多的選票而力圖『組織』民族，那還可以理解。可是，社會民主黨人什麼時候竟也開始幹起『組織』民族、『成立』民族、『建立』民族的事情來了呢？

在階級鬥爭極端尖銳的時代去組織包括各個階級的民族聯盟，這算做什麼社會民主黨人呢？到現在爲止，奧國社會民主黨和其他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一樣，只有一個任務，就是組織無產階級。可是

⊙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五三二頁。

這個任務看來『已經陳舊了』。於是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現在提出一個『新的』更引人入勝的任務，就是『建立』民族，『組織』民族。

不過，邏輯上必然如此：既然採取了民族自治，當然就要接受這個『新的』任務，而接受這個『新的』任務就是離開階級立場，走上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種精緻的民族主義。

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民族綱領責成大家關心『各民族的民族特點的保存和發展』，這也絕不是偶然的。真是異想天開：『保存』南高加索的韃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節日^③自己打自己這一類的『民族特點』！『發展』格魯吉亞人的『復仇權』這一類的『民族特點』！……

這種條文只配列在十足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綱領上，它既然出現在奧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上，那就因為民族自治和這類條文是相容的，而不是相抵觸的。

然而對現在的社會不適用的民族自治，對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更不適用的。

鮑威爾的『人類將分成一些以民族為界限的團體』^④這一預言已被現代人類的整個發展進程駁倒了。民族壁壘並不是在鞏固下去，而是在毀壞下去，泯滅下去。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說過：『各族人民間的民族隔離性和對立性已日益消失下去』^⑤，『無產階級的統治更將加速它們的消失』^⑥。人類後

④ 見本章前一部分。

來的發展及其資本主義生產的巨大增長，各民族的雜居和人們在愈益廣闊的地域上的結合，都十分肯定地證實了馬克思的思想。

鮑威爾想把社會主義社會看做「一幅由許多個人的民族聯盟和地域團體構成的五光十色的圖畫」，其實就是暗中企圖把巴枯寧的學說改頭換面來代替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社會主義的歷史表明，任何這樣的企圖本身都包含着必然破產的因素。

至於鮑威爾竭力推崇的「社會主義的民族原則」，那就更不用說了。這個「原則」，在我們看來，就是想用資產階級的「民族原則」代替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原則。如果民族自治是從這種可疑的原則出發，那就必須承認民族自治只能有害於工人運動。

固然這種民族主義並不如此明顯，因為它是用社會主義的辭藻巧妙地偽裝起來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對無產階級就更加有害。公開的民族主義總可以對付，因為它是不難識破的。要和偽裝的不易識破的民族主義作鬥爭，那就困難得多。它既然裝上社會主義的鐵甲，也就較難攻破而更加頑強了。它既然存在於工人中間，散播各民族工人互相猜忌、彼此隔離的有害思想，也就把環境弄得烏煙瘴氣了。

但是民族自治的害處還不止於此。它不僅造成各民族彼此隔離的基礎，而且造成分裂統一的工人運動的基礎。民族自治的思想為統一的工人政黨分成一些按民族建立的單獨的政黨造成一種心理上的前提。黨一分裂，工會就跟着分裂，結果是彼此完全隔離。統一的階級運動就這樣分成一些單獨

的民族細流。

奧國，「民族自治」的故鄉，在這方面提供了最慘痛的例證。奧國社會民主黨本是一個統一的黨，從一八九七年（黨的維姆堡代表大會〔註〕）起它就開始分裂成幾個單獨的黨。從黨的布隆代表大會（一八九九年）採納了民族自治以後，分裂的程度更加深了，最後竟使一個統一的國際主義的政黨分成了現在的六個民族政黨，其中捷克族的社會民主黨甚至不願和日耳曼族的社會民主黨打交道。

但是工會和黨是有聯系的。奧國黨內和工會內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工人中的社會民主黨人擔任的。這就令人耽憂黨內的分離主義會使工會也走上分離主義的道路而陷於分裂。事實果然如此：工會也按民族分開了。現在甚至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就是捷克族工人破壞日耳曼族工人的罷工，或在選舉市政局時和捷克族資本家一起反對日耳曼族工人。

由此可見，民族文化自治並不能解決民族問題。不僅如此，它還使民族問題更尖銳，更紊亂，更容易使工人運動的統一遭受破壞，使工人們彼此按民族隔離開來，使他們中間的糾紛加劇下去。這就是民族自治的收穫。

五 崩得，它的民族主義，它的分離主義

上面我們說過，鮑威爾雖然認為民族自治對捷克人、波蘭人等是必需的，但是他反對給猶太人這

種自治。對「工人階級應否為猶太人民要求自治」這個問題，鮑威爾回答道：「民族自治不能成為猶太工人的要求。」^①根據鮑威爾的意見，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不讓他們（即猶太人。——斯大林註）保全為一個民族」^②。

簡言之，猶太民族將不再存在，所以無從為誰要求民族自治了。猶太人在被同化着。

對猶太民族命運所持的這種觀點並不是新的。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就有過這種觀點^③，他當時所指的主要是德國的猶太人。考茨基在一九〇三年重述過這種觀點^④，他當時所指的是俄國的猶太人。現在鮑威爾在談到奧國的猶太人時又重述這種觀點，不過有一點差別，就是他所否認的不是猶太民族的現在，而是猶太民族的將來。

鮑威爾認為猶太人之所以不能保全為一個民族，在於「猶太人沒有單獨的居住地區」^⑤。這種解釋基本上雖然正確，但還沒有說出全部真理。問題首先在於猶太人沒有一個和土地相聯系的廣大的穩定的階層，這樣一個階層是不僅作為民族骨幹，而且作為「民族」市場自然地把它一個民族聯結起來

①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三八一、三九六頁。

② 同上，第三八九頁。

③ 見馬克思「論猶太問題」一九〇六年版。

④ 見考茨基「基什涅夫慘案和猶太問題」一九〇三年版。

⑤ 見鮑威爾「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第三八八頁。

的。俄國的五六百萬猶太人只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和農業有一些聯系。其餘百分之九十六從事商業、工業和在城市機關中工作，一般地住在城市裏，並分散在俄國各處，無論在哪一省都不佔多數。

可見以少數民族資格雜居在其他民族區域裏的猶太人主要是以工業家、商人和自由職業者的身分爲『異』族服務的，在語言等各方面自然也就適應『異族』。所有這一切，再加上隨着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各個民族的日益雜處，就使猶太人受到同化。『特許猶太居住區』的廢除只能加速這種同化。

因此，爲俄國的猶太人要求民族自治的問題是有些滑稽可笑的：有人竟主張替一個前途被否定、存在與否尙待證明的民族要求自治！

雖然如此，崩得還是採取了這種滑稽可笑的動搖不定的立場，竟在其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一九〇五年）通過了主張民族自治的『民族綱領』。

驅使崩得走這一步的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即崩得作爲猶太社會民主主義工人組織，而且僅僅作爲猶太社會民主主義工人組織而存在。早在一八九七年以前，那些在猶太工人中進行工作的社會民主主義小組就已經打算建立一個『純粹猶太工人組織』^①。一八九七年，他們果然建立了這樣一個組織，即聯合成爲崩得了。這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事實上還沒有作爲一個整體而存在的時候。從那時起，崩得不斷發展和擴大起來，在

① 見卡斯切梁斯基編的『民族運動的形式……』第七七二頁。

俄國社會民主黨處境慘淡的時候日益顯露頭角……可是二十世紀到來了。羣衆性的工人運動開始了。波蘭社會民主黨成長起來並把猶太工人吸引到羣衆鬥爭中去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成長起來並把「崩得」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了。崩得那種沒有地域基礎的民族圈子愈見狹小了。一個問題擺在崩得面前：或者是融化到總的國際浪潮中去，或者是堅持自己的獨立存在，做一個超地域的組織。崩得選擇了後者。

所謂「猶太無產階級唯一代表」的崩得的「理論」就這樣形成了。

但是要「簡單地」隨便爲這個奇怪的「理論」作辯護已經不可能了，必須有某種「原則性的」根據，「原則性的」理由才行。民族文化自治就成了這樣的根據。崩得從奧國社會民主黨那裏抄來了民族文化自治就抓住不放。即使奧國人沒有這樣的綱領，崩得也一定會想出一個來，以便「從原則上」爲自己的獨立存在作辯護。

這樣，崩得在一九〇一年（第四次代表大會）作了一番怯懦的嘗試以後，終於在一九〇五年（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民族綱領」。

第二種情況，即猶太人作爲個別的少數民族在其他多數民族密集的各完整區域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我們已經說過這種地位使猶太人不成其爲一個民族，使他們走上被同化的道路。但這是客觀的過程。主觀上，在猶太人頭腦中，這一過程却引起了反應，提出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保障不受同化的問題。崩得既然宣揚猶太「民族」富有生命力，就不能不採取主張「保障」的立場；既然採取了這種立

場，就不能不採納民族自治。因為，如果崩得能够抓住什麼自治，那就只能是民族自治，即民族文化自治。猶太人的地域上政治上的自治是談不上的，因為猶太人沒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

值得注意的是崩得一開始就強調說，民族自治的特點就是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保障民族的「自由發展」。這就難怪出席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崩得代表哥里德勃拉特要說民族自治就是「保障它們（即各個民族。——斯大林註）充分自由發展文化的機關」^①。崩得思想的擁護者也是抱着這種主張加入社會民主黨第四屆杜馬黨團的……

崩得就這樣採取了主張猶太人民族自治的可笑的立場。

上面我們已經一般地分析了民族自治。這一分析說明了民族自治的歸宿就是民族主義。下面我們就會看到崩得果然得到了這樣的結局。不過崩得還從特殊方面即從保障少數民族權利方面來考察民族自治。我們也就從這個特殊方面來分析問題吧。這樣做之所以尤其必要，是因為少數民族問題（不僅是猶太少數民族問題）對社會民主黨具有重大的意義。

總之，就是「保障」各民族「充分自由發展文化的機關」（着重號是我們加的。——斯大林）。但「保障……的機關」究竟是什麼呢？

這首先就是石普林格爾和鮑威爾的「民族委員會」，一種類似掌管文化事宜的議會。

① 見「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一七六頁。

可是這種機關能否保障民族「充分自由發展文化」呢？掌管文化事宜的議會能否保障民族免於民族主義的迫害呢？

崩得認為能保障。

但歷史證明恰恰相反。

俄屬波蘭曾經有過議會，一種政治性的議會，它當然力求保障波蘭人自由「發展文化」，可是它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在和俄國一般政治條件作力量懸殊的鬥爭中垮台了。

芬蘭早就有了議會，它也力求保護芬蘭民族不受「侵犯」，但它在這方面究竟有多少成績是有目共睹的。

當然，議會是有各種各樣的，對付按民主原則組織起來的芬蘭議會不像對付貴族的波蘭議會那樣容易。但是有決定意義的終究不是議會本身，而是俄國的一般制度；如果俄國目前還像過去一樣，像廢除波蘭議會時一樣，存在着野蠻的亞洲式的社會政治制度，那末芬蘭議會的處境就要壞得多。況且「侵犯」芬蘭的政策正在加緊推行，決不能說這種政策遭受過失敗……

政治議會這種歷史上形成的古老機關尚且如此，年輕的議會，年輕的機關，尤其像「文化」議會這樣軟弱的機關，就更不能保障民族的自由發展了。

問題顯然不在於「機關」，而在於國內的一般制度。國家沒有民主化，民族「充分自由發展文化」也就沒有保障。可以肯定地說，國家愈民主，對「民族自由」的「侵犯」就愈少，免受「侵犯」的保障

就愈多。

俄國是半亞洲式的國家，所以這裏的「侵犯」政策往往採取極粗暴的方式，即蹂躪的方式。不用說，所謂「保障」在俄國是少到最低限度的。

德國已經是多少有些政治自由的歐洲式的國家。無怪乎那裏的「侵犯」政策從來不採取蹂躪的方式。

在法國，「保障」當然更多些，因為法國比德國民主。

瑞士更不用說了。那裏由於有高度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各民族都自由地生活着，不管他們是少數民族或多數民族都是一樣的。

總之，崩得硬說「機關」本身能保障各民族充分發展文化，這是十分荒唐的。

也許有人會指出，崩得自己也認為俄國的民主化是「建立機關」和保障自由的先決條件。但這是不對的。從「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二)中可以看出，崩得想在俄國現存制度的基礎上通過「改革」猶太教會去達到成立這種「機關」的目的。

有一個崩得領袖在這次代表會議上說過：「猶太教會能成爲將來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核心。民族文化自治是民族自我服務的形式，是滿足民族需要的形式。猶太教會這一形式也包含着同樣的內容。這是一條鍊子的幾個環節，是一個進化過程中的幾個階段。」¹⁰

代表會議根據這一點決定必須爭取「改革猶太教會，通過立法手續把它變成世俗機關」，即按

民主原則組織起來的機關^①（着重號是我們加的。——斯大林）。

顯然，崩得當做條件和保障的並不是俄國的民主化，而是猶太人將來的『世俗機關』，這種機關是用『改革猶太教會』的方法根據『立法』手續，即經過杜馬而成立的。

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如果在整個國家內沒有民主制度，『機關』本身是不能盡『保障』之職的。

那末，在將來的民主制度下究竟怎樣呢？在民主制度下是不是也需要有專門的『文化機關』來『保障……』呢？例如民主的瑞士在這方面的情形是怎樣的呢？那裏有沒有石普林格爾的『民族委員會』之類專門的文化機關呢？那裏並沒有這種機關。那末，在那裏佔少數的例如意大利人的文化利益是不是因此受到損害呢？這類事情還沒有聽說過。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瑞士國內的民主制度使一切似乎能『保障……』的『專門文化『機關』都成爲多餘的了。

總之，在現時是軟弱的，在將來是多餘的，——民族文化自治機關就是如此，民族自治就是如此。可是，如果把這種民族自治強加於一個存在和前途都成問題的『民族』身上，那末它的害處就更大了。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族自治的人必然要維護和保全『民族』的一切特點，而不管它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只求『拯救民族』免於同化，只求『保全』民族。

崩得必然會走上這條危險的道路。而它事實上已走上了這條道路。我們所指的是崩得最近幾次

① 見『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一九二一年版第六十二頁。

② 同上，第八十三頁至第八十四頁。

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關於「安息日」、「行話」等等盡人皆知的決議。

社會民主黨努力爲一切民族爭取本族語言權，但崩得並不以此爲滿足，它還要求「特別堅決地」捍衛「猶太語言權」^①（着重號是我們加的。——斯大林），而且崩得自己在第四屆杜馬選舉時，「寧願選舉他們（即覆選人）中間答應捍衛猶太語言權的人」^②。

不是共同的本族語言權，而是單獨的猶太語言權，行話權！讓各個民族的工人首先去爲本族語言而鬥爭；猶太人爲猶太語言而鬥爭，格魯吉亞人爲格魯吉亞語言而鬥爭等等。爲各民族共同的權利而鬥爭是次要的事情。你儘可不承認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本族語言權，只要你承認行話權，你就可以放心；崩得會投票擁護你，崩得「寧願選舉」你。

那末，崩得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社會民主黨要求規定每周必須有一個休息日，可是崩得並不以此爲滿足，它還要求用「立法手續」保證猶太無產階級有權過安息日，不得強迫他們也過另一個節日」^③。

應該想到崩得會「更進一步」要求有權過一切舊的猶太節日。如果崩得不幸，猶太工人已拋棄迷信，不願過這種節日，那末崩得就要用爭取過「安息日的權利」的宣傳去叫他們想起安息日，在他們

① 見「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第八十五頁。

② 見「崩得第九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一九二二年版第四十二頁。

③ 見「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第八十三頁。

身上培植所謂『安息日精神』……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上許多發言人發表的『熱烈的言論』，要求設立『猶太醫院』，說『病人在自己中間覺得愉快些』，『猶太工人在波蘭工人中間會覺得不愉快，而在猶太店舖老闆中間會覺得愉快』^①。

保存一切猶太的東西，保全猶太人的一切民族特點，以至保全顯然對無產階級有害的特點，把猶太人和一切非猶太的東西隔開，甚至主張設立特別醫院，——請看崩得墮落到了什麼地步！

普列漢諾夫同志說崩得『要使社會主義適應民族主義』，這是千真萬確的。當然，柯索夫斯基和他那樣的崩得分子可以罵普列漢諾夫爲『煽動分子』^②（紙上不妨亂罵），然而熟悉崩得活動的人不難看出這些勇士們簡直是怕說出關於自己的實話，於是用『煽動』一類的惡毒字眼來掩護自己……

崩得在民族問題上既然採取這樣的立場，在組織問題上自然就走上使猶太工人陷於孤立的道路，走上在社會民主黨內結成各民族集團的道路。民族自治的邏輯就是如此！

崩得果然從『唯一代表』論進到工人『民族劃分』論了。崩得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在自己的組織結構上按民族實行劃分』^③。然後，它又由『劃分』論『進一步』走到了『獨存』論。無怪乎在崩得第八

① 見『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第六十八頁。

② 見『我們的曙光』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九、十兩期合刊第二一〇頁。

③ 見『關於崩得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通報』（二二）第七頁。

次代表會議上有人說「民族生存就是獨存」^①。

組織上的聯邦主義包含着瓦解和分離主義的成分。崩得正在走向分離主義。

它實在是走投無路了。它那種超地域組織的地位驅使它走上分離主義的道路。崩得沒有一定的完整的地域，它是在「別人的」地域上活動的，然而和它來往密切的波蘭、拉脫維亞以及俄國的社會民主黨都是國際主義的地域性的集體。結果便是這些集體每擴大一步都使崩得多受一分「損失」，使崩得的活動場所縮小。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整個俄國社會民主黨應按民族聯邦主義原則實行改組，那時崩得就有可能「保障」自己擁有猶太無產階級；或者是這些集體的國際主義地域原則仍然有效，那時崩得就要像波蘭和拉脫維亞的社會民主黨那樣按國際主義原則實行改組。

崩得一開始就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按聯邦原則實行改組」^②，原因就在這裏。

一九〇六年，崩得因受下層羣衆要求統一的浪潮所迫而選定了中間道路，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但它是怎樣加入的呢？波蘭和拉脫維亞的社會民主黨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是為了和平地共同進行工作，但崩得加入的目的是為聯邦制而戰鬥。崩得首領麥迭姆當時就是這樣說的：

「我們不是爲了太平生活，而是爲了鬥爭才加入的。太平生活是沒有的，只有馬尼洛夫之流才會盼望在最近的將來能享受太平生活。崩得應當從頭到腳地武裝起來去加入黨。」^③

① 見「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第七十二頁。

② 見「民族自治和按聯邦原則改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問題」一九〇二年崩得版。

如果認為這是出於麥迭姆的惡意，那就錯了。問題並不在於惡意，而在於崩得的特殊立場，由於這種立場，它就不能不和建立在國際主義原則上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作鬥爭。崩得既然和俄國社會民主黨作鬥爭，自然就破壞了統一的利益。最後，事情竟發展到崩得違背了黨章，在選舉第四屆杜馬時聯合波蘭民族主義者反對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因而和俄國社會民主黨正式決裂。

顯然，崩得認為決裂是它的獨立自主活動最好的保障。

組織上「劃分」的「原則」就這樣導致了分離主義，引起了完全決裂。

從前崩得和舊「火星報」(2)辯論聯邦制問題時說：

「『火星報』想使我們相信崩得對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聯邦關係一定會削弱它們彼此間的聯系。我們不能援引俄國實踐來駁斥這種意見，原因很簡單：俄國社會民主黨不是聯邦制的團體。然而我們可以援引奧國社會民主黨大有教益的經驗，因為奧國社會民主黨根據一八九七年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而變成了一個聯邦性的組織。」(3)

這是在一九〇二年寫的。

現在已經是一九一三年了。現在我們有了俄國的「實踐」，也有了「奧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這些「實踐」和「經驗」究竟說明什麼呢？

(2) 見「我們的話」雜誌第三期，一九〇六年維里諾版第二十四頁。

(3) 見「論民族自治問題……」一九〇二年崩得版第十七頁。

我們先來看『奧國社會民主黨大有教益的經驗』吧。一八九六年以前，奧國還存在着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就在這一年，捷克人在倫敦國際代表大會上首先要求單獨的代表權，並取得了這種代表權。一八九七年，在黨的維也納（維姆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告取消統一的黨，而成立了六個民族『社會民主主義團體』的聯邦制同盟。後來這些『團體』又都變成了獨立的政黨。這些政黨彼此又漸漸斷絕了關係。接着國會黨團也隨着黨而分裂，成立了幾個民族『俱樂部』。後來工會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後甚至連合作社也被殃及了，捷克分離主義者竟號召工人拆散合作社^①。至於分離主義的宣傳可以削弱工人的團結精神，往往推動他們走上工賊的道路，那就更不用說了。

總之，『奧國社會民主黨大有教益的經驗』證明崩得是錯誤的，舊『火星報』是正確的。奧國黨內聯邦主義造成了醜惡已極的分離主義，破壞了工人運動的統一。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俄國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崩得分離主義者也像捷克分離主義者一樣和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決裂了。至於工會，崩得的工會，那末它們一開始就是按民族原則組織起來的，就是說，和其他民族的工人是隔絕的。

完全獨存，完全決裂，——這就是聯邦主義的『俄國實踐』所表明的。

這種情形自然要削弱工人的團結精神，使他們的意志沮喪，而且這種沮喪現象也侵入崩得裏面

① 見《Dokumente des Separatismus》（『分離主義的文件』）第二十九頁所援引的瓦聶克（二）的小冊子的一段話。

了。我們指的是猶太工人和波蘭工人因失業問題而發生日益頻繁的衝突。請看崩得第九次代表會議關於這個問題所發的議論吧：

「……我們把排擠我們的波蘭工人看成暴徒，看成黃色工人；我們不支持他們的罷工，而要破壞他們的罷工。第二、我們用排擠對付排擠；他們不許猶太工人進工廠做工，我們就不許波蘭工人進手工作坊做工……如果我們不把這件事抓到自己手裏來，工人就會跟着別人走。」^①（着重號是我們加的。——斯大林）

崩得代表會議就是這樣談論團結精神的。

這真是登峯造極的「劃分」和「獨存」。崩得已經達到了目的；它已經把各民族的工人分離得厮打起來，分離得做起工賊來了。不這樣是不行的，因為「如果我們不把這件事抓到自己手裏來，工人就會跟着別人走」……

工人運動的瓦解，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意志的沮喪，——這就是崩得聯邦主義造成的惡果。由此可見，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及其所造成的氣氛，在俄國比在奧國更爲有害。

① 見「崩得第九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第十九頁。

六 高加索人，取消派代表會議

前面我們已經說到，抗拒不住民族主義「時疫」的一部分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發生了動搖。這種動搖表現在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步崩得的後塵（雖然這很奇怪）而宣佈了民族文化自治。

全高加索實行區域自治，高加索境內各民族實行民族文化自治，——上述社會民主黨人（順便說一下，他們是附和俄國取消派的）就是這樣表述自己的要求的。

請聽聽他們公認的領袖，並非無名的諾某所說的話吧：

「誰都知道，高加索無論按居民的人種成分或按地域和農業發展程度來說，都和中部各省大不相同。要開發並在物質上發展這樣的邊疆，就需要有本地的工作人員，需要有熟悉當地特點、習慣於當地氣候和文化的行家。一切以開發本地為目的的法律都必須由當地頒佈，並由當地人材去執行。因此，頒佈和當地各項問題有關的法律的權限是屬於高加索中央自治機關的……所以高加索中央機關的職權就在於頒佈旨在開發本地經濟富源，促使邊疆物質繁榮的法律。」^①

總之，就是高加索的區域自治。

① 見格魯吉亞文的「我們的生活報」(一九二二年第十二號)。

如果把諾某提出的那些有點含糊不清互不連貫的理由撇開不談，那就應該承認他的結論是正確的。由於高加索居民成分及其生活條件有許多特點，在全國性的憲法範圍內實行高加索區域自治（這一點諾某也不否認）確實是必要的。這一點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也承認了的，它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會宣佈：「凡是生活條件和居民成分與俄國本部各地不同的邊區皆得實行區域自理。」

馬爾托夫把這一條提交第二次代表大會討論時，會這樣申述其理由：「俄國幅員的遼闊和我們的集中管理的經驗，使我們有理由認為在芬蘭、波蘭、立陶宛和高加索這樣大的地域單位實行區域自理是必要而合理的。」

由此可見，應當把區域自理了解為區域自治。

但是諾某還要更進一步。他認為高加索區域自治所包括的「只是問題的一方面」。

「到現在為止，我們所說的只是本地生活的物質上的發展。但可以促進邊疆經濟發展的不僅是經濟上的活動，而且還有精神上文化上的活動」……「文化上很強的民族，在經濟方面也是很強的」……「但是只有用民族的語言才能發展民族的文化」……「因此，凡與本族語言有關的問題都是民族文化問題。教育、訴訟、教會、文學、藝術、科學、戲劇等等問題便是這樣的問題。從物質上發展邊疆的事業把各民族聯合在一起，而民族文化事業却使各民族彼此分開，使每個民族單獨進行活動。前一種活動是和一定的地域相聯系的」……「民族文化事業則不然。這種事業並不和一定的地域相聯系，而和一定民族的存在相聯系。格魯吉亞語言的命運是任何地方的格

魯吉亞人同樣關心的。如果以爲格魯吉亞文化只和住在格魯吉亞的格魯吉亞人有關，那就太無知了。舉阿爾明尼亞的教會爲例。各地和各國的阿爾明尼亞人都參加管理教會的事務，地域在這裏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或者，例如創辦格魯吉亞博物館，無論梯弗里斯的格魯吉亞人或巴庫、庫泰依斯、彼得堡及其他各地的格魯吉亞人都是關心的。這就是說，一切民族文化事業均應由各有關民族自己去掌管和領導。我們主張高加索各民族實行民族文化自治」^①。

簡言之，文化不等於地域，地域也不等於文化，所以必須實行民族文化自治。諾某可以替民族文化自治辯護的不過如此而已。

我們在這裏不再一般地談民族文化自治，因爲前面我們已經把它的壞處說明了。現在我們只想指出一般說來是毫無用處的民族文化自治，如果從高加索的條件來看，那更是毫無意義和荒謬絕倫的。

原因如下：

民族文化自治是以具有發達的文化和文學的、較爲發展的民族爲前提的。沒有這些條件，這種自治就會失去任何意義而變爲無稽之談。但是高加索許多族只有原始的文化，他們雖有特殊的語言，但沒有本族的文學；況且這些族都處於過渡階段，一部分在被同化，一部分在向前發展。怎樣在他們那

① 見格魯吉亞文的「我們的生活報」一九二二年第十二號。

裏實行民族文化自治呢？怎樣對待這些族呢？怎樣以民族文化自治為必然前提把他們「組織」成一些單獨的民族文化聯盟呢？

怎樣對待那些操着不同的語言但沒有自己的文學的明格列里人、阿布哈茲人、阿札里人、斯萬人、列茲金人等呢？應當把他們列入哪個民族呢？能不能把他們「組織」成一些民族聯盟呢？應當以什麼「文化事業」為中心把他們「組織」起來呢？

怎樣對待那些在南高加索正受格魯吉亞人同化（但還遠沒有完全被同化）、那些在北高加索一部分正受俄羅斯人同化、一部分又正在向前發展、創造着本族文學的沃舍梯人呢？怎樣把他們「組織」成統一的民族聯盟呢？

把那些操着格魯吉亞語言但過着土耳其文化生活並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札里人列入哪個民族聯盟呢？是不是以宗教事業為標準叫他們脫離格魯吉亞人而單獨「組織」起來，同時又以其他文化事業為標準叫他們和格魯吉亞人一起「組織」起來呢？還有科布列特人呢？英谷什人呢？英格洛伊人呢？

把許多族擯棄在外，這算什麼自治呢？

不，這並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這是胡思亂想的結果。

好吧，我們就來假設一下不可假設的東西，假定我們這位諾某的民族文化自治已經實現了，那末它會把事情弄到什麼地步，會導致什麼結果呢？例如拿南高加索那些識字人數的百分比少到最低限度、學校由萬能的毛拉主持、文化滲透了宗教精神的韃靼人來說吧……不難了解，把他們「組織」成

民族文化聯盟，就是讓毛拉站在他們頭上，就是任憑反動的毛拉去宰割他們，就是替韃靼羣衆的死敵建立一座在精神上奴役這些羣衆的新堡壘。

可是，社會民主黨人什麼時候會給反動分子助長聲勢呢？

把南高加索的韃靼人圈到一個替最兇惡的反動分子奴役羣衆的民族文化聯盟中去，——難道高加索取消派再不能『宣佈』一種較好的辦法嗎？……

不，這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

只有把後進的民族和族納入高度文化的總軌道才能解決高加索的民族問題。只有這種解決方法才是社會民主黨所能採納的進步的解決方法。高加索區域自治之可以採納，在於它把後進的民族引上總的文化發展的大道，幫助它們跳出小民族閉關自守的狹隘範圍，推動它們前進，使它們易於享受高度文化的成果。民族文化自治却適得其反，因為它把各民族禁錮在舊的狹隘範圍內，把它們固定在文化發展的低級階段，妨礙它們走上高級的文化階段。

因此，民族自治使區域自治喪失它的優點，把區域自治化爲烏有。

正因爲如此，諾某所提議的那種混合式的自治，即將民族文化自治和區域自治配合起來的自治，也是毫無用處的。這種反常的配合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因爲它除了阻礙後進的民族的發展以外，還會把區域自治變成被組織在民族聯盟內的各民族互相衝突的舞台。

這樣，一般說來是毫無用處的民族文化自治，在高加索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反動的妄想了。

諾某及其高加索同道者的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如此。

高加索取消派是否會『前進一步』，是否會在組織問題上也效法崩得，這有待將來的事實證明。到現在為止，在社會民主黨的歷史中總是先有組織上的聯邦主義，然後才有綱領上的民族自治。奧國社會民主黨人從一八九七年起就實行了組織上的聯邦主義，而民族自治綱領是兩年以後（一八九九年）才通過的。崩得分子第一次明確地叫喊民族自治是在一九〇一年，而組織上的聯邦主義遠自一八九七年就實行了。

高加索取消派是從末尾開始，即從民族自治開始做起的。如果他們還繼續跟着崩得走，那末他們就得先把目前這個早在九十年代末根據國際主義原則建立起來的組織機構全部摧毀。

但是通過工人暫時尚不明瞭的民族自治綱領是很容易的，而要摧毀高加索各民族的工人苦心培育出來、多年建立起來的機構，那就很困難了。只要一開始實行這種赫羅斯特拉特^④的想法，工人們就會睜開眼睛，看出民族文化自治的民族主義實質了。

如果說高加索人用來解決民族問題的是一種平常的方式，即口頭討論和文字辯論的方式，那末取消派的全俄代表會議却想出了一種完全不平常的方式。一種簡便的方式。請聽吧：

『據高加索代表團報告……必須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代表會議在聽取了這個報告以後，對這一要求的實質不表示意見，認定對黨綱中承認每一民族均有自決權的條文這樣解釋和

黨綱原意並不抵觸。」

總之，首先是「對這一」問題的「實質不表示意見」，然後却來「認定」。真是一種新奇的方式……究竟這個新奇的代表會議「認定」了什麼呢？

就是認定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和承認民族自決權的黨綱「原意並不抵觸」的。

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個論點吧。

民族自決的條文所說的是民族權利。根據這個條文，民族不僅有權實行自治，而且有權實行分離。條文上所講的是政治上的自決。取消派竟企圖曲解整個國際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中早已規定的這種政治上的民族自決權，這想欺騙誰呢？

或許取消派會規避問題，用詭辯爲自己辯護，說民族文化自治和民族權利「並不抵觸」吧？也就是說，如果某個國家的一切民族都同意按民族文化自治原則處理自己的事情，那末所有這些民族就完全有權這樣去做，誰也不能強迫他們接受別的政治生活方式。真是既新穎又聰明。是否還要加上一句：一般講來，民族有權廢除自己的憲法，有權用專橫制度代替憲法，有權恢復舊制度，因爲民族，也只有民族本身才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重說一遍：在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民族文化自治或任何一種民族的反動措施都和民族權利「並不抵觸」。

可敬的代表會議想說的是不是這一點呢？

不，不是這一點。它分明說：民族文化自治不是和民族權利，而是和黨綱「原意」「並不抵觸」。這

裏所說的是黨綱，而不是民族權利。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某個民族向取消派代表會議請求指示，那末代表會議就會直接認定民族有民族文化自治權。但是向代表會議請求指示的並不是民族，而是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的『代表團』，固然這個代表團所代表的是一些不好的社會民主黨人，但究竟是社會民主黨人。並且他們所過問的不是民族權利，而是民族文化自治是否和社會民主黨的原則矛盾，是否和社會民主黨綱的『原意』『抵觸』。

總之，民族權利和社會民主黨綱的『原意』並不是一個東西。

顯然也有這些要求，它們雖然和民族權利並不抵觸，但可能和黨綱『原意』抵觸。

例如社會民主黨的黨綱上有信教自由一條。按照這一條，任何一羣人都有權信奉任何一種宗教：天主教、正教等。社會民主黨反對一切宗教壓制，反對壓制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這是否就意味着天主教和新教等和黨綱『原意並不抵觸』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社會民主黨始終反對壓制天主教和新教，始終維護各民族有信奉任何一種宗教的權利，但同時它要根據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去進行反對天主教、反對新教和反對正教的宣傳，以便獲得社會主義世界觀的勝利。

社會民主黨之所以要這樣做，在於新教、天主教和正教等等無疑是和黨綱『原意抵觸』的，即和無產階級的真正利益抵觸的。

自決權問題也是如此。各民族有權按照自己的願望處理自己的事情，有權保存自己的任何一種

民族機關，無論是有害的還是有益的，誰也不能（沒有權利！）用強迫手段干涉任何一個民族的生活。但這並不是說社會民主黨就不進行鬥爭，不進行宣傳反對各民族的有害的機關，反對各民族的不適當的要求。相反地，社會民主黨必須進行這種宣傳，必須努力影響各民族的意志，使各民族按照最適合於無產階級利益的方式來處理本民族的事情。正因為如此，社會民主黨要為民族自決權而鬥爭，同時要進行宣傳，比方說，既要反對種人實行分離，又要反對高加索各民族實行民族文化自治，因為二者雖然和這些民族的權利並不抵觸，可是和黨綱「原意」抵觸，即和高加索無產階級的利益抵觸。

顯然，「民族權利」和黨綱「原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黨綱「原意」表現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綱領中科學地規定的利益，民族權利却可能依各階級（資產階級、貴族和僧侶等等）的勢力和影響為轉移，而表現其中任何一個階級的利益。前者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義務，後者是由各階級所組成的民族的權利。談論民族權利和社會民主主義原則是否「抵觸」，正像談論海奧勃斯金字塔和臭名遠揚的取消派代表會議是否「抵觸」一樣，二者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

由此可見，可敬的代表會議竟無可寬恕地把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了。結果得到的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而是一套謬論，依照這種謬論，民族權利和社會民主黨的原則「並不抵觸」，因此，民族的每一要求都能和無產階級的利益相容，因此，力求自決的民族的任何一種要求都不會和黨綱「原意抵觸」！

他們太濫用邏輯了……

在這套謬論的基礎上，也就產生了取消派代表會議臭名遠揚的決議，按照這個決議，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和黨綱「原意並不抵觸」。

但是取消派代表會議所違背的不僅是邏輯的規律。

它還違背它對俄國社會民主黨所負的義務，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它確實違背黨綱「原意」，因為大家知道，通過這個綱領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是斷然否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請看這次代表大會上有關這個問題的發言吧：

「哥里德勃拉特（崩得代表）說：……我認爲必須設立一些能保障各民族自由發展文化的特別機關，因此我提議在第八條上補充一句：「並設立一些保障它們充分自由發展文化的機關。」（大家知道，這就是崩得的民族文化自治的條文。——斯大林註）

馬爾丁諾夫指出，應該設立也能保障局部利益的總機關，任何保障民族自由發展文化的特別機關都是不能設立的。

葉哥羅夫說：在民族問題方面，我們只能採納消極的建議，就是說，我們反對對民族的一切限制。但某一民族是否會作爲一個民族發展下去，這和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無關。這是一個自發的過程。

柯里佐夫說：崩得代表一聽見有人說到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感到委屈。然而一位崩得代表提出的修正案却帶着純粹民族主義的性質。他們竟要求我們採取非常積極的辦法去維持那些甚至

已在衰亡的民族。」

……結果，「哥里德勃拉特的修正案以多數對三票被否決了。」

總之，取消派代表會議顯然是和黨綱「原意抵觸」的。它違背了黨綱。

現在取消派企圖爲自己辯護，竟求援於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似乎這次大會批准了民族文化自治。例如柯索夫斯基說：

「大家知道，根據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達成的協議，崩得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綱領（直到民族問題在全黨代表大會上獲得解決時爲止）。這次代表大會承認了民族文化自治無論如何和全黨綱領並不抵觸。」^①

但取消派的企圖是徒然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並沒有考慮批准崩得的綱領，而只同意暫時把這一問題作爲懸案。勇敢的柯索夫斯基竟沒有勇氣說出全部真情。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且看：

「加林提出修正案：『民族綱領問題因代表大會沒有討論而留作懸案。』（五十票贊成，三十二票反對。）

有人問：留作懸案是什麼意思？

主席答：我們說把民族問題留作懸案，這就是說，崩得在下屆代表大會以前可以保留自己對

① 見「我們的曙光」雜誌一九二二年第九、十兩期合刊第一二〇頁。

這一問題所作的決定。』^①（着重號是我們加的。——斯大林）

可見代表大會甚至「沒有討論」崩得的民族綱領這一問題，只是把它留作「懸案」，讓崩得自己在下屆全黨代表大會以前去決定自己綱領的命運。換句話說，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規避了這個問題，對民族文化自治未置可否。

可是取消派代表會議對這個問題作了十分確定的評價，認為民族文化自治可以採納，並根據黨綱批准了它。

差別是有目共睹的。

由此可見，取消派代表會議雖然用盡了一切狡猾手段，但並不能使民族問題有絲毫進展。在崩得和高加索民族主義者取消派面前獻媚，——這就是代表會議所能施展的全副本領。

七 俄國的民族問題

最後，我們還必須提出一個積極解決民族問題的辦法。

我們的出發點是：民族問題只有同俄國目前的形勢密切聯系起來才能得到解決。

① 見「我們的話」雜誌一九〇六年第八期第五十三頁。

俄國正處在過渡時期，『正常的』『憲制的』生活還沒有確立，政治的危機還沒有克服。狂風暴雨和『糾紛擾攘』的日子還在前面。因此，現在和將來的運動就是爭取完全民主化的運動。

民族問題也應該同這個運動聯系起來加以考察。

總之，國家完全民主化是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和條件。

在解決問題時，不僅要估計到國內的情況，而且要估計到國外的情況。俄國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奧國和中國之間。民主主義在亞洲的增長是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在歐洲的增長不是偶然的。資本在歐洲已感到地盤狹小，於是衝入異國去尋找新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新的投資場所。但是這就會引起國際糾紛和戰爭。誰也不能說巴爾幹戰爭^(二)是糾紛的終結，而不是糾紛的開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種內外形勢結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時俄國某個民族將認為必須提出和解決本身獨立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加以阻礙，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情。

由此可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主張民族自決權。

總之，自決權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

其次，對那些由於某種原因而寧願留在整體範圍內的民族怎麼辦呢？

我們已經知道民族文化自治是不適用的。第一、它是勉強湊成的，不切實際的，因為它要把一些被實際生活拆散和轉移到全國各地去的人勉強湊成一個民族。第二、它驅使大家走向民族主義，因為它主張人們按民族標準『劃分』，主張『組織』民族，主張『保全』和培植『民族特點』，——這些都絕

非社會民主黨所應做的事情。萊哈斯拉特中的莫拉維亞族分離主義者離開日耳曼族社會民主黨議員而同莫拉維亞族資產階級議員合併爲一個所謂莫拉維亞「集團」，這不是偶然的。崩得的分離主義者沉溺於民族主義，讚美「安息日」和「行話」，這也不是偶然的。在杜馬中還沒有崩得議員，在崩得活動的區域裏却有教權主義的反動的猶太教會，崩得目前就在這個教會的「領導機關」裏策劃猶太工人和猶太資產者「合夥」^①。民族文化自治的邏輯本來就是如此。

總之，民族自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出路何在呢？

正確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區域自治，就是像波蘭、立陶宛、烏克蘭、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單位的自治。

區域自治的優點首先在於實行的時候所遇到的不是沒有地域的空中樓閣，而是居住於一定地域上的一定居民。其次，區域自治不是把人們按民族劃分的，不是鞏固民族壁壘的，相反地，是打破這種壁壘，把居民統一起來，以便爲實現另一種劃分即按階級劃分開闢道路的。最後，它使大家不必等待總的中央機關的決議而能最適當地利用本地區的天然富源並發展生產力，——這樣的職能是民族文化自治所沒有的。

① 見「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文件彙編」中關於猶太教會的決議末尾一段。

總之，區域自治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

無疑地，不論哪一個區域都不是清一色的單一民族區，因為每個區域裏都雜居着少數民族。例如波蘭有猶太人，立陶宛有拉脫維亞人，高加索有俄羅斯人，烏克蘭有波蘭人等等。因此，有人就要擔心少數民族會受多數民族的壓迫。但是只有當國家還保存着舊制度的時候，這種擔憂才有根據。如果國家具有完備的民主制度，這種擔憂就沒有任何根據了。

有人提議把散居各地的少數民族結成一個統一的民族聯盟。但少數民族所需要的不是勉強湊成的聯盟，而是他們在當地擁有實權。沒有完全的民主化，這種聯盟能給他們什麼呢？或者有了完全的民主化，民族聯盟又有什麼必要呢？

少數民族特別關心的是什麼呢？

少數民族感到不滿的不是沒有民族聯盟，而是沒有使用本族語言的權利。讓他們使用本族語言，這種不滿就會自行消失了。

少數民族感到不滿的不是沒有勉強湊成的聯盟，而是他們沒有本族的學校。給他們這種學校，這種不滿就失去任何根據了。

少數民族感到不滿的不是沒有民族聯盟，而是沒有信仰（信教）、遷徙等等的自由。給他們這種自由，他們就不再會不滿了。

總之，在一切方面（語言、學校等等）實行民族平等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必

需在國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礎上頒佈全國性的法律，無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權，禁止對少數民族權利加以任何妨礙或限制。

這樣，也只有這樣，才能實際地而不是紙上空談地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

關於組織上的聯邦主義和民族文化自治彼此之間有沒有邏輯上的聯系，可爭可不爭。但民族文化自治替那種可能演變為完全分裂即演變為分離主義的、漫無邊際的聯邦主義造成有利條件，却是無可爭辯的。如果奧國的捷克人和俄國的崩得分子從自治開始，繼而進到聯邦制，最後竟轉到分離主義，那末無疑地，民族文化自治自然而散播的民族主義氣氛，在這方面是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民族自治和組織上的聯邦制携手並進不是偶然的。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兩者都要求按民族劃分，兩者都提議按民族進行組織。相同處是沒有疑問的，不同的只是前者要求劃分一般居民，後者則要求劃分工人社會民主黨黨員。

我們知道按民族劃分工人會引起怎樣的結果。統一的工人政黨的瓦解，工會按民族的分裂，民族糾紛的尖銳化，民族的工賊行爲，社會民主黨內的精神渙散，——這就是組織上實行聯邦主義的結果。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和俄國崩得的活動都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對付這種情況的唯一手段就是根據國際主義原則來進行組織。

在各地把俄國各民族的工人團結成統一的、完整的集體，再把這些集體團結成統一的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顯而易見，這樣建黨並不是排斥而是預計到各個區域在統一的黨的整體內實行廣泛的自治。

高加索的經驗表明這種組織形式是完全適當的。如果說高加索人已經能夠消除阿爾明尼亞工人和韃靼工人間的民族糾紛，如果說他們已經能夠使居民避免互相殘殺和互相槍擊，如果說在巴庫這個民族雜處的地方現在已經沒有發生民族衝突的可能，如果說在那裏已經能夠把工人羣衆納入強大運動的統一正軌，那末，高加索社會民主黨的國際主義建黨原則在這方面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組織形式不僅影響到實際工作，它還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滅的烙印。工人過着自己的組織的生活，在自己的組織中獲得精神上的發展並受到教育。他既在自己的組織中交往，每次都在那裏和自己的別族同志相見，和他們一起在共同集體的領導下進行共同的鬥爭，當然就深刻地意識到工人首先是一個階級家庭中的成員，是統一的社會主義大軍中的成員。這對於工人階級的廣大階層就不能不有極大的教育意義。

因此，國際主義的組織形式是培養同志情感的學校，是擁護國際主義的最強有力的宣傳。

按民族建立的組織却不然。工人如按民族來組織，就會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裏，彼此被組織上的壁壘隔離開來。這樣，所強調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點，而是他們彼此不同之點。在這裏，工人首先是自己民族中的一員，如猶太人、波蘭人等等。無怪乎組織上的民族聯邦主義只能使工人養成民族獨存的精神。

因此，民族的組織形式是培養民族狹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學校。

這樣，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兩種原則上不同的組織形式：國際主義團結的形式和在組織上按民族「劃分」工人的形式。

調和這兩種形式的企圖直到今天也沒有什麼成績。奧國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九七年維姆堡代表大會上制定的調和性的黨章已成了廢物。奧國黨已經四分五裂，並殃及了工會。「調和」原來不僅是空想的，而且是有害的。石特拉塞爾說得對：「分離主義在黨的維姆堡代表大會上初次奏了凱歌。」^①俄國的情形也是如此。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和崩得的聯邦主義所達成的「調和」，結果是完全破產了。崩得破壞了斯德哥爾摩的妥協。從斯德哥爾摩大會後第一天起，崩得就成了各地工人聯合為各族工人統一組織的道路上的絆腳石。雖然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七年和一九〇八年再三要求最後實現各族工人自下而上的統一^②，但崩得還是頑固地繼續實行它的分離主義的策略。崩得起初主張實行組織上的民族自治，繼而事實上已轉到聯邦制，以便最後完全決裂，實行分離主義。它既然和俄國社會民主黨決裂，也就給俄國社會民主黨帶來了離散和混亂。不妨回憶一下亞格洛^③事件。

因此，「調和」的辦法應該拋棄，因為它是空想的，有害的。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聯邦主義，那末俄國社會民主黨就要根據按民族「劃分」工人的原則來實行改組；或者是採取國際主義的組織形式，那末崩得就要根據區域自治的原則，按照高加

① 見石特拉塞爾《Der Arbeiter und die Nation》（「工人和民族」）一九二二年版。

索、拉脫維亞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的榜樣來實行改組，而為猶太工人和俄國其他各族工人的直接統一開闢道路。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原則只會戰勝，不會『調和』。

總之，工人的國際主義團結的原則是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必要條件。

一九一三年一月於維也納

第一次載於一九一三年三月至五月

『啓蒙』雜誌（四）第三期至第五期

署名：科·斯大林

① 「只捉不放」是形容沙俄時代警察專橫的成語，出自烏斯賓斯基的短篇小說「崗亭」。篇中描寫一警察名梅穆列佐夫者，濫用職權，動輒捉人，不肯釋放。——譯者註。

② 毛拉是伊斯蘭教的宗教學者（其中有的兼教長職），我國一般稱阿訇。——譯者註。

③ 「沙黑西—瓦黑西」節日是什葉派伊斯蘭教徒的哀悼日。伊斯蘭教教祖穆罕默德的外孫忽辛於公元六八〇年被害，什葉派伊斯蘭教徒每年在他的忌日舉行種種哀悼儀式，痛哭流涕，以掌自擊，甚至以劍自刺，藉示同情。——譯者註。

④ 赫羅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紀時的希臘人，據傳說，他為留名於後世，竟縱火焚燬了有名的亞爾蒂米司神殿。後來「赫羅斯特拉特」成爲追求個人榮譽而不惜犯罪的人們的通稱。——譯者註。

社會民主黨黨團狀況

在『真理報』第四十四號上出現了七個社會民主黨杜馬代表的『聲明』，他們以敵對的態度攻擊六個工人杜馬代表⁽²⁴⁷⁾。

六個工人代表在同一號的『真理報』上答覆了他們，把他們的攻擊稱爲走向分裂的第一步。這樣，工人就面臨着一個問題：統一的社會民主黨黨團會不會存在？

在這以前，社會民主黨黨團是統一的，因統一而有力，有力得足以使無產階級的敵人不得不重視黨團。

現在它也許要分裂成兩部分而使敵人拍手稱快了……

究竟是怎麼回事？爲什麼社會民主黨黨團的成員之間會發生這樣嚴重的意見分歧呢？什麼事情使得七個代表在報紙上當着工人階級敵人的面攻擊自己的同志呢？

他們在自己的『聲明』中提出了兩個問題：參加『光綫報』和『真理報』問題，兩報合併問題。

七個代表以爲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必須參加兩個報紙，六個代表既拒絕參加『光綫報』就是破壞社

會民主黨黨團的統一。

然而是不是這樣呢？七個代表對不對呢？

第一、很奇怪，你對一個報紙的方針不但不贊同而且認為有害，你怎麼能參加這個報紙呢？比如說，怎麼能迫使正統派的倍倍爾參加修正派的報紙，或迫使修正派的福爾馬爾參加正統派的報紙呢？在德國，人們對這樣的要求是會哈哈大笑的，因為在那裏，人們都知道行動的一致並不一定要觀點的相同。但是在我們這裏……託天之福，在我們這裏還沒有這種文明。

第二、俄國的經驗已給我們直接指出，代表們分別參加兩個不同的報紙決不會破壞黨團的統一。我們所說的是第三屆黨團⁽²⁰⁾。誰都知道第三屆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十三個成員中有九個只參加了『明星報』，有兩個只參加了『活的事業報』⁽²¹⁾，其餘兩個則完全拒絕參加任何一種報紙……但是這一情況絲毫沒有破壞第三屆黨團的統一！黨團始終是行動一致的。

顯然，七個代表要求別人必須參加『光綫報』是錯誤的。看樣子他們還沒有把問題完全弄清。

其次，七個代表要求把『真理報』和『光綫報』合併成一個非派別組織的報紙。

但是怎樣把它們合併起來呢？能不能把它們合併成一個報紙呢？

難道這七個代表，這些『光綫報』的『思想擁護者』不知道『光綫報』就是第一個拒絕這種合併的嗎？他們有沒有讀過『光綫報』第一〇八號？這一號上寫道：『用合併兩個機關報之類的簡單的機械辦法是不能達到統一的。』

如果讀過，那末他們怎能一本正經地談合併呢？

再者，這七個代表是不是知道取消派的首領們一般地對於統一問題，具體說來，對於一個共同機關問題的態度呢？

請聽一聽『光綫報』的鼓舞者阿克雪里羅得的話吧。當一部分彼得堡工人決定出版一種非派別的報紙以對抗『明星報』和『活的事業報』的時候，他却在『涅瓦呼聲報』第六號上寫道：

『創辦非派別的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的思想，在目前是一種空想，而且這種空想客觀上是和在社會民主黨旗幟下無產階級在黨的政治方面的發展和在組織方面的聯合的利益相抵觸的。把空氣從大門趕出去，它又會從窗口鑽進來……計劃中的工人機關報不能在兩個對立的陣營之間採取中立的立場呢？……顯然是不能的。』（見『涅瓦呼聲報』第六號）

可見，在阿克雪里羅得看來，一個共同的報紙的存在不但不可，而且是有害的，因為它『是和無產階級在政治方面的發展的利益相抵觸的』。

我們再聽一聽『光綫報』的另一個鼓舞者，一個並非無名之輩的唐恩的話吧。

他寫道：『巨大的政治任務使我們必不可免地要和反取消主義作無情的鬥爭……反取消主義是永遠的阻礙，永遠的破壞。』必須……『趁它還在萌芽的時候就用全力把它扼殺』（見『我們的曙光』雜誌一九一一年第六期）。

可見『和反取消主義作無情的鬥爭』就是和『真理報』作無情的鬥爭，『扼殺反取消主義』就是扼

殺『真理報』——這就是唐恩的建議。

既然如此，這七個代表怎能一本正經地談兩個報紙的合併呢？

他們究竟想合併誰，聯合誰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他們沒有弄清問題，沒有來得及認清『光綫報』的立場，就認爲自己是它的擁護者，——那末他們是『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或者他們是真正的光綫報派，和唐恩一起準備『扼殺反取消主義』，和阿克雪里羅得一起不相信能有一個共同的報紙，但是大聲叫喊統一，以便偷偷摸摸地爲分裂黨團打下基礎……

不管怎樣，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就是工人面臨着社會民主黨黨團是否完整的問題，因爲黨團有分裂的危險。

黨團在危急中！

誰能拯救黨團，誰能保障黨團的完整呢？

工人，只有工人！除了工人再沒有別人！

因此，覺悟工人的責任就是大聲疾呼地反對黨團內部不論來自何方的分裂企圖。

覺悟工人的責任就是要那反對社會民主黨黨團另一半人的七個社會民主黨代表遵守規矩。

工人應當立刻干預這件事，以維護黨團的統一。

現在不能緘默了。不僅如此——現在緘默就是犯罪。

載於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四十七號

署名：科·斯大林

按報上原文刊印

連納慘案一周年

(1901)

同志們！

自從我們的五百個同志在連納被槍殺以來已經有一年了。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在連納金礦，僅因為和平的經濟罷工，當局竟奉沙皇之命槍殺了我們五百個弟兄，以討好一小撮富豪。

以沙皇名義大肆屠殺的憲兵上尉特別申柯這次得到了政府的重賞和金礦業主的厚酬，並且現在正道遙在貴族酒吧間裏，等待就暗探局長之職。在民情鼎沸之下，他們答應保證被害者家屬的生活，這不過是無恥的謊言。他們答應給連納工人實行國家保險，這也不過是欺騙。他們答應『追查』案情，但實際上連自己的使者——議員馬努興所作的調查也藏起來了。

劊子手馬卡羅夫大臣在杜馬講壇上兇狠地說：『從前如此，將來還會如此。』他說得很對：沙皇和他的執政者過去是而且將來還是撒謊者、背信者、大屠殺者和執行一小撮野蠻地主和富豪意旨的匪幫。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冬宮廣場上已經槍殺了人們對舊的、革命前的專制制度的信仰。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在遙遠的連納又槍殺了人們對現在『革新的』、革命後的專制制度的信仰。凡是相信我們現在存在着立憲制度的人，凡是以爲舊日的暴行不可能重演的人，都已經確信：事情並不如此，沙皇匪幫依舊騎在偉大俄國人民的頭上爲所欲爲，尼古拉·羅曼諾夫君主制依舊要用成百成千的俄國工人和農民的屍體供在自己的祭壇上，沙皇的奴僕——把手無寸鐵的俄國公民當靶子打的特列申柯之流的皮鞭和槍彈依舊在俄國各地揮舞着，呼嘯着。

連納慘案在我國歷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已經忍無可忍了。阻擋人民怨恨的堤壩崩潰了。人民的憤怒之河奔流起來了。沙皇的走狗馬卡羅夫說的『從前如此，將來還會如此』是火上加油。這句話和一九〇五年沙皇的另一個走狗特列坡夫的命令『不要吝惜子彈！』起了同樣的作用。工人之海洶湧澎湃起來了。俄國工人以同心協力的、將近五十萬人參加的抗議罷工來回答了連納慘案。同時他們高舉起我們舊日的紅旗，在那上面，工人階級重新寫上了俄國革命的三個主要的要求：

爲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爲農民沒收一切地主和沙皇的土地。
爲全體人民建立民主共和國！

鬥爭的一年過去了。回顧已往，我們可以滿意地說：已經開了頭，一年沒有白過。

連納罷工和五一罷工匯合起來了。一九一二年光榮的五一紀念在我們工人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從那時起，鬥爭一分鐘也沒有平息過。政治罷工在擴大着，增長着。十五萬工人用革

命的罷工來回答槍殺十六個塞瓦斯托坡里水兵的暴行，宣告革命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的軍隊結成了聯盟。彼得堡無產階級以罷工來抗議偽造杜馬工人代表的選舉結果。在第四屆杜馬開幕的那一天〔五〕，在社會民主黨黨團就國家保險提出質問的那一天，彼得堡工人舉行了一天的罷工和遊行示威。而最後，在一九一三年一月九日，近二十萬的俄國工人舉行了罷工，以悼念殉難的戰士並號召整個民主的俄國起來進行新的鬥爭。

這就是一九一二年的主要總結。

同志們！連納慘案的一周年臨近了。在這一天，我們應當有所表示，無論如何必須有所表示。我們應當表示我們悼念我們的被害同志。我們應當表示我們沒有忘記四月四日這個流血的日子，正像沒有忘記一月九日這個流血的星期日一樣。

必須到處舉行羣衆大會、遊行示威和募捐等等以紀念連納慘案一周年。

讓整個工人的俄國在這一天融合在共同的呼聲中吧：

打倒羅曼諾夫君主制！

新的革命萬歲！

民主共和國萬歲！

光榮歸於殉難的戰士們！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

斯大林全集 第二卷

三六八

歡迎翻印和散發！
準備紀念五一節！

寫於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二月
按膠版印刷傳單原文刊印

註 釋

(一) 考茨基這本書於一九〇七年三月譯成格魯吉亞文在梯弗里斯出版。一九〇七年三月十八日布爾什維克的「時報」第七號發表消息，報道附有柯巴(斯大林)序言的考茨基這本書的格魯吉亞文譯本已經出版。——(正文第三頁)。

(二) 立憲民主黨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的主要政黨，於一九〇五年十月間組成(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七一頁註五二)。——(正文第六頁)。

(三) 「文集第一輯」是孟什維克的文集，於一九〇六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七頁)。

(四) 「我們的事業」(周刊)是孟什維克的雜誌，於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七頁)。

(五) 「同志報」(日刊)於一九〇六年三月至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出版；形式上它不是任何政黨的機關報，實際上是在派立憲民主黨人的機關報。孟什維克也參加這一報紙的工作。——(正文第八頁)。

(六) 「評論」是孟什維克的文集，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三集。——(正文第九頁)。

(七) 「世界」(月刊)是自由派的雜誌，於一八九二年在彼得堡出版。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該雜誌發表過「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孟什維克參加了這一雜誌的工作，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改名「現代世界」出版。——(正文第九頁)。

(八) 「勞動呼聲報」是孟什維克的報紙，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七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十一頁)。

(九) 「勞動團分子或「勞動團」，是小資產階級民主分子的集團，於一九〇六年四月由參加第一屆國家杜馬的農民代表組成(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七四頁註七七)。

人民社會主義者是小資產階級的組織，成立於一九〇六年，是由社會革命黨右翼分化出來的。人民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政治要求並沒有超出君主立憲的範圍。列寧把他們稱爲「社會主義立憲民主黨人」和「社會革命黨的孟什維克」。——（正文第十五頁）。

（一〇）指爲討論選舉第二屆國家杜馬的競選策略問題而於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舉行的社會民主黨彼得堡代表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四十個布爾什維克和三十一個孟什維克。以孟什維克佔多數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向代表們建議分爲市代表會議和省代表會議兩種。孟什維克想用這種辦法取得較多的選票。代表會議拒絕執行這一違反黨章的要求。孟什維克代表就退出大會以示抗議。留下的代表決定繼續開會。會議聽取了列寧的報告，宣佈反對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競選協議，認爲這種協議不僅在原則上是不允許的，而且在政治上是絕對有害的。會議通過決議，「立即把和革命民主派成立協議的這一對彼得堡極爲重要的問題提到議程上」。出席代表會議的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孟什維克宣稱，社會民主黨的彼得堡組織不一定要執行代表會議的決議，而退出代表會議的孟什維克則在報紙上建議和立憲民主黨人締結聯盟。——（正文第十七頁）。

（一一）「言論報」（日刊）是立憲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於一九〇六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十七頁）。

（一二）「我們的生活報」是布爾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文日報，於一九〇七年二月十八日在梯弗里斯公開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共出十三號。該報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六日「因持極端主張」被查封。——（正文第二十頁）。

（一三）「當代」（周刊）是孟什維克的雜誌，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七年三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四期。——（正文第二十一頁）。

（一四）「時報」是布爾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文日報，「我們的生活報」被封閉後，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在梯弗里斯出版，由斯大林主持。參加該報編輯部的還有齊哈卡雅和達維塔施維里。共出三十一號。——（正文第二十二頁）。

（一五）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七卷第五十五頁至第五十六頁。

「新萊茵報」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在科倫出版。該報領導者爲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文第二十四頁）。

(一六) 古爾柯是內政部長，利德瓦里是大投機商和冒險家，一九〇六年古爾柯把運送糧食到飢饉省份去的差事包給利德瓦里。這位沙皇大臣參與了利德瓦里的投機勾當，造成轟動一時的「利德瓦里事件」訴訟案。但古爾柯除被撤職外，並未因此案而受到任何懲罰。——（正文第二十四頁）。

(一七) 十月黨人，或稱「十月十七日同盟」，是工商業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反革命政黨，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組成。十月黨人完全擁護斯托雷平制度和沙皇政府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正文第二十四頁）。

(一八) 「帆船報」(日刊)是立憲民主黨的機關報，於一九〇七年在莫斯科創刊。——（正文第二十五頁）。

(一九) 「今日報」是低級趣味的資產階級晚報，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二十五頁）。

(二〇) 「言語報」(日刊)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創刊。從一九〇五年十月至一九〇六年七月是十月黨人的機關報。——（正文第二十五頁）。

(二一) 捷里亞生於一八八〇年。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九日在蘇維姆逝世，三月二十五日葬於庫泰依斯縣察蘭村。——（正文第二十九頁）。

(二二) 指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梯弗里斯工人在斯大林直接領導下舉行的五一遊行示威。遊行示威在梯弗里斯的中心區士兵市場舉行，參加者約二千人。遊行示威中與軍警發生衝突。十四個工人受傷，五十多個工人被捕。關於梯弗里斯的這次遊行示威，列寧的「火星報」報道說：「四月二十二日（舊曆），星期日，在梯弗里斯發生的事件是全高加索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從這一天起，高加索開始了公開的革命運動。」（見「火星報」一九〇一年七月第六號）——（正文第三十頁）。

(二三) 根據俄國社會民主黨梯弗里斯委員會的決定，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梯弗里斯工人舉行遊行示威，參加者約六千人。遊行示威以和軍隊發生衝突而結束。一百五十人被捕。——（正文第三十頁）。

(二四) 「無產階級鬥爭報」是用格魯吉亞文出版的秘密報紙，俄國社會民主黨高加索聯盟的機關刊物（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六六頁註二一）。——（正文第三十一頁）。

(二五) 「新生活報」是布爾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文日報，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四日在梯弗里斯出版。共出二十號。該報領導者為斯大林，經常撰稿人有達維塔施維里，捷里亞，基柯澤等人。——（正文第三十二頁）。

(二六)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〇七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十九日在倫敦舉行。在一切主要問題上，大會

都通過了布爾什維克的決議。斯大林代表梯弗里斯組織出席大會。斯大林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代表大會（一個代表的札記）」一文中總結了大會的工作（見本卷第四十九頁至第七十五頁）。——（正文第三十三頁）。

（三）崩得即「波蘭、立陶宛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於一八九七年十月組成（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六四頁註七）。——（正文第三十三頁）。

（三）「斯皮爾卡」是接近孟什維克的烏克蘭社會民主聯盟。「斯皮爾卡」於一九〇四年底成立，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革命烏克蘭黨」中分裂出來的。它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已不存在。——（正文第三十三頁）。

（三）「標槍報」是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文日報，於一九〇七年四月至六月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三十七頁）。

（三）「光綫報」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日報，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至一九〇六年一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魯吉亞文出版。——（正文第四十二頁）。

（三）第二屆國家杜馬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被沙皇政府解散。擁有六十五個成員的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被誣告進行軍事陰謀。大部分社會民主黨的代表被判處苦役和長期流放。——（正文第四十五頁）。

（三）「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代表大會（一個代表的札記）」一文沒有寫完，這是一九〇七年下半年警察監視加緊和後來斯大林被捕的緣故。——（正文第四十九頁）。

（三）維爾格什斯基是立憲民主黨「言論報」撰稿人梯爾柯娃的筆名。——（正文第四十九頁）。

（三）庫斯柯娃是「經濟派」綱領（*Program*）（「信條」）的起草人之一，於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七年為半立憲民主黨——半孟什維克的雜誌和報紙撰稿。——（正文第四十九頁）。

（三）阿列克辛斯基是第二屆國家杜馬的代表，加入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布爾什維克方面，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代表大會以後會堅持抵制第三屆國家杜馬的策略，後來脫離布爾什維克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亡命國外。——（正文第五十三頁）。

（三）關於國際社會黨人斯圖加特代表大會（第二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問題，起初曾列入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代表大會議程，但後來又被代表大會撤銷。國際社會黨人斯圖加特代表大會於一九〇七年八月五日至十一日（十八日至二十四日）舉行。代表布爾什維克出席大會的有列寧、盧那察爾斯基、李維諾夫等人。——（正文第五十六頁）。

(三) 略多沃依是馬林諾夫斯基的筆名，他的更爲大家所熟悉的名字是波格丹諾夫（也用過筆名「馬克西莫夫」）。一九〇三年參加布爾什維克派。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倫敦代表大會之後，脫離布爾什維克黨（見本卷註八〇）。死於一九二八年。——（正文第五十六頁）。

(三) 關於彼得堡組織的分裂，參看斯大林「彼得堡的競選和孟什維克」一文（見本卷第十五頁至第二十頁）。——（正文第五十六頁）。

(三) 關於土地問題的「國家杜馬宣言」草案是立憲民主黨人爲回答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日政府公佈農地產通告而擬定的，發表於一九〇六年七月五日。立憲民主黨人勸農民等待杜馬擬就土地法。孟什維克所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建議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投票擁護立憲民主黨的草案。但黨團投票反對這一草案。——（正文第五十七頁）。

(四) 人民黨（民族民主黨）是波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反革命政黨，成立於一八九七年。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時期，人民黨成爲波蘭反革命勢力的主要政黨，波蘭黑幫分子的政黨。——（正文第五十九頁）。

(四) 指第二屆國家杜馬代表孟什維克查帕里澤和策列鐵里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倫敦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見「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記錄」一九三五年版第二五〇頁和第三五四頁至三五五頁）。——（正文第五十九頁）。

(四) 蓋得派即蓋得的擁護者，是法國社會主義者隊伍中左的馬克思主義派。一九〇一年蓋得派組成「法國社會主義黨」。蓋得派對法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進行鬥爭，反對和資產階級妥協及社會主義者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爆發後，蓋得採取護國主義立場並加入資產階級政府。一部分仍舊忠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蓋得派，後來加入法國共產黨。——（正文第六十三頁）。

(四) 指彼列雅斯拉夫斯基（赫魯斯塔廖夫）的文章。

「巴庫之日」報，是自由派的日報，於一九〇七年六月創刊，一九〇八年一月停刊。——（正文第六十八頁）。

(四) 拉林、李恩（盧利葉）是孟什維克取消派。一九〇七年他曾鼓吹召開「廣泛的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一九一七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

艾里（盧津）是孟什維克取消派。——（正文第六十八頁）。

〔四〕指一九〇七年在梯弗里斯用格魯吉亞文出版的小冊子「全俄工人代表大會和「布爾什維克」」。『流浪漢』是指孟什維克艾拉澤，『舒拉』是他的妻子，則孟什維克培施金娜。——（正文第六十八頁）。

〔五〕切列萬寧論工人代表大會一文，曾收入孟什維克『政治形勢和策略問題』文集一九〇六年莫斯科版。——（正文第七十一頁）。

〔六〕林多夫是列切曾的筆名。——（正文第七十二頁）。

〔七〕一九〇七年秋，巴庫委員會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進行了第三屆國家杜馬的競選運動。在九月二十二日舉行的巴庫工人初選人大會上，布爾什維克當選為第三屆國家杜馬的候選人。斯大林草擬的『委託書』經大會通過，並由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巴拉漢內區委會印刷所印成傳單。——（正文第七十七頁）。

〔八〕本文是為行將召開的石油業主和巴庫工人代表協商會議而寫的。當時布爾什維克所實行的抵制協商會議的策略得到工人羣衆的廣泛支持。自一九〇七年十月十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巴庫油礦和工廠中舉行了幾次討論協商會議問題的工人大會。出席這些大會的工人有三分之二表示反對參加協商會議。主張無論如何要參加協商會議的孟什維克遭到了失敗。——（正文第七十九頁）。

〔九〕油礦工人是開採石油和鑽鑿油井的工人。機電工人是機械廠、發電廠和為油礦服務的其他輔助企業的工人。——（正文第八十頁）。

〔十〕「別什凱什」（直譯為禮物）是一套以發給獎金略施小恩小惠的辦法，曾被巴庫石油業主廣泛用來引誘工人脫離政治鬥爭並分裂工人運動。獎金多寡不一，由業主隨意決定。在罷工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堅決反對要求獎金，而為提高工人工資進行鬥爭。——（正文第八十一頁）。

〔十一〕柯切加爾是『汽笛報』正式編輯兼發行人施齊柯夫（薩馬爾采夫）的筆名。——（正文第八十二頁）。

〔十二〕『石油事業報』是石油業主的機關報，於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由石油業主代表大會委員會在巴庫出版。

代表大會委員會這一石油業資產階級的組織是在石油業主代表大會上由各大大公司的代表中選出的。代表大會委員會的任務是對工人階級進行有組織的鬥爭，在政府面前堅持石油業主的利益，保證石油業主獲得高額利潤等等。——（正文第八十五頁）。

〔五〕達什納克黨人是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達什納克楚純」的黨員。達什納克黨人爲維護阿爾明尼亞資產階級的利益曾在南高加索勞動者之間挑起民族仇恨。——（正文第八十五頁）。

〔五〕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以斯大林爲首的巴庫布爾什維克提出了「或者是有保障的協商會議，或者是不要任何協商會議」的口號。工人同意參加協商會議的條件如下：工會可以積極參加協商運動，工人可以廣泛討論要求，工人可以自由召開未來的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和選擇召開協商會議的時間。在巴庫的油礦和工廠中展開了選舉初選代表委員會的廣泛運動。這個初選代表委員會應當最後通過工人參加協商會議的條件和選出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的代表。工人選舉初選代表的集會是公開舉行的。大多數工人表示贊成布爾什維克的路綫。主張抵制協商會議的達什納克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主張舉行沒有任何保障的協商會議的孟什維克都沒有得到羣衆的支持。——（正文第九十三頁）。

〔五〕「汽笛報」是布爾什維克的公開報紙，巴庫石油工會的機關報。「汽笛報」創刊號於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日出版。「汽笛報」上刊載過斯大林許多篇指導性的文章，這些文章現已收入本卷。積極參加「汽笛報」工作的有德武勉、查帕里澤、斯洋達梁等人。布爾什維克編的該報最後一號（第三十四號）於一九〇八年六月一日出版。「汽笛報」從第三十五號起轉入孟什維克手中。布爾什維克開始在巴庫出版一種新的工會的公開報紙「巴庫工人報」，其創刊號於一九〇八年九月六日出版。——（正文第九十五頁）。

〔五〕參加巴庫米爾佐也夫油礦罷工的工人達一千五百名。罷工從一九〇八年二月十四日開始，繼續了七十三天。——（正文第九十五頁）。

〔五〕工人選舉初選代表的工作於一九〇八年二月初結束。但是初選代表委員會的召開因高加索總督沃龍佐夫——達什柯夫的命令而推遲了。初選代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於一九〇八年三月三十日舉行，以後的幾次會議在四月六日、十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九日舉行。奧爾忠尼啓澤後來就初選代表委員會的工作寫道：「在黑暗的反動勢力統治全俄國的時候，在巴庫却有真正的工人議會在開會。在這個議會上公開擬定了巴庫工人的一切要求，並由我們的發言人闡明了我們的全部最低綱領。」在初選代表委員會會議上，投票贊成布爾什維克提案的，即贊成參加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的，有一百九十九個初選代表，贊成抵制協商會議的有一百二十四票。贊成抵制的，即社會革命黨人和達什納克黨人退出了會議。關於委託書的最後通牒式的提案則以一百三十三票對五十四票的多數通過。——（正文第一〇三頁）。

〔五〕「油礦公報」是孟什維克的公開報紙，機械工會的機關報，於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月及一九〇八年三月至七月在巴庫出版，每星期出版兩三號。——（正文第一〇五頁）。

〔六〕卡—查（卡拉—穆爾查）是立憲民主黨黨員，巴庫石油業主的機關報「石油事業報」的編輯。——（正文第一一頁）。

〔七〕「柯企」——格魯吉亞語，意即強盜或僱傭的刺客。——（正文第一一三頁）。

〔八〕漢拉爾·沙法拉利也夫是一位布爾什維克工人，阿捷爾拜疆工人的天才組織者。漢拉爾在納甫塔爾油礦成功地組織了罷工以後，在一九〇七年九月十九日午夜遭石油業主僱傭的刺客暗殺，受致命重傷，幾天後就死了。工人響應俄國社會民主黨比比—愛巴特區委會的號召，舉行了兩天總罷工，要求納甫塔爾公司把殺死漢拉爾的兇手鑽井工頭賈法爾和經理阿布札爾別克趕出油區。漢拉爾的葬禮變成了有兩萬工人參加的、聲勢浩大的抗議遊行示威。斯大林在漢拉爾墓前發表了演說。——（正文第一一八頁）。

〔九〕「報刊評論」是斯大林一九〇八年夏天在巴庫監獄裏寫的。從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起至十一月九日被流放到索里維切果茨克時止，他一直被監禁在這個監獄裏。——（正文第一二五頁）。

〔十〕「火花報」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日報，於一九〇八年五月至七月在梯弗里斯用格魯吉亞文出版。——（正文第一二五頁）。

〔十一〕「思想報」是孟什維克的格魯吉亞文報紙，於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日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一二五頁）。

〔十二〕申德里柯夫兄弟（列甫、伊里亞、格列勃）於一九〇四年在巴庫建立了以「巴拉漢內和比比—愛巴特工人組織」為名的（後來改名為「巴庫工人同盟」）祖巴托夫組織。申德里柯夫分子對布爾什維克大肆誣蔑。申德里柯夫分子提出狹隘行會的經濟口號來瓦解罷工鬥爭，竭力破壞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鼓吹建立「調解室」和勞動組合等等。申德里柯夫兄弟領取石油業主和沙皇政府的津貼。孟什維克正式承認申德里柯夫分子的祖巴托夫組織是黨的組織。巴庫的布爾什維克揭露申德里柯夫分子是沙皇暗探局的僱傭走狗，並擊潰了他們。

「正義事業」雜誌是申德里柯夫兄弟在彼得堡出版的。該雜誌創刊號於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出版，第二、三兩期合刊於一

九〇八年五月出版。下面提到的格羅舍夫和卡利寧是孟什維克，中德里柯夫兄弟的擁護者。——（正文第二二七頁）。

(六) 古卡索夫是巴庫最大的石油業主之一，是石油業主代表大會委員會的領導人。——（正文第二二八頁）。

(六) 討論召開與石油業主舉行協商會議問題的籌備委員會會議於一九〇八年五月十三日舉行，出席會議的有石油業主十四人和工人十五人。當天報上載有消息，說工會代表未被允許參加籌備委員會。出席會議的工人代表團由於沒有工會代表參加而拒絕討論問題。籌備委員會主席鍾柯夫斯基（沙皇高加索總督府諮議會委員）藉口工人拒絕開會而宣佈籌備委員會會議停開。——（正文第一三一頁）。

(六) 「土地和自由」和「在鬥爭中才能取得自己的權利」是社會革命黨的口號。——（正文第一三二頁）。

(七) 巴庫在一九〇三年七月一日開始罷工，梯弗里斯在七月十四日，巴士姆在七月十七日。罷工席卷了整個南高加索，並波及南俄（敖德薩、基輔、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等地）。——（正文第一三三頁）。

(七) 巴庫總罷工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是由巴拉漢內和比比—愛巴特兩個油礦區的路特希爾德、諾貝爾、米爾佐也夫油礦的罷工開始的。十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罷工擴展到巴庫大多數的企業。這次罷工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進行的。巴庫委員會在罷工的頭幾天散發的傳單中提出了政治口號並擬定了經濟要求，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提高工資，取消罰款等。在罷工時期舉行了許多次羣衆大會和工人集會。罷工的結果，工人獲得勝利，工人和石油業主訂立了俄國工人運動史上第一個集體合同。「這次罷工好像是大革命風暴將臨時的雷前閃電」（見「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七十七頁）。巴庫十二月罷工的意義的詳細說明，見本卷第一六一頁至第一六五頁。——（正文第一三三頁）。

(七) 「巴庫報」是資產階級的報紙，於一九〇二年創刊，一九一八年停刊，其間有過幾次短期的中斷。該報主要代表阿爾明尼亞石油業和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正文第一三八頁）。

(七) 這裏指的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電報里報」於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七日第四號上刊載的「巴庫工人委員會」一文。——（正文第一三九頁）。

(七) 李恩（拉林）的小冊子「關於同石油業主舉行協商會議」於一九〇七年由機械工會出版。——（正文第一三九頁）。

(七) 「無產者報」是布爾什維克在黨的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之後創辦的秘密報紙，於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九月三日）創刊，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一日）停刊。「無產者報」出了五十號，前二十號在芬蘭出版，其餘在

日內瓦和巴黎出版。「無產者報」事實上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機關報，由列寧主編。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無產者報」在保持和鞏固布爾什維克組織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正文第一四二頁）。

〔六〕「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是孟什維克取消派在國外出版的機關報，於一九〇八年二月創刊，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停刊。參加「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編輯部的有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唐恩、馬爾丁諾夫。鑒於「呼聲報」所持的顯然是取消主義方針，普列漢諾夫從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起停止在該報工作，後來又正式退出編輯部。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全會雖於一九一〇年一月決定停止出版「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但孟什維克置之不理，繼續出版，在報紙上公開鼓吹取消主義的思想。——（正文第一四二頁）。

〔七〕「社會民主黨人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於一九〇八年二月創刊，一九一七年一月停刊。創刊號在俄國出版，以後各號移至國外出版，最初在巴黎，後來在日內瓦。根據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中央機關報的編輯部由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的代表組成。「社會民主黨人報」登載過列寧的許多篇指導性的文章。列寧曾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內部為徹底的布爾什維克路線進行鬥爭。一部分編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對取消派採取了調和態度，企圖破壞列寧路線的執行。孟什維克馬爾托夫和唐恩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實行怠工，同時在「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上公開為取消主義辯護。由於列寧毫不調和地反對取消派，馬爾托夫和唐恩於一九一一年六月退出「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起，「社會民主黨人報」由列寧主編。收入本卷的幾篇斯大林的文章曾登載在這個報上。「社會民主黨人報」有系統地登載了有關地方黨組織工作的材料，其中包括有關南高加索黨組織工作的材料。——（正文第一四二頁）。

〔八〕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會議（「第二次全俄代表會議」）於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舉行。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會議（「第三次全俄代表會議」）於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舉行。——（正文第一四八頁）。

〔九〕「黨的生活」是「巴庫無產者報」一個專欄的名稱。——（正文第一五七頁）。

〔十〕「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事實上就是布爾什維克的中央，是一九〇七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倫敦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派會議上選出的。「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會議是一九〇九年六月八日至十七日（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列寧領導下於巴黎舉行的。會議斥責召回派和最後通牒派是「變相的取消派」。會議認為召回派所設立的喀普里「黨」

校是「脫離布爾什維克的一個派別組織的中心」。波格丹諾夫（得到尙采爾支持）拒絕服從「無產者報」擴大編輯部的決議而被開除出布爾什維克組織。——（正文第一五七頁）。

（八二）巴庫委員會的決議於一九〇九年十月三日（十六日）刊載在「無產者報」第四十九號上，編輯部加按語如下：「除巴庫同志們關於召回派、最後通牒派和造神派說了一些話之外，我們什麼也沒有說。巴庫的同志們反對馬克西莫夫同志的行為，因為他聲明不服從編輯部的決定」。但是，如果馬克西莫夫同志服從布爾什維克機關報的決議並且不對布爾什維克派進行許多破壞活動，那就不會有什麼「分裂」。而「不服從」當然也就是「分裂」。關於我們的似乎是「分裂的」政策，我們在本號刊載的「和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的談話」一文中已詳加說明，因為編輯部在巴庫的決議送來之前，已收到彼得堡布爾什維克一份類似的決議。編輯部所提到的「和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的談話」一文是列寧寫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六卷第四十九頁至第五十九頁）。——（正文第一六〇頁）。

（八三）「阿姆沙拉」直譯是老鄉或同鄉，人們這樣稱呼到巴庫去謀生的伊朗雜工。——（正文第一六一頁）。

（八四）「高加索來信」寫於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月間，預定在「無產者報」或「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表；因為當時「無產者報」已停刊，「來信」就被轉寄到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高加索來信」之一是尖銳批評取消派，所以「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內的孟什維克拒絕在中央機關報上刊登。這封信後來在「辯論專頁」（「社會民主黨人報」附刊）上發表。——（正文第一六七頁）。

（八五）一八九〇年六月十二日的地方自治局條例是沙皇政府用以代替一八六四年的條例的。新條例規定以等級資格代替以前的財產資格，這就使貴族在大部分縣的地方自治局中取得了絕對多數，並加強了地方自治局對中央政權的從屬關係。——（正文第一七〇頁）。

（八六）「巴庫無產者報」是布爾什維克的秘密報紙，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止在巴庫出版。共出七號。「巴庫無產者報」創刊號是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組織巴拉漢內區黨的機關報出版的，第二號是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組織巴拉漢內區和黑城區黨的機關報出版的，從第三號起該報成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的機關報。「巴庫無產者報」是由斯大林主編出版的，報上刊載過他的好幾篇指導性的文章，現都收入本卷。參加「巴庫無產者報」工作的還有邵武勉、查帕里澤、斯洋達梁等人。「巴庫無產者報」出到第五號中斷。後於一九〇九年八月一日，即斯大林從索里維

切果茨克流放地逃回巴庫之後復刊。最後一號即第七號於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巴庫無產者報」編輯部和「無產者報」、「社會民主黨人報」曾有密切聯系。——（正文第一七二頁）。

〔八〇〕「勞動」合作社是巴庫市和各石油區工人的聯合消費合作社，創辦於一九〇八年初。「勞動」合作社有社員一千二百人左右。合作社在巴拉漢內、比比—愛巴特、後車站和黑城等區設有分社。合作社於一九〇九年出版「勞動呼聲」雜誌（周刊）。布爾什維克積極參加該社工作。——（正文第一七六頁）。

〔八一〕「知識就是力量」和「科學」這兩個俱樂部的目的是幫助石油工人自學。俱樂部曾舉辦一般知識學習班和技術學習班，組織各種小組和講演會。俱樂部的經費靠會費和舉辦講演會、戲劇演出的收入。為各石油區服務的「知識就是力量」俱樂部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科學」俱樂部是孟什維克領導的。——（正文第一七六頁）。

〔八二〕戒酒代表大會於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彼得堡開幕，一連開了幾天。出席大會的代表共五百一十人。大會的工人代表有四十三人，其中二人是巴庫工人代表。會後一部分工人代表立即被警察逮捕。——（正文第一七七頁）。

〔八三〕「開端報」是孟什維克用格魯吉亞文出版的公開報紙，於一九〇八年三月四日至三十日在梯弗里斯出版。——（正文第一七九頁）。

〔八四〕安恩、諾、柯斯特羅夫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取消派首領饒爾丹尼亞的筆名。——（正文第一七九頁）。

〔八五〕這是普列漢諾夫於一八八九年在國際社會黨人巴黎代表大會上所作演講中的話。——（正文第一八二頁）。

〔八六〕指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沙皇大臣斯托雷平所頒佈的關於允許農民退出村社另立田莊的土地法（指令）。——（正文第一八七頁）。

〔八七〕信中是指一九一〇年一月二日至二十三日（一月十五日至二月五日）在巴黎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全會。全會通過必須「消滅一切相當有組織的派別，把它們變成不違反黨的行動一致的政派」的決議。由於列寧的堅持，全會斥責了取消派和召回派（但在決議中沒有把「取消派」和「召回派」的真名稱提出來）。由於調和分子在會上佔優勢，所以他們得以通過幾個反列寧路線的決議。雖然列寧曾提出抗議，但仍有幾個孟什維克取消派分子被選入黨的中央機關。全會閉會後，取消派更加緊他們的反黨活動。——（正文第二〇一頁）。

〔八八〕指一九一〇年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一月全會所通過的關於改組（「改革」）黨的中央機關（中央委員會、中

央機關編輯部、中央委員會國外局、中央委員會俄國委員會的決議（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〇年第六版卷上第一五七頁和第一五八頁）。——（正文第二〇一頁）。

〔五〕信中說到，斯大林在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還有六個月（到一九二一年六月底）期滿。——（正文第二〇一頁）。

〔六〕「思想」（月刊）是布爾什維克公開的哲學和社會經濟的雜誌，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一年四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五期。這雜誌是列寧創辦的，他並且實際領導了這雜誌的工作。在「思想」雜誌上，自創刊號至第四期，刊載了列寧的一些論文。積極參加這雜誌工作的有沃羅夫斯基、奧里明斯基、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給該雜誌撰稿的，除布爾什維克外，還有普列漢諾夫和其他孟什維克黨分子。——（正文第二〇一頁）。

〔七〕「工人報」是發行很廣的布爾什維克報紙，於一九一〇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八月十二日）在巴黎出版。該報創辦人和領導者為列寧。黨的布拉格代表會議（一九二二年一月）曾表揚「工人報」在保衛黨和黨性方面的功績，並承認它為黨中央委員會的正式機關報。——（正文第二〇一頁）。

〔八〕「明星報」是布爾什維克的公開報紙，於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是周刊，後來每周出兩三號）。「明星報」的活動是由列寧指導的，他經常從國外寄文章給這個報紙。經常給「明星報」撰稿的有莫洛托夫、奧里明斯基、坡列塔也夫、巴圖林、葉列梅也夫等人。高爾基也曾參加該報工作。一九二二年春，斯大林留居彼得堡時曾直接領導該報工作，並在該報發表幾篇文章，這些文章都已收入本卷。該報的發行數有幾號曾達五六萬份。「明星報」為出版布爾什維克「真理報」（日刊）做了準備工作。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皇政府封閉「明星報」。繼「明星報」之後的是「涅瓦明星報」，該報出一九二二年十月。——（正文第二〇二頁）。

〔九〕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初寫的傳單「擁護黨！」和列寧寫的傳單「俄國社會民主黨競選綱領」曾一起在全國各地廣泛散發。中央局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十六號上發出通報說：「中央在俄國國內印發兩種傳單：（一）擁護黨（六千份）；（二）競選綱領（一萬份）。這些傳單送到十八個地方，其中包括一些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央委員會的傳單到處受到歡迎，莫不以數量太少而引以為憾。」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奧爾忠尼啓澤從基輔來信說，兩種傳單都「產生了良好的印象，大家都很歡迎」。稍後克魯普斯卡娅受列寧之託來信說：「我們收到了你們的兩封信（一封關於地方工作，一封關於擬定的計劃）和兩份傳單：『擁護黨』和『綱領』。我們致熱烈的敬禮。」——（正文第二〇三頁）。

(100) 傳單中是指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至十七日(十八日至三十日)在布拉格舉行的黨的第六次全俄代表會議。這次代表會議統一了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正式確立了獨立的布爾什維克黨。根據代表會議的決議，孟什維克被驅逐出黨，永遠結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形式上聯合在一個黨內的局面。布拉格代表會議給新型的黨奠定了基礎(見「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七三頁至第一八一頁)。——(正文第二〇三頁)。

(101) 「五一萬歲！」這一傳單是斯大林一九二二年四月初在莫斯科寫的。傳單由梯弗里斯的一個公開印刷所秘密印刷，以後全部運往彼得堡。——(正文第二〇九頁)。

(102) 國家根本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在國家杜馬休會期間，內閣有權提出法案交由沙皇直接批准。根據這一條，斯托雷平不經過杜馬而施行了許多重要法令，關於土地問題的法令即是其中之一。——(正文第二一七頁)。

(103) 「生活需要」雜誌於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二二年在彼得堡出版。一九二二年夏列寧寫信給高爾基談到這個雜誌說：「順便談到，這個奇怪的雜誌是取消派、勞動團和路標派的雜誌。」(見「列寧文集」第一卷第一二二五頁)——(正文第二二〇頁)。

(104) 和平革新黨是工商業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政黨，成立於一九〇六年。列寧稱和平革新黨是「和平掠奪黨」。——(正文第二二〇頁)。

(105) 「生活事業」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公開雜誌，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二二三頁)。

(106) 「我們的曙光」(月刊)是公開的雜誌，孟什維克取消派的機關刊物，於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二二三頁)。

(107) 進步派是俄國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集團，他們採取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之間的中間立場。進步派的首領是莫斯科的廠主列布申斯基和柯諾瓦洛夫等。——(正文第二三二頁)。

(108) 第四屆國家杜馬的選舉是在一九二二年秋季舉行的。但是從這一年的春季起，以列寧和斯大林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就開始進行競選運動的準備工作。布爾什維克黨在第四屆杜馬的選舉中，是在建立民主共和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下獨立活動的。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競選綱領」，綱領印成傳單在俄國許多大城市中散發。在競選運動中，斯大林直接領導布爾什維克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因被捕而暫時中斷了參加國家

杜馬選舉的準備工作，一九二二年九月，正當競選運動最熱烈的時候，斯大林逃出納頓姆流放地，回到彼得堡。——（正文第二三五頁）。

(一六)「庶民報」是於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的黑幫報紙，是國家杜馬極右派代表的機關報。——（正文第二四〇頁）。

(一七)「新時報」是於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彼得堡出版的報紙，是反動貴族和官僚集團的機關報。自一九〇五年起成爲黑幫的機關報之一。——（正文第二四〇頁）。

(一八)「莫斯科呼聲報」(日刊)是十月黨人的機關報，於一九〇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五年在莫斯科出版。該報編輯兼發行人爲古契柯夫。——（正文第二四二頁）。

(一九)「真理報」是工人布爾什維克的日報，於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二四年七月八日在彼得堡出版。「真理報」是根據列寧的指示和斯大林的倡議創辦的。斯大林作爲黨的中央委員領導擬定「真理報」編輯方針的工作，並參加該報創刊號的編輯工作。四月二十二日即「真理報」創刊號出版的那天，斯大林被捕。直到一九二二年秋天，從納頓姆流放地逃出之後，他才得以重新在「真理報」工作。自一九二二年十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真理報」刊載了斯大林的好幾篇指導性的文章，這些文章都已收入本卷。「真理報」的編輯委員和經常撰稿者有莫洛托夫、奧里明斯基、巴圖林、斯維德洛夫、高爾基、薩莫依洛娃等人。在兩年半中，沙皇政府曾八次封閉「真理報」，但是由於工人的支持，「真理報」又以新的名稱（「工人真理報」、「北方真理報」、「勞動真理報」、「擁護真理報」等等）重新出版（關於「真理報」的意義和作用，見「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八七頁至第一九二頁）。——（正文第二四三頁）。

(二〇)「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初寫的，在彼得堡各大企業的工人大會上和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七日的工人初選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斯大林在若干工廠的飛行集會上領導討論「委託書」。列寧特別重視這個「委託書」。他把這個「委託書」送往印刷所刊登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的時候，曾在原稿上批示：「一定要交還，不要弄髒。保存這個文件極端重要。」「委託書」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十八日）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十八、二十九兩號合刊上發表。列寧在給「真理報」編輯部的信中堅持說：「一定要把這個給彼得堡代表的委託書用大號字登在顯著地位。」（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五卷第三十八頁）——（正文第二四五頁）。

〔二四〕「解釋」這個名詞是因「已經政府化了的」參議院遵照政府的意圖解釋選舉法而產生的。政府當局在「解釋」選舉法時，蠻橫無理地把已經進行的選舉宣佈無效。——（正文第二四五頁）。

〔二五〕彼得堡省工人選民團選人的選舉，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五日的省的初選人代表大會上舉行的。雖然彼得堡二十一個大企業被剝奪了選舉權，但是在代表大會選出的六個覆選人中有四個是布爾什維克。在羣衆的壓力下，被「解釋」的企業的工人恢復了選舉權。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四日在這些企業中重新進行初選人的選舉，十月十七日舉行了彼得堡省工人選民團第二次初選人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又進行了覆選人的第二次選舉，五個人——兩個布爾什維克和三個孟什維克獲得了絕大多數的選票。次日舉行補充投票，結果有一個布爾什維克當選爲第六名覆選人。

關於競選的過程，在刊載於「社會民主黨人報」的斯大林通訊「彼得堡的選舉」中有詳細的描述。（見本卷第二六九頁至第二八一頁）——（正文第二四九頁）。

〔二六〕「光綫報」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公開日報，於一九二二年九月至一九二三年七月在彼得堡出版。取消派在「光綫報」上公開反對秘密的黨。該報主要是靠資產階級的經費維持的。——（正文第二四九頁）。

〔二七〕指奧布霍夫工廠。——（正文第二五三頁）。

〔二八〕「告俄國全體男女工人書」這一傳單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爲紀念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件八周年寫的。關於印發這種傳單的必要性，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六日）從克拉柯夫寫信給彼得堡的斯大林說：「親愛的朋友，關於紀念一月九日，預先考慮好和準備好是極端必要的。應當預先準備好傳單，號召舉行羣衆大會，罷工一天和遊行示威（這些事情應當在當地決定，在當地要看得清楚些）……傳單的口號應當是三個革命口號（建立共和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沒收地主土地），並要特別着重指出羅曼諾夫皇朝三百周年紀念的「可恥」。如果沒有充分的而且是極充分的把握能够在彼得堡弄好傳單，那就必須及時在這裏預先準備好再運去。」（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四〇二頁）——（正文第二六三頁）。

〔二九〕一九二二年八月至十月，庫托馬爾和阿爾加契兩個苦役監獄（尼布楚苦役流放地，位於外貝加爾）的政治犯爲抗議監獄當局的暴行，發生大批絕食和自殺事件。爲了對此表示響應，彼得堡、莫斯科和華沙工人舉行抗議罷工，學生舉行集會。——（正文第二六三頁）。

〔二〇〕一九二二年十月，塞瓦斯托坡里海軍軍事法庭判決一百四十二名被控準備在黑海艦隊起義的水手。被告中十七人被判處死刑，一百零六人被判處苦役，十九人被判決無罪。爲反對法庭的判決，莫斯科、彼得堡、哈爾科夫、尼古拉也夫、里加和俄國其他城市都舉行了羣衆性的抗議罷工和遊行示威。——（正文第二六三頁）。

〔二一〕一九二一年底，報刊上發表揭露政府陷害行爲的新文件：控告社會民主黨杜馬代表的材料完全是彼得堡暗探局一手捏造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旬，第三屆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向杜馬提出要求，——重新審查社會民主黨第二屆杜馬代表的案件。這一要求被杜馬否決了。因此，彼得堡、里加、華沙和俄國其他城市都舉行了成千上萬人的羣衆大會，並通過決議要求釋放被判刑的代表。——（正文第二六五頁）。

〔二二〕彼得堡進行競選期間，黨中央的代表是斯大林。彼得堡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由彼得堡委員會中少數委員組成，負責進行日常工作。——（正文第二七〇頁）。

〔二三〕取消派從他們一九二二年九月發表的競選綱領中取消了俄國社會民主黨最低綱領的基本政治口號。他們用「國家杜馬和地方自治機關選舉時」應有普選權的要求代替建立民主共和國的口號，用「重新審查第三屆杜馬土地立法」的要求代替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正文第二七二頁）。

〔二四〕指一九二二年八月在維也納舉行的取消派的所謂「八月」代表會議。這個代表會議是爲了對抗布爾什維克的布拉格代表會議而召開的。——（正文第二七四頁）。

〔二五〕布爾什維克「X」是披列塔也夫，取消派「Y」大概是馬耶夫斯基（古托夫斯基）。下面提到的彼得堡取消派分子「阿布×××和列×××」是阿布羅西莫夫和列維茨基（策傑爾包姆）。——（正文第二七六頁）。

〔二六〕「涅瓦呼聲報」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公開周報，於一九二二年五月至八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二七八頁）。

〔二七〕見「高加索來信」，本卷第一七九頁至第一八二頁。——（正文第二八五頁）。

〔二八〕在「社會民主黨人日誌」第九期上，普列漢諾夫批評了格魯吉亞孟什維克取消派季布拉澤在「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上發表的言論。——（正文第二八五頁）。

〔二九〕大伊斯蘭主義是一種反動的宗教政治思想，產生於十九世紀後半期蘇丹土耳其的土耳其地主、資產階級和僧侶

中，後來又傳播到其他回教民族的有產階級中。大伊斯蘭主義宣傳一切信奉伊斯蘭教（回教）的民族聯合成一個整體。各回教民族中的統治階級力圖利用大伊斯蘭主義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扼殺東方各族勞動人民的革命運動。現在美英帝國主義者正利用大伊斯蘭主義作為準備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帝國主義戰爭和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工具。——（正文第二八五頁）。

（三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是一九二二年底至一九二三年初在維也納寫的，第一次發表在一九二三年「啓蒙」雜誌第三期至第五期上，署名科·斯大林，題為「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斯大林的這篇論文於一九一四年由「波濤」出版社（彼得堡）出了單行本，書名為「民族問題和馬克思主義」。內政部大臣下令一切公共圖書館和閱覽室查禁此書。一九二〇年，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重印這一著作，把它編入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文集」（土拉國家出版社）。一九三四年，這篇文章編入了斯大林的論文演說選輯「馬克思主義和民族殖民地問題」。列寧在「論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民族綱領」一文中論到民族問題在這個時期被提到重要地位的原因，他說：「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獻中，對於這種實際情況和社會民主黨民族綱領的原則，最近已有詳細論述（在這方面首屈一指的是斯大林的論文）。一九一三年二月（公曆），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在給高爾基的信中寫道：『我們這裏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魯吉亞人在埋頭給『啓蒙』雜誌寫一篇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奧國的材料。』當列寧知道有人提議把這篇文章當作討論的文章時，他堅決反對：『當然我們絕對反對。文章寫得好極了。這是當前的重要問題，我們對胡得混蛋們絲毫也不放棄原則立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文獻資料）在斯大林被捕後不久，即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寧寫信給「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說：『……國內逮捕事件嚴重。柯巴被抓去了……柯巴在被捕前寫了一篇很長的（可供『啓蒙』雜誌三期用的）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文。好！應當為真理而對胡得和取消派中的分離主義者及機會主義者進行戰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文獻資料）——（正文第二八九頁）。

（三一）錫安主義①是猶太資產階級一種反動民族主義，為猶太知識分子和一部分最落後的猶太工人所擁護。錫安主義者竭力使猶太工人羣衆脫離無產階級的共同鬥爭而孤立起來。錫安主義組織現在是美帝國主義者的間諜組織，專事反對蘇聯、反對人民民主國家、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中革命運動的陰謀活動。——（正文第二九〇頁）。

（三二）奧國社會民主黨布隆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舉行。斯大林在本文第四章所引用的便是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問題所通過的決議原文。（見本卷第三一六頁至第三一七頁）——（正文第三一〇頁）。

（三三）「在我國，謝天謝地，沒有國會」，這句話是沙皇政府的財政部大臣（後來任內閣首相）柯柯甫采夫於一九〇八年四

月二十四日在國家杜馬中說的。——（正文第三一四頁）。

〔二四〕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章。（見「馬克思選集」兩卷本一九四一年俄文版卷上第一五四頁）——（正文第三二四頁）。

〔二五〕奧國社會民主黨維也納代表大會（或稱維姆堡代表大會，因大會在維也納維姆堡旅館舉行）於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六月六日至十二日）舉行。——（正文第三二六頁）。

〔二六〕指一八四四年刊載於《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鑑」）上的馬克思的論文《Zur Judenfrage》（「論猶太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八年俄文版第一卷）——（正文第三二七頁）。

〔二七〕崩得第八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一〇年九月在里沃夫舉行。——（正文第三三二頁）。

〔二八〕一九一二年十月二日（十五日），普列漢諾夫在「護黨報」上發表了「又一個分裂的代表會議」一文，他在這篇文章中斥責了取消派的「八月」代表會議，並指出崩得分子和高加索社會民主黨人的立場是使社會主義選就民族主義。崩得分子首領柯索夫斯基致函取消派雜誌「我們的曙光」編輯部，批評普列漢諾夫。……（正文第三三五頁）。

〔二九〕崩得第七次代表大會於一九〇六年八月底至九月初（公曆）在里沃夫舉行。——（正文第三三五頁）。

〔三〇〕「火星報」是第一個全俄馬克思主義的秘密報紙，於一九〇〇年由列寧創辦。（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三六八頁註二六）——（正文第三三七頁）。

〔三一〕瓦爾克是一個公開站在沙文主義和分離主義立場上的捷克社會民主黨人。——（正文第三三八頁）。

〔三二〕「我們的生活報」是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日報，於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庫泰依斯用格魯吉亞文出版。——（正文第三四〇頁）。

〔三三〕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於一九一二年十月，交戰一方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微爾諾戈里亞，另一方是土耳其。——（正文第三五二頁）。

〔三四〕見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會議（「第三次全俄代表會議」）和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一九〇九年一月三日至九日）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會議（「一九〇八年全俄代表會議」）的決議。（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〇年第六版卷上第一一八、一三三）

一頁)——(正文第三五七頁)。

(二四) 亞格洛是波蘭社會黨黨員，在第四屆國家杜馬選舉時由崩得、波蘭社會黨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為反對波蘭社會民主黨人而組成的聯盟選為華沙代表。社會民主黨的杜馬黨團以孟什維克取消派(孟什維克七人團)的多數票對六名布爾什維克的代表通過決議，接受亞格洛加入社會民主黨黨團。——(正文第三五七頁)。

(二五) 「啓蒙」(月刊)是布爾什維克的公開雜誌，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起在彼得堡出版。列寧領導這雜誌的工作，他在俄國內的編輯委員(薩維里也夫、奧里明斯基、葉利扎羅娃)保持着經常的通信關係。斯大林在留居彼得堡期間曾積極參加這雜誌的工作。該雜誌和「真理報」有密切聯繫。一九一四年六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政府將該雜誌封閉。一九一七年年秋，這雜誌又出過一次兩期的合刊。——(正文第三五八頁)。

(二六)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第四屆杜馬的工人代表表示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光綫報」工作人員的名單中。同時他們仍繼續在「真理報」工作。實際上工人代表並沒有參加「光綫報」的工作。中央對這問題發出指示後，他們就聲明將自己的名字從「光綫報」工作人員名單中勾銷。由於這個聲明，在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兩派(布爾什維克的六人團和孟什維克的七人團)之間發生了激烈的鬥爭。——(正文第三五九頁)。

(二七) 指第三屆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正文第三六〇頁)。

(二八) 「活的事業報」是孟什維克取消派的公開周報，於一九一二年一月至四月在彼得堡出版。——(正文第三六〇頁)。

(二九) 「連納慘案一周年」這一傳單是斯大林於一九一三年一、二月間在克拉柯夫寫的。傳單由克魯普斯卡婭謄寫，用膠印機印刷，然後轉運俄國，在彼得堡、基輔、莫斯科、梯弗里斯等城市散發。——(正文第三六五頁)。

(三〇) 第四屆國家杜馬會議於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開始。——(正文第三六七頁)。

① 舊約「以賽亞書」中稱錫安為聖城，是猶太國被「外邦侵吞，傾覆荒涼」之後一個僅存的地方，先知以賽亞預言「錫安必蒙救贖」，故猶太復國主義者自稱錫安主義者。——譯者註。

年 表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

一九〇七年

- 一月一日 斯大林領導的格魯吉亞文「火炬報」創刊號出版。
格魯吉亞文「新時代報」第八號繼續刊載斯大林的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 二月十日 斯大林爲考茨基「俄國革命的動力和前途」一書格魯吉亞文版作序言。
- 二月十八日 斯大林領導的格魯吉亞文「我們的生活報」創刊號出版，上面刊載斯大林的「彼得堡的競選和孟什維克」一文。
-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我們的生活報」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各號繼續刊載斯大林的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 三月十一日 斯大林領導的格魯吉亞文「時報」創刊號出版。
- 三月十三日 「時報」第二號刊載斯大林的「立憲民主黨人專制還是人民專制？」一文。
- 三月十七日 「時報」第六號刊載斯大林的論文「無產階級在鬥爭，資產階級在和政府締結聯盟」(社論)。
- 三月二十二日 「時報」第十號刊載斯大林的「悼念捷里亞同志」一文。
- 三月二十八日和三十日 「時報」刊載梯弗里斯布爾什維克工人關於選舉斯大林爲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代表的決議。

年 表

斯大林全集 第二卷

四月四日至六日和
十日
「時報」第二十一號至第二十二號
「會主義？」

四月八日
「時報」第二十五號刊載斯

四月十日
「時報」第二十六號刊載斯

四月十三日
「時報」第二十九號刊載斯

四月三十日至五月
十九日
斯大林代表黨的梯弗里斯組

六月上半月
斯大林出席俄國社會民主

斯；在巴庫、梯弗里斯和格
的報告。斯大林領導布爾什

六月二十日
斯大林主編的布爾什維克報

「杜馬的解散和無產階級的
札記」。

夏季至秋季
斯大林在巴庫各區舉行的講

斯大林領導抵制和石油業十

七月十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二號刊

續稿。

七月底
巴庫布爾什維克在斯大林領

八月十二日
「汽笛報」創刊號出版。這

八月二十四日

在五個區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和社會民主黨回民小組「古墨特」的聯席代表會議上，斯大林當選為黨的全市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

九月至十月

斯大林領導第三屆國家杜馬競選運動。

九月二十二日，在巴庫工人選民團初選人大會上，通過斯大林起草的給第三屆國家杜馬社會民主黨代表的「委託書」。

九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在被資本家僱傭的刺客所暗殺的布爾什維克工人漢拉爾·沙法拉利也夫墓前發表演說。

「汽笛報」第四號刊載斯大林的「應當抵制協商會議！」一文。

十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在布爾什維克巴庫全市代表會議上，當選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委員。

十一月上半月

斯大林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在薩朗奇醫院舉行的會議。

十一月二十二日

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在斯大林領導下舉行罷工一天，以抗議對第二屆國家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審判。

十一月底

斯大林因黨的工作到梯弗里斯。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

斯大林領導巴庫工人在工人權利得到保障的條件下參加與石油業主舉行協商會議的運動。

至一九〇八年三月

一九〇八年

一月十三日

「汽笛報」第十四號刊載斯大林的論文「選舉以前」（社論）。

一月至二月

巴庫布爾什維克在斯大林領導下組織多次大罷工。

年 表

二月三日

『汽笛報』第十七號刊載斯大林的論文「再論有保障的協商會議」(社論)。

二月

因黑幫襲擊事件越來越多，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在斯大林領導下成立「自衛司令部」。

三月二日

『汽笛報』第二十一號刊載斯大林的「我們最近時期的罷工說明了什麼？」一文。

三月九日

『汽笛報』第二十二號刊載斯大林的論文「石油業主在策略上的轉變」(社論)。

三月十六日

『汽笛報』第二十三號刊載斯大林的論文「必須作好準備！」(社論)。

三月二十五日

化名爲蓋奧茲·尼札拉澤的斯大林被捕，囚禁於巴庫的拜洛夫監獄。

三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在獄中和巴庫布爾什維克組織建立並保持聯系，領導俄國社會民主黨巴庫委員會，並給『巴庫無產者報』和『汽笛報』寫文章。

在獄中，斯大林在政治犯中進行工作，與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爭論，組織政治犯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

三月三十日

『汽笛報』第二十五號刊載斯大林的論文「經濟恐怖和工人運動」(社論)。

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八日

『汽笛報』第二十八、第三十、第三十二各號刊載斯大林的「石油業主對經濟恐怖的看法」一文。

七月二十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五號刊載斯大林的兩篇文章：「奴顏婢膝的「社會主義者」」和「假仁假義的祖巴托夫分子」。

該報附刊載斯大林的「協商會議和工人」一文。

十一月九日

斯大林被流放到沃洛果達省，由警察公開監視，期限兩年。

一九〇九年

- 一月
斯大林被遞解到沃洛果達後，關在沃洛果達監獄裏。
- 一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的流放地被確定為沃洛果達省索里維切果茨克鎮。
- 二月八日
斯大林在被遞解到流放地的途中，患回歸熱，從維亞得卡監獄轉送到維亞得卡省地方醫院。
- 二月二十日
斯大林從醫院又被轉送到維亞得卡監獄。
- 二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到達索里維切果茨克。
- 六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從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逃走。
- 七月初
斯大林路過彼得堡，停留了幾天。
- 七月上半月
斯大林秘密到達巴庫，領導巴庫和南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恢復和鞏固工作。
- 八月一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六號出版（停刊一年後），刊載斯大林寫的社論『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
- 八月二日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巴庫委員會在斯大林領導下通過關於『無產者報』編輯部內部情況的決議，表示『擁護以列寧同志為代表的編輯部內多數人的立場』。
- 八月二十七日
『巴庫無產者報』第七號刊載斯大林的兩篇文章：『黨內危機和我們的任務』（續完）和『關於即將到來的總罷工』。
- 九月上半月
斯大林從巴庫到達梯弗里斯，組織和指導梯弗里斯布爾什維克組織反對孟什維克取消派的鬥爭。
- 九月底
斯大林設法恢復巴庫委員會秘密印刷所的工作。
- 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初
斯大林到達梯弗里斯，籌備召開黨的梯弗里斯全市代表會議和出版布爾什維克的『梯弗里斯無產者報』。
- 十一月十二日以前
斯大林由梯弗里斯返回巴庫。

年 表

十二月十三日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巴庫委員會印發斯大林寫的傳單『十二月罷工和十二月合同』（爲紀念巴庫

一九〇四年罷工五周年而作）。

十一月至十二月 斯大林給黨中央機關報寫『高加索來信』。

一九一〇年

從一九一〇年起，斯大林是黨中央委員會特派員（『中央委員會代辦』）。

一月五日 在斯大林直接參加下創辦的『梯弗里斯無產者報』創刊號出版。

一月二十二日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巴庫委員會通過斯大林起草的關於必須召開全黨代表會議、把實際領導黨工作的中心移到俄國國內和出版全俄指導性報紙的決議。

三月二十三日 化名爲查哈爾·格里哥良·梅利疆涅茨的斯大林被捕。

斯大林寫的傳單『德國工人領袖奧古斯特·倍倍爾』印就並散發。

三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被囚禁於巴庫的拜洛夫監獄。

九月七日 斯大林在監獄裏接到高加索總督八月二十七日關於五年內禁止斯大林在高加索居住的決定。

九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被遞解往索里維切果茨克。

十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到達索里維切果茨克。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
至一九一一年六月
斯大林和列寧建立聯系，舉行流放者會議，會上做學術演講，討論當前政治問題。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斯大林寫信給黨中央（『自索里維切果茨克流放地寄給黨中央的信』）。

一九二一年

三月至六月

在索里維切果茨克斯大林（在庫查柯娃家裏）被搜查多次。

六月一日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在巴黎舉行會議，斯大林缺席被任命為召開黨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候補委員。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斯大林在索里維切果茨克因組織被流放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會議被拘禁三天。

六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流放期滿，免除警察的公開監視。斯大林被禁止在高加索、省會和各工業中心居住，於是他選擇位於通往彼得堡大路上的沃洛果達作為居住地。

七月六日

斯大林持通行證從索里維切果茨克前往沃洛果達。

七月十六日

斯大林到達沃洛果達。

七月至九月

斯大林在沃洛果達受警察秘密監視。

七月

斯大林寫信給列寧領導的『工人報』編輯部。斯大林在信裏說明他打算在彼得堡或莫斯科工作。

九月六日

斯大林秘密地從沃洛果達前往彼得堡。

九月七日

斯大林到達彼得堡，用契日柯夫的居民證報戶口。

九月七日至九日

斯大林會見布爾什維克托德利亞和阿利路也夫，和黨的彼得堡組織建立聯系。

九月九日

斯大林被捕入獄（彼得堡拘留所）。

十二月十四日

斯大林被流放到沃洛果達受警察的公開監視，期限三年。

年 表

三九五

十二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到達沃洛果達。

一九二二年

一月五日(十八日)
至十七日(三十日)

在黨的第六次代表會議(「布拉格代表會議」)上，斯大林缺席當選為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二月中旬

在代表會議上建立了以斯大林為首的領導俄國實際革命工作的中心(中央委員會俄國局)。
中央委員會俄國局委員奧爾忠尼啓澤受列寧的委託到沃洛果達見斯大林，把布拉格代表會議的決議面告斯大林。

二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從沃洛果達流放地逃走。

三月初

斯大林寫傳單「擁護黨！」。這傳單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印行，在俄國各地廣泛散發。

三月上旬

斯大林到達巴庫和梯弗里斯，組織南高加索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工作以執行布拉格代表會議的決議。他寫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給黨的各地組織的第一號通知書，通知它們中央委員會已完全組成。

三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召開巴庫布爾什維克區組織的工作人員會議。會議表示擁護布拉格代表會議的決議。

三月三十日

斯大林給「社會民主黨人報」寫關於巴庫會議情況的通訊。

四月一日

斯大林從巴庫前往彼得堡。

四月初

斯大林在往彼得堡的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會見奧爾忠尼啓澤。
斯大林寫傳單「五一萬歲！」。

斯大林把莫斯科一部分黨的工作者表示擁護布拉格代表會議決議和擁護新建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全文寄往梯弗里斯。

斯大林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寫信給蔡特金，請她把保管的黨的經費交給中央委員會作爲進行第四屆國家杜馬競選運動之用。

四月十日

斯大林秘密到達彼得堡。

四月十日 至 二十二日

斯大林主編布爾什維克的工人報紙「明星報」。

「明星報」刊載斯大林的幾篇文章：「新的時期」（社論）、「實際生活在勝利着！」、「他們幹得好……」、「奔流起來了！……」（社論）、「他們怎樣準備迎接選舉」、「結論」（社論）等等。

四月中旬

斯大林和第三屆國家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的成員坡列塔也夫和坡克羅夫斯基，以及布爾什維克著作家奧里明斯基和巴圖林商談「真理報」的出版和方針問題，並和他們一起編輯該報創刊號。

四月二十二日

工人的日報「真理報」創刊號出版，刊載斯大林的「我們的目的」一文。

斯大林被捕，監禁獄中（拘留所）。

七月二日

斯大林從彼得堡被遞解到納賴姆邊區流放，由警察公開監視，期限三年。

七月十八日

斯大林由監視員押解乘「柯爾巴什維茨」號輪船從托姆斯克開往納賴姆流放地。

九月一日

斯大林從納賴姆流放地逃走。

九月十二日

斯大林到達彼得堡。

九月至十月

斯大林領導第四屆國家杜馬競選運動，組織反對孟什維克取消派的鬥爭。
斯大林主編「真理報」。

年 表

三九七

十月四日 在斯大林領導下彼得堡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舉行會議，會議通過舉行罷工一天的決定，以抗議取消彼得堡各大工廠（普梯洛夫等工廠）選舉初選人的權利。

十月初 斯大林召開黨的秘密會議，會議上討論了對取消派鬥爭的策略並擬定第四屆國家杜馬工人代表的候選人名單。

斯大林寫「彼得堡工人給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託書」。

十月中旬

斯大林把「彼得堡工人的委託書」寄到「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給列寧（「委託書」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十八日）發表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十八、二十九兩號合刊上）。

十月十七日

彼得堡省工人選民團初選人代表大會通過斯大林起草的「委託書」。

十月十九日

「真理報」第一四七號刊載斯大林的論文「初選人的意志」（社論）。

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三日）

克魯普斯卡婭受列寧的委託寫信給「真理報」和社會民主黨黨團的成員們，請斯大林務必去克拉克夫一行。

十月二十四日

「真理報」第一五一號刊載斯大林的「關於彼得堡工人選民團的選舉結果」一文。

十月二十五日

「真理報」第一五二號刊載斯大林的「今天選舉」一文。

十月底

斯大林在莫斯科住了一些時候，和新當選的第四屆國家杜馬代表——布爾什維克工人建立聯繫。

十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從莫斯科返回彼得堡。

十一月十日前

斯大林秘密到克拉克夫見列寧。

十一月十一日（二十四日）

列寧把斯大林寄給他的「委託書」寄給「真理報」編輯部，建議「用大號字登在顯著地位」。

十一月上旬

斯大林參加在克拉柯夫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

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

斯大林從克拉柯夫回到彼得堡之後，領導第四屆國家杜馬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工作。

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

列寧寫信給斯大林談到準備紀念一月九日事件和必須印發傳單的問題。

十二月上旬

克魯普斯卡婭受列寧的委託寫信給斯大林，要他務必到克拉柯夫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和第四屆杜馬代表（布爾什維克的「六人團」）的聯席會議。

十二月底

斯大林秘密赴克拉柯夫。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至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十四日）

斯大林參加列寧主持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和黨的工作人員及社會民主黨杜馬黨團成員（布爾什維克）的「二月」聯席會議。在會議上列寧和斯大林擬定了改進「真理報」編輯工作的措施。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二三年一月初

斯大林寫的傳單「告俄國全體男女工人書」印就並散發。

一九一三年

一月十二日

「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十號刊載斯大林的兩篇文章：「彼得堡的選舉（聖彼得堡來信）」和「在走向民族主義的道路上（高加索來信）」。

一月下半月

斯大林從克拉柯夫到維也納，辦理在巴黎印刷列寧寫的關於「二月」聯席會議和會議決議的「通報」。

一月 斯大林寫「民族問題和社會民主黨」一文。該文刊載在一九一三年三月至五月「啓蒙」雜誌第三期至第五期上。

一月至二月 斯大林寫傳單「連納慘案一周年」。

二月中旬 斯大林從國外回到彼得堡，遵照列寧的指示，和斯維德洛夫夫一起着手改組「真理報」編輯部。

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彼得堡布爾什維克組織假卡拉什尼柯夫交易所會場舉行的音樂會上被捕，監禁獄中。

二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四十七號刊載斯大林的「社會民主黨黨團狀況」一文。

七月二日 斯大林被流放到土魯漢斯克邊區，由警察公開監視，期限四年。

七月十一日 斯大林到達克拉斯諾雅爾斯克。

七月十五日 斯大林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被解往土魯漢斯克。

八月十日 斯大林到達土魯漢斯克，被解往柯斯廷諾小村流放地。

一九一四年

三月上半月 斯大林被轉解至北極圈內的庫萊卡村。警察對斯大林的監視更爲嚴密。

一九一五年

二月二十七日 斯大林到修道院村訪問當時在流放中的斯涅達梁，從那裏寫信給列寧。信中批判了採取機會主義立場的普列漢諾夫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護國主義路線。

夏季

十一月十日

斯大林在修道院村參加被流放的政治犯（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俄國局的委員和第四屆國家杜馬布爾什維克黨團的成員）會議。會議討論黨團審判案問題。
斯大林從土魯漢斯克流放地寫信給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

一九一六年

二月五日

斯大林寫信給在國外的黨中央，報告他在寫有關民族問題的文章。

二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經由阿爾曼德致函僑居國外的布爾什維克中央，信中詢問由阿爾曼德轉寄國外的「論民族文化自治」一文的下落。

三月十二日

斯大林和斯津達梁以及其他流放者聯名寫信給「保險問題」雜誌編輯部。

十二月十四日

因徵召流放政治犯入伍，斯大林被遞解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

一九一七年

二月初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徵兵委員會免除斯大林的兵役。

二月二十日

斯大林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赴阿琴斯克，他被准許在那裏住到流放期滿。

三月八日

斯大林和一批流放者從阿琴斯克出發赴彼得格勒。